

目 录

日本军部致 731 部队长北野中将的秘令	
.....	管宁 搜集翻译 (1)
中苏条约谈判的俄国档案文献	
.....	张木生 翻译 沈志华 编注 (5)
康有为收文录 蒋贵麟 辑 (46)
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遇难者遗骨发掘纪实	
.....	朱成山 (81)
抚顺平顶山惨案幸存者证词 佟达 整理 (98)
回忆一九三八年延安之行 堵述初 (141)
1855—1889 年银钱比价、物价等资料 张德昌 (182)
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大事记	
(1924—1927) (续一) 司马文韬 (216)
1895—1899 年王先谦行年事迹考辨 邱涛 (261)
《近代史资料》总 85 号—94 号篇目解题	
.....	刘建光 编 (273)

日本军部致 731 部队长北野中将的秘令

管宁 搜集翻译

编者按：1946 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战争罪行。盟军总司令部得知日军曾在中国东北部进行过细菌战试验，便命传讯日军 731 部队长到庭作证。日本军部怕案情暴露，便向当时担任 731 部队长的北野中将发出密令，指示其不得回国受审，而由增田大佐（大校）代替北野回国向驻日盟军总司令部（麦克阿瑟司令部）“出头”，并指示其编造谎言，隐瞒 731 部队进行细菌战试验的罪行。1996 年，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常石敬一先生在一友人处得到了这份极其秘密的“指令”原件，并将之公布于众，揭露了当年日本军部编造谎言，欺骗国际法庭，逃避法律制裁的丑恶行径。去年笔者访问常石先生之时，得先生允，复制原件一部，现译出公布于此，以为我国研究者参照。

致北野中将联络事项

- 一、○^① 及“保作”^② 之事绝对不可说出。
- 二、石井部队长以下之关防给^③ 尚在满洲。

① “○”指用于作人体试验的活人体，即“丸太”，意为原木。

② “保作”即保密作战，指细菌战实验事。

③ 职务所属、任职地。

三、增田大佐排除万难，单独归还（回国），向“麦”司令部^①出头。

四、关防给为：总务部长兼第四部长大田、第一部长菊池、第二部长碓、第三部长兼资材部长增田大佐。其他转出或解队。

五、担任：第一部 研究；第二部 防疫实施及指导；第三部 给水实施与指导以及资材修理；第四部 制造、资材部 资材保管、补给。

六、场地使用：七、八栋——中央仓库、田中班——P 研究^②、八木泽班——自营农场。

七、关于“保研”，除石井队长、增田大佐以外，（余者）不得知道综合性事宜。研究要细分，经常换人担当之。其他人只可使部分地知道，而不可使得知研究之目的。

八、北野中将在职中，除对前任者之实验进行部分追加试验外，并未积极地研究，呈中止状态。

九、“保研”非上级指示，乃出于防御研究上的必要，由一部分人进行的。

十、北野中将在职中，专一埋头于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

① 指麦克阿瑟驻日盟军总司令部。

② 指病毒研究。

附《致北野中將聯絡事項》原件

陸 軍	北野中將へ連絡事項
一〇及保作ハ絶對ニ出サス	二關防給ハ石井隊長以下尙在荷シアリ
三増田大佐ハ萬難ヲ排シテ單獨歸還シマシ司令部 へ出頭セリ	四關防給ハ總務部長兼第四部長大田第一部長 菊池第二部長、碇第三部長兼資材部長 増田大佐トナリ其他ハ轉出又ハ解隊シアリ
五第一節研究第二節防疫實施並ニ指導 第三節給水實施並ニ指導及資材修理 第四節製造資材部資材尿管補給 ヲ担任シアリ	六七棟一中央倉庫、田中一班一P研究、八木澤班一 自營農場ニ使用シアリ

七、保研^レニ關シテハ石井隊長増田大佐以外ハ綜合
 的ニ知レルモノナシ
 研究ハ細分シテ常ニ人ヲ代ヘテ之ニ當ラシメアルヲ以テ
 他ノ者ハ部分的ニ之ヲ知レルクミナリ而モ其目的ハ
 知得シアラザルナラン
 八、北野中將在職中保研^レハ前任者ノ實際ヲ若
 干追試セル外積極的ニ研究セズ中止ノ狀態ナリ
 九、保研^レハ上司ノ指示ニアラス防禦研究ノ必要上一部
 ノモノガ研究セルモノナリ
 一〇、北野中將ハ在職中專ラ流行性出血熱ノ研究ニ
 没頭セリ

（原件为日本陆军用信箋，微黄，长24mm，宽17mm，用蓝墨水书写，共二页。）

中苏条约谈判的俄国档案文献 (1949 年 12 月—1950 年 2 月)

张木生 翻译 沈志华 编注

说明：新中国成立之初，经与苏联商定，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出访苏联，目的是参加斯大林 70 寿辰的庆祝活动，商谈和签订中苏之间的有关条约和协定，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949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通过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多次商谈，毛泽东终于迫使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以取代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0 年 1 月 20 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经过反复会谈和协商，中苏两国于 1950 年 2 月 14 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的协定》，并通过了关于废除 1945 年条约和外蒙古独立的《公告》。当时双方确认但未予公布的还有上述两个协定的议定书和条约的《补充协定》。2 月 17 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莫斯科回国，留下中国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方面谈判贸易协定等其他问题。这次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以及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动。

关于这次外交谈判的情况，直到 80 年代后期，中国方面才开始公布一些有关的电报、信函，并出版了几部当事人的回忆录，使我们得以对这次中苏谈判的过程有了一个大致

的了解。但是，我们仍然无法依据现有的文献和材料，对于中苏谈判过程进行具体的和详细的考察。不久前，我们在俄国解密的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这次中苏条约谈判的历史文献，共有70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或协定的最初文本和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这里发表的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以及周恩来分别与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等谈判的纪要。这些文献反映了中苏双方在签订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时各自的立场、设想、方针及其变化过程。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1949年12月16日)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费德林等同志和师哲（卡尔斯基）同志。

在互致问候和寒暄后，进行了下述内容的会谈。

毛泽东同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了解世界和平的情况将会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保障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么说，中国是在为和平而战。苏联也首先致力于和平问题，虽然它实现和平已有四年。至于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恢复起来，因此它没有能力准备战争；美国虽然在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打仗；欧洲被战争吓

破了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会打中国吗？

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不仅可以保障 5—10 年或 20—25 年，甚至可能是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 1945 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 and 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 and 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最好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采取这样的措施。

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到中方的愿望，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对协议的有关条款做些修改。但是，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个设想，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同志：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仅靠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有效地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此外，中长铁路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同志：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援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这种援助的话。问题在于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样一来，任

何人都可以说，如果苏军可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在香港驻军，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

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么在国际上我们将博得好评。同时，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的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尊重民族资产阶级。

条约保障了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是，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而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撤出军队。当然，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驻旅顺的军队可以留下2年、5年或10年，就看如何做对中国有利。别让人们以为我们想从中国逃跑。我们也可以把军队留下20年。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

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毛泽东同志：希望能解决苏联给中国贷款的问题。也就是说，苏联政府同中国政府之间签订一个贷款三亿美元的协议。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如果您想现在就签订协议的话，我们同意。

毛泽东同志：是的，正是现在，因为这可能会在中国引起很好的反响。

与此同时，必须解决贸易问题，特别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虽然我们目前无法提供这一地区的准确的贸易业务计划。

斯大林同志：我们现在要知道中国需要哪些设备，因为我们没有备用设备，必须预先向工业部门提出申请。

毛泽东同志：在编制设备订单方面，我们感到有困难，因为工业情况我们还不清楚。

斯大林同志：希望尽快提出订单，因为设备订货在我国工业部门至少要提前一年安排下去。

毛泽东同志：我们非常想在建立空中航线方面得到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我们已打算好给予这方面的援助。空中航线可以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提供援助是有保证的。

毛泽东同志：在建立海军方面，我们同样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可以在旅顺为中国海军培养干部。你们出人，我们出船，完成学业的中国海军干部，可以开着这些船返回中国。

毛泽东同志：国民党分子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攻占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

斯大林同志：不会不给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的干预提供借口。至于参谋人员和教官，我们随时都可以提供。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你们有空降部队吗？

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原国民党的空降团，现在已转到我们方面来了。

斯大林同志：可以挑选一个空降连，把任务告诉他们，将他们空投到台湾，然后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

毛泽东同志：我们的部队已进抵中缅边境和中国与印度支那的边境。因此，英国和美国担心，我们的部队是要越过边境，还是到此为止。

斯大林同志：可以放出风去，说你们打算越过边界，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上，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但我们认为，我们不必急于得到承认。我们必须整顿国内秩序，巩固自己的地位，尔后再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谈判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是正确的策略。然而，不必亲自出面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生冲突。例如，如果需要对英国施加压力，那可以通过广东省与香港的冲突来做到这一点。而为了妥善解决这类冲突，毛泽东可以作为调停人出面。主要的是不要匆忙行事和避免冲突。

外国银行是否仍在上海营业呢？

毛泽东同志：仍在营业。

斯大林同志：它们为谁服务呢？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企业服务，这些企业我们暂时还未触动。至于外国人的影响，在经济和商业领域，主要是英国人的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国人占主要地位。

斯大林同志：日本企业的情况如何呢？

毛泽东同志：已将它们收归国有。

斯大林同志：海关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注意海关，它通常是国家巨额收入的来源。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我们已取得完全的成功，

至于文化和经济，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摆脱外国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在外国企业、银行等处，你有稽查人员和情报人员吗？

毛泽东同志：有。我们在研究和监督外国企业方面（开滦矿务总局、上海的电厂和水厂等），进行了相应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必须有按照法律行事的政府稽查人员。对外国人征税必须多于中国人。

钨、铝、石油的开采权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发展采矿业。尤其是石油开采，可以在兰州以西至成都铺设输油管道，然后通过管道运输燃料。

毛泽东同志：我们还没有决定中国哪些地区必须首先发展——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因为我们尚不清楚和平的前景。

斯大林同志：石油、煤炭、钢铁总是需要的，不论将来是否打仗。

斯大林同志：在中国南方能否栽培橡胶树呢？

毛泽东同志：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

斯大林同志：中国有气象站吗？

毛泽东同志：没有，还没有建立。

斯大林同志：应该建立。

斯大林同志：我们想从您那里得到您的译成俄文的著作目录。

毛泽东同志：我正在审校自己的著作，它们是由各地的出版社印刷的，有很多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我打算在1950年春季以前审校完这些著作。但我希望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与俄语翻译一起对文稿进行加工；第二，对中文原稿进行校订。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但是对您的著作进行校订还需要帮助吗？

毛泽东同志：需要。请您为此指派一位适当的同志，比如说，一位联共（布）中央委员。

斯大林同志：如果需要，这也可以做到。

（费德林同志记录）

毛泽东与罗申关于访苏安排的会谈纪要

（1950年1月1日）

摘自罗申日记

根据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指令，1月1日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

互致新年问好和礼节性问候之后，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同志谈到了如下问题。

最近几天，他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通知缅甸和印度政府，如果他们确实希望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那么他们必须首先完全断绝与蒋介石的联系，并发表官方声明，无条件地拒绝向蒋介石政权提供任何支持和援助。在印度和缅甸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

毛泽东同志指出，还有消息说，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谈到中国的军事形势，毛泽东同志指出，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全部主力部队都已经被消灭了。在四川和新疆，差不多有40万国民党军队被俘或编入人民解放军。胡宗南匪帮约3—4万人残余部队逃向西藏和南方的道路已经被全部切断，不久将被消灭。在云南，还有3万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分散在昆明西南地区，但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毛泽东要求向苏联领导人转告他的健康情况，以及他在莫斯科停留的下一步计划。毛泽东说：“经过两年时间的休养，我的健康情况已经好转。最近4天，我每天睡8个小时没问题，没有吃安眠药。但外出散步时，我在冷空气中逗留不能超过一刻钟，这样我会感到头晕。鉴于这种情况，我想静养一个多星期，完全恢复正常的睡眠。”

他还提出，在以后一周的休息期间，他想会见什维尔尼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和维辛斯基。这些会见只能以普通会谈的方式进行。他不会提任何特别的问题，也不讨论工作问题。每天只会见一人，谈话不会长。他认为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时间是在下午5—6点钟以后。

在这段时间里，他想与斯大林讨论工作问题。

讨论了工作问题后，他想在停留的剩余时间里向列宁墓献花圈，看一看地铁，参观集体农庄，观看歌剧，然后结束在莫斯科的停留。

毛泽东同志强调，他不参观工厂，不接见大批客人，不发表公开讲话，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的健康，再次破坏他的睡眠习惯，并引起头晕复发。以前他想访问苏联其他地方，但由于健康情况，而且回国时还要进行长途跋涉，所以他现在不想在苏联旅行了。

离开北京时，他曾想在苏联逗留三个月，然而最近国内的工作需要他把停留的时间减少到两个月。考虑到乘火车回北京要11天，他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6日到达北京。

听完毛泽东同志的谈话后，我说，我将在第二天把他的所有要求转告给苏联政府。

我又问毛泽东同志，他是否知道苏联政府（1949年）11月提出的建议，即将几百名日本军官引渡给中国政府，以便使他们接受对他们在华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

毛泽东同志说，他在离开北京时已经知道这一情况，因他们正忙于莫斯科之行的准备，中国政府未能认真考虑这件事。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中国政府原则上愿意接受这批罪犯，但是，考虑到最近中国人民正忙于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以及中国的司法制度还不健全，中国政府在公众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之前不能开始审判，因为这样无法造成必要的政治影响。此外，中国政府必须同时准备审判国民党战犯。

考虑到毛泽东所说的所有这些情况，我估计6个月后我们可以让这些战犯离开苏联国土。我请求苏联政府在1950年上半年把这些战犯留在国内，如果可能的话，收集有关他们罪行的更多的证据。从今年下半年起，我们将引渡这批战犯，让他们接受审判。

正式讨论结束后，毛泽东邀请我与他共进晚餐，我接受了邀请。

与毛泽东同志分手后，我继续与卡爾斯基一起等汽车。卡爾斯基告诉我，毛泽东三天以来感觉非常好，他睡眠好，没有吃药，爱开玩笑，很兴奋，很健谈。但是像以前一样，他不能长时间在户外呼吸冷空气，他仍犯头晕。毛泽东同志确实决心再休息一周，不去任何地方旅行。2月2日将有医生会诊。

毛泽东与维辛斯基谈话纪要

(1950年1月6日)

摘自维辛斯基日记

今年1月6日，我拜访了毛泽东，简短的互致问候以后，开始了正式会谈。

一、我告诉毛泽东，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要求

帮助恢复吉林水电站^①，苏联政府已经做出决定，五天之内，四名苏联专家去中国，为期一个月，他们必须写出一个关于水电站情况的报告，并拟定恢复吉林水电站的必需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对苏联政府提供的所需帮助表示感谢，说苏联政府为此所提供的帮助对中国的整个民族经济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我告诉毛泽东，鉴于刘少奇的电报中提到为了进行航空训练要求苏联供应燃料，（我们）倾向于这样答复，根据我们专家的计算，按苏联空军的标准测定，为此目的所用的燃料是：高辛烷汽油 13400 吨，低辛烷汽油 5270 吨，航空汽油 1315 吨，P—9 型燃油 26 吨。

苏联政府将下达命令，从 1 月开始，在今年上半年向中国提供上述数量的燃料。至于中国提到的这批燃料的支付方式和条件的问题，可以在 1950 年的贸易谈判中解决。

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要求表达他对苏联援助的感激之情。至于燃料的数量，他说“我们的人本来想要的更多”，但对此必须进行严格控制。他感谢苏联政府对此进行复核，他完全同意采取这种作法。毛泽东还说，燃料的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方式进行分配，因为这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利益，在使用外援的商品时应该更加注意节约。毛泽东要求把电报文本留给他。

三、我问毛泽东，他是否认为发表一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声明会更有利，声明的内容是国民党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是非法的，必须把他们驱逐出去。就苏联方面说，苏联倾向于支持这个声明，同时也要求安理会将国民党代表团驱逐出安理会。在国民党代表仍然留在安理会的情况下，苏联代表将宣布，只要有国民党代表存在，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

^① 即小丰满水电站。

作。

毛泽东说，他百分之百同意这个建议，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安理会的这个声明的抄件可以同时递交给安理会成员国。

四、毛泽东说，关于苏联政府给中国人民政府的有关 971 名日本战犯的信，他愿做如下答复：

(1) 总的说来，日本战犯无疑必须移交给中国，并接受审判。

(2) 但是，中国政府主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对国民党战犯的审判同时进行。这样一个司法程序的准备大约在 1951 年上半年或下半年进行。因此，希望苏联政府同意暂时在苏联收押这些日本战犯，大致到 1950 年下半年。

我提出，既然苏联政府受到道义的约束，即到 1950 年 1 月遣返全部日本战犯，或许更有利的是考虑同意在形式上把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而在事实上暂时把他们留在苏联国土上。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完美的方案，他认为是最有利的。

五、毛泽东称，他一直不断地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需要签订一个两国之间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他说，我们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的完全新型的关系。对现存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已经垮台。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我回答毛泽东说，在我看来，新条约似乎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存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做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利益造成损害。这是不希望，并

且不能允许发生的。

毛泽东指出，毫无疑问，当确定签约问题的方案时，这种情况必须加以考虑。

会谈时在座的有伊·弗·柯瓦廖夫、尼·特·费德林，以及师哲。

会谈大约进行了 45 分钟。

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

(1950 年 1 月 18 日)

摘自莫洛托夫日记（绝密）

相互问候并就一般话题进行简短交谈后，进行了下列内容的会谈。

一、我对毛泽东说，1 月 12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做了演讲，其中涉及到了一些国际问题，包括中国、苏联和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艾奇逊就这些问题的讲话是对苏联明显的中伤，并指望对舆论进行欺骗。

美国对华政策失败后，艾奇逊试图为其辩解，不耻使用欺骗手段。从下面这段谈话可以看出他的谎言到了什么程度。

“下面是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苏联正在采取新的手段将中国的北部地区从中国划分出来，并将其归入苏联。在外蒙古这一过程已经完成，在东北地区这件事也差不多完成了。所以，我相信，苏联代理人正在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发出最令人愉快的消息。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即这片居住着中国人的广阔地区正在从中国分离出去，并归入苏联。

“我想声明，或许我会违背自己的否定教条主义的主张，但我想说，在任何情况下，苏联占领中国北部四个地区这一事实，在某个世界强国同亚洲的关系方面是最重要的和最能说明问题

的。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某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建议毛泽东了解一下艾奇逊的这篇讲话，并将（据塔斯社的）讲话全文转给了他。

毛泽东说：众所周知，在此以前，从事这种欺骗活动的主要是以美国记者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坏人，而现在就连美国的外交部长也亲自干起了这种肮脏的勾当。这就是所谓美国人的进步。

我回答说，鉴于艾奇逊的这一讲话，我们认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应以相应的方式做出反应。同时，我指出，据塔斯社从华盛顿的报道，1月14日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所表明的是与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讲正好相反。在此，我援引华德讲话中相应的地方，其中说：尽管苏联根据协议中自己的权利，参与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但他没有看到任何表明苏联正在对东北地区进行监督管理或者力图将其并入苏联的迹象。

我说，我们打算以苏联外交部的声明对艾奇逊的讲话做出反应。但我们认为，最好是中国政府首先就此问题发言，然后，在我们的报刊上刊登中国人民政府的声明和华德的声明后，我们苏联外交部再发表相应的声明。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一点，对此没有任何疑问。不过，他询问说，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

我回答，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的外交部长对如此重要问题的讲话，因此，声明就不应该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来发表。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一意见，并在研究艾奇逊的讲话后，明天就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的文稿，再将其交给我们征求意见和修改，然后用电报发往北京，让正在行使部长职责的外

交部副部长公布这一声明。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在这个声明中他一定揭露艾奇逊的反苏诽谤。

毛泽东还问，在我们看来，艾奇逊的这个诽谤性声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这一讲话是否是美帝国主义企图借此占领台湾的一种烟幕弹？

我说，美国人在其对华政策失败后，总是力图借助于欺骗和诽谤在苏中关系方面造成误解。我还说，也不能否认他们将利用散布谣言作为某种烟幕来实现其占领的计划。与此同时，我指出，根据我们的观点，在中国人民政府关于艾奇逊讲话的声明中应该指明：美国国务卿的谣言是在侮辱中国，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斗争不是为了让某个人统治或监督管理中国的某一部分。中国人民会起来揭穿艾奇逊的谎言。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些建议，并立即起草声明草案。同时，他还请求将艾奇逊的讲话文稿和华德给记者的声明转给北京新华社。我答应今天晚上就办此事，并立即和维辛斯基谈妥了此事。

随后毛泽东说，最近几天，美国人加强了其代理人的活动，以探听与中国人民政府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例如，几天以前，美联社巴黎分社社长问毛泽东，他将如何对待著明的美国远东事务专家杰塞普到北京来谈判这件事。差不多与此同时，又收到了上海发来的消息，驻上海美国领事馆通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已着手采取措施，以便得到中国人民政府的同意，派代表到香港同杰塞普谈判。毛泽东说，然而，对美国人的这种试探，我们是不会理睬的。

其次，毛泽东接着说，正如他以前对维辛斯基说的，中国人民政府要采取一些旨在把美国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的措施。毛泽东强调说，我们需要赢得时间在国内整顿，因此，我们将努力延缓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越有益处。今年的1月14日，北京地方政府向前

美国领事声明，他们因自己的需要打算收回外国军队的营房，这些营房是外国人过去凭借不平等条约而得到的。占领上述这些房屋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领事将失去他现在占用的房子，并迫使他离开北京。美国驻北京的领事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开始对中国当局进行威胁说，为了表示抗议，将不得不召回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的所有领事代表。毛泽东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说，这样，美国人对我们的威胁恰恰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我指出，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首先是要保证国内状况的稳定，对此我们是非常清楚和理解的。

二、我接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不合法的，蒋廷黻应被驱除出安理会的声明，以及苏联驻安理会代表同时所采取的行动引起了混乱，并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敌人的队伍乱了阵角。但是，为了将在联合国中已开始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自己驻安理会的代表是适宜的。并且，理想的是这种派遣应尽可能快些进行。

毛泽东回答说，这个问题他同维辛斯基同志谈过并完全同意这种建议。但是，毛泽东强调，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还存在着技术困难，即挑选候选人。唯一合适的候选人就是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同志，尽管他在这方面稍微弱了一些。关于任命章汉夫的事，在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时，我想同他商量一下。

我说，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么，目前周恩来尚在途中，可以同他在高频电话中谈一下。

毛泽东高兴地同意利用高频电话与周恩来联系，并立即商议这个问题。

三、随后我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消息，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仿佛打算脱离国民党，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但是我们对这些消息是否可信没有把握，此外我们对朱世明所知甚少，因此我们很难对他做出明确的结论。所

以，我们想同毛泽东讨论这个问题，并要弄清楚，是否应该等待朱世明自己声明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不等到这一时刻，就要求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开除国民党的代表。

毛泽东说，从他的观点看，通过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代表团的秘书郑金兆来办这件事比较合适些。不久前这位秘书通过杰列维扬科将军^①寄来一封信，提及了他正在进行的有关上述代表团在东京的工作人员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指出，应当对朱世明施加影响，推动他转到我们方面来，这将使我们能更平稳地解决派遣我们驻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代表的问题。

毛泽东说，他将起草对郑金兆的复信，并将其寄给我们，转交东京的收信人。

我说，这个建议可以采纳，我们可以通过杰列维扬科将军将毛泽东的答复转给郑金兆。

会谈持续了1小时20分钟。

参加会谈的有：尼·特·费德林和师哲（卡尔斯基）同志。

维·莫洛托夫 1950年1月18日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1950年1月22日）

互相问候、简短叙谈以后，举行会谈，内容如下：

斯大林：有两类问题需要讨论，第一类问题涉及中苏现有各项协定，第二类问题涉及有关满洲、新疆等现实问题。

我想，最好不从现在的问题谈起，而是先讨论已有的协定。我们认为，这些协定必须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经考虑可以把它

^① 杰列维扬科，时任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

们保留下去。已有的协定，包括条约在内，必须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的原则。既然战争结束了，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变了，那么，现存的条约就落后于时代了。

请对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发表意见。

毛泽东：我们还没有具体拟定好条约的草案，仅有一些设想。

斯大林：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起草有关草案。

毛泽东：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已经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发动新的侵略。既然两国的繁荣对我们有利，那么就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阻挠这件事。

斯大林：对的。日本保留了干部，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他们目前政策的条件下，日本必然会重新抬头。

毛泽东：我所说的两点是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存的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建立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

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斯大林：要不要保留写入原友好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呢？即“在联合国应缔约国双方的要求承担起防止日本今后侵略的责任以前，本条款继续有效。”

毛泽东：我想，这一条就不必保留了。

斯大林：我也认为不必了。在新条约中应规定哪些条款呢？

毛泽东：我们认为，在新条约中必须规定在国际问题上协商的条文。把这一条列入条约将增强我们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民

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在国际关系上反对向苏联靠拢的意见。

斯大林：好的。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时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对。

斯大林：委托谁去起草草案呢？我想，应该让维辛斯基和周恩来去做这件事。

毛泽东：同意。

斯大林：现在转入中长铁路协定。您对这个问题有何建议。

毛泽东：也许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

斯大林：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

毛泽东：我们必须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对的。我们认为，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是担心，这会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果。

斯大林：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对日战争时期签订的现有条约。我们不知道蒋介石会被推翻。我们的出发点是，我国军队驻旅顺将对苏联和中国民主事业有利。

毛泽东：这个问题是清楚的。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认为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俄军撤

出旅顺。或者可以提出另一种方案，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哪一种方案更合适，就采纳那一种方案，我们同意任何一种方案。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我们希望在旅顺我们之间进行军事合作，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斯大林：大连问题，我们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

毛泽东：大连是否保留作为自由港？

斯大林：既然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应当自己决定大连问题，它是自由港或者不是。当年罗斯福曾坚持让大连成为自由港。

毛泽东：这么说，保留自由港是符合美、英利益喽？

斯大林：当然，其结果就是门户开放。

毛泽东：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斯大林：就是说，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依然有效，签订和约以后现协定失效，俄国撤走自己的军队。我可以把说过的意思这样归纳吧？

毛泽东：核心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想写在新条约里的正是这一点。

斯大林：继续讨论中长铁路问题。按照共产党人的态度，请告诉我们，你们有哪些疑问？

毛泽东：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经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说到管理，那么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然后，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

规模。

莫洛托夫：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担任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 2—3 年轮流一次。

周恩来：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中长铁路理事会以及铁路局长的职务应该撤销，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就必须轮换担任。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

周恩来：要不要修改双方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 51%，以代替现行的平均投资？

莫洛托夫：这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

斯大林：我们确实有同捷克和保加利亚的协定，规定了双方均衡、平等的原则。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

斯大林：那就讨论贷款协定吧。对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要赋予国家间协定的形式，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军事装备供货是否纳入贷款额之内？

斯大林：这可由你们自己决定，可以用贷款支付，也可以按贸易协定办理。

毛泽东：如果军事供货用贷款来支付，那么，我们为工业剩下的资金就不多了。因此，看来军事供货只能部分靠贷款来支付，部分用商品来支付。不能把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的供货期从 5 年缩短到 3—4 年吗？

斯大林：要看我们的能力如何，要看我国工业的订货情况。然而，毕竟可以把贷款协定的有效期提前到 1950 年 1 月 1 日，

因为实际上现在就应开始供货。如果在协定内从 1949 年 7 月就开始提供贷款，那么，国际舆论就会不理解，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政府，怎么能同苏联达成协议呢？我想，你们应赶快提交工业设备订货清单。应当考虑到，这种清单提交得越早，对事情就越有利。

毛泽东：我们认为，贷款协定的条件对中国十分有利。因为这笔贷款我们总共只付 1% 的利息。

斯大林：我们为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协定，都规定收 2% 的利息。

斯大林同志开玩笑说，如果你们情愿，我们可以给你们提高利率。当然，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从接到的电报中看到，中国政府正准备把军队用于经济建设，这很好。当时，我们也曾把军队用于我国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毛泽东：对的，我们正在利用苏联同志的经验。

斯大林：你们提出中国要为新疆弄到一定数量的粮食吗？

毛泽东：小麦和纺织品。

斯大林：为此，你们要提供一个相应的申请数。

毛泽东：好的，我们起草一个。我们怎样起草贸易条约？

斯大林：你们有什么意见？至今只同满洲有贸易条约。我们想要知道，今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是同新疆、满洲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

毛泽东：我们希望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但同时新疆可以有单独的协定。

斯大林：只是新疆，满洲呢？

周恩来：对满洲则不签订单独的协定，因为中央的条约基本上要靠满洲供货来保证支付。

斯大林：我们希望同新疆或满洲的协定要得到中央政府批

准，并且中央政府要对这些协定负责。

毛泽东：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

斯大林：对，因为省政府考虑不了那么多，而中央政府总是了解得更清楚。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恢复和发展满洲的经济。

斯大林：我想，我们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和李富春同志准备一下这个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我想指出，您派到中国的航空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共运送了将近一万人。请允许我，斯大林同志，感谢您的援助，并请您把这个航空团继续留在中国，为给准备进攻西藏的刘伯承部队运送食品提供帮助。

斯大林：你们准备进攻，这很好，必须把西藏拿到手。至于航空团的事，我们同军方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和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和师哲（卡爾斯基）。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谈判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年2月1日）绝密

约·维·斯大林同志：

在1月31日同我们的谈话中，周恩来对我们的草案提出了下列修改意见：

一、关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 在条约序言的第二段中，以“友谊和合作”代替“友好

关系和合作”。

2. 在第二条, 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代替“在战争期间”。

3. 在第六条, 以“自批准之日起立即生效”代替“签字后立即生效”。

关于第1点, 我们指出了我们的措词比较合适。

关于第2、3点我们不反对。

二、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

1. 给协议书以下述措词的标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

2. 给我们草案序言的第一段加上下述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 自1945年以来远东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即: 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到了失败,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粉碎了) 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被推翻了; 中国已成为人民民主共和国, 并在中国建立了新的人民政府, (与苏联友好的人民政府, 使中国苏联合成统一的国家, 并证明) 统一了全中国, 实行同苏联友好、合作政策, 并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捍卫国家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 维护民族荣誉和中国人民的尊严的人民政府。”

3. 在第一条“无偿地移交”一句话后加上“政府”一词。

4. 序言的最后一句话以下列方式表述:

“根据这些新的情况, (苏联和中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缔结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的本协定。”

5. 第二条第一段用下列方式表述: “缔约国双方代表同意, 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 但不应迟于1952年末, 苏联军队应撤出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 并将该地区的军事设施移交给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

同一条的第二段开头这样表述：

“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军事设施前的一段时期。”

6. 在第三条第二段，以“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替“隶属于中国”。

在上述第2、4、5点中，周恩来建议不用括号中的词，而代之以加着重线的词。

关于上述第1、3、4、5、6点，我们表示，从我方来讲大概不会反对，但答应以后给予答复。至于第2点，我们坚持我们的措词。

讨论的结果是周恩来表示，他将不坚持自己的措词，答应考虑后再来谈这个问题。

三、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

1. 序言以下列方式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

2. 把我们草案的第三点变为第一点。

3. 补充新的第二点如下：

“二、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上尔克斯坦—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以上划线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

我们不反对第1和第2点中的修改。至于周恩来提出的新的第二点，我们答应以后给予答复。

四、关于贷款的协定。

1. 协定的标题这样表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关于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

2. 在第一条的第二段中,以“鉴于中国因其领土上长期的军事行动而引起的财政困难”代替“由于中国遭到严重破坏,以及在其领土上长期的军事行动”……以下见文本。

3. 在第三条中,在“供应原料”一词后加上“工业品”,在“原料的价格”一词中加上“工业品的”。

4. 在第五条中,加上“应经批准,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第1、2和4点中所指出的修改我们不反对。有关第3点的修改,我们答应以后答复。

五、关于贷款协定的议定书。

在第2段用“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购买价格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期限为14年,即从1950年至1963年,按每年易货协定的方式进行”,代替“所有剩余的钨、锑、铅、锡在前10—12年间按照每年的易货协定规定的方式卖给苏联”。

划线的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打算买下全部剩余的钨、锑、铅和锡,中国政府是否可以将部分剩余的产品卖给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对此,周恩来又补充说,捷克斯洛伐克打算购买一定数量的钨(1600吨之内)。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苏联政府准备购买全部剩余的产品。这里说的是中国将不再使用的剩余产品。

我们答应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后告知我们的最后意见。

周恩来在提到航空协定的问题时说,提交给他的我们的草案是相当复杂的,应该将其简化。周恩来所关注的主要是,这个协定是否能让中国人沿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茨克和北京—阿拉木图航线飞行。

米高扬同志说，他还没研究我们专家的草案，所以不能就此问题表示最后的意见，并补充说，他觉得周恩来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在审议这个草案时一定会予以考虑。

此外，周恩来还建议互换关于1945年8月14日的条约和协定已失效的照会。

附上周恩来拟定的照会草案，以及条约和协定的草案。

经与阿·伊·米高扬同志协商，由我呈上报告。

安·维辛斯基 2月1日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年2月2日)

约·维·斯大林同志：

1950年2月1日同周恩来进行了例行会晤。会晤时我们交给周恩来：

1.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2. 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及其议定书）草案。
3. 贷款协定（及其议定书）草案。
4. 互换照会草案。

文件附上。

米高扬同志说，在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中采纳了中方的修改意见。

接着，米高扬提请周恩来注意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义定书的第一条，指出：根据中方愿望该条列为第一条，但作了如下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

苏方的建议是这样的：经满洲里向海参崴调动苏军可以缩短一半的距离，并且在战时可以提供两条调动军队的路线，这一建

议是非常合理和具有说服力的。无需证明，这是指在苏联在远东受到战争威胁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

在中方关于从满洲到新疆调动军队和军用物资的权利的建议中，丝毫未提及此点。

苏方认为这个建议完全不能接受，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沿我们的铁路调动中国部队，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针对苏方关于沿中长铁路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苏方部队的建议的反提案，并且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

这是很明显的，中方没有享有这种权利的任何必要。首先，这是因为还不清楚，新疆现在面临或者将有可能面临来自哪个方面的战争威胁；其次，众所周知，从满洲里经西伯利亚、阿拉木图，还要再步行一千公里才到乌鲁木齐的道路，远比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道路漫长，而且不方便。显然，这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这个建议的合理性。

还有一点我们没有谈到，即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的西伯利亚铁路将忙于运送军队到远东，我们未必会同意从东北到新疆来回运送中国军队。当然，我们不可能同意这样做。

我们对这样提出问题感到很惊讶，因为周恩来本人曾确认：如果苏联将中长铁路转交给中国，那么中国政府就同意，苏联军队在事实上是可以沿中长铁路的任何线路调动的。

现在，我们同意转交中长铁路了，结果，中国人竟然改变了主意，他们反对我们的军队沿中长铁路调动，甚至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也不行。我还指出，列入第二条显然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

这些意见显然使周恩来感到尴尬，他开始详细地解释第二条的含义，为自己的建议辩解，并竭力想证明这完全不是反提案或搞平衡。他指出，最初中国代表团在议定书中根本就没有规定双方调动军队的条款。周恩来说，这种调动是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

逻辑发展。关于这个问题，一旦有必要，随时都很容易达成协议。中方提出第二条，是因为在我们的草案中规定了苏军可沿中长铁路调动。按照周恩来的说法，如果与此同时中方没有得到可以在苏联境内调动自己军队的权利，那么，在中方看来，就不能列入这样的条款。因此，中国代表团认为必须提出自己的第二条，即在该条中规定，中国军队可以沿满洲至新疆的苏联铁路调动。

此外，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打算利用这些铁路从满洲调运粮食和其他货物供给驻新疆的部队，这大概能节省很多开支和时间。

米高扬同志再次提请注意，中长铁路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距离，较之苏联境内从赤塔到海参崴要短得多。至于说到沿苏联铁路调动中国军队到西部，米高扬同志说，这并没有实际需要。中国政府也没必要从满洲运输粮食和货物，因为这样是非常昂贵的，而粮食也可以在新疆境内买到，就像现在做的一样。

米高扬同志指出，如果中方反对苏方的建议，那么，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就取消苏方的这些建议，而采纳周恩来关于缩短中长铁路租赁期的建议，其方式是把已经缩短现有协定的有效期再保留十年。周恩来声明，还是新修改的第一条要好一些，即规定一旦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时可以沿中长铁路调动苏联军队，对此他不反对，但要向毛泽东报告。他不同意米高扬同志重新讨论缩短中长铁路租赁期问题的建议。

关于偿还苏联用于自1945年以来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费用的问题，周恩来建议将有关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议定书第二条中的“偿还苏联的费用……”一句改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还苏联的费用……”。我们同意周恩来的这一修改。

对贷款协定草案中其他的修改部分，周恩来表示同意。

接着，周恩来了解了新的贷款协定义定书草案的内容后，请

求取消供应铅的条款，其理由是中国不能供应铅。中国目前每年对铅的需求量达 20,000 吨，因此中国还不得不进口铅。

关于钨、锑、锡的供给数量，周恩来说，虽然全部提供这一数量是可能的，但中国担心在开始的两年是否能保证确切地履行这一职责。他建议在议定书中加一个补充说明，即中国在满足自身的需要后，将首先把多余的上述原料供给苏联，或说明在我们草案中所指定的最初两年的数量是有条件的。周恩来未提出自己的条文，只是说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米高扬同志问，对议定书草案还有什么意见。周恩来回答，议定书原来的草案指明是国际市场价格，修改后的文本没有说明这一点。

米高扬同志解释说，因为在这个议定书草案中讲的是按年度易货协定供货，自然，这些供货将按国际市场价格进行，两国之间的易货也将以这个价格为基础。所以在议定书草案中没有提国际市场价格的问题，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中方坚持要指明价格问题，我方也不反对。

维辛斯基同志把经苏方修改的中方的《互换照书》草案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修改的部分表示同意。

然后米高扬同志又解释说，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应规定航空运输合营公司的飞机可以沿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茨克、北京—阿拉木图航线飞行的建议是正确的。

此报告经与阿·伊·米高扬同志商议，由我呈上。

安·维辛斯基 1950 年 2 月 2 日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年2月3日) 绝密

约·维·斯大林同志：

1950年2月2日同周恩来进行了例行会晤。周恩来声明，中方已分析了2月1日转交给他们的条约和协定草案，并对这些草案进行了研究，现通报如下。

赞成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此没有任何修改。

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可以接受，不作修改。中方建议，在该协定义定书第三条中，将第1点并入第2点。

我们同意这一修改。

周恩来又说，除了与议定书草案有关的问题，他还想谈一下沿苏联铁路调运中国军队和物资的问题。周恩来问，尽管在文件中没有规定这个问题，是否有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满洲向新疆调运中国军队。

米高扬同志说，正如他上次所表明的，中国关于经苏联领土调运中国军队的权利的建议之所以被拒绝，并不是因为我们要排除在实际必要的情况下，按照同盟国之间的条约，沿我们的铁路调运中国军队的可能性。

米高扬同志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再一次表示惊讶。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

然后，米高扬同志又说，苏联政府考虑了中方关于取消议定书中供应铅的条款的请求，决定满足这一请求。至于钨，我们同意开头两年将钨的供给量从8000吨减少到7000吨。

周恩来援引从本国贸易部长那里获得的详细情况声明说，中方不反对在头两年供应 8000 吨钨。但他们请求将锡的供应量第一个两年从 7000 吨减至 5000 吨，第二个两年减至 6000 吨，以后的十年保持按每年 10000 吨供应。周恩来对这一请求做出的解释是，产锡的云南省刚解放不久，同时根据得到的情报，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些锡矿开采区进行了破坏。他还补充说，如果苏联给予援助，他们就能较快地扩大开采量，到时就可以按苏联需要的数量完成供应任务。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如果中方提出具体需要什么帮助，我们是可以帮助的。

谈到供应锑的问题，周恩来说，锑的开采地区位于湖南省，但是，无论是在日本人统治时期，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地区都遭到了破坏。因此，要完成苏方指定的定货是很困难的。有鉴于此，中方请求在第一个两年将锑供应量降至 4000 吨，在第二个两年减至 5000 吨，在以后的十年保持每年 8000 吨的数字。但如果苏方能在这方面也给予相应的帮助，苏方的定货是可以完成的。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我们坚持我们的数量并准备给予帮助，只要你们说出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米高扬同志还强调，保持这些数量将刺激中方去扩大这一中方本身也有利害关系的原料的开采量。与此同时，这也是对履行协定承担一定的责任。

周恩来回答说，因为中方对这种原料的开采量还不清楚，为了弄清情况，已经给北京拍了电报加以询问，至今还没得到答复。因此，中方请求等收到答复后，可以就这个问题再讨论一次。在没收到肯定答复时，不得不缩减供货数量。

我们不反对收到答复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周恩来指出，在议定书最后一段谈到偿还贷款的期限时，不

用 1955 年，应注明为 1954 年，贷款协定第三条是这种更改的根据。

我们不反对。

对于所有的文件，中方再没有提出其他的意见。

周恩来建议 2 月 3 日最后审定条约和协定的中、俄文两种文本。

我们同意。

接着周恩来又谈起在新疆开采石油和金属的问题。他指出中方有当年张治中同苏方讨论这些协议的草案。中方希望利用这些草案，在乌鲁木齐重新开始这个问题的谈判。但是，鉴于新疆代表团已到达莫斯科，他认为，最好是能在莫斯科开始预备讨论，然后在乌鲁木齐完成。

周恩来补充说，按照他的意见，双方的法定资本应是均等的。合营公司的管理方式应与中长铁路一样，即轮流担任职务的原则。拟定中的合营公司的经营期限应比航空合营公司的经营期限更长。

周恩来谈到在大连的企业的问题时指出，在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生效后，中苏联合委员会应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哪些企业将归中苏双方共同经营。

米高扬同志问，指的是哪些具体的企业。周恩来对此问题答复说，首先就是船舶修配厂的问题，毫无疑问，它应该是属共同经营的范围之内。

双方谈妥，周恩来所提及的问题将由中苏双方代表进行预备性讨论。我方将由葛罗米柯同志参加。

谈到贸易条约时，周恩来建议近日应结束主要文件及其主要附件的审议工作。有关贸易条约的下一步工作（具体定货数量、价格及其他），中方将责成贸易部长负责，在中国代表团离开后，他将与一组中国专家留在这里。

我们表示同意。

接着周恩来又问，在4—5天时间里能否结束贸易协议主要文件的讨论工作。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这一点不仅取决于苏方，也取决于中方。

周恩来又提出，是否应该把空运部队工作结算的议定书看成是航空协定的附件。对这一问题我们解释说，这个议定书看作是单独的，是一份独立的文件，同航空协定没有任何关系。

周恩来说，关于邀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问题，他有一些新的建议。因此他问，他能否会见柯瓦廖夫同志。

双方商定，有关专家问题的讨论将通过外交部进行。

周恩来表示，如果这样，他将就此问题专写一封信给维辛斯基同志。

以前，毛泽东曾请求苏联政府向新疆省提供棉种和农业机具。周恩来指出，曾就这一问题给斯大林同志写过信。斯大林同志把这一请求归入第二类问题。因为在新疆3月份将开始播种，因此最好是不要迟于2月份收到上面提到的农业机具和棉种。

米高扬同志指出，必须要有关于棉种数量和农机具清单的具体申请。

周恩来问，可否以单独清单的形式递交这个申请单。

米高扬做了肯定的回答。

会谈结束时，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同志在最近几天组织他们参观工厂、集体农庄、博物馆等的愿望，这是考虑到代表团的回国日期预定在2月8—9日。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建议问清毛泽东同志的具体愿望和他拟定参观的具体项目。

我邀请周恩来共进早餐，并建议毛泽东和周恩来观看芭蕾舞剧《红罂粟花》。

周恩来表示感谢，接受了共进早餐的邀请。至于芭蕾舞剧，他应允以后告之。

经同阿·伊·米高扬同志商议，由我呈上此报告。

安·维辛斯基 1950年2月3日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年2月12日) 绝密

约·维·斯大林同志：

2月11日米高扬同志和我会见了周恩来。

一、周恩来告之，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了莫洛托夫转交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的协定草案。

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以下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从汉语的角度来看，这个草案的标题必须这样表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一段的结尾俄文是：“协议如下”。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二段俄文是：“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

我们回答，由于这些修改并没有使草案的意义和实质发生变化，大概不会遭到反对。

二、周恩来说，最好是贸易协定同所有文件一起同时签字。我们回答，这将取决于中方。

关于申请单，米高扬同志说，现在就来看看这些申请单。同时，在申请单上有这样一些机械和设备，比方轧钢机、蒸汽锅轮

机等等，这些机械和设备中方希望在 1950 年得到。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就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现在专家们正在确定生产这种设备的时间和可能性，在近期内，我们就可以告之在什么期限内可以提供什么设备。

关于价格问题，中方显然是不熟悉情况的。根据外贸部的资料，一些价格是不符合国际市场价格的。外贸部拥有国际市场所有价格的全部资料，并可以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中方。如果中国代表团来得及了解这些材料，申请单和价格的问题就可以快得多地得到研究。

周恩来回答，如果对申请单的研究要推迟，那么最好是能先签署贸易协定。申请单和价格的问题委托贸易部长和其他专家们进行审议。

米高扬同志回答，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将提交中方进行审议。

三、周恩来接着说，他认为航空协定草案已经达成了协议。

四、周恩来还说，他希望确切弄清楚关于支付专家费用的协议草案的几个问题。周恩来说，我们不理解第四条的内容。该条指出，中国政府应该每月支付给每个专家 2—4 千卢布的补偿金。这笔钱是用于赡养专家的家庭，还是给国家或者直接付给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

米高扬同志和我都进一步明确说，这笔钱将用作对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的补偿。自然，这是通过苏联政府进行的。

然后周恩来又说，如果规定用美元支付，那么中国政府就不得不支付一大笔钱，而如果以实物结算，对中国政府来说就要容易些。

米高扬同志回答，支付协议草案所规定的支付可以是提供实物，也可以用黄金、美元和英镑。

周恩来问，这个协议是否涉及所有各类专家（军事专家、教

师和伊万诺夫专家组等)?)

我回答,根据对协议的理解,它包括各类专家。

周恩来问,可不可以标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出差期限是2—3年。

我们解释说,在同中国的协议草案中指明专家在中国的期限是一年,但有可以延长期限的补充条款。

周恩来答应将把他们对这一草案的修改稿通知我们。

五、周恩来说,中方希望准备签字的文件最好能在2月14日或者2月18日签字,因为从2月16日开始是我们中国的新年,在这个期间,中国将有三天不出版报纸。

周恩来补充说,如果贸易合同草案准备好了,也应该在2月18日签署。

双方商定,日期问题通过大使再进一步协商。

六、接着,周恩来转而谈到2月14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的问题。他问,他们能否请斯大林同志出席这个招待会。同时,周恩来还说,如果斯大林同志不能出席全体招待会,那么,也希望斯大林同志在全体招待会前能参观中国大使馆。周恩来说,我们恳请将这一请求转告斯大林同志。

我们答应一定做到。

七、周恩来请求尽快开始同新疆代表团进行谈判。

米高扬同志回答,在这方面我们期待中国代表的主动性。

八、周恩来说,中方请求葛罗米柯同志明天同中方代表会面。

我们同意。

经与阿·伊·米高扬同志商议,由我呈上会谈记要。

安·维辛斯基 1950年2月12日

附件: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签署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了保证两国的国防，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达成成本补充协定：

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

1950年2月 日订于莫斯科，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注：划线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

(1950年2月12日) 绝密

摘自罗申日记

2月12日晨4时，受葛罗米柯同志委托，与周恩来进行了会晤。

一、关于会见中国新疆省代表的问题，周恩来说，中方准备2月12日19时同葛罗米柯同志会晤，中方出席的人员有：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赛·阿济佐夫^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新

^① 即赛福鼎·艾则孜。

疆全权代表邓力群^①、中国外交部司长伍修权。

二、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苏方移交给中国人民政府的在满洲地区的资产，应按下述方式来办理：

必须起草一个两国政府间的关于苏联将资产移交给中国人民政府的简短的协议。为了移交资产，应成立一个类似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规定的那种联合委员会。

协议中应规定一点，即中国政府将把部分资产以股份公司的形式交由双方共同经营。无论是苏方还是中方，目前都不能确定企业的具体名单。这项工作必须责成联合委员会办理。联合委员会在该项工作结束后应向双方政府报告。

周恩来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上述协议草案应由苏联外交部起草后，于2月12日转交中国大使馆。

三、周恩来请我向苏联外交部长报告下列事情：

在关于不允许各外国公司和团体在满洲和新疆境内从事活动的协定中，没有指明应怎样对待目前在满洲和新疆境内的外国小商人以及在新疆南部的外国牧民（印度、巴基斯坦）。周恩来说：“我们认为，我们将逐步采取旨在使在满洲和新疆的商人缩减经营活动的各种措施，来排挤满洲和新疆的外国商人，可疑分子要迁移，被发现搞间谍活动的人要逮捕，对于其他人要利用税收和地方政权的其他措施进行斗争。新疆南部的牧民比较难对付，对这一类人我们要逐渐驱出。我请求苏方的代表考虑这个问题，并在与我们会面时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四、周恩来还请求向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同志转告，与他们会谈后，他又仔细考虑了支付专家费用协议的第四条，并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协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每月支付苏联专家

^① 邓力群当时是中共中央联络员，1949年6—8月作为政治秘书随同刘少奇访苏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8月14日由莫斯科到达新疆伊宁。

2000—4000 卢布，是做为补偿企业所蒙受的损失而赔偿给苏联政府的，如果规定这笔钱收取美元，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这将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周恩来强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每个专家的费用相当于每月 10000 至 18000 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们每月只有 3400 斤小米，部长们只有 2800 斤小米。

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如果采用供给各种原料和商品的方式作为补偿金，对于中方来说，比支付美元要轻松得多。”我们表示，苏方会考虑这些情况。此外，我们要求告诉我们，支付给每个专家的大体数字，这一数字包括以美元核算的金额以及按照国际市场购买相应商品的卢布价格计算的各种原料的数量。

五、接着周恩来请求转告，2 月 14 日 18 时是签署文件最合适的日期。在这一时间签署已准备好的文件，中方就可以在 14 日将简短的公报和文件等用无线电话通知北京，2 月 15 日所有的中国报纸都能刊登出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2 月 16 日中国将开始过春节（按阴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要过节，在中国北方过节要持续三天，而中原和南方过节要延续一周以上。在这些日子，中国人民将忙于过节和一些拜年活动。因此他们再一次请求苏方对他们予以协助。

罗申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的会谈纪要

（1950 年 2 月 13 日）绝密

摘自维辛斯基日记

在互致问候并就一般话题进行短暂交谈后，进行了下列内容的会谈。

周恩来说，根据他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即将在莫斯科签字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所有协议都应公开发表。同时，周恩来补充说，贸易协定、航空线协定以及在新疆加工石油和有色金属的协定，不能签字，因为这些协定的文本有些尚需进一步协商和明确。

周恩来表示，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协定的中文本已寄给北京，并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汇报，而在签字的协定中有什么不能公布的，必须向政务院成员做专门的解释。周恩来强调说，按照我们的意见，公布所有签字的协定，无论是对中苏两国，还是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更加提高他们在全世界的威信。

我对周恩来说，尽管他表述的意见相当明确，然而双方并未就公布所有的协定和其他文件达成协议，公布这些文件或其他一些文件的问题，必须加以讨论。这个问题我将向苏联政府汇报。我会立即将苏联政府的决定通知周恩来。

会谈进行了 30 分钟。参加会谈的有安·安·葛罗米柯、尼·特·费德林、王稼祥。

安·维辛斯基

康有为收文录

蒋贵麟 辑

编者按：本资料系康有为的学生蒋贵麟生前由台北编辑而成，主要反映康有为晚年与各省军阀、政客进行恢复帝制的情况。原题目为《康南海先生接应南北军阀政客书札》，今为醒目起见，改为《康有为收文录》。原函均无年份，有的具编者所知酌加括号内，有的尚待考。今按原顺序排列印刷，供研究参考及稽查考订。

序

康师南海先生，文章德器，倾动天下。民国十六年猝逝于青岛。其夫人梁随觉女士居沪，继承夫志，教养儿孙。卅八年初春，梁女士先命其子同箴携孙保延移居台湾，随后彼亦转辗经穗市、香港抵台，共享团聚之乐。未几，同箴任职铁路局时，忽患气喘症，呻吟病榻，久治不愈。而梁女士风烛残年，内心郁结，遽患子宫癌，医嘱须照钴六十数十次可愈。此项巨额医疗费无力负担，贫病潦倒，一筹莫展。路局同仁为其申请贫民施医，始得治疗。虽李大超、任卓宣等吁请社会济助，终以为数微薄，无济于事。嗣探悉梁女士莅台时，曾携有吴昌硕镌刻康师石章一方和南北军阀政客书札八九十通，爰以在凄凉景况下，藏之筐篋，无裨实效，不如售与学术机构作史料为适宜。经洽商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博士，由近代史研究所给付金元券万元受让，借资救助康

师妻儿医疗及生活之需。此项书札为康师晚年历访冀、察、鲁、皖、苏、浙、赣、豫、湘、粤、滇、黔、蜀各省军阀政客，推展恢复帝制，取得共识，推襟送抱之情景也。兹将原书札录出，用付剞劂，以飨读者。

公元一九九〇年三月，蒋贵麟识于台湾台北市八德书屋，时年八十有五。

张绍曾

一

南海先生道席：奉读惠示，敬悉时局纠纷，诸待收拾。曾为国尽力，在野胜于在阁，故不愿遽入漩涡，同为丘貉。承公殷殷荐贤，足征惓惓国事。河汾讲学，门下多才，宏景棲真山中作相，惆怅风云，盱衡宇宙，当预储夹袋，以报曹丘。梅炎藻夏，掇卫攸宜，敬颂万福，不尽依驰。张绍曾谨启。六月十八日。

二

南海先生赐鉴：去春在沪，过蒙优宠，并承邮赐法书，感仰无似。兹拟明日午后二时趋前敬聆教益，谨先奉闻。肃颂道履万福。张制绍曾谨上。三月八日。

朱 瑞

长素先生有道：瑞自束发受书，即闻先生硕学弘抱，迈绝古今。自恨植薄，道阻不获相从。间尝读先生之书，博大精深，含宏万有，著往察来，明逾蓍蔡。天固将降大任于先生，以为斯世斯民之警铎也。惜乎希世一遇，竟成数奇。佳会不再，厄运斯成。戊戌、庚子、辛亥事变递嬗，大命继续，不可终日。亡国之痛，贤者益忧之。虽然彼希腊、意大利、德意志、俄罗斯尝亡国矣，后数百年蹶而复起，是知一国之立，必有立国之精神辅以俱存。国亡而立国之精神不亡，国民葆之延绵不绝，终必有兴起之

一日。否则，支离涣散，聚而不群，虽存若亡。亡则不复，譬之尸居余气，较亡尤惨矣。立国之精神，恒赖文言习尚历史、宗教以维系之，而教之为力尤伟。盖提撕国民之神志，使之触物有觉感而思通，自坚城壁，不被同化，国性常存，民德斯大。先生超伦绝诣，翼圣教于未亡之前，冀以继绝国于既亡之后，诚心毅力，大声疾呼，三十年之后，必有受其赐者。惠函恳挚，具见苦心。瑞去年八月尝通电两院，请以孔教为国教，思定一尊，以齐众志，区区翼教微衷，谅承共喻。自惭谫陋，无所阐扬，猥荷藻饰，愈愧且勉。沪杭同轨，半日可达，倘荷高轩税止，不惟瑞获承明教，一罄十余年向往之忱，即泉亭湖山亦以增色矣。耑此奉复，敬颂道安，诸希亮察。朱瑞拜启。（1916年）十一月廿四日。

吕公望

南海先生道席：顷奉手教，敬稔。扶筇载酒，五岳归来，杜老作秋兴之诗，唐子有善游之喻。雅人深致，瞻望为劳。军兴以来，商旅不行，民生凋敝，公望冒承浙乏，目击心伤，欲救时危，端资实业。因念项城当日若能乘欧战时机以帝制经费振兴物耻，则国利民福，事半功倍，计不出此，乃以弛弛声色坐致沦胥，及今补牢，已苦其晚。蒙公拳拳于浙招徕华侨，此亦浮图三宿之缘，感泐何已。谨当多方筹备，静候好音。苟有尺寸之功，固非邱山之惠。德辉千仞，不尽驰依，秋深惟宝啬，不一一。吕公望谨启。（1916年）十月十八日。

罗文幹

一

南海先生大鉴：幹入狱以来，先生仗义执言，维护后进，且感且愧！狱中接到先生旧著，捧读再四，受益不浅。国事之坏，

十余年来坏于制度者尚少，坏于人心者尤大。而人心之坏，一言以蔽之，衣食难也。海通而后，物质日进，生活日高，遍地土匪，乡居不可，聚群于市，又无工商以济之，此饿群乃成政治之魔矣。加以维新以来，所行新制与吾国人之程度相去最少一二百年，复有饿鬼因而利用之，是则今日之乱象，岂无故哉。幹出狱后，卧病月余，故久未执笔奉候。案件仍在上诉中，幸不再羁押。然幹自问无愧，此殊不足介怀也。热暑逼人，伏维珍重，谨此敬叩起居。幹上。（1923年）八月六日。

二

南海先生侍史：奉诵书教，无任瞻仰。叶君柳宅事已将尊意代告亮畴^①矣。新秋风厉，敬候起居万福。后学罗文幹顿首。（1923年）九月六日。

唐继尧

一

更甦先生侍者：去岁夏五，以先妣李太夫人歿已七年、葬亦三载、铭墓之文尚付阙如，曾致书史席，附以行述，哀恳大笔撰为志铭。迟之又久，奉致复书，推锡类之仁，宠以闡幽之作，感激涕零乌可已也。旋以督师靖难，于役川黔，忽忽经年，未以书报。今岁孟冬，自蜀班师归，图后备展谒先墓，冢树已青，而慈晖日远，不有善述，情曷能已。惟望哀其恫忧，锡以鸿著，则光被泉垠，感及歿存矣。曩者，驱除僭伪，天实为之，何敢贪功以自取戾。先生奖劝有加，岂诱之而俾进于道欤？专肃奉恳，即颂道履，企候复示不庄。唐继尧顿首。二月九日。

二

南海先生侍者：往岁侨寓香江，即欲驰趋澥上，晋聆教言，

^① 即王宠惠。

嗣以尘事牵掣，中情莫遂。逮反滇后，距离高斋弥远，因之笈候寝疎，瞻顾云门，弥深向往。乃者乡人归自灞上，道及杖履双清，渴怀藉以愉如。尧遂初莫赋，鞅掌为劳，较台履息影匡庐长吟抱膝者，真有霄壤之别。法书宝同球图，海内久征一致。附去屏幃两堂、楹帖二付，尚希乘兴一挥洒之。百朋之锡，当不我吝，微物数事，聊伴荒函，亦即藉表倾忱，伏冀笑纳。乡人王竹村兄民国四年即已识荆海上，是时为华侨捐款事深资鼎力，此次抵沪访戴，当有一番话旧之乐。专肃奉恳，即祝道祺百益。唐继尧谨启。

黎元洪

一

长素先生大鉴：日前王君公裕、郑君义卿来京，备承拳注。询悉优游杖履，即事多欣，远企德晖，为颂无量。元洪以迂拙之才，谬当重任，外交内政，昕夕不遑，数月以来已觉任重道悠，心长力绌。近以克强、松坡相继逝世，益复伤悲。每念海滨胜事，健羨殊深，尚冀时锡南针，以匡不逮。宣南气候大异昔年，近届初冬，犹觉妍暖。台端若能北行一晤，实慰阔悵，瞻望清光，溯洄靡已！兹由二君南还之便，略布数言，祇颂道祺不尽。黎元洪启。（1916年）十一月十四日。

二

长素先生大鉴：时势至今日艰劬极矣！政弊时穷，万端扰攘。先生瑰学硕德，为天下望，而邈焉□□，迄未一展鸿材，薄海倾风，万流仰镜。元洪才轻任重，际如焚之方炽，若涉水之无津，非有大雅宏通匡拂调持，恐一身未及，焦濡四维，遽用颠覆。今特派王君铁珊敬迓高轩，尚希惠然肯来，不我遐弃。东山霖雨，非谢公咏洛之时；北斗星辰，待昌黎障川之手。引领旌麾，无任跂向。祇颂台绥，诸祈朗照。黎元洪启。（1917年）

冯国璋

一

长素先生史席：日前君勉兄来宁，交到惠书，并晤谈一切，备悉尊恚，当即分电府院去后。兹接芝老复电一件，谓粤事亦曾有所闻，故始终未允朱去，并允悉力维持。至内务事，黄陂复电亦极赞同。特此奉达，藉释荅怀。君勉返沪匆促，未及稍尽地主之谊，希代致歉忱为荷。顺颂道履。愚弟冯国璋拜启。（1916年）十二月十二日。

二

长素先生道座：二月初五日为先生六十大庆，星辉南极，薄海胪欢。弟为职守所羁，弗克登堂鞠脞，谨遣王道尹赓廷代表奉祝，附呈幛联数事，祇乞莞存。临颖翘跂，敬颂遐龄曼福。愚弟冯国璋谨启。（1917年）正月二十一日。

段祺瑞

一

长素先生尊右：景慕德辉，靡伊朝夕，每念修阻，无由瞻晤，至所疚心！伏稔颐志林樊，群流仰镜，鸡鸣风雨，怀想弥劳。比者外交艰棘，屡承匡教，老成谋国，智虑至周；既用心佩，而箴诲之施，无间远道，尤祺瑞所拳拳服膺者也。自抗议发生，外交秘密，未能详布，京沪遐阻，此中曲折，亦莫由缕达清聪。兹事体大，中外具瞻，存亡所关，千钧一发，倘非举国一致，虽有智者，无以善后。自维薄植，益用兢惶。先生为海内硕望，所望随事指导，共济艰屯，岂惟祺瑞之幸，抑国家实利赖焉。兹托郑君浩将近日外交情形及详细理由诣陈左右，敬希鉴察。临颖神往，不尽欲言，敬颂兴居万福。段祺瑞拜上。（1917年）。

二

长素先生执事：盛暑曾复寸笺，计尘严电。秋风荐爽，百景澄鲜，引领停云，日唯琴德清娱，动静适道为颂。瑞殚虑淬精，兢兢听夕，以迂拙之性，当纷变之交，民生凋敝，国步踉跄，内政未备，外患日深，尤为自古国家未有之境，揆之男子报国之义，虽不容自弛，而能否徼天之幸，则亦非所敢知。

先生遍览宙合，洞观万变，凡所蕴蓄，以肫肫救世之切，当有不忍深闾者。甚盼大旆惠临，冀奉清尘，以端趋步。大总统亦亟思与公一道渴衷。兹因王君芝祥南来，便令趋承兴居，幸即諏期命驾，已饬馆人洁除以待矣。不尽之言，统由王君面陈。尚此。祇颂道祺，无任延企之至。段祺瑞顿首。（1917年）九月四日。

韩国钧

一

颓龄薄宦，占釜臼而徊徨；温语荣褒，感仪文之周至。辰维长素先生勋祺楸介，绩履崇闳，广永逝之文，哀艳逾夫骑省，致脱骖之赠，深情隆于馆人，诵款款之宏词，纫拳拳之雅谊，铭膺戴德，拜手抒诚。国钧自顾衰迟，倏伤内助，每寻哀乐，莫遣中怀。落叶心惊，有黄门之同病；劳薪穀转，悔白下之重来。谨布谢忱，敬颂台祉，维希亮鉴。韩国钧顿首。

二

长素先生道鉴：江海咫尺，每輒起居，忽奉赴书，惊审左右，有悼亡之赋。百年嘉偶，一昔离尘，缅念悲怀，定同元相。矧以夫人柔嘉维则，恭俭持躬，执事既蒙难海邦，夫人遂侍亲港澳，所处皆百折千辛之境，所守以勤家劳国为常相，夫子四十七年中，其最艰难者，竟垂十六载，幸而家庭重聚，兰玉多英，方慰平生，倏闻解脱，贤明行识繄古，所希忧患频仍，此情谁遣？

惟是去来自在，早悟人天，四序推移，默觐消息，敢以达者观化之旨，稍塞先生感逝之悲。比迫尘劳，未遑趋奠，附邮輓幛，谨荐纁帨。秋暑未阑，惟万万珍卫，不尽百一。韩国钧拜启。（1922年）。

赵恒惕

一

南海先生道鉴：徐君来湘，奉诵尊槭，就谗道履清娱，至慰驰仰。惕在湘数年，毫无穀状。兹当民治发轫之际，复膺重托，深恐才智鄙薄，无所裨补，致蹈覆餗之愆，而启维鹈之诮，猥辱奖许，愧不敢承。现谋实施省宪，诸待革新，夙荷眷注，甚望有以教之也。前承赐墨宝，如接英光，反复展视，令人神旺，拜荷高雯，感谢曷极。此间情形，徐君当为备陈，不尽一一。专此奉复，敬请道安。赵恒惕谨启。（1922年）一月十六日。

二

南海先生道席：久未承教益，系仰之怀，良不可任。春风扇物，道躬安和，至为颂祷！国事纷纭，前途益艰，言念及此，时用慄慄。先生国中先觉，幸时惠教，以资循率，所欣企也。兹嘱子威诣叩起居，未尽之怀，悉托代白。敬颂道安，不尽驰依。赵恒惕谨启。三月二十三日。

陆征祥

一

长素先生足下：日前由海部陈副官交到木箱一只，嗣奉手书，敬承一一。辱荷以意大利所造玛利亚像见惠，瞻天人之色相，诧神工之美术，欢喜赞叹，摩胸画十，行将供悬石室。室在阜城门外，瞬将落成，仿欧洲教堂式而缩小其规模，拟为先人潜灵之处，并在旁筑小舍四五楹，稍师庐墓之意，以抒孺慕，以志

弗援，但望风拜嘉而已。因念在欧时，东道未周，不足执维高躅，耿耿无已；今则报过于施矣，愧甚愧甚！蒙询生日，感慨系之，行年五十，何足云寿，私衷祈祷，祝者则愿我震旦国势蒸蒸日上，与列强抗颜行，斯乃祥称觞之日耳。若犹未也，将吊之不暇，其又何贺焉。生平崇拜大著，又酷爱法书，如承赐寄文集一二种，并亲题数行墨，则每一展卷，如对故人，想亦我公之所许也。兹寄上先师《许文肃公全集》一部暨拓本五种，（附《政闻报》一册，内有公祭田忠祠并该祠内容之插画。）即祈察入。祥侍文肃最久，受知亦最深，三十年来稍谙外交并略知检束身心者，皆一本于文肃。追念师承，为之泫然！专肃布臆，并陈谢悃，敬请道安，伏维霁照。陆征祥谨启。（1920年）三月十二日。

二

长素先生阁下：前奉到赐寄先墓志铭，拜领之余，殁存均感。从此先人志行得随椽笔以传，尤深荣幸，曾经专电奉谢，托由谭君秋飘转致，谅邀台鉴。祥孱躯近尚粗适，惟内人年来多病，去秋因病割治之后，体气较亏，原拟十月底由熊城赴罗村养痾，不意十月中旬忽患左臂左腿麻木不仁及舌音不清之症，来势颇恶，举室惶恐，当即延此间熟医诊视，幸叨天佑，逐渐平复。近因左目发生障翳，医生力劝用放血旧法，此间巴西公使及法大使夫人亦以为此法虽旧，施诸内人病体当尚合宜。嗣经医生试放三次，计前后放出之血量共重三百三十格拉姆，血脉压力计自二百二十毫收缩至一百七十五毫，现觉左目阵翳略退，腿力亦稍增。按目前病状，除步履艰难，左目障翳未尽消退，夜间尚需人伺候外，眠食幸已照常，当可日就痊愈，不致再生枝节。祥数年来率同小女亲视药食，未敢稍离左右，盖二十五年来深感内人相待之诚，殊觉非如此不能安于心耳。惟经此焦虑，终日寸心憧憧，若有危急之将临，年仅知命，有此景状，深自叹息！内人此

次患病不在北京，亦不在罗村，而适在专门医家萃集之熊城，祥忧惶之余，又不胜窃自感幸者也。宿承垂爱，用敢缕陈一一，藉以告抒远注。兹乘驻和王劫使夫人归国之便，带奉瑞士雪景及花景三幅，聊代鲜花之献，用先函达，届时该件送到，敬祈晒存为幸。尚此奉候，祇请道安。陆征祥谨上。（1922年）三月廿一日。

三

长素先生尊鉴：久违道范，时系私衷，遥维蹈履祥和，优游著作定慰颂祝。祥海外从公，了无善状，每闻国内频番扰攘，恒切隐忧，不识先生将何以善其后也。客岁接诵悼启，惊悉尊阃夫人遽尔作古，老年丧偶，其何以堪。想先生久历坎坷，神伤虽甚，应付达观，惟当时道远，不克致送礼仪，兹谨具纪念铜牌一事，以备銜诸墓道，不啻长睹慈云，惟祈晒存示复是幸。专泐佈臆，祇颂箸安，统希垂照不既。陆征祥谨上。（1922年）。

朱庆澜

一

迺启者：为朱九江先生捐置祭田一事，前由何君翔高寄送尊处捐册第一号，未审募集若干，恳于旧历正月二十日以前将捐册并银券汇交濠畔街官银钱局收存，掣回收条为据，以便将款项购置祭田，交其遗裔掌管，并将捐助诸君芳名刻石，以传久远，实纫公谊。此颂台祺。朱庆澜谨启。一月六日。

二

长素先生有道：捧诵手教，奖饰逾量，铅刀经风胡淬砺而焕发光芒，驺骀以方钦翦拂而骄嘶矜宠，海云引睇，莫罄钦迟，愿言之怀，良不可任。粤东开化最早，人材蔚兴，而年来士习嚣张，道德堕落，辄欲表扬理学，树之风声，愧无化民移俗之方，冀收立懦廉顽之助。过承奖借，唯觉汗颜，耿耿愚诚，益当自

励。窃维九江束塾，岭表经师，渊雅闳通，一时瑜亮。而九江之学，注重力行，学说颇近于陆、王，而践履笃实于濂洛，其吃紧为学者提撕处，尤在惇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四教规，洵为修身之橐钥，入圣之途径。前清自纪文达编纂提要，议论偏激，轻蔑宋贤，相习成风，讳言道学。阮文达所辑经解，不采顾、黄，尊宋经说。江慎修谬以汉学、宋学各分师承俗学沿讹，徒以笺注金石相尚，拘牵琐细，无裨世用。嘉、道以后，有学问而无学术，闭塞心性，斫丧廉耻，相率而为虚伪无用之学。左文襄至以发捻之乱由汉学家酿成，痛哉斯言，似非过激也。先生亲承九江渊源，根柢槃厚，中更世变，环游五洲，开拓心胸，激励志节，采万国之宝书而观其大，综耶佛之教义而汇其通，诚本九江之学发扬而光大之。他日缙衣相业，定出河汾之门；涑水勋名，实本徂徕一派矣。别纸承以曲阜书藏，征求粤省官书，以存古籍，具佩尊圣翼教之深心。广东经三次变乱以来，学海山堂，鞠成马肆，广雅藏籍，污于潦流，伍刻丛书，版归灰烬，孔家旧槧，卷复散遗，以《论语》作薪，以《汉书》糊壁，艺文之厄，至今而极。重承淳嘱，加意爬搜，当经令飭图书馆将旧刻官书各检一部，开单转解，并布告各县，私家刻藏秘籍，有愿捐送曲阜者，统交图书馆汇寄，以广庋藏而副宏愿。庶使书籍之主，经秦火而不焚，丝竹之声，护孔林而世守。谨先奉复，并候起居不宣。弟朱庆澜谨复。一月十七日。

前附送九江先生遗像墨刻想经收到，又及。

严家炽

一

南海先生有道：顷奉赐书，敬承一是。伏念先生巨学纬时，元模轨物。孔文举四方瞻表，韩退之百代宗师，久已尊若北辰，隆逾东岱。乃于下走曲赐裁成，备劳奖誉，私衷荣幸，倍益惭

惶。承示高州税席政委张君，自亦甚善。惟自何君辞差后，即派丁君乃澄接办。丁系前清道员，久办榷务，熟悉情形，已于前日赴差；张君只得另行设法，尚乞鉴原，曷任悚歉！无缘瞻谒，临颖神驰，祇请道安，伏维垂察。严家炽谨上。十二月十三日。

二

南海先生钧鉴：簿书鞅掌，笺敬多疏，景仰之余，弥深惶悚！比维山斗望崇，起居枯笃，灵光在望，且颂且欣。家炽抗尘走俗，本少宦情，握算持筹，惭无计学。最近以亩捐一案，大受邦人士指摘。自五属代表到京，风潮愈烈。究其主动之由，悉由何湛霖一人所鼓惑。而其所以鼓惑之由，亦自必有原因，遂致于本案真相一概抹煞，以讹传讹，淆人闻听。在官厅自问无他，原不必过为深论，但传闻失实，不知者真以为官厅不恤民艰，违法搜括。用将本案始末编制成帙，寄陈一册，伏乞俯赐省览，俾晓然于官厅之为此举，实所以救济危局，而绝无丝毫私意存乎其间也。明知人民多增担负，而在民间暂忍一时之痛苦，在公家可得大宗之税收。取之于民者，仍用之于民，当亦为群情所共谅。此事知必久劳廛念，谨陈大略，尚求赐教为幸。奚涯肃械上达，靡尽欲陈，恭请钧安。严家炽谨肃。五月廿六日。

三

南海先生箸席：系迹白门，久睽清教，言瞻道履，载颂绥和。辱荷东招，欣承厦屋落成。大雅阁达，辟海隅清幽之地，为名山著作之林。古物搜罗，辇之绝域，良辰忻赏，足爱吾庐，以咏以觴，亦仙亦佛。家炽形劳度支，心驰华构。幕友衡阳符君铁年颇嗜书画，下笔尚能去俗，谨属书一楹帖为贺，借请雅海，敬乞麾入。专肃。祇颂道安。严家炽谨启。

温树德

南海先生道席：养（二十二日）电祇悉。树德猥以轻材，忝

摄埠政，方虑汲深绠短，乃承奖饰优加，捧读回环，良深感愧。定庵赴济之时，树德适不在青岛。泊海上归来，始悉其详，比经函致蕴帅为之缓颊。旋得复书，据云不久即可恢复其自由。现在济垣闻甚优待也。承嘱各节，遇便当为转致。筠农已经离青，惟抱病未瘳耳。知关锦注，谨以奉闻。南中气候如何？啸傲湖山，定多佳趣。敬问兴居，惟希珍卫。弟温树德拜启。十一月二十六日。

陈光远

长素先生台鉴：昨由贵高足弟陆君逸君交来尊函，敬悉一是。谬膺过誉，惭愧曷胜。陆君言论丰采，典雅温文，足征春风化雨陶淑自有真矣。兹承不弃介绍前来，良思借助，业经嘱即迁居署内，俟筹相当位置，以副雅意。将此奉复，顺颂道祺，诸惟亮照。陈光远鞠躬。元月八日。

刘镇华

更生先生箸席：青门祖道，倏将匝岁，仰止之忱，靡时或释。昨读致纯庵书，知骑气方谋首途南旋，属遘云间兵事，暂旅青岛，东望瀛壖，弥殷遐思。顷得京沪捷音，卢、何去国，松、太敕平，陶径依然，庾园无恙，武城返轸，欣慰曷似。北方早寒，想已整归櫂。此函比达签曹，先生杖履应早在天游松菊间矣。南天兵气甫销，滦阳战云正亟，仁人悲悯为怀，度必时时北顾蹙额。惟腹心之疾郁陶既久，发迟祸巨，发□检收。善伯英年高识，将来必大有建树，戈戈菲罍，聊助壮游，乃承齿及，只益汗颜。海滨风劲气寒，幸为国为民蓄光颐养，以慰苍生之望。手疏奉候起居不备。刘镇华敬肃。（1924年）十月十八日。

田中玉

南海先生道席：新秋送爽，计已安抵沪滨，杖履多娱，慰为私颂。承示与玉帅^①往来电文，仰见关爱拳拳，铭感无既。此案发生本出意外，而救护迫切，终获安全出险，中历艰难曲折，共见共闻。当时颇有偏重外宾之讥，今乃小题大做，援引庚子条约与惩，创排外者一例，要求事之不平无过此者。玉求去已非一日，肇事以来，曾三电自劾，个人地位早已度外置之。乃外牒既已提出，一去了事，恐开交涉恶例，为国家主权计，不能不冒嫌撑持，然精神则异常痛苦矣。俟交涉略有结束，仍当力求罢斥，以谢国人。如蒙长者远注，不觉缕缕，便祈时加教导为叩。专此申谢，祇请道安不备。田中玉谨启。（1923年）。

赵 琪

南海先生赐鉴：昨日由掖县回青，旗常转到我公为藤田所书之墨宝，无任感谢之至。明年正月初九日为效帅之封翁锡五七十晋公寿辰，遗老刘幼老诸公均各送匾额称庆。我公德隆望重，前经旗兄函恳椽笔挥一匾额寄下，以便由青做成送去。惟时日无多，尚乞早日书成赐下，俾飭木工赶做也。肃此布臆，敬请勋安。后学赵琪谨上。十二月三十一日。

沈鸿英

南海先生尊鉴：宗邦泰斗，仰之弥高。接奉赐书，感蒙知遇。回环庄诵，慊悚莫名。时局螭蟾，风云变幻，老成谋国，艰苦公忠，无任诚服。君勉允相赞助，良契于心，一切必随时相与商榷。鲍君公武门墙桃李，既承不弃，容当招致幕中，询谋咨

^① 吴佩孚，字子玉，时任两湖巡阅使，驻洛阳。

度，藉资匡助，用副尊命。专肃。敬请崇安。鸿英谨肃。

邓如琢

囑收容残部愿借箸以为筹，相期扫荡赤氛，岂请纓之无路！大地有陆沉之痛，谁泣新亭；粤中多将领之才，群歼丑虏。望风怀想，不尽依依，一切由黄君代陈。邓参议嘉章来沪时会当晋谒。专复。顺颂道安，诸维荃照不备。邓如琢拜启。五月五日。

张福来

敬复者：福来丛愆积愆，俯仰多亏，视膳问安，侍奉无状。昊天降罚，罚此鞠凶。于名教为罪人，于家庭多愆德。抚躬循省，哀楚难胜。乃承锡类推仁，关怀垂恤，摅诚慰唁，情溢于词，曲意矜存，爱人以德，祇诵之下，感痛莫名！福来醜然为人，戚焉在疚。大事未毕，一息偷存。聆君子之言，孝思益笃；荷仁人之教，篆结良深。抢地稽顙，望云引领，肃絃鸣谢，顺颂勋安，祇维矜鉴。棘人张福来稽顙。

张 勋

园公先生有道：云翁回，知从者已安抵沪滨，并承宠赐古刀一持、火箸七种、法书一联，摩娑披读，具足宝贵，敬谢。所述各节，尤见关怀，雅意已属云翁代达一切。公主持正论，发大声于群梦，作暗室之一灯，虽犹不忍之初心，实有挽回之大力，佩仰无已。谨备不腆之敬三千蚨，聊助公笔墨之需，区区之私，幸祈鉴纳。入冬乍寒，尚祈卫道珍重，不尽视缕，此颂道安。愚弟张勋顿首。

龚积柄

南海先生道席：去年青岛幸接清尘，执别以来，羲娥易迈，

风云变幻，南北□□每仰冲襟，时萦梦毂。猥以迁擢，过辱奖存。循省自惭，感悚无似。先生公才公望，经师人师，高密之居，黄巾率避，柱下所过，紫气先来，引领南云，弥倾北斗。枌屏翰海右，筭滥稷门，鲁邦所瞻，祇用惕厉。渤海治行，期绍家风，惟望大贤加以指导，毋吝金玉，用作韦弦。庐企游存，馨香以祝，春回歇浦，寤寐相思。专此布谢，敬颂道绥。后学龚积柄启。二月二十三日。

尹昌衡

一

南海夫子道鉴：连日得亲山斗，平生莫大之幸。衡武夫浅学，尚邀青睞，诱掖后进之风，令人刻铭五内。再陈鄙著二册，虽不足以登大雅之庭，亦心血之所染也。江博士待友挚诚，其同德学校之组，允宜竭力赞之，惟衡旅况甚窘，必俟稍苏后方有以报命。先祈代致拳拳。专此。敬叩道安。后学尹昌衡顿首。闰五月十九日。

二

南海夫子道鉴：德义相与，肝胆必倾。衡在官时有出人意外之廉，故罢官后有出人意外之窘。今旅次饔餐且不继，而朋友消息尚难通，故同德基金之助，必待稍缓方敢莅会，以真情相告，免口惠之愆，希先生代达前途。衡俟稍裕即专为先生一言，亦当为江君尽力矣。道安不庄。后学尹昌衡顿首。闰五月廿九日。

三

南海夫子大鉴：旅沪得瞻山斗，实平生无上之幸。俗事来迫，难随函丈，歉极。惟捧读孟子微不啻夜雨池塘时承面命也。法书海内奇珍，渴慕已久，能锡数行，俾后生常仰鸿范，尤为感甚。大示掷交四川成都府南街四十三号尹宅必无误也。谨候道安。后学尹昌衡顿首。七月二日。

马 良

南海先生有道：顷奉钧函，敬承旌麾北指曲阜，约良赴彼晤教，感荷盛意，极愿前往瞻拜大贤，因鲁省东路军事正待结束，张督军莅任未久，一时情形尚多隔阂备谘商，段总理屡以鲁事谆嘱，未便刻离，极深歉仄！兹特派敝署秘书李君悟仙、周君少勋赍函并编成两种武术图说，奉呈钧览，务恳辱临敝处，俾获亲炙光仪，谨当陈列各种武术，请赐按图观演，就正改良。此间人士亦极愿大贤惠临，为湖山生色，而教育界诸君尤切瞻仰，以为先生不来，学校无从承教整顿为深憾极愧，嘱良代为淳切劝驾，先生无论若何匆迫，万恳屈玉一行，以慰良与鲁人饥渴之思。谨祷祝以求，幸勿金玉尔音，无任企跂。余情嘱李君等面陈，惟察纳是荷。专肃。祇请道安，伏维垂鉴。马良谨肃。（1916年）。

龙济光

长素先生伟鉴：违教日久，向往殊殷。顷承惠书，敬聆种种。奸人造作蜚语何所不可，诚宜一笑置之。贤达如公，幸勿介介。承命禁止各报传讹，已飭警厅照办，特先复慰廑系。原电附同大函已转送颖陈省长，当由渠处迳奉还也。专复。敬颂道福，诸维亮察。龙济光鞠躬。四月九日。

刘显世

一

南海先生道鉴：顷奉赐书，忻悉阳明像册业承宏题邮递，无任钦荷。吾黔开化，功首阳明，今得当代耆儒加以阐扬，美益彰而盛益传，南中学子信仰愈坚，德进业修，裨益为匪浅矣。兹有敬恳者，显世胞伯母石氏，今年九十有九，同邑人士合词呈恳转呈中央建坊志瑞，征求硕德锡以宏题。谨按胞伯父铭之公在安义

镇游击任内，巡防捧觥，为贼所戕时，伯母年未四十，嫡堂兄显慎才一岁，显潜才五月耳。伯母苦节抚孤，以迄成立。民国元二三年，堂兄显潜任安义镇总兵，迎养镇署。四年任贵西道道尹，以道远未同赴任。潜兄现亦解职，在籍侍养。伯母秉性仁淑，艰苦备尝，兹幸届期颐，神明不衰，敬恳先生赐书坊额，勒诸贞珉，以昭不朽，感激之忱，楮墨难罄。尚肃。敬请道安，伏希垂察。刘显世再拜。二月十九日。

再启者：承寄尊照，尚未奉到，黔中邮寄包裹每多迟滞，俟到当悬诸座右，如亲光霁。显世再上。

二

南海先生钧鉴：国事纷扰，未通音讯已数寒暑。遥想龙马精神，倍胜畴昔，定如私祝。显世不自量度，以爱国心切出任艰危，九年于兹。黔本瘠苦，力崇节俭，勉力维持。国势日危，全国鼎沸，当局不悟，受东邻诡谋，如饮醇醪，如茧自缚。近且甘为外臣，受人指挥，变本加厉，摧残民气，刻酷青年，国家权利扫地送尽。时局至此，不胜痛哭！前读报章，幸蒙先生伟论说言，充耳不闻。近则青岛问题颇有直接交涉之趋势，自残同胞，自失信用，厝火积薪，燕雀处堂，其愚真不可及。全国人民待先生如性命，尚祈时发谏论，力辟邪说，俾全国同胞不致流于奴隶牛马。此全国所依赖于先生者，非显世一人之私言也。得蒙先生一言九鼎，以救危亡，万世子孙，均利赖之。显世两年以来，均以救亡为务，力持非将东邻军事协约及种种副件取消，决无南北和议之可言，非欲残民以逞也。非如此，中国终有必亡之一日。先生宏通中外，识周全球，救国至计，早有成竹，论道之余，尚祈指示方略，俾有遵循，是所至祷。不知北廷当局必欲亡国，与同胞有何愁怨？与青年学子有何世仇？真百思不得其解！惟祈先生一救之，不胜祷祝。匆匆草肃，敬颂道安。后学刘显世谨肃。（1919年）三月廿五日。

马福祥

长素先生伟鉴：久钦道范，未遂瞻依，远企德晖，时殷景慕。恭诵文章名世，经济匡时，翘首喬云，倾心向往。祥忝膺疆寄，惕切冰兢，惟勤慎以自持，欺悔尤之或寡。昨由李公瑾顾问转到承赐法书对联一付，凤毛麟角，虎卧龙跃，汉魏六朝，风神如见，非唐以来书家所能得窥门径也。谨悬斋壁，用志光荣。惟祥自束发受书，想望丰采，不啻李太白之愿识荆州，只以远处边陲，缘浅莫由拜谒，怅歎奚如！比闻台驾有西游之意，如荷宠临微特，祥异常欣幸；绥区得识大贤，紫气遥瞻，欢迎倍切。肃修寸简，敬鸣谢忱，恭请崇祺，伏希霁照。马福祥敬肃。（1921年）。

马 麒

长素先生函丈：瞻望山斗卅载，于今跼促荒陬，莫由抠谒。南天引领，载结寝兴。顷李君公瑾自洛阳寄到所赐墨宝，发缄伸轴，满堂动色。窃维先生道德文章遒踪诸夏，牖民觉世愿力尤宏，余事染翰，亦足不朽。获自意外，拱璧同珍。又李君言先生有西行之意，陇人闻之，同深延伫。麒窃迹前史，孔子辙环天下，西不到秦，唯老子有西游之事，而过化迹杳，教泽无闻，自斯以降，圣哲芳轨，罕经陇上。清初顾宁人欲应张勇之招，一赴兰州，卒亦不果。边风僿陋，此其一因。倘蒙不弃遐黎，有造西上，麒当占望紫气，拥簪先驱，临风向往，不尽欲言，虔鸣谢悃，敬请道安。马麒顿首。

董 康

长素先生执事：奉达芝宇，积以岁时，世故侵寻，只增怅结。顷承赐翰，备诵兴履清胜，至愜颂忱。比以审查内外债事辱

荷慰喻周详，语重心长，无任惭感！近年财政纷乱，无可讳言，国事艰虞，良堪悚惧。如康迂陋，诚不足副先生之殷注与国民之厚期。惟猥膺此任，不敢不负应尽之责。昨有通电一件，并上公府呈二件，录呈大教。呈文外间均未曾发表，仍祈秘之，思□处容以尊函转示。手泐奉复，即颂道安。弟董康敬启。（1922年）二月十八日。

孙宝琦

一

长素先生大鉴：日前抠谒侍教，无任欣幸。昨承折柬订今日晚餐，极感盛意，惟有京友赴华府会议者明日放洋，琦预为今晚设饯，不克分身奉扰郇厨，殊深歉疚！明日拟即赴杭，旋沪再当诣教。专此申谢，敬颂道绥。孙宝琦启。（1921年）九月初三日。

二

南海先生左右：日前离沪时，蒙赐大箸，拜珍感谢。琦回里省墓，前夕旋沪，暂寓沧州旅馆，三四日即行北上，渴与先生一谈，苦罕多暇，兹拟初三日午刻假旅馆奉攀执事惠临。另约梦华师及晦若子修，藉可畅叙，务乞早光勿却。晦若曾迁至尊处否？专上。敬颂道安。宝琦启。初一日。

袁金铠

南海先生赐鉴：金君息侯转到教言，幸甚！尊志未尝一日去怀，亦信万无不见诸实行之一日。惟仰观俯察正自有待，若急遽为之，仍不妥当。盛武程度恐尚逊于定武，然此不足虑，自有水到渠成时，其吃紧处在实行后如何力量乃克旋转耳。废兴大事，只可承天，不宜矫强，历验往迹，不烦言而可解也。迹阻心通，届时再商量作去。此复。敬候道安。袁金铠谨启。十一月二号。

吴佩孚

更生先生道席：罗君来汉，展诵惠函，期望之切，悲悯之深，感动叹服。尊意所筹备得纲领，惟事关大局，须有绸缪，借机他人亦待时会耳。承示罗君节概，立谈可见，凡所商论当可代达，比物此志大略相同也。宏谟所及，时复教迪，幸甚。耑复。祇颂撰安不宣。弟吴佩孚拜启。一月十八日。

范源廉

太夫子大人道鉴：敬承函电奖饰，感悚不遑。源廉前由京返沪，趋候起居，维时杖履方游杭中，嗣以京电催促，匆匆北行，竟未获承面命，至为怅怅！方今国势，人心飘摇陷溺，为忧方大，明教痛切言之，敬佩无似。源廉弩下之材，加以重负，深虞陨越，乃蒙荐引名贤以为匡辅，感纫之余，本应虚席以待，惟目下财力奇绌，教育方面，尤其用人范围，自不能不因之减缩，祇有徐图机会，再为延致，以报盛意。临书仓卒，不尽欲陈。肃此。敬请道安，惟鉴不备。门下生源廉谨上。（1921年）八月九日。

曹 锐

南海先生左右：前以文旆过津，诸多简褻，寓书齿及，殊觉颜汗。承赐墨宝，当觅良工上石，藉传不朽。令坦潘叔玗兄才学俱优，久矣心契，拟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俾邀匡助，想亦不嫌屈就也。肃复奉谢，敬请著安。教弟曹锐拜启。

靳云鹏

长素先生侍者：青山碧海，喜逢旧雨，叨陪谭宴，兼荷感招，曷胜快慰。比承杖履优游，林泉颐志，健羨健羨。弟本朝作

大小二劳之游，稍揽幽胜，暂息尘鞅。因淄矿同人久待，遂赴矿区视察，匆匆不及奉别，比已于端阳节前旋津。漫游以来，倏已匝月，无淑足告，缅怀高躅，辄复神驰。专布伸谢，藉颂道绥，余维雅鉴不宣。弟靳云鹏拜启。

阎锡山

南海先生台鉴：黄君来，辱荷惠书，奖饰逾量，愧不敢承。比维道履增绥，慰如所祝。敝省因前岁旱灾奇重，与民休息，庶政进行不无疲滞之处。此后物质方面，注重生产；精神方面，注重教育，再积以数年之久，或可望有粗治之初基。就过去经验言之，非人民有永受物质之精神，则物质多一分，精神反弱一分，故非富教同时并进不可也。承示理财开矿，洵属要策。黄君专门心得，侨商素所信任，当派保晋公司妥为招待，导引参观，如得侨商投资，该公司无不推诚与共也。先此奉复，敬颂春祺，并请台安不备。阎锡山拜启。二月十九日。

孔祥霖

总会长先生钧座：昨得示圣诞之祭仍用廿七日京外各机关团体。今年局势略定，费用花繁亦即照发通启矣。山东民军已着手改编，不至再生扰乱。粤事亦了，大局略定，善后各政务亟待进行。宪法利害尤大，先生以不忍之心挽回劫运，入手之举，似不可缓。会期并乞亲莅阙里，提倡宗风，所关匪细。孙省长届时闻当来会助祭。至主祭者自应仍推燕庭宗子，而内务部皓电各省大祭通改跪拜为鞠躬，凡我会员，是否遵照一律陪祀，祈酌示。专肃。敬请钧安。书至此，李炳宪君方至，得读二十日手谕，乃急将各通启追回改制另刊，余照办。孔祥霖谨启。

王承斌

南海先生赐鉴：顷奉教函，勤勤恳恳，因垂爱之深，故不觉期许之过，浅陋如鄙人，讵足当此褒勉，展诵至再，惭感交并。年来承乏畿疆，所督责于寸衷者，实欲以实事求是之心，就职务所当勉力量所能及者，尽瘁国事，以期稍有裨补。惟以才识短浅，中经种种困难，事实所著，不足副初愿所期。加以脑病日深，惧以衰疾之身蹈旷废职守之咎，故拟暂卸仔肩，安心静养，庶免陨越取戾，实无丝毫他意。辱荷盛意，勛以镇静自守，惟有铭之肺腑耳。兹将原电及洛阳复电一并奉还，敬乞察收为禱。专此复谢，敬请道安。王承斌拜启。五月廿一日。

蒋尊簋

南海先生史席：前辱惠书，感与惭并。簋与先生相违数千里外，二年未见德音，饥渴之怀，殆如山积，何相遇之疏，而相念之切也。盖君子谓寄通灵台遗迹，江湖乃贤达之素交。簋与先生既属忘形，岂在寸楮之謁来焉耳耶！居尝窃念国事之多难，世变之孔殷，吾人扰攘于金戈铁马之间者，迄无宁岁。先生导养时晦，息影蓬蓽，居混浊之中，洁身高蹈，超身物外，固计之尤者矣。然不闻理乱虽隐者之所珍，而谈言解纷，抑亦古人之所重。先生以闳远之卓识，明见万里，蒿目时艰，想自有宏谟硕画也。簋不佞，不能致身陶钧之中，获聆大贤之余绪，私尝用为耿耿。然倘能时锡良规，俾知从违取舍，岂非其素望耶？承嘱一节，已函王援引，知关遥念，谨以奉闻。专肃。敬请道安，惟希霁照。蒋尊簋顿首。五月廿七日。

汪大燮

南海先生鉴：十三一晤，遂不克再访一谈，闻先生已回须

磨。昨晤劳伯锡知太夫人弃养，不胜悲愕！兹托紫芝带奉奠敬一百圆，乞即察存。夔今抵神户，即刻登舟，未克走唁，尤为歉仄！想行旌折日归国，将来或在沪滨一叙也。敝寓暂在北京东单牌楼二条，即致任公转交亦可。匆匆不及多详，敬候孝履。大夔再拜。（1913年）八月廿一号。

刘子楷住东京麹町区永田町支那公使馆。

江天铎

太夫子大人赐鉴：远隔南云，时殷北面，卅年私淑，五内钦迟。窃随鲁直闻香，悟微言于无隐，伏承庾公赏月，畅逸兴以婆娑。宏民胞物与之怀切玉宇琼楼之感。有容必照，斯民皆仰止兴思，清节为秋，大道实无得而踰，升恒介福，钻仰倾忱。天铎难承衣钵，敢忘渊源，仰拔萃于生民，愧传薪之受授。屡思便赴沪渚，藉侍程门，瞻近无缘，至深向往。兹因华威银行于初冬在沪行开幕式，届时决意南行，藉遂亲炙。先此肃达，祇叩节厘，并颂菲祉。门下晚学生江天铎谨上。九月十三日。

曹蕴键

南海老伯先生渊鉴：日前轺车莅淮，诸多简褻。兹奉教函，远锡备承，奖借逾恒，盥诵再三，感愧五内，遥维道体康胜，是祝是颂。蒙赉希腊碑石像拓本、先秦金石遐荒蝌蚪，洵希世之宝，拜谢拜谢。然非有道，纵有千古横罗八荒未易识也。惟唐碑并列未见附寄，谅或遗漏。并有前恩椽笔赏书对联二付，当以挥酒过劳，交托贵价带回，倘或书就，望便中并寄，是所至盼！屡承长者之赐，再伸无厌之求，自问殊深愧赧。秋凉即希为道自卫，努力加餐。肃此鸣谢，虔祝道安，惟乞亮察。世愚侄曹蕴键谨肃。十月十六日。

潘 复

连日获侍杖履如坐春风，瞽瞍所闻，拳拳曷已。专足旋济，率已弗及，兹再遣足于南京临淮间，奉诣匆匆，所购肥桃似尚非最上之品，然海内殊已无可与比，乞试尝之。武梁祠之游，据鞍近百里，闻未敬讶，途次稍安息，伏承起居逾恒，至祷以念。敬上南海先生座右。潘复谨百拜。九月初五日。

李 谦

一

南海夫子道鉴：昨亲渠训，深慰积忱。荷拳注之逾恒，切心藏于靡既。敝族主峰仰望德辉久矣，今蒙热诚爱助，不独为回部九千万庆幸，即我中华更大有幸焉。除将德意分别函电西北通报外，谨将八部回王及统兵大员衔名遵示开单，附呈崇阅，敬祈椽笔一挥，俾回疆万里见墨宝如见先生。夙所崇拜，故附求手翰，以志钦慕。专肃奉恳，敬请崇安，伏乞爱鉴。回族总代表李谦谨呈。四月二十四日。

附呈宣纸及名单。

二

夫子大人德鉴：自违尊颜，倏尔月余。虽相去云遥，而依驰挥□，无时稍忘。恭维迪躬佳善，旅履笃祜，为颂为祝。敬肃者，昨接绥远马都统^①函，称对联业经收到。马都统实深铭感，并有专函乙件借鸣道谢。如夫子游历乾方，马都统极所欢迎，倘旅期有定，尚祈早为函示，以便恭迓税驾，是为至盼。专此稟候，敬请道安。受业李谦鞠躬。

^① 即马福祥，1921年5月任绥远都统。

左孝同

一

昨朱沅尹、于晦若、陈伯岩、王聘三来面订餐鞠之约，拟假尊庖治办，即就辛园宴集。十三后请公定一期，以便邀约。此外拟约刘窗石公，相知有能食者尚邀一二亦可。专此敬上，即候复示。南海先生。弟左孝同顿首。十二日。

二

昨念康来，始知高迁新居，尚未趋贺为悵！承赐多珍，古香古色，豁我心目，希世之宝，何敢登受，重以高谊，却之不恭，谨领醉红碗一双，余珍完璧，再拜申谢。酷暑维起居安福，容日再上谒。此复。敬颂南海先生新秋新居多祐。弟孝同。辛酉（1921年）七夕。

三

翼日承宠召，适先已约定数友于酒楼小集，自作主人，不克趋陪，尊宴心饫，谢谢。昨有携宋版易经、明本、晋书来求售者，易经可宝，特不免贾蚀，公如欲观，可令送呈钧鉴。敬上南海先生尊右。孝同顿首。八月初十日。

四

昨有携董临阁帖求售者，属送先生鉴赏，如以为可，再取其值。（共十本，今先呈五本）皇甫碑非旧拓，并附一览，统候复示。敬上南海先生。孝同再拜。冬月既望。

五

昨厚扰，饱德铭心。奉诵大疏，早深佩服。若当日施行，何至今日，可胜浩叹！承赐祗树园景片，走卒祗领。敬上南海先生尊右。孝同再拜。

罗惇融

一

夫子大人钧座：昨由卢毅安传信，惊悉师母夫人遽弃尘世，惊痛莫名。伏念师母懿德流闻，德音永嗣，慈孝彰于宇内，乡国奉为女宗，靡间亲疏，同深痛悼。长者洞幽明之旨，决生死之涂，视百年不过刹那，知逝者已归净土，幸同旷达，稍抑哀情。弟子等延阻海山，未亲执紼，悚歉如何。先此驰唁，敬叩崇安，伏维垂鉴。弟子惇融谨上。（1922年）五月廿六日。

二

夫子大人函丈：敬肃者，接奉赐示，敬悉一是。命购诸碑，除有三两种坊间少见正在访购，其已购得者，俟君勉南行，托其带呈可也。云雨既兴，忽为大风所阻，雨不复作，亦奇观也。长者有书成得意之屏联，能赐一二，尤所欣盼。敬叩崇安，诸维爱照不备。门人惇融谨上。八月初三日。

徐致靖

一

敝乡先烈卢忠肃公象昇军中七夕歌墨轴，为邑人储君南强收藏征题，慕公今时泰斗，欲乞椽笔一题，属仆作函介绍，特持来沪，藉瞻风采，以先生荣拜先贤定必不吝珠玉也。储君名贤之后，敦品之士，此次晋谒，并望赐与接待为幸。专肃。并请长公先生道安。

二

览揆称觞，簪裾咸集，乐何如矣。阅报牒德后势将决裂，以意见之私竟致儿戏国事，妄欲为孤注之一掷，不识主斯议者是何肺肠？干戈惑于协约之诱胁，群盲之怂恿，且以踰垣之避相要挟，乖谬昏聩，殊堪扼腕！毕竟黄陂尚有主见，力持不下。此公

大节不夺，故是道德中人所言，当此危疑之际，犹能特立不倚，作中流之砥柱。第恐一齐难敌众咻，四顾无援，情势甚为危迫。有先生前既抗电力争，与黄陂夙具同心，盍再剴切一陈，痛辟盲从之谬，诱胁之不可信。事关国之存亡，即改组亦不得不然，于彼群盲何恤焉。易言倾否，今否已极，徒与委蛇将顺否，且益甚！非倾去此否，别用一番人，不能挽回扼运。竭诚谋国者，岂曰无人，而必惟党系中是求乎？以利害言，惟美及诸中立小国受潜害为甚。然诸小国只抗议而不敢决裂，即美亦仅虚张声势，未敢实行宣战，遂欲运动我国当国者为彼附属品，而彼且安然作壁上观，情事显然而甘受其愚乎？至协商之诱胁亦仅以未来之口惠相诘。狡虏反复，如我国能强使践言乎？况胜负之数未可知乎？严守中立，主权在我，彼狡焉者无从强迫，何等游行自在！乃舍万全之策，无端加入，既与结约，必且受其要挟而不能拒，必且罄竭膏血以相供给，即能制德而胜，国已不支。（主加入者，保无为义和团罪魁之结果耳，参之肉固不胜食，奈国事何。）若德终胜利，则祸尚可问乎？“吹皱一池春水，底事干卿”，此理极明，不待智者而知。彼主张决裂者，岂尽愚昧无知，徒以感情用事，遂尔借题发挥，昧却惺惺使糊涂安心铸错，以遂其私耳。外国人非无党事，一涉外患，即尽捐党见，一致对外，所谓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我则适与相反，方且利用外侮以肆内讧。沪上报章惟《国是报》始终力持正论外，此皆变易论调，强词夺理，以非为是，金钱能力对付口辈，真如疾风扫落【叶】，人心死绝至此，可胜叹哉！《时事新报》主笔某君曾登欧战事略，盛称德之可畏，非诸欧所能敌，今在都中亦变而盲从，事略亦不复续登。某即吾先生游杭时，盛称为后起之秀者。反复如此，顾易知耶。外交商榷会持论与主峰同意，虽其中或挟有党争私见，然其言固不可易也。仆迟暮之年，忧愤莫释，深恐曾不几时将及身为亡国之民。思吾先生一身系全国之望，深为主峰倚重，如能一面力

争，一面联合同志、汇集舆论为后援，或犹可挽斜阳于一线。匹夫有责，正在此时，恐未可默尔而息、高卧东山以自适也。狂瞽之见，伏候裁示，并请颐安。更生先生大鉴。仅叟顿首。（1917年）二月望日。

顷阅报：踰垣者听劝而归，主峰且牺牲已见，降心以从，然分事急矣，将奈之何。

三

更生先生大鉴：绝交不已，又将加入，贵高足之主持斯义，究不知是何肺肠？报载各处公电及吾师致政府长函，痛斥人之荒谬，逐条指驳，以矛刺盾，言之綦详，无庸赘及。独怪若人者，自戊戌政变久而论定。当世志士尊吾先生师弟为先知先觉、望隆泰斗，人无间言。方谓清政虽荒，袁逆虽肆，外患内忧虽亟，而撑拄乾坤、力挽危局将必虽师弟两人，金石不渝，岁寒可盟。为私以窃幸已垂暮，犹冀须臾无死，拭目以观公等二人造福我国民，而不图人心难料，顿易生平昧却惺惺使糊涂，竟欲以党见、私见假外交以倾覆吾国，昏谬险毒一至于此也。吾先生缘是怒气冲激，几成肝厥，然而徒怒无益，吾意惟有宣布 人祸国罪状，与众共弃，使天下之人咸晓然于 人罪恶，人得而诛，甚于义和之罪魁、洪宪之鬻国，人人痛恨。势力独夫，即妄欲挟外以自重，亦何能为？夫人孰无情，以数十年渊源授受，同心同德之谊，就令小有齟齬，何遽加屏绝，贴谓凶终。然而事有重轻，大祸之搆，惟在斯人。劝之不听，责之不覆，是其叛弃师门，遂非怙恶，悍然祸国，以图一己之私，司马之心，路人皆知。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在先生取友不端，羿亦有罪。即鄙人戊戌被祸，虽以滥保为吾师罪，而问心无愧，处之坦然。今则目睹 人之肆毒，一起先皇帝于九原，治臣以滥保匪人之罪，其何能自解耶？早知如此，彼 人者不如戊戌被戮，反得保有令名，免至今日肆虐。所谓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也。愤气填膺，言不

能择，惟望速加断割明示，鸣鼓攻之，宣布观之，律为背师祸国者戒。再迟回姑息，意存不忍，致斥李斯者追咎荀卿，恐吾师亦难逃斯责也。春寒惟国自卫为祝。仅叟谨上。（1917年）清明时节。

《孟子微》收到，讹漏太多，宜重加细校。《春秋考》样本尤宜细加精校，然后付梓，方不负此大著作也。附上远祖遗墨缀讨一首，叩乞赐题。又及。

四

读《中庸》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章，愚意此章经义精深博大，匪言可罄，似举今世界中西学说所谓哲学、科学包括靡遗，经文特举其大纲耳。愤乐相寻，进德修业，反身皆备，充实光辉，尽其性也。推以及人，因材施教，刚柔疆变，胥剂其平，尽人之性也。皆哲学也。至尽人性以尽物之性，则一切科学皆在其中，天文地舆，飞潜动植，声光化电，水火机汽，莫非物也，莫不有性之可尽也。天地能生物而不能成物，化之育之，出奇无穷，蕃殖万汇，以前民之用，胥赖吾人竭心思耳目手足之力，为之研磨发明，使天地间一切物类尽发其蕴，无废材，无遗材，夫而后理无不穷，知无不尽，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尽性功能，乃为至极。是则谓人赖天地以生，无宁谓天地赖人以成化也，育也，皆人力赞助为之也。人为万物之灵，其能力之巨若此，与天地参，岂侈语哉！而要非至诚不为功。吾人生于斯世，苟其秉性异于凡庸，莫不欲孜孜德业，以冀有所尽于民物。惟夫诚有未至，则因循坐误者有之，半途而废者有之，见异思迁者有之，终不能达于尽性参赞之域，遂以为天地万物理蕴浩博，非人力所能悉举，故章首特提至诚为主。至诚者，专以笃志一力进行，无游移，无中馁，具移山填海之愿，奋先难后获之功，人以为艰苦卓绝，至诚乃行所无事；人以为大愚无比，至诚且乐此不疲，用力之久，豁然贯通，卒底于成。此非

至诚而能若是乎？次章致曲有诚，极之于至诚，能化艺成见道，似由科学而跻于哲学，所谓外打进也。本章以哲学而通科学，所谓里打出也，及其成功一也。夫吾国历来经传中言修己，言治人，于哲学言之綦详，独科学一道，从未有专门学说，不知吾圣人在二千载上具何等眼光、何种思想先已揭发道妙昭示后人。举凡欧西哲学，科学家分条列目，繁赜夥颐，累千百辈、万亿言阐发之而不足者，《中庸》此章以数语总括之而有余。异哉，圣人何修得此良由，圣质天纵，声入心通，故能议道自己智周伦物，中和极之位育，尽性极之赞参，比物此志也。惜数千年来，笺注家习焉不察，不能抉其真相耳。彼粗涉西学新说，沾沾自喜者，辄欲傲吾圣人以为有所不知不能，孔子之教，但可为修身之本，而不能适于今世之用。试取此章潜心玩索，当亦恍然于吾所矜为得未曾有者，先圣人早已显言之，汝自不识耳。觉鸠笑鹏，多见其不知量矣。

丙午丁未年间息影虎林，杜门课孙，以《中庸》授读为之讲贯，至至诚尽性章，忽有悟于圣人在二千载上已举今世界哲学、科学诸说，包举靡遗，不觉惊叹，如读异书。夫以童而习之之书，其中具有如此精深博大要义，乃昧焉不察，徒瞠目不知所云，虽笺注家种种诠释，总觉恍惚无要领。今感于身世之际，受外界激刺，忽焉悟及于此，纵使从来未经人道而硿硿之见，竟以为此章真解舍此无他。每思竭吾意识为圣经真相推阐而扶发之，又恐学殖浅薄，力不能举，有举鼎绝龔之虑，卒卒不果，然而怀此久矣。比年来学界、政界少数人自负新说，妄议排孔，竟欲屏孔教于宪法之外。彼以为圣人不知行，谓科学不适于用也。不揣固陋，勉成此篇，欲为彼辈关其口而夺之气，未知其有当否也。丁巳春仲，仅叟自记。

右拙稿一首，臆见如此，不敢自是，录奉教正。得复书，善卿来又蒙惠贶，受之殊切不安。敝寓现况尚可支。近日沪上有市

屋一所售出，得价可岁余敷用。我国时事孔棘，先生爱国函电交驰，用项浩繁，何可于敝处频有所润，后此幸无再施，以重吾愧。元（十三日）、寒（十四日）两电，痛切极矣，苟非凉血，能不为之惧。然特未识某某辈溺于利欲，对之何如？人欲炽而天理灭，儒先格言不吾欺也。善卿言尊恙为时事所激而然，吾窃以为不必担荷艰虞，全在公身万金之躯，关系何如重大！天职所以尽分，天君仍是泰然，自来圣贤豪杰担任大事，必以心平气和出之。孔曰行素，孟曰善养，诸葛公三分大业鞠躬尽瘁，依然不改□□风流。窃愿先生涵养心气，而后可以从容应付也。持其志，毋暴其气，以之应事，亦以之摄生。真气一动，龙雷上腾，百脉受损，大非卫生之道，敢贡其瞽说，以冀采纳。国交既断，即已授权于协约，虽欲不加入，而彼将不计，将来德胜则拜赐之师祸不胜数，即幸而德败，则协约诸国乘战胜之威，其视我且如机上肉，任意齑割，将如之何？其祸殆又甚焉。在某某等将安心作李完用第二耶？数其罪恶，浮于奕劻、世凯万倍矣。若德而胜，则义和团众魁第二，窃恐天壤虽大，无可逃避也。而招工无限制，粮饷无限制，是直接间接淘汰吾国人民两大宗。秦符生、隋杨广恶天下人多之乎？段不逮远矣。《国是报》于德胜后之祸患，言之綦详；于德败后之祸患，犹略而未及，盖此事之罪恶，诚有罄竹难书者已。此请更生先生痊安。仅叟谨上。

顷阅报内乱甚剧，如确则时局或又有变更矣。舍侄仁铨留部得署佥事，公之赐也。谢谢。（1917年）二十四日。

瞿鸿机

一

迹闻贤姬之戚，知难为怀，亟欲走唁，贱体感寒右胁痛剧，狼狽万状，尚难出门，容少迟奉诣定谅之也。朝云才淑，奄即棲禪，坡老情深，何能遣此！惟冀达观物化，强抑幽思，无任祷

跂！先此布意，敬慰起居。长素有道兄。弟鸿机再拜。（1914年）初八。

二

嘉招极欲赴并得与厚公共谈，无如日来胃寒，方与乙庵同病相怜，竟难强出，止得神往而已。即候长公道兄起居。弟鸿机顿首。

三

手教诵悉。承破格赐书，谨先代谢。莘莘学子，得此奇逢，当如何感奋也。敬请长公颐安。弟鸿机顿首。

四

黄氏书画已将尊恔与商，据云但可八折，意在必求善价而沽。鄙见拟请公将欲留者酌示定值，先行发还原物十事，再向磋商，较易为力。公谓如何？敬叩长公有道大安。弟鸿机顿首。十八。

江亢虎

长素先生：沪江一别，忽复三年。世变仓皇，□□增感，抱住绝国，坐看陆沉，弥滋愧赧！兹有乡人熊正理君毕业回国，愿接光仪，正言为介，至祈□而教之。明年暑假拟率此邦教育界人西渡观光，过沪当再晋谒。弘道会讲演周秦诸子已竟，明年将及汉宋学派。英文讲义付印，尚未竣工。梁君曾一晤谭，态度似颇消极。时会如此，元龙豪气消磨尽矣。惟祝杖履安健，捧手有日。匆布。即劬道安不庄。江亢虎谨上。月当头之夜。

溥 伟

一

天游主人电鉴：在沪二十日，备荷优厚，又承惠以多珍，叨在知交，不敢言谢。旋寓后晤靖一，清息尚佳。今彼已北游，二

月中当再至连，如有好音，必以告也。别时适感风寒，极以为念，想已大愈矣。春寒仍宜保摄，不胜驰情。专此。谨候起居兼鸣谢悃不一。宣统乙丑（1925年）正月初五日。溥伟谨泐。

外纸二张录拙作各一，乞转致是荷。

二

函、扇想收到矣。昨接大札，并照片四张，谢谢。善伯必不虚此行，深望早得好消息也。如归来，切盼其过我一叙。北事良佳，倘善伯事就，别无难题，萌芽已茁，不必再多呼将伯，以其无益而有损也。此复。兼问春禧。伟启。乙丑上元（1925年正月十五日）。

三

莪庐先生鉴：溥伟不孝，遭此鞠凶，不克为臣，不克为子，万死莫赎。承惠哀辞，谨稽顙以谢。只以志迷神瞢，不及时复。今者先灵已安窀穸，少得苏息，乃恭修寸笺，藉伸哀悃。今日又收到奠幛一方，谨再申谢。子培处以未悉里居，无法投函，乞代为致谢。专此。持服未敢颂安，死罪死罪。溥伟稽顙。

四

莪庐先生惠鉴：久违颜色，倍切驰依。自去冬移居后，即拟通函问候，苦于莫详居址，举笔又废者屡矣。上年冬至日，接到敝业师顾芝省夫子自关中所寄之信，敬阅之下，始知驹从过秦时相遇，以同年之谊，蒙告以寄信之法，并居址详焉。呜呼！自壬子（1912年）出亡以来，不得师门消息，惘惘心目，无时或忘。今忽捧手教，恍如梦寐，欣庆悲感之极，一旦获万里之鸿鱼，慰十年之梦想，皆先生之厚惠也。衔感大德，莫可名言。而最奇者，前在青岛初晤，系冬至之日，敬为先生设饌，曾经大作及之。而此次接到师函，又是冬至日，可谓奇矣。然尚有奇于此者，光绪己亥（1899年）之秋，即先生去国之第二年，夜梦有人来访，视其刺则大名也。下列四行小字，则冬至也。醒后亦讶

其异，而未敢言也。今果应其二，岂日后尚有因缘以待未来之冬至耶？是真不可解已。此段因果，久欲贡诸左右，因未知投函处，昨阅报纸，始知遄返青岛，谨专人持函，用口清听，想必有以教我矣。

再有恳者，年来颠越，丧乱频遭，囊橐久空，为债所困，增利追迫，固不能怨及债主，而点金乏术，赖欠无颜，耻失信于人，形神嗒尔，望解囊于友，音问杳然。嗟夫！关山失路，人岂长贫贱者乎？惟是故旧之内，顾我无人，友朋之中，惟公仗义，用敢冒渎清神，为我转假若干，以偿急索。先生为过来人，当具同感也。详情请询来使，盛谊永泐不忘。激切陈请，诸希哲察不尽。伟言。六月初九日。

五

游存主人鉴：伟向不主张先生赴津，善留以有待也。今时机已到，为皇上为中国，同人均力请先生一行。伟九顿首为四万万人请命。余详善伯言。伟启。十一月十七日。

后 记

《康南海先生接应南北军阀政客书札》是康有为弟子蒋贵麟先生生前在台湾编辑而成，未及刊印，贵麟先生即因病于一九九二年六月回大陆疗养，一九九三年二月二日在家乡常州市病逝，享年八十八岁。

贵麟先生是我的岳父，一九〇六年六月十四日出生于常州市。兄弟五人，排行第三。其祖蒋伯魁、父蒋金声均从事工商。兄弟多承祖业，惟贵麟先生有志于学，初在常州从江南大儒钱名山，后至上海，于一九二六年初春入康有为创办的天游学院，亲聆康先生讲学。一九二七年二月迫于南北战争激烈，康先生移居青岛，天游学院随之解散，贵麟先生转而考入上海法政学院，就读于法律系。毕业后，曾任教于上海敬业中学、南方中学，又

先后任浙江海宁县政府秘书科长、浙江省峡石县立师范学校校长、南京政府地测局秘书科长等职。一九四六年春，随友人迁至台湾，先后在日本管理委员会任秘书、科长，在南山人寿保险公司任秘书主任兼法律顾问，并曾在东吴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一九七〇年退休后，全力从事康有为遗著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出版康氏遗著三十余册，发表有关康有为思想行谊的文章多篇。

李名方 记于一九九八年五月

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遇难者遗骨发掘纪实

朱成山

1998年4月30日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整理草坪时，在馆内遗骨陈列室北侧草坪坡地上，新挖掘出4具大屠杀遇难者遗骨。

南京江东门又发现大屠杀遇难者遗骨，成为一条爆炸性新闻，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日本、美国等国内外媒体迅速作了专门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一、历史性的发现 弥足珍贵的价值

据史料记载，较大规模地有组织地发掘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骨，在南京历史上已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46年1月29日下午3时，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中华门外兵工厂后面和普德寺后山上，分别发掘出“万人坑”中千余具骸骨。经法医对尸骨检验鉴定，发现遗骨上留有弹穿刀劈的痕迹。后来，在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时，曾在法庭上出示这批遗骨，对法庭的审判起到了重要的物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批遗骨至今下落不明。第二次是在1984年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馆时，从江东门“万人坑”现场挖出了遗骨，并且挖出了日军的啤酒瓶、刺刀和遇难者的纽扣、鞋底、皮带等一批遗物。除了部分遇难者遗骨仍保存在地下未及挖掘外，这次挖的遇难者遗骨，部分被陈列在纪念馆遗骨陈列室内，部分分别陈列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部分遗骨碎片被就地

掩埋在纪念馆内北侧草坪下。遗憾的是，这批遗骨未能原地保护和展示，不仅使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深感遗憾，也给对这段历史的怀疑论者和否定论者留下了口实。

这批遗骨的发现，具有重要的价值：

——发现的遗骨珍贵，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铁证，属珍贵文物。目前在南京，尚无一处遗骨发掘现场保留，这次发现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性质。

——发现的地点重要，恰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尸骨陈列室旁，弥补了当年建馆时未能保存尸骨现场的不足，如加以发掘和整理，作现场陈列，可与纪念馆的原陈列内容、与尸骨陈列室的展示功能相得益彰，增加了在现遗址建馆的份量，增大了馆内陈列物的可信度和震撼力。

——发现的时机有利，正当日本极少数右翼分子抛出反动影片《自尊——命运的瞬间》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时候，加强有关南京大屠杀内容的宣传，不断展示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证据，是我们反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的重要手段。特别应指出的是，有少数日本人妄测纪念馆内陈列的遗骨并非遇难同胞之遗骨，而今发掘现场之保存，将使上述怀疑不攻自破。

此次发现的影响巨大，已通过新闻媒体传送到海内外，引起国内、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成为学术界、新闻界研究和采访的热点。

但是也存在保护困难问题。遇难同胞遗骨距今虽只有 60 余年时间，但如不采取得力措施保护，将会迅速风化，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二、科学地发掘 严格地检验

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先后做了六件事：

一、进行科学地发掘。在江苏省南京市文物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了以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华国荣为领导的考古发掘队，申报并获得国家文物局下发的（1998）第15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证照”。发掘工作从6月2日正式开始，7月24日完成，实际工作日为35天，发掘面积为70平方米，发现遗骨35具。发掘的过程正是南京的高温季节。为了弄清挖掘地点的原始地形、地势、尸骨掩埋的范围、遗骨情况及其性质、年代等一系列问题，考古队员们不顾毗邻的大片鹅卵石在太阳曝晒下散发的阵阵热浪，不怕蚊虫的叮咬，细心地用小铲掀开一撮撮黄土，用毛刷轻轻地拂去遗骨上的土粒，边挖掘边分析考证。每挖一具尸骨均详细地作好现场记录、绘出图例、拍摄录相和照片，留下了一套完整真实的考证发掘资料。尽管发掘的进度是及其缓慢的，但这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二、请法医作现场鉴定。南京市公安局领导大力支持，派来了该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张坚和荣玉山、许象成、张飏、周顺平等6位法医，对现场每一具遗骨作勘察鉴定，用法医学的原理，留下了一套科学可信的“物证鉴定书”。

三、同步进行遗骨保护。邀请了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奚三彩和该院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王勉等文物保护专家，按照不改变原貌就地进行现场保护的原则，采取消毒、清洗、干燥、防霉、加固等保护措施，并在遗骨上空临时搭建油布遮阳（雨）棚，使这批遗骨初步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四、同步进行史料考证。为了对历史负责，组织了部分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专家学者，查找江东门一带1937年底屠杀和1938年初的尸体掩埋的历史资料，并搜集1985年江东门遗骨发掘的资料。此外，还在原先掌握的目睹江东门屠杀和尸体掩埋的11位证人的基础上，又发现3位新的证人，并且请南京市公证处为其公证，留下了三份证人的文字和音像证言资料公证书。

五、同步进行建筑保护方案设计。本着长期保护的目，请纪念馆一、二期工程的建筑设计师齐康来现场设计，初步设计出风格各异的三套可供选择的建筑保护方案。在这些方案中，既考虑和纪念馆目前的建筑环境相配套，又考虑到这批遗骨原封不动地原样展示的需要；既考虑到观众多角度观瞻的空间，又考虑到遗骨保护需要控制一定的温度、湿度等特点。

六、同步进行法律公证。为了取得法律上的证明，南京市公证处的刘庆宁、李巧宝公证员，对挖掘的过程进行现场证据保全公证。

三、江东门一带屠杀和尸体掩埋史料的考证

1. 当年江东门地形地貌的考证

江东门位于南京城西水西门外，是明代南京都城外郊西南部城门之一，有水道经过北河口入江，因位于长江东侧而得名。

在南唐以前，长江主航道大约在今天的莫愁湖、上新河、江东门、三汊河附近，后来沙滩面积不断堆积、扩大，上新河、江东门一带成为陆地。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江东门为中心，东至水西门，西至上新河，北至下关的三汊河，有莫愁湖等大小湖泊和池塘，一条河横贯其间，形成了一个较为荒凉的三角水网地带。从水西门至上新河为5公里，江东门在中间的2.5公里处。其间有一条公路，汽车从水西门出城，可直通上新河，一些村落散布在路旁。江东河边芦苇丛生，周围有不少池塘，当地的一些百姓以采集茭儿菜、种植荷藕谋生。日军进入该地区时，有不少人就躲进芦苇荡里，有的甚至隐蔽了几个月之久。

江东河上有一座桥，名叫江东桥，始建于宋代。相传，朱元璋大战陈友谅即在此桥附近。此桥为南京西部重要交通枢纽。

距离江东桥不远，有一座著名的监狱——国民党中央军人监

狱。该监狱初建于1930年，又名“军政部军人监狱”、“中央海陆空军人监狱”，老百姓又称之为“军法处”。监狱座北朝南，长宽约200米，呈正方形，面积约有40000平方米，能够同时关押1400余人。监狱周围有围墙、铁丝网，沿着围墙的四周还有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沟，将监狱包围。

2. 1937年12月日军在江东门一带的屠杀

日军与中国军队在江东门一带的交战情况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对南京发动总攻击，谷寿夫的第六师团猛攻中华门。与此同时，为切断南京中国守军的退路，第六师团的步兵第四十五联队从西善桥出发，经棉花堤、上新河、江东门，再北上下关。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称：“10日，第六师团命令部分联队从扬子江岸出发，向前进军，同退却的敌纵队相遇，予以击溃，14日到达下关。”45联队在棉花堤、上新河附近与中国守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对此，田中正明在《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文中有不少记载，现摘录如下：

11日夜到12日晨，与驻守在上河镇（应为上新河镇）的敌人交战。攻占该镇的第十二连在这次未曾料到的苦战之后，丧失两名排长，士兵伤亡二十四人。敌人遗弃尸体约三百四十具。

13日拂晓，第十一连和高桥义彦中尉率领的山炮、工兵各一个排总共约二百五十人，与从城内逃出来的约一万五千名中国部队在上河镇北侧的堤坝（应为棉花堤）上展开了遭遇战。经过用山炮点射和近五个小时的白刃战，除连长方大茵之外，我方还伤亡八十人。由于救援部队到来，敌人弃尸而逃。所遗弃的尸体数是，堤坝上约两千三百具，江边上约一千具。基于这一战功，第十一连荣获了师长发的奖状。

13日早晨，第七连（即中队）在江东门与水西门逃出的敌

人遭遇。我方排长岩间战死，连长日高负重伤，此外还伤亡三十人。敌人遗弃尸体六、七十具。

成友营长率领的第十二营 13 日早晨从江东门出发前往下关途中，在三汊河又与城内逃出来的敌人遭遇。战斗中，我方伤亡十余人，敌人弃尸约一百余具。

如果把田中正明所说的“敌人弃尸”的数字加起来，可以算出江东门一带中方军队战死的共有 3800 余人。

日军在江东门一带屠杀俘虏和平民

不保留俘虏是日军的既定方针，这可以从不少日军官兵的日记中得到证实。步兵第 23 联队的一个士兵在 12 月 15 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碰到大约 2000 名无路可逃的中国佬，打着白旗排成长串投降，老幼掺杂，服装不一，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沿道绵延而跪，简直成了天下奇观。（我们）好象没有采取任何处理措施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杀了。近来，闲的无聊时，就拿杀中国人取乐。把无辜的抓来，或活埋，或推入火中，或用木棒打死，或采用其他残酷手段加以杀害。”（《朝日新闻》1984 年 8 月 5 日）谷寿夫在《军情报告》中就当时的“军事行动”这样说：“到处可遇到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我们予以重创，江岸全为尸体所覆盖。”日本著名学者洞富雄认为，谷寿夫所说的“万余敌人”中无疑混杂着很多俘虏和平民百姓。其中无疑混杂了一般平民，“他们是从南京西侧诸城门和城北的挹江门外下关逃出来的。中国兵既有扯起白旗的，也有一起朝扬子江岸边溃逃的，但是他们连带一般市民，都在机枪扫射下葬送了生命”。（洞富雄《南京大屠杀》，26—27 页）田中正明所列举的 3800 余名“敌人弃尸”中，也肯定有不少俘虏和平民百姓。

事实的确如此。教导总队的士兵乔祖贵在队伍溃散后，逃往下关受阻，他亲眼看见向江东门方向逃跑的十余老百姓全被日军

击中。乔祖贵躲入一间空房未被发觉，得以幸免。（杨新华《血证》，44页）刘世海所在的第八十七师驻守在雨花台，经过几天的战斗，部队开始退却、瓦解。刘世海等人败下来后，从城南跑到城北，企图渡江，但江边没有船只。后来，刘世海与四五十人一道，经三汊河来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去。一路上看见许多尸体横陈路边，除了当兵的以外，也有老人和孩子。还有一处有七具尸体，都用铁丝穿了锁骨连在一起，其中还有两个女的，一个女的鼻孔中塞着两发没打过的子弹，七个人都是被刺死的。（本多胜一《通往南京之路》）在江东门，刘世海一行人也没逃过劫难，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他们把白旗举给日本兵看，对日军说：“我们是投降后的士兵。”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他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名日本兵，其中有十几人提着军刀，其他的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一起从四周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刘世海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他只记得日本兵高举军刀向自己砍来的凶恶形象，旁的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刘世海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他身上压着两个死人，他使劲推开站了起来。幸亏伤口还不深，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亮，他赶快离开了那块菜地，走了半里多路，看到一个防空洞，他躲进了洞中……那次遇难的时间，是冬月十四或十五日。同行的五十来人，只有刘世海一人幸存，脖子上留有刀疤约十厘米。

日军在江东门一带扫荡过程中的狂捕滥杀

从《华中方面军南京城内外扫荡区域要图》（14日前后）中可以看到，以江东门为中心的大约3平方公里的区域，正是日军第45联队第3大队负责扫荡的区域。

日军对于扫荡有不少规定，同属第十军的第九师团步兵第六旅团“关于进入城内的旅团命令”，其中“南京城内扫荡纲要”

说：“逃跑之敌，据判断大部分换成便衣，所以，凡有可疑者，悉数检举，在适当位置监禁。”在“关于实施扫荡之注意事项”中说：“青壮年都可以看作败残兵，或是便衣兵，要全部逮捕监禁！”（《偕行》，1984年10月号）日军在扫荡过程中，大肆搜捕，到处抓人，“日本兵对于中国平民可以随便乱抓，任何人的手上只要发现硬茧，就可以指为当兵的证据，必死无疑。”（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18页）江东门一带的居民大多是农民，他们的手上不可能没有老茧，很多人成为日军搜捕的对象。现住江东门积善一队的邱荣贵在江东门经历过好几次这样的检查。邱荣贵曾为日本兵当过挑夫，拿到一张日军写的路条，得以幸免。住江东乡新农村的蒋前富回忆说：“1937年冬月14日上午，有两个日本人到汪明志家门口找花姑娘，在门口的草堆里找到一套中国兵的军装，日本人把军装给王德明穿，一看他穿得正合适，就说他是中国兵，当场就把王德明打死了。”（杨新华《血证》，138页）

日军在江东门以搜捕中国兵为名，胡作非为，大开杀戒。徐学玉当年19岁，他记得：“冬月11日早上，日本人在电台端着枪，对我打来，子弹从我肩上擦过，打中我后面一个人，只听‘啊’的一声，后面的人就倒下死了，我也受了伤。第二天，日本人又来了，叫我趴在地上，问我是不是中国兵？我说不是中国兵，日本兵便打我，对准我的头打了一枪，我头一偏，子弹从头边擦过，至今还留有伤疤。后又踢我三脚，当时我动也不敢动，如果动了，他们就要把我打死。”（杨新华《血证》，43页）家住江东乡圩村的季永松也有类似的经历，冬月13日他遇到日本兵，日本兵问他是不是中国兵，他说不是，是种地的，日本兵根本不听他的辩解，仍然认为他是中国兵，他的头上被打了一枪。（杨新华《血证》，45页）

日军还大肆强奸妇女，至今仍健在的朱有才亲眼看见本村丁

家的女儿因为不肯被日军奸污，跳到河里，日军又逼她的哥哥去拽她上岸，她哥哥自然不肯，结果她哥哥与父亲均被杀害。他还看到本村戴家兄弟被日军戳死，蒋家兄弟也被日军杀害。

农妇陈万珍曾亲眼目睹日军在江东门附近的积余村残忍的将一批难民活活烧死。她说：“冬月十二（即12月14日）这一天上午，日军抓走了我的伯伯，随后又将他押送到积余村附近王华明家里。王家的三间房子当时已关满了难民。过了一会，日军又把这些难民押到附近的一个大茅坑里，用几张大桌子卡在人头上，然后在桌子上加上干柴点燃，使得桌子和人一道化为灰烬。日本兵走后，我去找伯伯时，伯伯已和所有的受难者一道被活活烧死在茅坑内。”邱荣贵也记得这次屠杀，他说：“积余村王华明、王月德家有百十名中国难民，全都捆绑着，被日军打死，尸体堆在房后的大茅坑里。那天，我也被日军抓去，后来跑了……晚上我出来时，那百十名难民全死了。”

江东门地处城郊，比较偏僻，同时又是通往江边的要道，当时，有不少人外出避难的人滞留于此，或干脆直接在此避难。张从贵那时家住宝塔山，由于日本人到处大肆屠杀，被逼无奈，在日军占领南京几天后，只好向外逃难，在路过江东门时，被日本人抓住。他说：“走到江东门桥上时，从桥边的芦席棚里走出几个荷枪实弹的日军，不问青红皂白，竟将我们同行而且互不相识的九个人抓去，指手划脚，叫我们抱稻草、铺床、烧饭等杂事。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等日军吃完晚饭后，天已经黑了，他们把我们九人叫到一个铁丝网围着的操场内，逼我们全部跪下，两旁各站着一名日军，以防我们跑掉。另有九个日军，各持一支上了刺刀的枪，朝我们身上刺。第一刀正刺在我的腰部，因天气很冷，我穿着棉衣，这一刀没有刺着我的肉。第二刀正刺到我的颈部，顿时鲜血直流，没一会工夫，由于流血过多，我昏倒在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日军也就以为我死

了。到了深夜，我苏醒过来时，借着月光，我看到其他八个人都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下，周围一片血迹。我仔细听了听，没有一点动静，我猜想日军大概都睡觉了，就拖着沉重的身子，爬到铁丝网前，滚出了铁丝网，掉到了沟里。我又忍着伤痛，爬了一里多路，在一块坟地里歇了一会儿，看到周围有稻草灰，就抓了一些垫在地上，就地躺下。由于伤痛，实在睡不着，熬到天亮，看到一些难民从这里经过，我就跟在他们后面。”

家住茶亭东街的刘福根回忆说：“当时日军在这里有一个连，到处抓人、放火、杀人，无恶不作。一天，我家来了亲戚象良明和他的儿子象连生，躲在我家豆芽房。日本人来抓民夫，抓到象良明的儿子象连生，他不愿意去，日本人就用枪托打他。当时我的衣服也被抓破了，象连生还不愿意去，日本人就往死里打。我父亲见情况不好，就想跑，日本人也没放过，我父亲刘保荣、我大舅李保田就这样被打死了，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三个木匠和两个过路人。”（杨新华《血证》，57页）

日军在中央军人监狱的屠杀

当时，中央军人监狱里面关押了不少被日军抓获的俘虏和难民，这些人都被日军凶残地杀害了。家住积善村的邱荣贵曾挑着两头猪跟着日军到监狱门口，他亲眼目睹大批中国军人和难民被屠杀的情景。他说：“……日军叫我跟着他们走，刚到江东门监狱门口，日军叫我把猪放在门口场上，这时我看见有一千多名难民被日军从监狱里绑出来，从江东桥头一直排到凤凰街，每隔几步就有一个日军，他们手持刀枪，只听日军军官一声嚎叫，日军就用刺刀往这些无辜的中国难民身上乱刺，上千名中国人倒在血泊之中……”邱荣贵的鞋子上全是血，后来血干了，他不得不把它扔掉。

刘修荣当年十六岁，他看见日本兵把国民党军的俘虏集中在

中央军人监狱（就在他家附近）到大士茶亭之间约二里长的距离之内，用刺刀捅，用机枪扫，整整杀了一天，尸体成堆，只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

朱有才记得那是12月16日，当时他躲在几里以外的阎王庙避难，听到监狱这边机关枪响个不停，难民的哀号声不绝于耳。开春以后，朱有才到水西门领良民证，监狱门前的马路上还到处都是血迹。

监狱里面也是日军杀人的屠场。几天以后，朱有才到监狱里面找东西吃，他看到死人就象麦靶子一样，到处都是。家住江东门的孙孔氏回忆说，她的丈夫孙正宝曾被日本人抓到监狱里做工，看到很多中国人被机关枪扫死了，他回来后就吓病了，几年后病故。

江东门的“尸体桥”

离监狱不远的江东桥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炸毁，日军为了过河，竟然丧心病狂地将尸体堆积在河里，上面铺着木板、衣被，成了令人恐怖的“尸体桥”。孙殿炎的家原住桥头，相距只有10米左右，因为日军经常从这里经过，很危险，他们一家就迁往相距约200米的一座空房子居住。据孙殿炎回忆，尸体桥呈台形，由于垫得不是很平整，多少有些晃动的感觉。一次，一辆日军军车滑进河里，为了便于作业，日军便把孙家的房子点燃作为照明，用另外一辆卡车牵引落水的军车。（杨新华《血证》，12页）何玉峰回忆说：“江东门的江东桥被炸，日军用尸体填平河道，上铺门板、芦席，作为便桥。人走在桥面上，上下颤动，实在惨不忍睹。”朱有才回忆说，用来垫这座尸体桥的，还有活人，“当时江东桥是中央军炸掉的，鬼子把死人、活人填到河里，上面铺上木板。1938年，中岛部队才又重新造了桥。”对此，家住江东门附近的张文尧、孙孔氏都记得很清楚。孙孔氏还记得，后来挖

这条河时，挖出了很多尸体。

日军第16师团在江东门一带的屠杀

12月15日，华中方面军下达命令，为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定及准备下期作战，除第16师团继续驻守南京外，其他师团相继撤离，江东门地区成为第16师团（该师团长为中岛今朝吾）的防区。

日军在江东门继续搜捕杀戮无辜百姓。江东乡积善一队的崔素华回忆说：“1937年日本人来了半个多月，我二婶家来了几个日本人，二叔和我堂弟被他们抓住，拖到江东门军法处，二人被绑着推到一个大茅坑里，结果遭枪击，二叔看见日本人走后才爬回家。”（杨新华《血证》，81—82页）

不仅如此，由于江东门地处城郊，河塘密布，荒地众多，易于掩埋，日军还把在城内搜捕的俘虏押解到江东门进行屠杀。据《首都警察厅西区警察局搜集当年在南京罪行调查资料表》记载（1945年11月12日），1937年12月，日军中岛部队在江东门附近，“将我抗战前警厅官警俘集江东门地点约千余名，以机枪扫射殉难。”

3.1938年春在江东门一带掩埋遇难者尸体的情况

经过日军的疯狂屠杀，江东门一带尸横遍野。陈永富曾亲眼目睹这一带的惨景，他回忆说：“有一次，日军叫我去抬蔬菜，从凤凰西街到江东门约四五里路，我一路上看到有很多被害同胞的尸体，有的是被日军杀死的，有的是被烧死的，横七竖八地躺在路边和水塘里，惨不忍睹。”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4份档案资料，明确记载了1938年初在江东门一带掩埋尸体的情况。红卍字会于1938年1月至5月在水西门至上新河一带收尸掩埋死难者计十四批，共埋尸8459具。

其中，于1938年2月9日，在江东桥收敛尸体1850具。同年2月14日在中央监狱内（即中央军人监狱）收尸328具。崇善堂第二埋尸队从1938年4月9日至23日，在水西门外至上新河共计收尸18788具，其中男尸18429具，女尸336具，儿童23具，埋葬于附近的各荒地菜园。旅居上新河的湖南木商盛世征、昌开运因家务、财产的缘故，在南京沦陷前没有离开。在日军的屠刀下，上新河一带“尸横遍野，人血染地，凄惨万状”，盛世征、昌开运二人从死尸堆中逃出，发动木业商人助款雇佣民工组织掩埋队，在江东门、汉西门、凤凰街、广播电台、棉花堤等地，共埋28730具。

这几个掩埋队都曾在江东门一带活动，它们之间相互独立，掩埋数字不可能重复。如果把慈善团体在这一带掩埋尸体的数字加以清理，就可得出从水西门到上新河，慈善团体共计埋尸55977具。即使除去田中正明所说的“敌人弃尸”3800余具，还有52000多具尸体。这是一个庞大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数字。

江东门附近有不少人曾参加过埋尸，现住白露南巷的张文尧回忆说：“红卍字会组织了埋尸，我干了一天，有的妇女下身还插着鸡毛掸子，我看到的尸体有几千具”。“（尸体埋在）监狱对面有三个大坑，是日本人飞机炸弹炸的…坑有一人多深，二三丈宽。”朱有才也证实：“（尸体）是用钩子钩，拖到监狱对面的三个坑。坑有三间房子大，是飞机炸的。”

孙殿炎则回忆说，监狱对面还有战壕和毛厕，尸体就被埋在里面，“日军进城二十天以后，红卍字会才组织收尸，尸体送往军人监狱对面一条长达二百多米，宽一米，深一点五米的战壕和二个砖砌毛厕内，层层叠叠，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万人坑’。”

对于坑中掩埋尸体的人员组成，孙孔氏回忆说：“当时江东门死了很多人，这里三个坑，里面埋了很多，有老百姓，也有中央军，还有妇女和儿童。”

监狱对面的坑，还是日军杀人的屠场。家住江东门中保村的陈德星，在一九三七年冬月路过江东门时，亲眼看到“日本兵在模范监狱前面把桌子、床板、大门板、木料等堆在一个坑内，倒上汽油点燃，然后两个日本兵架着一个中国人，后面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戳着中国人的脊背，把中国人往火堆里推，只听到声声惨叫，实在惨不忍睹。”

经过日军的大肆屠杀，从水西门至上新河到处坟莹遍地。何玉峰回忆说：“南京沦陷时，我避难郊区沙洲圩，目睹在长达五六公里的水西门至上新河这一段道路上，被日军杀害的人，真是尸横遍野。记得经过红卍字会掩埋，在这一条道路上每隔二三十公尺就有一丘尸体堆。”

综上所述，江东门一带是日军大屠杀的地点之一，共有5万多具遇难者尸体被就地掩埋，而仅江东门一处，红卍字会掩埋的就达2100余具，如果加上崇善堂及盛世征、昌开运在江东门掩埋的尸体数目，再考虑其中一些尸体是由遇难者家属自己掩埋的，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江东门遇难者的人数约在一万以上。

四、发掘和考证的结论

1998年8月10日，各路专家们均拿出了发掘或考证的书面报告。根据考古发掘、清理保护、法医勘验和史料考证的情况，形成了综合性的意见。

1. 现场发掘的遗骨及其特征

新发掘的遗骨共有35具，其中27具保存有头颅及肢骨，有8具仅存肢骨和头颅。35具尸骨中除一具方向不明外，29具为头东脚西方向排列，有5具为头北脚南方向排列。通过对35具尸骨进行骨质分析，对其性别、年龄初步鉴定后发现，尸骨中男女老幼均存在。从性别上看，成人男性16具，成人女性7具，

不可鉴别者 12 具（因儿童或残肢骨之性别不易鉴定）。从年龄上看，老年占 5 具，青壮年占 23 具，儿童占 7 具。儿童年龄最小的只有 5 岁，最大的 12 岁。老年人年龄为 60 岁以上。

发掘出土的遗骨分布密度是惊人的。就整个发掘区而言，在不足 40 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如此多的尸骨，显然不是正常的掩埋现象。从局部而言，尸骨之间有明显的上下迭压关系，并可清晰地看出五个层面。有的一具尸骨同时压着两具其它的尸骨，且相互之间间距很小，相互挨连。有的尸骨左右并排，有的尸骨头脚相连。

大部分的遗骨出土现状不合常规，呈现出特殊的、非正常掩埋的迹象。例如，2 号尸骨为一壮年男性，尸骨出土现状显示其掩埋的时候是下身俯屈卧，膝盖朝下，上躯为侧卧，肋骨朝上，脊椎骨严重弯曲，呈“S”形，可推断出掩埋时是一具扭曲的躯体。10 号尸骨为一个 25 岁左右的男性，其颈椎骨块少缺，头顶骨朝向躯体，出土的位置和现状显示出掩埋时头颅和身躯分离的现象。5 号尸骨为一个 6 岁左右儿童，出土时头骨置于胸肋之上，同时肋骨及下颌骨等散置在头骨周围。22 号尸骨的右上肢肱骨向上和尺、桡骨合并在一起，脊椎屈曲，下肢屈。所有这些，均可看出此处尸骨在死亡或掩埋的过程中，呈现出非正常的现象。

出土的遗骨绝大部分无葬具。在 35 具尸骨中，只有 1 号尸骨有明显的棺具痕迹，且尸骨北侧仍保持较薄的木板残屑。另外，6 号、7 号、19 号头骨前部有铁钉出土，可能为棺板或垫板上遗留的铁钉。其余 31 具尸骨均无任何棺具。在开掘现场散有石灰痕迹，如 25 号尸骨周围及底部铺有约 5 公分厚的白石灰。令人吃惊的是，从挖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一直注意从土层的比较中寻找每一具遗骨的墓穴，但一直未能如愿。35 具尸骨，不论有无棺木，全部没有墓穴痕迹的出现。

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发掘区地层。在发掘区表层及扰乱层中出土了大量的碎骨片，而这些骨片均属人体上的头骨及其它肢骨碎片等，说明了此处确实属于大批尸骨掩埋地，许多尸骨在60年中受到不同程度地毁坏。为了弄清该处的地层情况，考古人员特地在这些遗骨现场东侧挖一条10米长2米宽的探沟。探沟的堆积情况表明，紧靠砂层土层中发现有树桩和大量螺丝壳、贝壳等物，因而推断此处原来的地形应是一处较低的洼地，紧靠池塘边缘。这与至今仍健在的证人的证言是一致的。现仍健在的朱米氏，当年家住牌坊街173号之一。日军侵入南京后，她和丈夫宋昌仁一起逃难到江东门西街头的一间草房住下。第二天，日本兵将他丈夫等10多位难民押到附近菜园地的池塘边，沿塘边的杨柳树站着，然后用枪一个一个地杀害了，尸体都倒在了池塘里。孙孔氏当时24岁，曾经躲在江东河边的芦苇丛中避难，芦苇丛的地点大约在纪念馆办公房西侧。

2. 遗骨掩埋时间的推定

这批遗骨究竟是不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骨，弄清遗骨掩埋的时间尤为重要。为此，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作了科学严密的考证。法医荣玉山、许象成、张飏、周顺平分别查阅了中国《法医人类学》和日本的《法医诊断学》，并根据两书的记载和有关检测项目与数据，采取了现场肉眼甄别、显微镜检验和骨密度检测三种方法实施。他们根据遗骨颜色呈灰色伴有金黄色、骨质完全腐败崩溃、无任何衣服碎片和头发残留、无脂肪外溢、骨髓网状改变、骨质变脆易碎等现场发现，初步判断这批遗骨掩埋时间在50年以上。他们又从现场提取两块股骨，先送至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经扫描电镜和荧光显微镜检验，遗骨中发现含有氧化二铝、二氧化硅、氧化铁等成份。又经南京鼓楼医院骨密度仪器检测，其送检的遗骨骨密度为1.803，十分接近书

上记载的“地下掩埋 56 年的尸骨骨密度为 1.81”。根据骨密度值随着掩埋时间的增长而降低的原理推算，这批遗骨掩埋时间距今 60 年左右，也就是 1938 年左右。这与史料记载和幸存者回忆完全一致。这批遗骨正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骨。

3. 考证后的结论

从遗骨呈阶梯状交错重叠掩埋，分布密集层高，相距距离长短不一，性别杂乱，年龄跨度较大，且有的尸骨呈现有扭曲现象，有的尸骨的头颅移位，绝大多数尸骨无棺木，所有尸骨无棺穴等实际情况分析，该处遗骨为非正常死亡后的非正常掩埋，并呈现出战争时仓促掩埋或大批尸体处理的特点。此外，现场有个别棺木残屑及钉铁出土，与红十字会当年“由于埋尸太多，棺木不够，后来改用芦席包裹尸体，并在掩埋时洒石灰消毒”的史料记载完全吻合。

从现场发现的男女老幼遗骨均有，以及掩埋地点选择在低凹处的特点看，与民间传统的埋葬习俗相悖。一般来说，人们通常忌讳将老人、妇女和孩子合葬在一处，也不习惯将死者埋在低洼地甚至水塘中。只有在战争条件下，没有力量组织机械或人力挖坑或墓穴，通常选择或“坑”或“沟”或“池塘”等低凹处，草草掩埋了结。该处遗骨及其现场环境也符合这一特点。

从现场发掘的部分尸骨有创伤，尤其是 6 号尸骨的右侧骨盆上面有一条明显的枪刺痕迹，据分析，这是单刃枪刺留下的创痕，与日军当时所使用的枪刺完全吻合，推定这位生前 18—20 岁的女性，是被枪刺刺入腹部后身亡的。加上扫描电镜、荧光显微镜和骨密度仪等仪器检定，尸骨掩埋时间为 60 年左右，结合史料记载和至今仍健在的当年证人与证言，我们可以断定，这批遗骨正是 60 年前被侵华日军杀害的死难者。

抚顺平顶山惨案幸存者证词

佟达 整理

说明：1932年9月15日，辽宁民众抗日救国军四路、十一路进攻抚顺。其中十一路军途经千金堡、平顶山村和栗家沟村攻入抚顺煤矿腹地，重创抚顺煤矿。16日，驻抚顺日军守备队、警察署首先将毗邻的栗家沟、平顶山村民3000余人集中，实施了灭绝性的屠杀，然后又扑向千金堡村。该村村民闻讯已经大部分逃离，只有未逃的24人死于追杀。因此，平顶山惨案实际上是包含了栗家沟、平顶山两村的灭绝性屠杀和千金堡的烧杀。

由于平顶山屠杀现场尸体堆积密集，压在底层的140余人于16日晚从现场死里逃生，因无人救治，中途殒命者达百余人，幸存约四五十人。

1971年发掘屠杀现场，就地建起遗址纪念馆。来馆留下证词者30余人。根据1992年掌握的情况，当时健在的幸存者只有16人了。而至今能够对中外观众说明详细情况的只有当年8岁的莫德胜、11岁的杨宝山和3岁的夏维荣三人。到目前为止，中外人士（特别是在日本）大多只知道这三个人，而不知道大多数幸存者悲惨的经历。

这批档案形成于1972年—1973年，现在我们将其中全部公布出来，为日军侵华暴行的研究提供一份资料。对档案中语言不规范的地方，我们在不违反原意的前提下作改动。例如，原文“我的胳膊上被钻了一个眼”，改为“我的胳膊上

挨了一枪。”对于重复量很大的辽宁民众抗日救国军途径千金堡、平顶山村的情况，我们作了删节，只在有代表性的证词中做了保留。但对于所有幸存者关于屠场上情况的证词，我们一字不删。

这部分档案资料在这里发表分成两个部分：一、平顶山的惨案（包括栗家沟）；二、千金堡烧杀。第一部分由于是灭绝性屠杀，因此，每个幸存者的证词前边加上一个题记，介绍了他们的家庭被残害的情况。

幸存者档案的记录者有王洪、谢政、赵秀芝、赵文玉、李凤艳、关文艳等。

一 平顶山、栗家沟屠杀

1. 夏廷泽

题记：夏廷泽，男，全家4口人，兄嫂殉难。当年27岁的夏廷泽抱着3岁的侄儿夏维荣冲出屠场，幸以身免。夏廷泽1983年辞世，享年78岁。其侄儿夏维荣健在，是年龄最小的幸存者。

1932年9月15日中秋节之夜，一陈喊杀声把我惊醒。我爬上墙头向外看，一支人数很多的队伍在行进，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头上包着白毛巾，腰间扎着青布带子，有的人手拿大刀、长矛和棍棒，还有几个人抬着土炮，杀声不断。

9月16日早晨，我看见大街上人们议论纷纷，说大刀会把小鬼子的卖店和采碳所都烧了，杨柏堡的采碳所长渡边宽一被打死了。中午我正在吃饭，外边响起了汽车声。我看见从4辆汽车上下来百余名鬼子兵，把村子包围起来。他们端着刺刀，杀气腾

腾，挨家挨户一个不留的把人们向村南驱赶。我看见村北的 80 多岁的顾大娘因为是小脚走得慢，鬼子一脚把她踢倒，然后一枪刺死。我返身跑回家，告诉我二哥：“不好了，鬼子来报复了，咱们快跑。”二哥抱上孩子，二嫂拿了两个包袱，我们全家跑了出来。我们跑到村子西南，那里已有鬼子把守，我们只好随着人群被驱赶到牛奶房子前面的一片草地上。我们坐在西南角，距我们 2 米远的地方安放着一个蒙着黑布三角架。二哥问我：“这是什么？”这时村中火光冲天，人群大乱。一个鬼子军官嚎叫起来，三角架上的黑布被揭开，露出 6 挺机枪，向人群扫射起来。整个屠场上顿时一片哭声和咒骂声。儿唤娘，母寻子，乱成一团，还有人不顾一切向外冲。我二哥被一枪打倒，3 岁的侄儿从二哥怀里掉在地上，全家 4 口人，一瞬间就死了两口。我抱起侄儿，趁着鬼子更换弹夹的机会，一鼓作气冲了出去，躲在屠场附近的小豆地里，把已经吓得昏迷不醒的侄儿放在垅沟里，我也顺着垅沟躺下了。这时，藏在附近的来大嫂小声问我：“老三啊，你把小侄儿抱出来了，你受伤了吗？”我说：“孩子没伤着，我的右臂挨了一枪。”我问她怎么样，她说：“我不行了，肠子都出来了，我宁可疼死也不叫喊，让鬼子听见，你们也都没命了。”不长时间，来大嫂就死了。

枪声停止了，鬼子兵在人堆里逐个用枪刺杀，我能清楚的听到枪刺扎在骨头上的“咔嚓”声和刺在肚子上的“噗哧”声。有的鬼子惨无人道的挑开孕妇的肚子，一刀挑出胎儿，高高举起，向空中一甩，摔在地上。

鬼子兵走了，我吃力的爬起来，抱着侄儿坐在豆地里，看见三千同胞横躺竖卧在地上。天黑了，下起了牛毛细雨，血雨腥风扑面而来。我的右臂疼痛难忍，小侄儿哭闹着找妈妈。我忍着伤痛，抱着侄儿，告别亲人，我们从虎口逃生。

2. 杨宝山

题记：杨宝山，男，全家3口人，惨案时父母殉难，11岁的杨宝山从屠场逃出，他的大腿受伤，留下残疾，今仍健在。

1932年9月16日上午10时左右，从千金寨开来了4辆汽车，车上装满了鬼子。汽车停在牛奶房子附近，鬼子下了车。上午11时，鬼子到各家各户欺骗说：“你们快到那边去，我们要在这里举行炮兵演习。”这时，几个鬼子闯进我家，用刺刀对着我的父母，叫喊着：“快出去，到牛奶房集合，不去就打死。”我吓得抱着母亲的腿，全家被赶出家门。街上已经挤满了男女老少，一些老弱病残当场就被杀死，村中已经烧起了大火。

我们全家坐在一起，我指着盖着布的东西问父亲：“那是照相机吗？”一个汉奸开始喊话了，他说：“把孩子抱起来，有病的要扶起来。”蒙着布的东西被揭开了，有人一声高叫：“那不是照相机，是机枪，快跑啊！”一个日本军官一挥手，6挺机枪疯狂扫射起来。许多人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已饮弹倒下。片刻之间，血肉横飞，人们的惨叫声、妇孺的哭叫声、鬼子的咒骂声响成一片。枪声过后，整个草地都被鲜血染红了。

当时许多人还没死，伏在地上。汉奸高喊：“日本人都走了，你们快逃命吧。”人们上当了，爬起来就跑。鬼子又来了一阵机枪扫射，我的身上中了两枪，为我日夜操劳的母亲在第一次射击时就被夺去了生命，父亲至死还抓着我的手。鬼子开始用刺刀逐个刺杀，一刀刺去，没有声息的就是已经死了，一刀下去发出惨叫的就再来一刀。有的鬼子为了取乐，专挑孕妇腹中的胎儿。

天黑以后，下起了小雨，我苏醒了，我叫了几声母亲，她不应声，拉几下父亲，他一动不动。我慢慢的爬到附近的高粱地里，伤口痛，肚子饿，爬到第四天，我遇见了大刀会，他们治好了我的伤。以后我投奔舅舅，活了下来。

3. 韩树林

题记：韩树林，男，全家8口人，他的大哥、二哥、嫂子、侄女殉难。惨案当时12岁，他和父母及妹妹幸免。韩树林1989年辞世，享年69岁。

1932年9月15日中秋节之夜，我父亲和大哥上夜班，22时就回来了，说今夜没活干了。夜半，我们听见外面一片喊声，大刀会来了。大家不敢出去看，他们也不进百姓的门，只听他们喊：“中国人不要害怕。”栗子沟那边起火了，我哥哥说：“爹，着火了，我出去看看。”父亲不让他去。

第二天，我和二哥在山坡下的铁路边看见一具义勇军的尸体，身边有个长矛。这时有些人到平顶山看热闹。我大哥在大官桥有个朋友，他要去看望，结果不能出村。听他对父亲说：“村子被包围了，只让外边的人进来，不让村里的人出去。”接近中午的时候，来了两车日本兵，大约百余人，下车就驱赶村民，街上有个汉奸喊：“都到牛奶房南边的山根下集合。”有4个鬼子闯进我家，全家8口人被赶出家门。有个妇女的孩子哭，她蹲下给孩子喂奶，鬼子说：“快快地。”上去一脚把她怀中的孩子踢死了。还有一位小脚老太太因为走得慢，当场刺杀。有个汉奸说：“看见了吧，不快走，跟她一个样。”

在山根下，鬼子让我们坐在地上。这时，村子里房子起火了，大家骚动起来。一个鬼子举起刀，大喝一声，机枪响起来。我记得有6挺机枪。因为父亲问过：“这是什么东西，有6个呢！”枪响之际，父亲把我压在身下，大哥已经死了，父亲受了伤，他再三嘱咐：“千万别动啊。”枪声停了一二分钟，我听见小孩的哭声，然后枪声又响起来。一会儿，日军分成两队用刺刀复查刺杀。父亲“唉呀”一声，被刺了三刀，昏过去了。接着母亲又惨叫一声，二哥喊了一声“爹呀”就死了，嫂子和侄女怎么死

的就知道了。

天黑了，只有我和妹妹没有受伤。父亲苏醒了，问我：“三啊，全家还有谁活着？”大哥、二哥、嫂子都死了，侄女找不到了，可能被鬼子用刺刀甩到什么地方去了。半夜了，父亲说：“没死的快逃命吧。”受重伤的父亲拽着我，妹妹搀着父亲，母亲两个眼睛发呆，一动不动。人死得太多了，在尸体上行走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从死人身上向外爬。我们遇见一个大嫂，她对父亲说：“大哥呀，能带我出去吗？”父亲已经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了，我对她说：“大娘，你能爬就自己向外爬吧。”她呻吟一声就栽倒了。整个屠场上呼爹唤娘的惨叫声和孩子的哭声连绵不绝于耳。我们全家逃到大官町，在一个姓刘的家里住下。母亲眼睛发直，成了傻子。我去矿山要饭，鬼子说我是偷煤的，放出狼狗咬我，现在大腿还有伤疤。为了维持生计，把妹妹卖了 25 元钱。父亲伤口溃烂，一天夜里，他推醒我，对我说：“三啊，你妈妈傻了，你妹妹……”话没说完就断气了。

4. 赵树林

题记：赵树林，男，全家 5 口人，殉难 4 人，11 岁的赵树林幸免。1992 年，我们去寻访他，他已患了脑血栓，只会说：“我是平顶山的幸存者。”

1932 年 9 月 15 日夜，数不清的大刀会杀声震天，路过平顶山。第二天上午，我和几个小孩正在玩耍，看见来了几辆鬼子的汽车，下车就赶人。我跑回去告诉母亲。鬼子随后闯进我家，把患病的父亲拽下炕，姐姐扶着父亲，母亲拉着我和妹妹，全家 5 人被赶出家门。

我们随着人群来到一块空地，听见一个汉奸说：“大家坐下，皇军给你们讲话。”我看见几个黑布蒙着的东西，不知那是什么。等村子起火了，才知道那是机枪，想跑已经晚了。人们一排排的

倒下去，母亲把我搂在怀里，用她的身体掩护我。一颗子弹飞来，母亲身子一抖，压在我的身上，热呼呼的鲜血溅得我满身鲜红。

枪响之后，我的头枕着母亲的大腿，清楚的看见有的鬼子挑开孕妇肚子，把胎儿挑出来，甩出去很远。有的小孩被鬼子挑在空中，在刺刀尖上哇哇乱叫。距我不远有位妇女昏迷了，鬼子一刀刺进她的胸膛，她眼睛瞪得很大，双手抓住刺刀不放，鬼子用脚一蹬，那妇女的手指“唰”的一声掉了下来。这时我的母亲还没死，她轻声对我说：“孩子我活不成了，你千万别动，留条命将来报仇。”鬼子兵一步步刺过来，母亲被一刀刺死，父亲也在惨叫中死去。这刺刀扎在人体上的声音就象刺在我的身上，我昏迷过去。

当我被雨水浇醒，四周静得可怕，我伏在母亲的尸体上哭起来，不知不觉睡着了。火药厂的汽笛声把我惊醒，已经是9月17日早晨7点了。一位受重伤的大伯劝我：“孩子，快逃吧，一会鬼子再来，你这条小命就没有了。”我告别亲人，从屠场走了出来。

5. 杨占友

题记：杨占友，男，杨家是一个大家族，兄弟7人及其妻小共24人，被驱入屠场，殉难18人。时年31岁的杨占友在兄弟中排行第六，他的家族仅6人幸免。杨占友1979年逝世，享年78岁。

1932年阴历8月15日夜，大刀会来了，高喊“杀啊！杀啊”，我心里害怕，带着孩子躲藏到高粱地里，只有老伴躲在炕沿下。这些人中有个叫冯小堆的对我老伴说：“不要怕，咱们是专打洋鬼子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第二天早晨，看见大刀会的尸体在栗子沟那边很多，有十多

个。上午10点多钟，鬼子来了，开始赶人，“快快地，南边红胡子来的有。”大家被赶出了家门，我背着4岁的孩子，领着老伴和7岁的孩子，以及我的5个兄弟的家人共24口人。有个昌老太太70多岁走路慢，鬼子立刻把她刺杀在井边。在被指定的地方，我看见东南方有一挺机枪。我家坐在人群中央，南边的机枪响起来，人群都趴下了。老伴说：“你背着孩子跑不行吗？”话刚落，飞来一弹，老伴一头栽倒在我的两条腿上，鲜血喷我一身。弟妹对我说：“不如干脆站起来，让他们打死倒痛快。”她真的站起来，没等站稳就被打倒。我的上身是弟媳，下身是老伴，鲜血流淌把眼睛都糊住了。扫射了一阵，鬼子好象收兵了，汽车刚启动，听到有人叫喊，汽车又开回来，从北到南开始用刺刀扎。有个摊煎饼的姓郑，被扎上一刀，他大声咒骂，鬼子又在他身上扎了好几刀。鬼子走到我身旁，一只皮鞋踩在我身上，把我免了。听到汽车走远了，我试着爬起来，费了很大劲才用衣袖擦开糊住双眼的鲜血，睁开了眼睛，我的左臂中了一弹，伤不重，先背走4岁的，后领走7岁的。一脚一个死人，我穿的白鞋变成了红鞋。我的侄儿屁股被扎烂了，走不了，流血过多，用双手接自己的尿喝，好不容易逃出虎口。我的妻子和另外一个妇女的肚子被剖开，七八个月的胎儿和大肠流在地上。我的脸上流着鲜血和眼泪，两个女儿哭喊着妈妈。

一个月后，日本煤矿发布布告赔偿，死去的给5元，活着的给30元，瓦房一间给20元，草房一间给10元。据我回忆，有48个人到村长栗广枝那里登记。

6. 任成玉

题记：任成玉，女，全家6人，殉难3人。1978年辞世，享年84岁。惨案当时38岁。

我今年79岁了，41年前，我家住在平顶山村，全家6口

人，有孩子他爹、3个儿子、一个女儿。孩子他爹在家养病，依靠大儿子在矿井干活维持生活。

1932年阴历8月15日那天，抗日自卫军经过平顶山村，烧了鬼子的卖店，打死了好几个鬼子。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我的大儿子祁宝祥从外边跑回来，告诉我鬼子在撵人。我抱着3个月的小儿子，鞋跟没提上就被撵出来了。我的公婆在大官屯住，过中秋节公公来串门，第二天婆婆领着外孙和外孙女也来看我们，刚进门，也一起被赶到屠场。

刚刚中午，鬼子开始屠杀。机枪响起来，人群一下子乱了，人一排排倒下去，哭喊叫骂，象开锅一样。当时，我的大儿子的腿压在我的身下，二儿子离我不远，我抱着小儿子和女儿都趴在地下。这一阵枪杀，死了很多人，我们家除了我的大腿被枪弹擦破皮以外，都没受伤。过了一会儿，孩子他爹说：“鬼子真狠哪，用刺刀扎人。”我二儿子看我怀抱里的小儿子哇哇直哭就说：“妈，给他吃几口奶吧。”我说：“还吃什么，鬼子要扎过来了。”不一会，凶神恶煞的鬼子过来了，噗哧噗哧往人身上扎，孩子他爹挨了一刀，就不动了。我的大儿子趴在地上，他没动，一会，鬼子第二次扎过来，一刀扎在我大儿子身上，还恶狠狠地骂着：“苦力。”我大儿子呻吟几声就不动了。鬼子看见我怀里3岁的小儿子在哭，瞪着眼喊了声“小孩”，扑过来就是一刀，然后挑起来，使劲往后一甩，摔在地上。我浑身上下都是血，鬼子以为我死了，蹬了我一脚就走到我女儿身边，他以为我女儿也死了，枪拄着我女儿的脊椎骨上，好象是歇口气，然后就走过去了。

经过这次屠杀，人差不多都死绝了，遍地都是血，大人小孩的尸体横放七竖八倒在地上，有的还有气，躺在那里呻吟，有的挣扎着往外爬。那种惨象，真是惨不忍睹。

7. 梁平

题记：梁平，女，惨案当时 24 岁。全家 4 人，殉难 3 人。现状不明。

我家住在平顶山最南端，孩子他爹在古城子下矿，家里有两个小孩，大的 4 岁，小的 7 个月。

1932 年阴历 8 月 15 日那天晚上，大刀会什么时候路过我不知道，那时我年轻，加上有两个孩子，没敢出去看，只听见外边一片喊叫。

8 月 16 日那天早饭后，我准备带着孩子去看我的外甥，刚一出来，迎面碰到日本鬼子，他们头戴铁帽子，手中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恶狠狠的逼着我们往外走。孩子他爹抱着 4 岁的大孩子，我抱 7 个月的小孩子，随着人群走到牛奶房子旁边的草地上坐下来。

屠杀之前照了像，有些年轻人见事不好，站起来就往山上跑，这时鬼子的机枪就响了，那些跑到山腰的都被打死了。

我们一家 4 口人坐在一起，枪一响，孩子他爹对我说：“你好好抱着孩子”，说完就没声了。我怀里的孩子一会儿也死了，子弹打穿了他的脑袋，连着把我的右臂也打折了，直到现在这条胳膊还不能伸直。孩子的鲜血和脑浆溅了我满脸满身。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受伤坐在那里不能动，他的女人已经死了，他有个不到 6 个月的儿子，在死人堆里爬来爬去，他大声咒骂鬼子：“王八羔子，没有人性，孩子没死，妈死了。”鬼子听见了，走过来一枪把他打死了，又用刺刀把他的孩子挑起来，甩出老远。真是惨不忍睹。

8. 冯隆才

题记：冯隆才，男，惨案当时 16 岁。全家 5 人，殉难 4 人。

1992年76岁。

那年阴历8月15日夜，忽然来了不少人，喊着“杀、杀。”全家人都起来了。一会儿，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我二哥回来了，还背着枪，他告诉我们：“不要拍，我们专杀鬼子的，小鬼子的日子长不了。”那时我二哥二十多岁，原来在腰截子干活。

我们家住在村子北头。大刀会一走，不知不觉天亮了。早饭后，鬼子包围了村子，由北向南赶人，街头乱了。我看见我们村的八姑不走，鬼子一刀把她扎死在屋里。我们来到牛奶房子附近，我看见东边有3挺机枪。机枪“哇哇”的响起来，不少人冲过去抢枪。我妹妹12岁，第一枪打在她的手指上，妹妹哭喊着，母亲把她紧紧搂在怀里。我身后一个姓曹的，子弹打在他的腿上，血溅了我满身。等鬼子开始枪打刀扎时，我顺势趴在地上，鬼子以为我是死人没扎我。我母亲被打中三枪，扎了七刀，死去了。父亲、妹妹及嫂子都死了。鬼子走了以后，我钻进了高粱地逃生。

9. 董兴财

题记：董兴财，男，惨案当时25岁。全家10人，殉难8人。1992年84岁。

1932年9月15日夜12点，救国军来了，到了腰截子就点起了火。到凌晨三点，东岗吹响了号，他们就撤退了。

第二天早晨，我看见平顶山南头有一个救国军，腿被打断了，牛奶房有七八个，栗子沟也有几个，围着不少人看。平顶山究竟有多少户多少人，我记得不是474户就是475户。我在商务会的老常家看见过一册户口簿，我问老常，他说不是474户就是475户，这个印象比较深。那时候每户的人口多，一户四五口、八九口、十几口人是普遍的，多则二三十口一户。所以平顶山人口最少两千七八百人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天鬼子来了，大家被撵出来。我看到一个三条腿的东西，上边蒙着布，一半红一半黑，那是伪满时期的防空帘。看样子象照相机，所以人们说给我们照相。我发现鬼子一个挨着一个散开了，心想大事不好。枪响时际，我趁机从别人身上爬过去，爬到山根下，一动不敢动。一家人怎么死的就不知道了。现在想起来还心里难过。突然吹来了一阵风，帽子飞走了，血从头上流下来，我才知道是子弹擦破了脑袋，后来子弹又擦过了屁股。枪声刚停，我以为守备队走了。鬼子走到死人堆里来，看到哪个动，就给他一枪。有个男孩挨着我，鬼子给他一枪，他身子一挺栽倒在我的腿上。幸亏没向我开枪。一会听到汽车发动了，有个小孩喊他妈，鬼子又下了车，开始全面复查，用刺刀挨个扎，扎到小孩，就象扎蛤蟆一样往外甩。鬼子到我面前，蹬我一脚就过去了。鬼子走后，下起了雨，我爬到平顶山上，听见受伤的同胞在叫喊，看见千金堡那边大火冲天。天亮了，我逃到北大井。

第二天我逃到东岗窑业的瓜棚里躲藏，看见守备队的卡车来回奔跑运送汽油。大约12点左右，屠场那边升起了浓烟，火势很大，我才知道焚烧尸体。我一家死去8口，有我的母亲、爱人、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的孩子、嫂子和侄儿。

在屠杀时来了飞机，听声音很近。

第二天，鬼子组织人把平顶山村的房子推倒，毁灭证据。

10. 栾立成

题记：栾立成，男，惨案当时20岁。全家4人，殉难3人。1992年80岁。

1932年9月15日夜12时，我下班休息，在理发所玩牌九，听见南边枪响，我们来到大街上，遇见两个人，一个穿黄衣服，一个穿黑衣服，手拿扎枪，问我这儿有日本人吗？又说：“我们是大刀会，来杀日本人，你们回去睡觉吧。”他们秋毫无犯。一

夜只听见西山机枪响。第二天早晨，平顶山下躺倒六七个大刀会的尸体，我也随着大家去看，日本人把守着，不能靠近。10点左右，我回家，鬼子的汽车来到栗子沟车站洋灰洞，全副武装，戴着钢盔，端着枪，来势凶猛。他们把铁丝网以外的都往平顶山撵。我正和哥哥吃饭，两个鬼子闯进我家，我衣服都来不及穿就被赶出来。我因为走得慢了，屁股就挨了一枪把。整个驱赶过程大约一个钟头，这时天上日本飞机在盘旋。大家到齐了，鬼子喊坐下。一会儿机枪响了，先向高处打，然后向人身上打。大家喊叫起来，都说“完了”。我的母亲脑袋被打穿。母亲搂着我，鲜血流在我脸上，眼睛都让血糊住了。我告诉哥哥，母亲完了。哥哥唤叔叔，叔叔也完了。我的后脑勺什么时候擦破的，自己也不知道。哥哥还好，没有受伤。枪声停止了，有人爬起来要跑，鬼子发现了，吹哨又返回来，打了一阵枪，然后就用刺刀挨个扎。哥哥告诉我千万别动。我的母亲压在我身上，浑身都是血，鬼子以为我是死人，没碰我。到我哥哥跟前，只听“噗哧”一声。鬼子走了，我问哥哥怎么样了，他说：“我完了，受伤啦。”太阳落山了，我说：“我背你走”。哥哥很费力的说：“你赶紧逃吧，我不能活了。”我没有办法，一步一个跟头，走一步瞅一眼哥哥，他挣扎着让我快走。

后来我从矿工王庆祥那里得知，我哥哥在我走后全力爬到大房子（矿工房）的菜园子，王庆祥把他藏起来，哥哥身负重伤三处，几天就死了。临死嘱咐王说：“我的弟弟逃出去了，帮我找到，多加照顾。”哥哥埋在东岗杆子道下，裹着破席入葬。我去看他的时候，胳膊、大腿都被狗撕破了。我的头部炎症发作，头和脸肿胀起来。受伤加上精神刺激，从此我的精神变得不正常。三年后的阴历8月15，我买了烧纸和香，到平顶山被围起来的铁丝网外边祭奠亲人，一个鬼子踢我一脚，吓得我跑了。

11. 李连贵

题记：李连贵，男，惨案当时 24 岁。全家 2 人，殉难 1 人。1992 年 84 岁。

平顶山事件前日本人就知道大刀会要进攻抚顺。当时厂里有个日本人叫哲元的，告诉我们中秋节那儿也不可去，红胡子要来。当时我父亲在栗子沟矿工房做饭，没在家住，在平顶山住的只有我和一个叔叔。我们都是单身。中秋节夜里，大刀会来了，我听了害怕跑到西山藏起来。一会儿，栗子沟卖店着火了。第二天在河畔发现二十多个大刀会的尸体。

第二天上午 10 时左右，来了两辆汽车，是日本守备队和在乡军人。分成三队，从东、南、北驱赶，他们说：“快到那边去，有红胡子，我们打红胡子，不走死了有。”我看见一挺机枪。一会就开枪了，大家乱作一团，都往下蹲，往下倒，在我前边有二十多人，我就势倒下，前边的人把我挡住了。离我不远，有个穿白鞋的小伙子，起来抢枪，结果被打死了。鬼子以为都死了，就要开车回去。没死的以为鬼子走了，就喊大家快跑。这一下子鬼子又下车复查，从北边开始，挨个用刺刀扎。我装死不动，快到我跟前时候，我双眼紧闭，握紧拳头，双腿蜷曲，牙关紧咬，精神万分紧张，等待挨刀。“咔嚓”一下，一刺刀从我腰部穿过去，已经穿透了。幸亏没有刺第二刀，我活了下来。当时不知道疼，以后疼死了。天黑了，活着跑出来的有十多个，爬到哪儿的都有，也有死在高粱地的。我爬到南大岭瓜棚，一个老人救了我。一个月后，我才回来。事后领取了 8 元钱（5 元？），叫做损失费，时间大约在事件一二月后。

12. 吴景祯

题记：吴景祯，男，惨案当时 12 岁。全家 10 人，殉难 9

人。1990年辞世，享年70岁。

1932年9月15日夜，义勇军沿千金堡、平顶山这条路攻击抚顺，冲进抚顺市内，次日撤退。早晨我跟着很多人往南跑，去看一个受伤的义勇军。这时由市内开来一辆小汽车，有两个人用一个筐把受伤的义勇军抬到牛奶房子门口，由日本鬼子和翻译询问。内容是那个义勇军的姓名、住址、什么地方人。后来又问为什么当胡匪，这个义勇军说是因为生活困难，和救国军反对压迫。然后把这个义勇军抬上小汽车拉到市里，结果就不知道了。

在午前11点左右，由市内开来4辆大卡车，都是守备队士兵，在栗子沟下车，然后把平顶山包围起来，将全村百姓都赶出来，到牛奶房子附近的山根下坐下，这时已是午后一点多钟了。大屠杀开始了，机枪射击后用刺刀挑刺。把全村约三千多人几乎杀死烧光。受伤逃出来的约有百余人。这个数字是我在日本鬼子赔款时知道的。

我是在日本鬼子走后（约5点钟）才爬出来，逃到石文厂村。

13. 李凤琴

题记：李凤琴，女，全家21人，殉难20人，惨案当时22岁。1983年辞世，享年72岁。

我叫李凤琴，在我22岁那年，即1932年阴历8月15日夜里11点40分左右，抗日义勇军从村南进来，烧毁日寇的平山卖店和腰截子的灯房，打死了两个日本强盗。日本鬼子哪肯罢休，16日那天中午11点多钟，鬼子把平山村包围了，端着刺刀挨家挨户由南往北赶人。那时我家21口人，住在村南马路东的草房里，是租别人的。闯进我家的鬼子有3个，头戴钢盔，端着枪，什么也不说。我们的邻居曾老太太瘫痪在床，鬼子往外撵她，她苦苦哀求：“我走不了啊。”鬼子一枪把曾老太太打死了。我们一

家和乡亲们被赶到村西山下牛奶房子附近。这个地方西边是立陡的山，山上有鬼子岗哨，其它三面是开阔地，一百多鬼子把我们紧紧的围起来，东边和南边分别架起了1挺机枪，上面盖上青布。我爸爸预料不好，对我爷爷说：“死要死在一起，活要活在一块。”屠杀开始的时间大约12点。这时，村子里浓烟四起，村子被点着了。人群里有20多个小伙子向山上爬，东边的机枪响了，这些人一个也没有跑掉。接着，四周的鬼子命令我们蹲下，东边和南边的机枪同时响起来，机枪一共打了三排，就是打一阵子中间略停一下，再打第二遍。子弹打得天空都是烟，连山头都看不见。第一排枪响时我就倒下了，母亲压在我的身上。第二排枪响，我的爷爷被打死，一颗子弹从母亲脑袋穿透，打进我的屁股，弟弟双腿被掐断了，他对我说：“姐姐，我不行了，两条腿都……”话没说完，又一排枪夺去了他的生命。这时，死的人还不到一半，剩下的都是后来用刺刀挑死的。我一家只剩下5口，有父亲、一个4岁的妹妹，一个8个月的妹妹，还有弟媳和我。人们的哭喊和呻吟不断传来，万恶的日本鬼子看见人没死光，就踩着人的尸体用刺刀检查。躺在父亲身边的4岁的妹妹对父亲说：“爸爸，我热。”鬼子发现妹妹在说话，上来就是一枪，我妹妹死了。我的8个月的妹妹被死去的母亲压在身下，哭闹不止。一个鬼子走过来踢开我蒙着脸的包袱，一只脚踩着我的脑袋，刺刀拄着我的肩膀，另一只脚踩着我的上身，对准躺在我身上已经死去的母亲的脑袋就是一刀。母亲身上的血、我肩膀和屁股上的血、亲人和乡亲们的血遍地都是。8个月的小妹妹在母亲的身下直哭，灭绝人性的日本豺狼的刺刀扎入我的妹妹的肚子里，挑起来一甩，摔在地上。我妹妹死得多惨啊。鬼子到我弟媳身上时，见她没死，对准她的肚子狠狠一刺刀，刺刀从肚子左边进去，从右边出来，她身负重伤。大概下午3点多钟了，鬼子走了。我抬起头来，四周没有一点声音，我没敢动，过了一会，我

发现鬼子真的走了，就坐了起来，我的肩膀和大腿都受了重伤，站不起来。我爬一段走一段，来到东边的高粱地。过了一会，我的父亲搀着我的弟媳也来到这里，我们三人见面后抱头痛哭。弟媳向我哭诉了他们的经历。原来，弟媳看见我爬出去了，就喊我父亲：“爸爸，你死了没有，你要没死就跑吧，我姐姐已经出去了。”爸爸闻声坐起来问她：“孩子，你怎么样，还能走吗？”弟媳说：“我不行了，肚子穿透了，不能走了。”她已怀孕快生了，肠子都打出来了。父亲说：“有口气就要出去，这个仇一定要报。”父亲急忙把她的肠子塞回肚子，背着她走出屠场。

这个时候我们家只剩下我们三人了。

我父亲去找人，把我和弟媳抬到亲戚家，三天后，弟媳因为没钱医治死去了。我父亲由于惊吓和想念亲人，患了精神病，没几年也被万恶的旧社会夺去了生命。由于鬼子一脚踩着我的脑袋，我的右脸紧压地面，右眼被踩进了沙子，几年后失明了。

是谁杀害了平顶山三千殉难同胞？是谁夺去了我家 20 人的生命和我的一只眼睛？又是谁烧毁了我们的家园？是万恶的帝国主义。

14. 余桂华

题记：余桂华，女，惨案当时 13 岁。全家 7 人，殉难 3 人。1992 年 73 岁。

我家原住沈阳白塔铺，因为生活困难，在 1931 年秋天到平顶山落户。两个月后，父亲才找到工作，在煤矿下洞子。我家有祖父、父母、弟弟、两个妹妹和我。到了抚顺，生活更加困难，连吃饭都没有保证，父亲下井，我和弟弟每天都去拣煤核，每天都看见鬼子殴打工人，往外抬死人。矿井常出事故，只见好人下，不见活人归。

我家在平顶山实在混不下去了，1932 年 7 月下旬，父亲偷

偷回到沈阳，来信说实在没办法就在秋后把全家接回沈阳。父亲一走，鬼子三天两头来要人，母亲说下井还没回来，也向鬼子要人，一连几天找不着，鬼子以为父亲死在井下，马上来撵我们搬家，那日子真没法过了。

一天父亲来信，让我和弟弟先回沈阳。过了几天，弟弟哭闹着回家，父亲就给我们买了车票。我和弟弟回到平顶山，拐过露天矿，怎么平顶山的房子都不见了？周围都用铁丝网围着。鬼子俩人一对，端着刺刀来回走，他们看见我们两个小孩就对我们摆手，也不知是让过去还是不让过去。正在这时，栗子沟浴池的郭大伯来了，他问我们：“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我说：“我们串门去了，才回来，我妈呢？”郭大伯十分害怕的领着我们往回走了一段路，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对我们说：“你们别回家了，家都搬走了，你妈他们回老家了，这里鬼子不让住了。”郭大伯拿着铅笔在一个烟盒背面写字，眼里含着泪水，写完了以后交给我，嘱咐我收藏好，千万别丢失，只许给父亲看。郭大伯送我们去火车站，买票钱不够，郭大伯拿着我的小包袱去了当铺，换回4毛钱，又给我们买了几个馒头，把我们送上火车，然后掉头就走。

我们在榆树台下车就迷路了，一位工人把我们送到姑姑家，姑姑又惊又喜，问我们怎么回来的，然后让我把纸条拿来，姑姑看完放声大哭，连夜叫人把父亲找来，父亲来了也痛哭起来。

父亲到处打听母亲的消息，得到消息是这样的：大刀会从千金堡来，路过平顶山，又到栗子沟，说要砍日本人，见人就问是不是中国人，说是中国人，大刀会就走，根本不碰中国人。在日本街两个多钟头就回来了。

第二天八九点钟鬼子来了，手拿刺刀，往外撵人，说山里有马贼，让我们躲避。把人群撵到山根下，不一会枪响了，人们哭声震天，骂声不绝。接着一批一批倒下去。有个特务喊：“日本人走了，快跑吧！”活着的站起来就跑，鬼子又用刺刀挨个扎了

一遍。

我母亲听到撵人了，手里拿着装着饼的面袋，随着人群跑出来，枪一响，母亲吓得直哆嗦，把怀里的小妹妹压在身下，妹妹在下边一个劲叫喊，身子还向上顶，我母亲用胳膊往下按她，鬼子看见了，一枪把母亲打死。爷爷站起来就喊：“王八羔子，我跟你们拼命。”鬼子一刺刀就把爷爷扎倒，连扎几刀。妹妹也是这样死的。

从那以后，父亲的精神很反常，一出门就是一天，晚上拿捆草回来。

以上所说都是从隗金山那里听说的。

15. 王殿恒

题记：王殿恒，男，惨案当时 26 岁。全家 5 人，殉难 4 人。1980 年辞世，享年 74 岁。

我当年在大山坑干活，家在戈布住。我有个表弟在平顶山，因为在大山坑干活回家远，在矿工房又很苦，因此就住在平顶山表弟家。工资和表弟一起花。

1932 年 9 月 15 日夜，大刀会进了平顶山，前面的人拿扎枪，后面的人是一色的大刀片，都是红布包头。听说大刀会吃了符，刀枪不入，连日本鬼子都害怕。大刀会烧了栗子沟的卖店，还抢了白面。这样，日本人就说平顶山人通匪，良心都坏了。

第二天 8 点多钟，日本鬼子来了，开始挨家挨户的撵人。我和表弟正在包饺子，就进来两个鬼子，让我们去开会。

我表弟家 4 口人，两个大人和两个小孩。我们 5 人坐在一起，我抱着一个男孩。枪刚响，表弟就被打倒，我被压在他的身下。子弹象雨点一样，抬不起头来。枪声停止，鬼子就开始用刺刀扎。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已是满天星星，周围死一样的静。我抽出被

压木了的腿，看看亲人，好象作了一场恶梦。

16. 隗金山

题记：隗金山，男，惨案当时 11 岁。全家 7 人，殉难 5 人。1992 年 71 岁。

我家住在平顶山北面，靠着栗子沟的臭水沟。家里有太爷、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姐姐和我。

1932 年阴历 8 月 15 日那天晚上，我和爷爷在栗子沟火药厂我姐那儿住的。半夜我们也听见了枪炮声和喊杀声。第二天正在做午饭的时候，我看见来了 3 辆鬼子的汽车，约有 150 余人，下车就赶人，说是要打仗，让我们躲藏。

我家住在牛奶房子附近的半山坡上，南边正对着我们的有 3 挺机枪和 1 架照相机（这架照相机的三条腿都是黄色的，立在那里比机枪高）。有个人用照相机拍照以后，鬼子就把蒙在机枪上的黑布揭开，枪就响了。同时，村里的房子烧起了大火。在我旁边有一个在私馆读书的同学，把棉被蒙在身上，风一刮，被子角就动，子弹一个接着一个打过来，打在那个同学的肚子上，血溅了我一身。突然一颗炸子打在我的肩上，炸掉半块骨头，直到现在我的胳膊还抬不起来，比右臂短了一截，成了残疾人。有个老太太的儿子、女儿都被打死了，她就喊：“把我也打死吧。”我看见鬼子用刺刀挑起小孩，摔在地上，象拌糖葫芦一样。鬼子穿着皮鞋在我身上走，刺刀尖扎在我的后脖颈上，扎出一寸长的口了，现在还有伤疤。因为我没动，才没有被鬼子扎死。

下午三四点钟，我从屠场逃出来。我逃到南花园一个瓜棚里，瓜棚里有热炕，我走得实在太累了，就躺在炕头，满身的血被热炕一烙，粘在炕上起不来。

第二天，一个姓宋的山东人把我背到他家，救了我。

17. 韩成义

题记：韩成义，男，惨案当时 13 岁。全家 2 人，殉难 1 人。1992 年 73 岁。

我家住在平顶山靠着栗子沟的山坡上，上去是平顶山，下来是栗子沟。我 3 岁时父母先后去世了，只有我和哥哥俩人。哥哥在杨柏堡矿上干活，我整天的拾煤渣。

1932 年阴历 8 月 15 日晚上，从千金堡来了抗日义勇军，穿的都是灰衣服，裹着绑脚，手拿大刀，长矛上还有红缨。当时栗子沟有个卖店，抗日军给烧了，他们分别从平顶山、搭连、古城子三路进攻。

第二天，日本鬼子开来 4 辆汽车，每辆汽车上有一挺机枪和四、五十个鬼子兵，下了车就把村子包围了，任何人不能出入。不久，鬼子开始撵人，说是要演炮，要大伙躲躲。鬼子把蒙着红布的机枪抬下来，说是要给大家照相。露出了机枪，大家“轰”的一下起来就跑。同时鬼子的机枪也响了。我站起来刚想跑，一颗子弹打在我左腿的膝盖上，我赶紧趴下，我的后背也被子弹擦了一下。我被压在底下，只听见哭喊咒骂。机枪停下了，只听见隔一会响一枪，屠场上慢慢静下来。我躺在下面动不了，哪知道鬼子又用刺刀扎，只听见“咔嚓、咔嚓”就象扎大萝卜一样。我的大腿被刺刀扎透了，刀尖还把另一条大腿扎破了，现在还留下伤疤。

我醒过来了，好不容易把上半身从死人堆里钻出来。我喊哥哥，他没反应，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

我踩着死人，淌着河一样的血水爬出来。

在没开枪之前，空中有一架飞机来回盘旋，后来鬼子开枪射击非常凶，谁还顾得上这些，什么时候走的就不知道了。

18. 苗长青

题记：苗长青，男，惨案当时 17 岁。全家 4 人，殉难 3 人。1983 年辞世，享年 68 岁。

我家原籍本溪歪头山，1932 年 2 月到平顶山居住，9 月就摊上了这场灾难。我家有母亲、哥哥、我和老婆。我哥哥刚从本溪回家探亲，就遇难了。阴历 8 月 15 日夜间 12 点，大刀会路过，只问是中国人、朝鲜人还是日本人。紧接着把栗子沟郑辅臣的卖店烧着了。接着东乡南坑的劳务系也着火了。大刀队打到北大井就打不进去了，早晨四点多钟就撤退了。

这天夜里打死了 5 个日本人，即渡边宽一、高口、高木、平岛、大龙老太太。大刀会从栗子沟进来，渡边宽一骑电驴子到现场，高木领着一群武士手提大刀，保护渡边宽一。电驴子在由东岗至杨柏堡的途中，渡边宽一被流弹打死，是日本的流弹击中的，子弹是从胸背打进去了。高口是北大井的系主任，他是在屋子里坐着被流弹打死的。只有平岛和大龙老太太因为迷路，在慌乱中迷失了方向，没有躲在井下，而是跑到南坑那边，被大刀会所杀。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躲进矿洞里。

第二天中午，鬼子来了 4 辆汽车，一下车就开始撵人。王长春在场，他领着日本人，他说：“无论男女老幼都到牛奶房子山根下，今晚大刀匪还要来，打炮怕吓着你们，都上那边去。”说完就剥开铁丝网，开始驱赶。当时沿着水沟有一圈铁丝网，网里即栗子沟，一户没动。网外为平顶山，一户没剩全部撵走。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栗子沟华工系有个日本人叫尾张，大刀会进攻当夜，他在值班，藏在桥下水沟里，他看见平顶山居民扛白面，第二天早晨日本人在矿务局二楼开会，他去报告，说平顶山居民勾结大刀匪了，就是以此为借口进行了大屠杀，事情就坏在尾张身上。卖店头一天进来一车皮“红三菱”牌白面，平顶山扛白面的

人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人。

大约1点多钟，我们被赶到屠场，就知道大事不好。鬼子从四面八方围上来，用枪托砸，你想跑也不成。我看到有4挺机枪在南边摆着。机枪开始是往远处打，离机枪近的死得少。我大哥在张大帅手下当过几年兵，机枪一响他往外冲，被打死在山坡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腿上中了一枪。机枪扫射的时间不短，但是人死的还不算多。枪声停止鬼子坐车准备走了。我抬头一看，有个老赵太太，她看到两个儿子死了，就边站起来边呼：“别走了，干脆把我也打死算了。”这一喊，鬼子就来了个第二次复查，死在刺刀下的比枪杀的还多。到4点多钟屠杀完成。屠场上硝烟弥漫，睁不开眼睛。我爬到西山顶上，就是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我藏到半夜，又下来找寻母亲，她还没死，多处受伤。我老婆下肢被打断了。我母亲说：“我不行了，你走吧。”我背不动她们，我不仅腿上有枪伤，后脑勺和右肋也挨了两刀。我忍痛离开了她们。平顶山的房子已经烧得落了架，冒着白烟，千金堡那边还在烧着。

平顶山有多少户，死去多少人，最清楚的是李晋清，他是矿务局日本人的翻译，是土地系掌握户口的，后来发放抚恤金就是他经手的。死的给5元钱，活着的和房子也给了钱。

惨案以后的阴历11月我到屠场看一看，掩埋的土堆被狗掏出了洞，尸体和衣服狼籍满地。

19. 曾广链

题记：曾广链，男，惨案当时35岁。全家12人，殉难11人。1982年辞世，享年85岁。1972年寻访他时。他已经77岁了，说话口语不清，耳朵又聋，有些事情讲不清楚。

我那天是下夜班，天亮回家，鬼子就圈上来，谁也跑不了。

事情的发生，就是由于说是我们平顶山人抢了日本人和郑辅

臣合开的卖店。要不是第二次用刺刀挑，不会死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用刺刀挑呢？就因为郑辅臣有个侄儿叫郑殿林，他听说他的一家也都死在屠场里，就通过郑辅臣的关系，由日本人在人群中找他的老婆和孩子。就这样，没死的人都遭殃了。平顶山的人都死光了，老君庙的老道看全堡的人都死了，他也就上吊了。

我一家 12 口人，全完了，只跑出来我一个。

20. 吴长庆

题记：吴长庆，男，惨案当时 9 岁。全家 5 人，殉难 4 人。1990 年辞世，享年 67 岁。

我们家是从关里到抚顺平顶山的，父亲在北大井采煤。

在惨案前夜大约 10 点多钟，街上响起了枪声和喊杀声，打了一夜。第二天早上 3 点天快亮时，大街上安静了。我们一夜没敢在炕上睡觉，都在地下蹲了一夜。天亮了，我出去大便，看见山上有日本军人，全副武装，在草棵里藏身，有时站起来又蹲下，往村子里窥视。这个时间大约早上六七点钟。然后，日本鬼子下山赶人，从早晨到中午 12 点。我们平顶山有个庙，庙里大约有 15 个和尚，他们坐在头一排。日本军官和翻译研究了一下，翻译让老百姓都站起来，说现在宪兵队长给你们讲话。这个时候全村老百姓都站着，和尚坐在头排，五心朝天。翻译和日本军官说平顶山没有好人，平顶山的老百姓通匪，胡子来了不报告。在我们没有注意的情况下，机枪就响了。在此之前，有个人用小照相机拍照。刚开枪的时候，哭声很大，喊爹叫娘的，不长时间就肃静了。我们家 5 口人，我挨着妈妈，爸爸挨着奶奶，奶奶靠近姑姑。枪响之际，人们就趴下了。我的爸爸从家里带来一个被子，枪响他就给我们盖上被，他正在拽被，一枪击中我爸爸的头部。我妈妈接着拽被，一阵密集的枪弹打在她的脑部。射击停止，日本兵把大枪安上刺刀，在人堆里搜查。有的小孩还活着，

鬼子用刺刀把小孩挑在半空中，甩了出去。我的腰部被子弹擦破一层皮，至今还落下一个伤疤。我憋气装死，日本兵从我身上踩过去，我没动，就这样我躲过去了。等鬼子走了，我才敢睁开眼睛，从死人堆里站起来的大约有五六十人。爸爸、妈妈、奶奶、姑姑全部都死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了。地上都是凝固的血，很厚，把我的鞋都粘掉了。

我原来姓周。平顶山惨案后，姓吴的一家收养了我，我因此改了姓。

21. 刘永海

题记：刘永海，男，惨案当时27岁。全家7人，殉难6人。1972年提供证词后，失去联系，去向不明。

1932年9月16日，日本鬼子的4辆汽车开来停在牛奶房子下边。这时候，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我家在蒸烫面卷子，日本鬼子来了，说要打仗，让我们快走。我领着8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老婆抱着还没满月的孩子，父亲和爷爷随后也来了。走在路上，我听见一位姓顾的姑娘对她的母亲说：“咱们刚出来就听见家里枪声响了，爸爸怕是完了。”这家姓顾的就住在我家西面，隔一条马路，是开杂货铺的，患了关节炎走不动，估计当场给鬼子毙了。在牛奶房子下边，4挺机枪朝西放好，上面蒙着红外青的布，说是给我们照相。

机枪刚响，我赶紧往下趴，吓得浑身麻木，一动也不敢动。我的脖子被一颗子弹擦破了皮，亲人是死是活都顾不得了。射击停止，我的4岁的孩子没有被枪弹击中，她后来是死在刺刀下，被扎了两刀，第三刀就扎到我身上，从后背到前胸扎透了。

到了五点钟，天还没黑，我爬到窑地水池，已经是半夜，下着小雨，就在这儿藏了一夜，第二天逃到朋友老赵家。

22. 李玉芳

题记：李玉芳，女，惨案当时 31 岁。全家 8 人，殉难 5 人。1976 年辞世，享年 75 岁。

1932 年 9 月 15 日半夜，大刀会进了平顶山，枪打得很厉害，我们一家都趴在屋里地下。

我家住在平顶山后街，第二天，我们一家觉得不太平，准备离开平顶山。我爹在家呆不住，就上街闲逛去了。在牛奶房子附近，他看见有 10 多个大刀会的尸体，吓得急忙跑回家，张罗着要走。我抱着两岁的孩子，到前街去找孩子的奶奶。半路碰到一个姓刘的去挑水，鬼子不让，把水桶抢去扔掉。那时大约 9 点了，我听了害怕，不敢走大道，从小路回来。路上，我碰到一个小伙子，20 多岁，脸上身上都是血，他说：“日本鬼子把村子围上了，让进不让出，我要出去，被他们扎了一刺刀。”这时，大约是 10 点多钟了。

我急忙回家，鬼子已经在赶人了。有一个日本鬼子气势汹汹闯进我家，高叫几声“快走”，我们也不知道干什么，急忙出来。全村的人都被赶到牛奶房子下边。我家一共 8 人，有爹、婆婆、大弟弟、二弟弟、两个兄弟媳妇、我和一个两岁的男孩，都坐在一块。

我记得有 3 辆汽车，好象还有 1 辆小汽车，日本鬼子架上了 4 挺机枪。刚开枪的时候，村子里着了火，烧得象火笼一样。刚打第一排枪的时候，我爹就喊：“鬼子杀人了，快跑啊。”人群乱了，我抱着孩子爬起来，沿着西山坡拼命跑，一枪打在我的胳膊上，同时一块石头把我绊倒，我就喊爹：“我受伤了，你抱着小四快跑吧。”爹也受伤了，腿上淌着血，我把孩子给了他，我的腿也不听使唤了，就慢慢向前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山，上边有 4 个鬼子，我怕他们发现我，不敢再爬，就趴在山坡上不动。

我受伤以后，血流得太多，眼睛什么也看不清了。过了一会，我的大弟弟和他的媳妇，还有二弟弟也都跑过来，大弟弟胳膊和腿都受伤了，肚子被子弹穿透了。后面，夏廷泽抱着他的侄儿也来到这里，山坡上还趴着很多人。在我不远的地方有个老太太呻吟，我就问她：“你不是赵大婶吗？你别叫唤了，这山坡上有不少人呢，让鬼子听见，就全完了。”她说：“我难受啊。”就不再叫喊了，可能是死了。鬼子走过来了，我把我的胳膊上的血抹在二弟弟身上，让他别动装死。鬼子用刺刀把我弟弟的衣服挑了个口子，没伤着人，鬼子以为我们都死了。

鬼子走后，我没敢爬起来，就看见有一架飞机飞得很低，围着死人转了几圈就飞走了。天快黑了，下着小雨，我在这时才敢逃出来，我的大弟弟伤重，出来没几天就死了。

10月初，我回到平顶山，平顶山村已经烧光了。我到牛奶房子看看，真惨啊！死人堆很高，上面盖着土，有很多狗掏出许多洞，往外拽死人吃，附近还有一堆鬼子杀人戴过的手套扔在那里。

23. 莫德胜

题记：莫德胜，男，惨案当时8岁。全家7人，殉难6人。1992年66岁，至今健在。

1932年9月15日半夜11点左右，我突然被喊声和脚步声惊醒，急忙爬上窗台向外看，只见一支队伍从南向北开进，第一队手持长枪，第二队手持大刀，第三队手拿钢枪，队伍大约一个小时才从村子通过。天刚亮，我来到街头，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上午9点多钟，我们一群孩子跑到平顶山西坎，往下一看，看见日本鬼子在牛奶房子下了车，直奔平顶山而来，我们这些孩子急忙跑回家。一个邻居对我妈说：“平顶山被围得水泄不通，许进不许出，快收拾一下东西吧，看样子要出事。”

中午刚过，全村就被驱赶到屠杀场。当时，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在我们家里，我父亲是煤矿工人，下夜班在家休息，我母亲在火药厂上班，想上班但是出不去。我们一家在人群的东南部。在人群东边有架照相机，上面盖着黑布。一个翻译传达鬼子官的话说：“日本皇军是为了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把你们集中到这里，胡匪还没走，就要在平顶山打仗了，你们不要怕，把胡匪打跑了就让你们回家。”讲话以后就照相。忽听东山一声枪响，机枪立刻向人群扫射。我们全家马上趴下了，我听不见父母的声音，妹妹不敢喊叫，我的外祖母说她的大腿挨了一枪，外祖父说你别喊，以后就再也听不到声音了。鬼子又开始用刺刀扎人了，快要到我时，我心里想，这回可要完了。鬼子的大皮靴踩在我的胯骨上，一阵巨痛，接着脖子突然冰凉，接着是巨痛，脖子被刺刀划破了。小孩哭喊着，鬼子竟然把孩子活活扎死。

鬼子走了，我爬起来，外祖父和外祖母已经死了，我喊父亲，他不动，我想他可能是睡着了，就咬父亲的手，他还是不动，这时我才发现父亲的脖子上冒着血泡。我孤身一人逃了出来。

24. 马长顺

题记：马长顺，男，惨案当时 44 岁。全家 4 人侥幸全部逃脱。1979 年辞世，享年 91 岁。

我家有我和老伴、一个女儿和侄儿。我有个朋友叫米照兴，他在平顶山开了一个杂货铺，字号“兴顺长”。我家 4 人来到平顶山借住他家，后来我们入了一股，主要经营油盐酱醋之类。平顶山惨案时，米照兴一家已经搬家了，我们一家住在杂货铺里。

在阴历 8 月 15 日前几天，就听说大刀会要来打抚顺。我是听一个村人讲的。记得那个卖菜的对我说：“你们这里过节了没有？”我回答说：“为了什么提前过中秋节呢？”他说：“你没听说

大刀会要来吗？还是早点过节安生。”到了阴历8月15晚上，我们正在睡觉，听见爆炸声和惊天动地的喊杀声，那一夜也没敢睡觉。

第二天早晨，街上有人喊：“快起来，那边有死人。”我的侄儿去看了，说有好几个大刀会的人死在马路上。我听了心慌意乱。到了10点钟左右，才想起早饭还没有吃，正要做，外面有人喊：“日本鬼子要用这个地方演习，都得搬走。”我开门一看，一家家携儿带女，从北向南走。我总寻思没好事，不想跟着走，就把杂货铺的门关好，在屋里藏身。日本守备队来了，用枪砸门，没有砸开，就丢下我们去赶人。这样，我们一家总算幸运，没有被赶出去。

过了一会，外面十分安静，没有声音，我们正准备逃走，机枪突然响起来，推开门一看，房子都烧着了，漫天大火，正向我们这里烧过来。山上还有日本鬼子站岗，逃不出去，我们一家人急忙逃避到我家后院的小厕所，在小厕所里藏了两个小时。枪不响了，火却越来越近，我们只好从厕所的土墙上跳出来，直奔老君庙。老君庙北边也有个小厕所，哪知道里边已经藏了4个人了，是平顶山姓邓的一家。我的老伴和女儿挤进去了，我和侄儿提心吊胆的躲在墙根下，幸亏鬼子没有发现。

天黑了，我们一家死里逃生。

25. 吕均平

题记：吕均平，男，惨案当时36岁。全家8人，殉难6人。1972年留下证词后去向不明。

1932年阴历8月14那天，我在杨柏堡听见议论说大刀会要来，日本人在周围下了卡子。我听说平顶山要来大刀会，就把老婆和孩子从平顶山接出来，到杨柏堡我工作的卫生所躲避。9月15日半夜11点枪响了，大刀会向日本街杀去。到早上2点多钟

我听到号声，知道大刀会撤离了。天亮以后，我看见日本街的劳务系、派出所、银行都被大刀会烧了，而平顶山却十分安静。我以为平顶山安全，就带着全家回到平顶山的家。因为昨夜一夜没睡，所以回家就睡着了，直到孩子打架把我吵醒，这时钟正打12点。我出门看见街上有许多鬼子兵，我心里发慌，就沿着山根没有岗哨的地方溜出去，回到杨柏堡卫生所。

我们医院有个姓周的，他见我从平顶山回来，就把我的白帽子借去。说他回平顶山把老婆、孩子接出来，回去就死在里边了。事后我听说我的母亲、老婆、孩子和弟妹也都被赶到牛奶房去了，我的老婆在屠杀后逃出来，躲在千金堡的豆地里，后来给我送信，我把她背回来，她的大腿被机枪穿透了，十多天后得败血症死去。死的时候还有8个月的身孕。我的三个孩子、母亲都死了。弟妹受伤也跑出来。

平顶山惨案时我躲在屋里没有出来。第二天，我看见有三个日本人领着二十多个工人在收拾被大刀会烧毁的劳务系。其中有两个平顶山的老头，一个是卖菜的老张头，一个是卖花的老李头。我想知道平顶山的情况，就想和他们打招呼，日本鬼子拦住我说：“什么的干活，回去。”第三天，我看见一伙工人拿着锹镐，我问干什么去，他们说给日本人祭灵。我想可能是去平顶山，就跟着去了。他们走到劳务系东边大约三、四百米远的一个小树林里，那里有两个坟头，是被大刀会打死的一个日本老头和一个老太太。坟前立着牌，上边写着名字，坟上还供着两个人头，吓我一跳。原来这两个人头就是我昨天看见的卖菜的老张头和卖花的老李头。我问日本人，这两个老头怎么死的？日本人说：“平顶山的人良心大大的坏了，没有好人，我们跑得快，躲在洞子里，跑得慢就没命了。”

事后我听说在惨案那天，日本人没有发现他们，他们躲在屋子里。第二天日本人到平顶山去抓鸡，发现了他们，就让他们干

了一天活，然后把他们的脑袋割下来祭了灵。

26. 李佩珍

题记：李佩珍，女，惨案当时 23 岁。全家在平顶山惨案中殉难 13 人。这是一份迟到的证词。她的家在杨柏堡，娘家在平顶山，1932 年 9 月 16 日她们一家回到平顶山娘家，全家和娘家全部殉难。她的三哥在杨柏堡医院工作，就是吕均平证词中提到的向吕均平借医生帽子的那个回平顶山接亲人的姓周的。1995 年我们寻访李佩珍，她已经 86 岁，身体健康。

我娘家住在平顶山，我出嫁到杨柏堡。我娘家有父亲、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我是最小的。父亲叫李从文，惨案那年 60 岁，大哥和二哥在龙凤矿当矿工，三哥是杨柏堡医院的医生，还有三个嫂子和侄儿、侄女。

我家住在杨柏堡的庙西，庙在村北，村子很大，人也很杂，有杂货铺、豆腐房、面铺，有日本人开办的照相馆、理发店等，还有一个日本街，村子不远就是栗子沟。1932 年阴历 8 月 15，大刀会路过杨柏堡，打死了不少日本人，烧了日本人的房子，我家的房子和日本人的房子相连，也被烧了。我们家吓得都藏在洞里。第二天，我和丈夫及小叔子跑回平顶山娘家，三个哥嫂同情我们没有房子住了，让我们留下来。上午 10 点钟左右，发现村子里很不安静，也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心中发慌。后来很多日本兵把我们撵出来。两个多小时的屠杀，我家 13 口人，有我的大哥李广贵一家 6 人、二嫂、三嫂、侄儿、侄女、父亲、丈夫、小叔子全部死在平顶山。我身中一枪还被扎了一刀，疼痛难忍，昏死了几次。到处是人，满地是血，我没想走，房子烧了，亲人也都死了，我也想死在这里。到了深夜 2 点，我突然想走（那时谁也顾不了谁），也不知哪来的力量，如有神助一样，向搭连走去。有一个老两口收留了我。七八天后，我的二哥和三哥得

到我的消息（他们当时上夜班，没有在家），领我回去，到沈阳小河沿治病，肩上的子弹拿不出来，至今还留在身上。

事过这么多年，我从不愿意提这件事，太伤心，也从没向子女讲过。1978年我的儿媳妇去抚顺参观遗骨馆，回来对我讲，我心里难过极了，对儿媳妇发火了，儿媳妇吓坏了。直到1992年我看电视，才知道日本人不承认平顶山惨案，我气坏了，我就是历史的见证人，我要揭露日本人在平顶山犯下的罪行。本多胜一来我家采访，我说：“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家13口人，烧了我的房子，我现在叫你们日本政府偿还，难道不可以吗？平顶山惨案难道是假的吗？”

27. 方素荣

题记：方素荣，女，惨案当时5岁。全家8人，殉难7人。1992年65岁，身体健康。

我本来姓韩，原名韩晓钟，平顶山惨案后，我姥姥收养了我，随姥家姓韩。那年我才5岁。我家8口人，有爷爷、奶奶、父母、姑姑、两个弟弟和我。

早晨，来了许多汽车，我父亲看情况不好，急忙跳墙，被鬼子一枪打死。接着，全家被赶出来。开枪以后，我的爷爷把我压在身下，我昏迷了。醒来睁开眼睛，看见爷爷、奶奶、弟弟都被打死了，我的母亲的脑浆被打出来，2岁的弟弟在母亲身旁爬，叫着妈妈，鬼子一刺刀往远处一挑，弟弟不见了。

天快黑了，受伤的没死的都叫着“救命啊”。我想回家，看见房子都烧了，就又回到爷爷身边睡了一夜。第二天我来到大房子，采矿工人把我藏起来，我的身上共有8处伤口。

28. 张庆芬

题记：张庆芬，女，惨案当时30岁。全家4人侥幸全部逃

生。1988年辞世，享年86岁。

1932年9月16日上午10多钟，鬼子包围了平顶山，驱赶老百姓，从北到南挨家挨户的撵。我家住平顶山东南角，从杨柏堡搬来不到一年。我心想可能是查户口，怕我们窝藏大刀会。有个老头姓陈，从北边跑来，说北边都撵出来了，让我们快走……这时大约12点，我们正在犹豫不定，两个鬼子就进了屋，让我们快走，说完就到邻居老常家。往外走的时候，我心里产生了怀疑，就拉了老邓一下，暗示不要再向前走了，趁着乱哄哄，我们一家转身又回到家里，把门关好。就这样，把我们漏了下来。后来听见鬼子喊：“房子火给，房子火给。”再过一会枪响了，枪声听得很清楚，人们的喊叫声听不见。我们在屋子里躲藏了两三个小时，距我家不远的杨新珍的7间房子烧着了，就要烧到我家。老邓说：“不行了，不走就烧死了。”这时，已是午后3点了，一出门迎面碰到4个鬼子，背着枪，扛着一面旗，吓得我们退向老君庙，4个鬼子跟来了。老邓说：“完了，咱们死在一块吧。”我们家4人都趴在地下，低头等着挨枪。4个鬼子来到我们面前，枪口对着我们。说来也奇怪，他们咕噜了一气，把旗扛起来就走，我们急忙溜进老君庙的厕所。鬼子为什么不杀我们，不清楚。他们一转身，发现了刘老头，老刘是摊煎饼开豆腐房的，他牵着一头毛驴藏在煤堆中间，被鬼子发现，一枪打死毛驴，老刘头转身就跑，边跑边喊“我是好人啊”，也向老君庙跑来，快到我们面前了，“啪啪”两枪，他就倒在血泊里，真是可怕极了。鬼子也许发现老刘头那边有动静，先过去查看，回来再杀我们，等他们杀了老刘头，我们已经藏身在老君庙的厕所里，他们找不到了。后来，老马家也来了。

天黑以后，我们逃出来，遇见一个姓李的媳妇，肩上中了一弹，非要跟我们走，走在途中死去了。一路上跑到哪里，哪里都没有人，大家吓得都跑光了。到了唐力屯，有一家反而让我们给

看家，他们要跑。

我们一家躲在厕所里的时候，天上来了两架飞机，这个印象很深，因为老邓想抽烟，我不让抽，好不容易逃出虎口，飞机飞得这么矮，抽烟被飞机发现怎么办。这时候，屠杀已经结束，飞机在天上盘旋了很长时间，天黑才走。

29. 田廷秀

题记：田廷秀，男，惨案当时 17 岁。全家 6 人，殉难 5 人。1992 年 77 岁。

平顶山事件那年，我父亲常年生病，不能干活，我在井下背煤。1932 年阴历 8 月 15 这天，鬼子已经知道大刀会要来，到处都有鬼子的探子。我就听鬼子说过：“红胡子来的有。”说明鬼子早有准备。我亲眼看见永安桥南北都设了岗哨，防备严密。

阴历 8 月 15 晚上我下二班回来，已经是晚上 10 点多钟。后来，我在沉睡中惊醒，喊声震天，天空烧得通红。腰截子斜井上边有三、四百户日本住宅，他们得知大刀会进来了，一按电铃，家家户户都躲到井下去了。大刀会在腰截子扑了空，就往市里攻，同时把东乡坑日本人的办公室烧毁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小孩往南跑，去拣大刀片和扎抢头，在一个坑里和豆地里发现十多个伤员，后来被守备队抓走了。早饭后，外边进来看热闹的很多。平顶山所以死那么多人，就是因为进来看热闹的人多。上午 10——11 时左右，守备队开到了平顶山，三、四辆汽车停在栗子沟车站附近，把平顶山围起来，不许进出。

屠场在牛奶房子附近，长约 150 米，宽约 200 米。大家集合差不多的时候，来了一辆小汽车，有两个人下了车，讲了几句话，朝鲜人走了出去。我站在人群中间，我身边有一个在腰截子开杂货铺的进来看热闹的人，他懂日本话，他听见小汽车上的日

本人说的话后，脸色一变说：“不好了。”这时候我们才明白大事不好。机枪响了起来，人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机枪开始是往高处打，然后越打越矮，因为人们拼命往下蹲，所以，许多人是脑部中弹。我看见机枪有6挺。我的腰部被击中一枪。机枪射击一两个小时，接着开始复查。我父亲死了，压在我身上，我拼命蜷曲身体，把腿收缩到小腹部，我的腿肚子被扎了一刀。我听到我的哥哥叫了一声没气了，我妹妹哭了两声也完了。

我爬出屠场，逃到南大岭，爬到南大岭的有二十多个，有的爬到半道就死了。我哭了，从前不知道哭。

事后死的给5元，活着的给15元，我领了25元，是矿务局一个老头给办的。

30. 方俊山

题记：方俊山，男，惨案当时28岁。这又是一份迟到的证词，是由平顶山幸存者莫德胜提供线索，由方俊山的儿子方忠武转述。方俊山1970年辞世，享年66岁。

我在1927—1932年在腰截子和大哥方福山、二哥方海山合开理发店。1932年初我到平顶山，和父母住在一起，在平顶山自己开理发店。

平顶山全村有400多户人家，800多间房屋，3000多居民。

1932年阴历8月15深夜，大刀会途经平顶山村，袭击了鬼子，烧了粮店，抢走了白面。第二天上午9点，开来了三、四辆大卡车，以及一百多鬼子和汉奸，全村3000多人被逼到平顶山下。中午12点，6挺机枪开始扫射，平顶山村燃起大火。在第二次屠杀开始后，我身边有一个老太太在呻吟，鬼子向她开了一枪，子弹从老太太身上穿过，打在我的左肩上（造成终身残废，左手至今不能干活），我昏了过去。醒来时天已经黑了，爸爸、妈妈浑身是血，早就没气了。我躲进高粱地，在那里遇见了两个

小孩，一个男孩七八岁，女孩五六岁，男孩就是现在抚顺钢厂党委书记莫德胜。我带领他们投奔拉古峪我三哥。女孩脚被刺刀刺伤，不能走，把她寄托在一个农民家里。

附：莫德胜的证明

有一位方叔叔我不会忘记，是他把我从千金堡西山领到拉古峪的。那天我和一个从平顶山逃出来的小女孩跑到千金堡西山岭顶，不知道往哪里走。这时从岭上来了一个人，他问，小孩，你们到哪里去？我说不知道。他说：你不是姓莫吗？我是你们家药铺隔壁的理发馆的方叔啊！我这时认出了方叔，我常在理发馆门口玩。我告诉他：我的父母、妹妹、外祖父和外祖母都被日本人杀死了，我的身上还挨一刀。那个小女孩说她的父母也死了，两脚被扎透了。女孩因伤走不动，留在一个老乡家。方叔把我送到拉古峪林老师家。方叔叔是我的救命恩人。

二、千金堡烧杀

1. 崔玉山

我和老伴关玉清都是从千金堡顶着枪子跑出来的。我住在河东，也就是东山堡。鬼子进千金堡，先进的我们东山堡。

那年中秋节半夜1点钟，大刀会来到我们堡，我看可能有上万人，满山遍野呼号而上，一个劲喊：“杀啊！杀啊！”震天动地，听了叫人害怕。我们都出去看，队伍经过村庄大约1小时，没有打扰我们老百姓。他们的武器是红缨枪、大刀片，也有带枪的，还有十几台大车拉着木头做的土炮。不久，老虎台矿的木头桥烧了，灯房也着了，烧得满天通红。日本人在各个路口都设了卡子，所以大刀会一到，到处都有机枪响。

日本鬼子知道大刀会要来，我们也知道。鬼子是做了认真准

备的。例如我是在杨柏堡修车的铁匠，我的班长从日本人石野那里得到消息，几天前就告诉大家中秋节不要出去，大刀会要来。并且在14日那天傍晚每人发给一个袖标，戴上等于通行证，白地红字。

9月16日早上，我的父亲让我去平顶山的三姐家，接她回娘家躲避。我早上骑着车子到了三姐家，她说过中秋节买的東西还没有吃完呢，暂时不回去。我刚走出三姐家门，就看北边来了4辆汽车，上边架着机枪，开始赶人了。我沿着小路骑车跑回千金堡，告诉父亲三姐不回来，然后爬上很高的杆子道。我一个人站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只见人们被赶到平顶山的牛奶房子山下，前边赶人，后边点火。半个小时以后，机枪就响了。我看得很清楚，急忙回家告诉家人，又跑回杆子道去看。鬼子都上了汽车，发现还有没死的，又进行了第二次屠杀，用刺刀挨个扎了一遍，然后上车，直奔千金堡而来。我赶紧跑回家，告诉家里人快跑。

关玉清插话：我们是东山堡最后跑的一家，是因为公公到河西窜门了，等他回来一起跑，很长时间也没回来，我着急了，就说咱们先走吧，到路上去迎老太爷。途中果然遇上了老太爷，他说：“没事，鬼子演习演习。”相信了他的话，我们又回到家里。刚到家十多分钟，玉山从杆子道回来说：“不好了，鬼子真杀人哪！”我们转身就跑，但是已经晚了，鬼子来了。我们顶着枪子跑的，好危险啊！

崔玉山接着说：我为了拿点东西，晚了一会，出门就遇见了鬼子，我的帽子被一枪打掉了。我跑过老金家门口喊金明举跟我跑，没跑几步，他的胳膊中弹了，打得稀烂。后来我到朗士，人都跑光了。

那天确实来了飞机，飞得很低，大约是4架。

千金堡死了多少人呢？我看不超过20个。被打死的一般都是舍不得财物的，或者留一个老头看家的。大部分人都跑了。我

记得老张家死 7 人，老金家死 4 人，老赵家死 1 人，老富家死 1 人，加上腰街死几人，最多也就是二十来个。河西大堡没死人。这三个堡有多少户？河东有三、四十户，百十间房；腰街小些；河西有好几百户。三个堡的房子被彻底烧光了。有个鬼子向老杜头借火柴，然后把他一枪打死。房子烧了五六天还在冒烟。

不仅人被打死了，牲口也被打死不少。人畜死后无人收拾，很远就闻到臭味。

2. 赵德山

我今年 90 岁了，1932 年我住在千金堡。平顶山事件时，千金堡的村长是王成贤，我是他手下的办事员。

平顶山大屠杀是中午 12 点，鬼子来千金堡是 1 点。守备队来了 32 个人。当时我正在割地，看见平顶山着火，听见机枪响个不停，知道不好，我赶快回家，告诉家里人收拾，背着行李跑。我的父亲、叔叔、嫂子、侄子被打死了。鬼子向我开了一枪，没打中，我伏在稻田里装死，把我免了。

千金堡共有 1100 多户，房子都烧光了。事后赔偿，瓦房 80 元，草房 60 元，臭油房 20 元。

3. 富德俊

我今年 60 岁，1932 年鬼子烧杀千金堡时我 19 岁。我住在千金堡的河西大堡，一共有 200 多户。那年阴历 8 月 15 大刀会从千金堡路过，时间大约是半夜 12 点左右。我们不少年轻人都躲了起来。

第二天，日本鬼子从平顶山杀完，就进了千金堡。因为已经知道平顶山被屠，并且因为到千金堡必然先到河东，所以我们河西这边都跑了。鬼子进了千金堡就杀人放火，用枪打房子，打着了火。我的爸爸、爷爷、妹妹刚跑出家门，就碰到了鬼子。鬼子

开枪打死了爷爷和妹妹。妈妈抱着小妹妹跑到西边大道上，小妹妹的脚被枪弹穿透，妈妈自己也挨了一枪，爸爸受了重伤，几天后死去了。我是听到枪声就跑进了树林。

鬼子烧杀千金堡是下午两、三点钟，千金堡烧了五六天。鬼子也怕大刀会，烧几个房子就跑，烧了五六天才烧完。最后只剩下一座庙。

有个人叫赵金山，他的父母在千金堡村边住，鬼子因为他们年龄大，没有杀他们，因此别人就把东西寄存在他们家。过了几天，鬼子到他们家看见这么多东西，就说你这个老头、老太太良心大大的坏了，把他们枪毙了。

4. 赵文山

我今年 80 岁，平顶山出事那年我是 40 岁。我住在千金堡。那年中秋节晚上，大刀会来攻千金寨，人数很多，有从唐力屯到千金堡的，也有从塔峪过来的。他们的武器是扎枪、刀片，也有骑马背枪的，但那是少数。他们打着白旗，三角形镶着月牙边、红边或蓝边。千金寨他们没攻进去，撤退回到千金堡，还用门板抬伤员。

第二天上午 9 时听到平顶山枪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午饭后鬼子就到千金堡来了，先到东山堡，大约有二、三十个，见人就开枪，见到房子也开枪。当时草房多，枪子一打就起火。

我住在河西大堡，大约 300 户人家；河东和腰街共 100 余户。鬼子进了东山堡（河东），我们河西才跑，所以我们这边死得少。但也有留在家里看东西的，结果都完了。

鬼子以后每天都来，继续烧杀。人死后，无人敢收尸。我的叔叔和婶婶身上的肉都叫狗吃了，只剩下骨架。

5. 金贵祥

我今年 58 岁，平顶山事件那年我 18 岁。那年中秋节晚上 10 点钟左右，大刀会经过千金堡，人数很多，队伍通过大约一个小时。我和叔伯爷爷给他们领路到北大井。听说当时分四路进攻，南边有三路，北边也有一路是从河北来，是赵亚洲的队伍，结果赵亚洲的队伍没来。南边也领错了路，原计划进攻永安台，但领错了路，到了老虎台。所以败了。大刀会的头头听说是李司令，他们是从救兵、马郡单来的。

第二天下午三点钟，鬼子杀完平顶山，就到我们千金堡来。我们已经知道平顶山的屠杀，枪声听得很清楚，所以不少人已经先跑了。有个叫韩宝荣的，从平顶山跑回来报信说：“不好了，平顶山被鬼子圈上了。”因此大家都跑了。可是有个姓张的，他在平顶山牛奶房工作，给日本人喂牛，家住千金堡，他下班回家时，鬼子还没到平顶山，所以他说没那么回事。有些人相信他，没有跑，吃了亏。首先他自己全家就都死在千金堡。

千金堡先跑出来三、四百人，所以人死得不多。我家 6 口人都跑出来，只留下我父亲金明举看家。鬼子进了村，我父亲和崔玉山、胡明甲的父亲最后跑出来，鬼子在后边追杀，我父亲的胳膊受了伤。

千金堡由 3 个堡组成，河东有 100 多户。鬼子来了，河东首当其冲，死的人最多，大约死伤七、八十人。腰街最小，夹在中间，大约 30 户。河西最大，大约 200 多户。河西只死了 1 个人，有个姓富的被打死了，他的儿子叫富德俊。

千金堡的房子被烧光了。鬼子是陆续烧完的。所有的人都跑光了，哪儿都没有人。地里的庄稼无人敢收割。牲口死了许多。人和牲畜尸体的臭味老远就能闻到。

关于事后的赔偿，千金堡死的人不给钱，但是房子赔了钱。

我家7间房，得到赔偿200元。

大刀会来了，很多人不了解情况，到处躲藏。我有个叔伯妹妹，那年十八、九岁，第二天早上躲到平顶山，就死在了里边。

6. 金明德

1932年我20多岁。我当时在杨柏堡当工人，是运输打旗的（信号工）。大刀会是在晚上十点多钟进村的，我们一家人害怕，躲进河套里。

第二天我到河西串门，人家对我说，你们河东的人都跑光了，鬼子就要来了，你怎么还在这儿。我赶紧回到河东，别人都跑了，只有我的老婆等着我。我还和金明祥、高德广闲聊了几句，他们说：“中国人怕啥？咱们工人怕啥？”我老婆催我快跑，幸亏她这么一催，不然再晚两分钟，我就完了。金、高俩人由于没跑，结果被杀。七、八天后我回来看见他们的尸体都发了，臭气熏人。

有的人舍不得家，凡是看家的都被杀死了。例如赵家和杜家，把门插上，这怎么能行呢？鬼子一脚把门踢开，两个老头都死在门洞里。还有的套上马车跑，但是晚了，连车带人全完了。

河东死了30人，腰街死了五、六个人。

7. 赵德福

千金堡是由河西、腰街、河东3个堡组成，共710户。鬼子到千金堡是在下午4点钟。平顶山在烧杀，大家已经有了准备，被打死的主要是那些顾家的人。

我家没跑，是因为老伴差两天满月，心想一个没满月的妇女能把她怎么地，结果她身中3枪，她怀抱着孩子，子弹从后背打进去，穿过孩子身上，孩子死了，老伴的腿和脚都被打中，右脚被穿了一个洞。鬼子走后，我把老伴背出来。太阳快落山时，天

上来了飞机。

一个月后我们才敢回来，满地的庄稼没人收割，牲口死得到处都是。老伴的伤口没处治疗，脚趾都生了蛆。

8. 赵文泉

在阴历8月15以前就听说大刀会要来。

第二天，平顶山那边枪响得厉害，不一会鬼子就来到千金堡，见人就打，见房就烧。我往谷地里跑，鬼子连开两枪，没打着。

鬼子先进的东山堡。死者大约二、三十个。富成文一家被打死五、六口，我们家死了三、四口。

9. 胡明甲

平顶山惨案那年我19岁。1932年阴历8月15前几天，就听说大刀会要进攻抚顺，南花园、唐力、王木这条大道上都不走车了，行人稀少。

中秋节晚上8点，大刀会的队伍从唐力、邓尔、丁家沟路过千金堡。那天晚上有月亮，看得清楚。队伍排成一列，行进速度快，纪律非常好。武器是大刀、长矛，都包着红缨。大部分是年轻人。

大刀会路不熟，边走边打听。我们堡有个姓潘的，送大刀会去平顶山，我也给他们带过一段路。大刀会烧了日本人的粮店。事后日本人说是平顶山人抢了白面，这完全是造谣。卖店有个替日本人管事的刘惠民，他说日本人提前两天就把白面运走藏起来了。

平顶山的大火和枪声我们都十分清楚。这时从平顶山跑来一位妇女，浑身是血，手捂着肚子，告诉我们鬼子把平顶山的人用机枪突突了。人们这才感到处境危险，纷纷外逃。

记得平顶山的枪声不再响的时候，一辆鬼子的汽车来到了。鬼子发现人们逃跑，使用平顶山的方法不行了，就开始追杀。我父亲走得慢，他和一个姓杜的老头还没出院子，就碰到了鬼子。两个鬼子向他们要火柴，我父亲装作取火柴进屋，从后门溜走了。我们邻居有个姓张的工人，他说自己没干坏事，日本鬼子不能把他怎么样，结果他的一家父亲、妻子、弟弟、4个孩子都被杀了。

我逃到房身，遇见一位大刀会的团长，叫曹锡夫，山东口音。他说当过大山坑的工人，到过平顶山。

一个月后，我回到了平顶山。邻居张家8人的尸体还扔在院子里，他的妻子肚子被剖开，胎儿掉在外边。

回忆一九三八年延安之行

堵述初

一九三八年，我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湖南长沙办事处工作时，接受我会派往延安参观之命，于是年五月七日于长沙首途赴延安，直至六月二十一日离开延安，返回长沙。这次延安之行，离现在已五十多年了。当时我三十三岁，现已到了耄耋之年，每忆及此事，仍然激情满怀，不能自己！我从延安回到长沙后，曾写了一份题为《陕甘宁边区考察报告》，约两万余字，交给我会，但我自己没留底稿。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长沙大火”前三天，匆匆离开长沙，前往我会驻湖南湘西泸溪办事处。一九三九年由泸溪入川，在我会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便再也没有谈起延安之行了。到了一九八二年，我才抖起精神，写了一篇《延安参观记实》的回忆录，约二万五千字。这个回忆录是全凭记忆写成的。一九八五年前后，北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宋恩荣同志来到我南京家中。宋同志谈他自己来南京的目的，是为研究晏阳初先生生平及晏先生所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的。宋同志还告诉我一个意外消息，就是他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看到了我在长沙交给我会的那份《陕甘宁边区考察报告》^①。他说已把这份《报告》中的《毛泽东先生会见记》^②的大部分复印出来了。这真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到一九九〇年五月，我应邀出席石家

① 《陕甘宁边区考察报告》写于1938年7月13日，在我会长沙办事处。

② 《毛泽东先生会见记》写于1938年6月14日，在延安西北旅舍。

庄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国际讨论会之前一周，我女儿德健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找到了那份《报告》，并把《报告》全部复印出来了。现在我手头有了上面说的这两份材料，再加上我现在对于那次延安之行的回忆，我这次的回忆录就可以动笔了。

以上所说，就作为一个开场白吧。

—

题目叫“回忆录”，自然以回忆为主。但是，有些材料，如我在延安晋见毛主席以及和毛主席的谈话，虽然宋同志在编辑《晏阳初文集》时，把我那篇曾经在《民间》杂志上发表过的《毛泽东先生会见记》编入该集附录中去了，但此文前面缺了一小段，因此，我必须按照那份《报告》的全文，加以补足，使成完璧。还有关于“边区”的组织图表等项，也应以《报告》为依据，加以引用了。《记实》是凭回忆写成的，有些部分可以引用，但不能照搬；否则我就不必写这次的回忆了。此外，还有些过去没有想到的事，如在延安见到毛主席共有几次等等，自然更是这次回忆录所应该写进了的。

我的延安之行，是受平教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的派遣而去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我自己没有一点儿主动性。我是有一定主动性的。第一，我是一九二八年大学毕业不过三个月左右，就由平教会代理干事长陈筑山先生聘请到平教会工作了。当时，平教会的办公地点在北京石驸马大街。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起，我就从北京来到了定县实验区，直到一九三七年初春才离开定县，来到长沙。在这将近十年的定县工作中，思想上也有一些变化。如一九三四年前后，我写了一篇题为《晚霞》的短篇小说，说有一位名叫S的北京某大学女生，经过与其男友一段热恋以后，便去洞庭湖“落草”了。“落草”是个隐语，就是这位S女士参加革命游击队去了。因为自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兴起

后，洞庭湖边的革命游击队活动是一直未断的。第二，一九三一年我在定县高头村工作时，王若飞同志的舅父黄齐生老先生也受平教会之聘来到高头村工作。这时，王若飞同志已被绥远省傅作义主席投入监狱，黄老先生曾去探监，历述王同志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的风格，令人敬仰。抗战爆发后，王若飞同志被释放出狱。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黄老先生由延安返回贵州老家路过长沙，我和黄先生得以再见。黄先生说起延安情况，使我欣羡不止。黄老先生便劝我到外面走走，最好到延安。由于黄老先生的鼓励，我便萌生了“静极思动”的意念。过了几天，我便向平教会申请派我去延安参观，而且很快就批准了。平教会之所以批准我去延安参观，是从本身工作和国内的形势来决定的。因为平教会和共产党都是做农民工作的，虽然平教会着重点在教育，共产党的着重点在政治。而且抗战前不久，平教会已办了几个实验县，不仅办实验县，同时，还准备和新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先生办“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呢。办实验县、办干部学校，难道说不是政治吗？因此，私人学术团体的平教会派遣我到延安参观访问也就合情合理了。

平教会平民文学部主任孙伏园先生，这时已被平教会推荐任湖南省衡山实验县县长。孙先生的大儿子惠迪、二儿子惠畴，抗战爆发后从北平来到了长沙。这两兄弟都在北平念书，弟弟已经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哥哥已是高中毕业生，他们早想去延安投入革命阵营中去，这时自愿和我结伴同行。孙先生也赞成他两个孩子的行动。我有了这两位革命青年同行，自然非常高兴！但在我们起程前几天，突然听到日寇已经侵占了潼关对岸的风陵渡，不时炮击潼关，而潼关又是去延安的必经之地，可我们三人，却并没有因为这个日寇炮击潼关的消息叫我们败兴或者惶恐，恰恰相反，更增加了几分“壮别天涯”的豪气。我的表妹戴原本，“七七事变”前是北京大学学生，“七七事变”后，北大已成为“西

南联大”的组成部分。这时，“西南联大”的师生来到长沙，借驻湖南大学，准备稍停一个时期，然后转到云南的昆明去。因此，我便有在长沙与表妹时常见面的机会了。离开长沙的先一天夜晚，我独自渡过湘江到湖南大学与表妹告别时，虽然知道此行要冒很大风险，但彼此都满含悲壮之情，相对无语而意气甚豪！

按照当时一般人前往延安的办法，是必须取得那个地区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才能进入解放区的。当时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负责人是徐特立老同志。徐老和孙伏园先生及黄齐生先生在法国留学时已经很熟了。我来长沙后，在孙、黄两先生的带领下，曾经多次访问了徐老，还曾听过徐老的长沙的公开讲演呢。因此，徐老给我们三人开介绍信很顺利地办到了。因为我们第二步要到武汉，所以徐老给我们的介绍信只是把我们三人介绍给武汉的八路军代表董必武老同志。西安是我们在蒋管区的最后一站，西安的八路军代表是林伯渠老同志。董老的介绍信只是把我们三人介绍到西安的林老。

我一生开始与共产党员相认识，就是徐、董、林三老。三老的年龄都在六十岁以上，但丝毫没有社会上一般知识老人的暮气，但也没有年青人的锐气形诸言谈之中。与其说三老是革命家，不如说他们是学者。由于我和徐老见面次数较多，徐老的学者风度我领略得更多一些。有一次，他告诉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的草稿，我没看见论文的题目，他随手就把那草稿塞在床铺下面了，似乎并不认为这草稿有多么重要似的。徐老即使作公开讲演，言词也很平易，没有激昂的神态。有一次我听徐老在公开演讲中说：“长沙有没有民主？”他自己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八路军在长沙设立了办事处。我在武汉见到董老时，他正忙着和一批赴延安的青年们谈话。董老看了徐老的介绍信，立即提笔写信，把我介绍在西安的林老。在西安见到林老时，办公处人员不多，来访者也少。因此，林老的态度比较悠闲。因为要在西安等候去延

安的汽车，我在西安街上又见到了正在街上散步的林老一次。我对徐、董、林三位老共产党员都十分钦敬。

我们三人在武汉稍作停留，恰好孙氏兄弟的叔父孙福熙先生也在武汉。我和福熙先生曾在定县相识。福熙先生在上海主编《艺风》杂志时，我曾在那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福熙先生对于孙氏兄弟奔赴延安表示赞许。这是令人感动的。

因为武汉是南京失陷后事实上的国民政府的首都。我那份《报告》中曾有如下的叙述：

“武汉是现阶段抗战期中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也可说是事实上的首都，所以各个方面的人物都聚会在这里。人口陡然的增加了，市面上的繁荣便成为自然的现象。不过这些增加的人口，多半是南京及其他江南各县逃难来的。因为江南富庶，生活习于奢靡，他们逃到武汉以后，只要手中还有几个余钱，生活习惯依然不改，结果形成一种反常的现象。譬如汉口所有的饭菜馆，每天都是座无虚席，而在法租界中的种种荒淫逸乐的行动，反较南京失陷前更为放肆了。但是在另一方面，最高领袖的贤劳那是不用说了，在政府内部，确有不少积极分子。至于努力救亡工作的青年，如宣传队、剧团等，更是随处可见。此外，从事于各种救济事业的社会名流，亦在多方面努力之中。如组织中国儿童保育会的李德全女士，即其一例。我曾经访问李女士一次。她们的工作，就是保育战区的儿童。第一步的目的，希望收容难童两万，已经派人到华北的战区实行收容去了。不久即将有五千个儿童运到汉口，然后分送到设于内地的分会。收容之后，不但给他们以衣食，而且给他们受教育。我们的敌人，现在沦陷区内也在搜集我们的幼年同胞，运到他的国内，施以奴化教育，准备下一代侵略我们的种子，这手段最毒辣不过。所以对照起来，我们这种儿童保育工作实在非常重要了。”

我那《报告》中也谈到了董必武同志和我的会见，并说：

“董先生态度和蔼，也了解本会工作。他希望得到本会的出版物全份一套，以为参考。谈到国共两党最近的政治关系，他很抱乐观，纵令有些磨擦的纠纷，那只是某种行政机构的问题。譬如现在武汉检查新闻的机关有十三个之多，而且每一个自成系统，互不相属。这自然就生出麻烦来了。”

董老是我离长沙后，听见到的第一位关心我会工作的中共人士，使我深深受到鼓舞。关于董老要我赠送我会全部出版物问题，因为我从延安返回武汉时，长江下游的马当要塞已经失守，侵华敌军正在沿江西侵，“保卫大武汉”的呼声也正在风起云涌之时，所以我没有把我会的全套出版物寄奉董老，但是当我回到长沙后，我却把我会一部分大部头的出版物，如《定县社会调查》、《定县农民教育》等等寄到延安去了。我寄去的这些书籍，延安方面是否收到，就不得而知了。

从汉口到西安，我们三人买的是平汉和陇海铁路的联运票。那时陇海线上自汜水至潼关的许多车站，都遭到侵占黄河北岸的日寇的炮击。潼关北岸的风陵渡，这段黄河水道最窄，所以侵占风陵渡的侵略军，对于潼关的炮击也更频繁，我们的火车到达潼关附近时，只好停下来，以便等到夜晚，熄了车灯，悄悄地开车过潼关了。我那《报告》中写道：“火车在白天是不敢从这里经过的，否则，必有危险。所以我们那次火车，也只能在夜晚于灯光熄灭下特别加快速度地开过。当偷过潼关时，全车的人都静寂无言，紧张情况，可以想见。”我当时的心情，集中在两点：一是屈辱感。在自己的国土通行，白天不能过，只能在夜晚过去，这是日寇压境所造成的，不是屈辱是什么！二是责任感。我们这次抗战，本是以弱敌强，暂时国土的部分沦陷，是不可避免的，但到我这西行之前，我正面军已有台儿庄大捷，我敌后八路军又有平型关大捷，士气正盛，前景光明。我应当把抗战救国的责任从本身担当起来。我这次延安之行，不正是寻求抗战救国之道才

去的吗？想到这里，我的心情便逐渐振奋起来了。

火车到西安附近的灞桥站时，我从车窗看到古灞桥的遗迹。桥身低临于灞水之上，与经过火车的铁桥平行。桥系木制的。桥上可行人及驴车。桥头立着牌楼，特别表现雅趣。因而想到古代的名士诗人经过这里临别赋诗的情景，不禁发生了怀古的幽思。

西安这座古城，略近于北平，但没有故宫、颐和园、北海、中山公园等建筑，古朴有余而富丽不足。但我们不是来游览的。我们找完了旅舍之后，即去访问八路军驻西安代表林伯渠老先生。林老看了徐老和董老的介绍信，立即给边区政府写信，把我们三人作了介绍。当时，从西安到延安，有两种走法，一是乘坐西安办事处为延安运送日用品的商用汽车。这种汽车是西安办事处雇用的商车，司机也是属于商人的，并非八路军战士。这种汽车大概三四天一次，而每次车辆多少，是随货物多少而定的。汽车的行程，计为两天半。二是步行，需时十天上下。我们三人乘坐的是这种雇用汽车。因为候车，我们在西安停了三天。

在这三天里，我访问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江玲同志。丁玲原名蒋冰之，是湖南临澧县人。她的母亲姓余，是我的小同乡，常德人。丁玲是她的笔名。这时，她已是一位颇著声誉的革命作家了。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是从延安出发到西北战场上服务的。这时，丁玲率领的这个服务团已从前方返回了西安。团员二十余人，男女都有。团员在战地的工作，是协助各军队及学校进行政治宣传或指导他们演剧唱歌。这个服务团服务的对象是部队战士。我会在抗战爆发后，曾在湖南组织了农民抗战教育团，分赴湘中、湘南各县工作，我会服务的对象是农民。丁同志和我会都采用了文艺形式，却是相同的。我是第一次见到丁同志，我们谈得很融洽，但过去除了阅读她的作品外，还看过沈从文同志写的《记丁玲》那本书。所以在我们谈话中，我又提到了沈从文。这时，丁同志却表现不悦的神情，我便不再说了。多少

年后我才知道，丁同志和沈从文、胡也频当时在上海时是好朋友，而以后却分道扬镳了。我当时不明白这种内情，一时殊为尴尬。

当我们三人乘坐西安办事处的货车离开西安市区，行经陕北黄土高原时，一种奇异的现象就呈现于我们眼帘，而且这种现象愈来愈鲜明，以致心情激动起来。原来，在我们汽车行驶的道路两边，数以百计的青年，有男有女，三五个一组，或七八个一队，跟随汽车一道行进。他们走累了，就坐在路边，把随身携带的笛子或小提琴演奏起来，有时又引吭高歌，表现出豪迈的逸兴。据同车的人说，这些步行的青年都是从全国各地，甚至有从国外来的华侨子弟。这些青年赴延安的目的，就是进抗大或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他们意识到陕北公学等学校的学生生活比较艰苦，由西安步行去延安，就是艰苦生活的锻炼，也可以说是上革命学校的第一课吧。当时我想，这批步行去延安投奔革命的青年，简直具有朝拜圣地的虔诚。同时，我也想到自“九一八”事变起，中共号召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对于海内外的热血青年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是抗战必胜的可靠的保证啊！当时，我虽然坐在汽车上，但情感上与那些步行到延安去的青年是一致的。这些沿途步行去延安的千千万万青年，似乎也很了解我们这些坐在汽车上去延安的人们，有时大家挥手欢呼：“延安再见啦！”

我们乘坐的汽车，第一天宿于耀县，第二天宿于洛川县。我的《报告》对于这两个县的记叙是：“这两个县城都是在陕北黄土高原之上，而且很狭小，不过等于南方乡间的一个小镇。这些城内驻军很多，几乎满街都是兵了。街上秩序是零乱的，组织更谈不上。吸食鸦片的人，据说要占全县人口的一半。至于烟具，无论吸与不吸，每家都得准备着的，因为已成为必须的应酬了。还有十几岁仍在缠足的姑娘，她们成群结队地在田里工作，但走

起路来，一跳一跳的现出一种举步艰难的表情，这也是使我十分伤心的事。”

除了鸦片烟以外，还有娼妓。据我们的汽车司机告诉我：耀县和洛川都属蒋管区。他曾多次到延安住宿，延安却没有鸦片、娼妓和赌博。从抗战后方的社会情况看，这两县和南方各县相比，差的很远。

汽车从洛川走到富县，才算到达“陕甘宁边区”的区域。我那份《报告》上写道：

“到富县的茶房地方，我们受到第一次的检查，因为这里是‘边区’的边境，他们在这里设有第一检查站。检查的人对于被检查者相当客气，但检查时却异常的仔细，不但铺盖得完全打开，就是片纸只字也得毫无遗漏地看过，当然他们也看了林伯渠先生给我的介绍信。从此，我们就走进了陕甘宁边区的地域了。这里距延安城还有一百八十里。”

从茶房以后，我们又经过了两个检查站。这两个检查站比起茶房的检查站来，要松一些，只略问几句就放行了。

到达延安城的时间，正是五月二十二日的下午。因为我们在武汉和西安两处都作了停留，所以从长沙到延安的全过程走了两星期之久。

这延安城给我们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城墙上写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的标语。平常形容大字，称为“斗大”就了不起了，而延安城墙上的标语，就必需拿“丈”的长度来比拟了。如“团”字那一竖，至少有一丈长。城墙是灰色的，标语的字是白色的，异常显眼。至于八个字的含义，我当时还不甚清楚，是哲学意蕴吗？是政治态度吗？我不敢妄断。

且看我那“报告”怎样叙述延安城的形势吧。

“延安的城市，是建筑在山的环抱之中。它的西城就蜿蜒一座高山之上。此外，东门外为清凉山，南门外有宝塔山，一出北

门，也是两山夹峙的，所以就形势上说，延安城等于一个堡垒。环绕在南门和北门之外，还有一条像溪流似的延水。延水平时流经碎石岩壑之间，水色清澈，但到了大雨以后，便从上游夹泥沙而下，色浊而势猛，常常把桥梁都冲毁了。”

由于我从河北定县来到延安，走进延安城内时，自然和定县作了对比。定县城内的隙地很多，几乎是半城半乡的样子，而延安城内的隙地很少。延安城内的街道和定县一样，都只有一条大道，而且路面都是黄土铺的，可以容骡车经过。但定县城内有三层高楼的揽胜楼以及大片名为“考棚”的房舍，延安城内虽也有些公房，但比定县少得多。延安有窑洞，而定县却没有。这样的对比，都是半个世纪前的情况。现在从电视上看到的延安，与我去年所见到的定县，就城市建设来说，都跃上新的台阶。现在的延安和定县，虽然都享有国际声誉，但延安是革命圣地，那就不是定县所能相比的了！

二

我们到达延安那天，正值星期日，穿着灰布军服的青年男女，简直充满了整个城市。他们大半是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这类学院的学生，都要到星期天才能出外活动的。他们都很忙碌，但表情愉快，气象活跃。这种景象和我沿途所见相比，真是别有天地了！

我们首先和边区政府的交际科接洽，会见了交际科科长金城同志。金同志态度诚恳，便把我们安排到新开的西北旅舍，以便休息。孙氏兄弟便由金同志引导进行学习的事。四天以后，孙氏兄弟都进了陕北公学。我便与金同志商定了参观的程序。参观的程序很紧凑，除了党校和部队以外，都是我参观的对象。有时是金同志陪我，有时是交际科的其他同志陪我。共产党的严肃作风，我们在“茶房”检查站已经知道了一些，可一到延安城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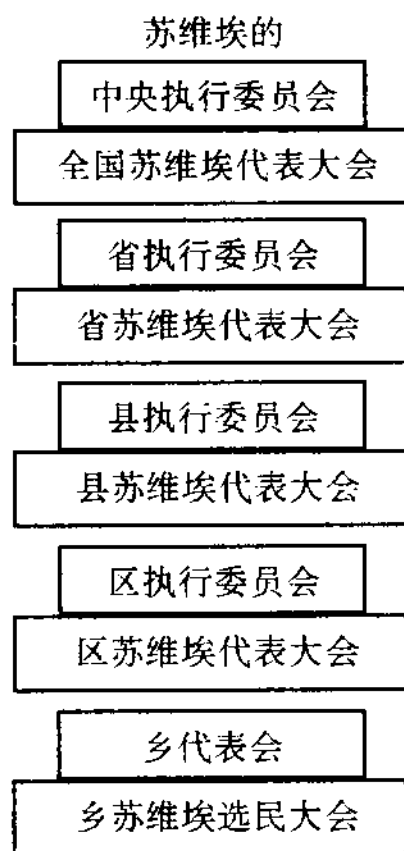
这种严肃作风一直是跟随我的。如西北旅舍设于城内，我在城内行动是自由的。如果要出城，便非有交际科的同志陪同不可。到某一单位参观，也必有交际科的同志相陪的。如想到乡村走走，也必有交际科同志相陪，否则，乡村的人就会向你要“路条”，即通行证。你拿不出“路条”，那在乡村间也是寸步难行的。这是我到乡间去拜访延安县长时所见到的。这种严密的组织生活，在我是生平第一次。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实际上在国民党军队包围之中，如共产党自己不能使组织严密起来，就有被分化瓦解的危险。

进入解放区后，政治气氛开始活跃起来。有一座桥起名为：“国共合作桥”，也看见“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标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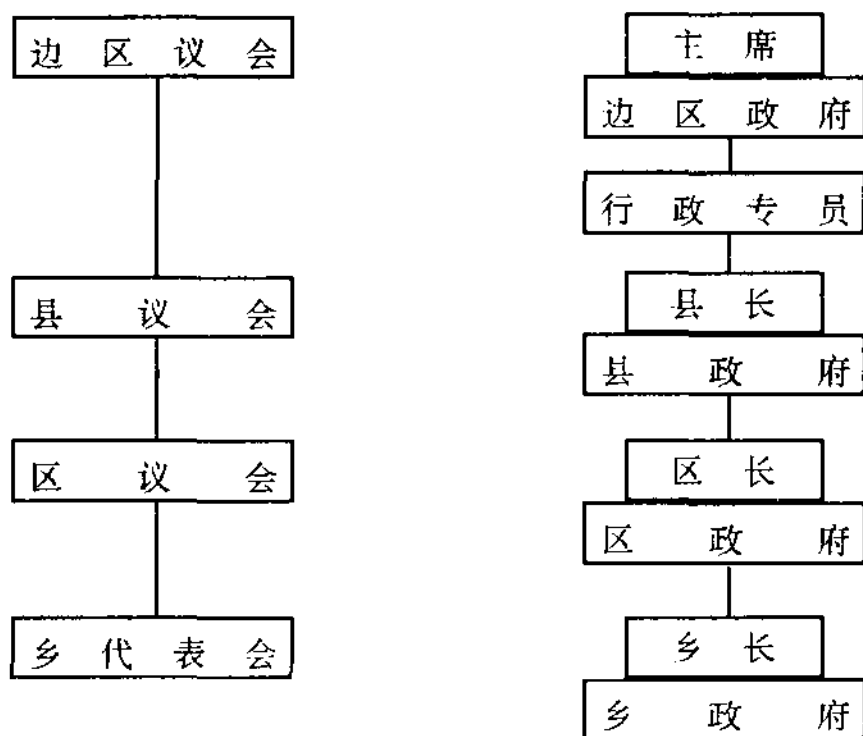
以下就叙述我在延安期内，参观访问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我那份《报告》的实录。

边区政府的行政概况。

陕甘宁边区政府，共辖二十一县、二市（另一市只等于一区），以延安市为政府所在地。大部分管辖区域都在陕西省的北部。这也就是西安事变以前的苏维埃区域。在苏维埃时代，他们的政治中心全在工农。所谓“工农民主”，就是说非工农不能有选举权，一切知识分子和地主等皆被排除于选举之外。现在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便改为“一般民主”，即为“资产阶级民主”。不管他甚么成份，也不管他做过什么事，只要他不是汉奸、卖国贼，不是有罪经法院剥夺公权的人，都可以参加选举。这叫做“普选”。而且废除了从前所行的宝塔式的选举，即由选民选出乡代表，乡代表选出区代表，一层一层地选去。现在是直接选举，乡代表、区议员、边区议员，均由选民直接选出，不转一点弯。因此，选民参加选举的次数比以前多了。现在把这两种选举的情形列表如下：



现在的边区政制图



边区政府的组织是和一个国民党统治区的省政府大致相同的，不同的地方，就是边区各级行政的负责者均由边区选民直接选出，非上级机关所任命。县组织系统列表如下：（见第 155 页）

说明：

（甲）各种议会的职权：

1. 选举行政长官；
2. 批准预算；
3. 创制或批准各项建设计划；
4. 决定缴收各项地方性的捐税及发行地方公债；
5. 议决边区内的单行法规；
6. 召回所选出之行政长官；
7. 下级议会议决案不得与上级议会议决案冲突。

（注：4、5 两项是专属于边区议会的。）

（乙）各项议会区域选举、被选举人与居民的比例：

1. 乡代表会，每居民 20 人得选举代表一人。
2. 区议会，每居民 50 人得选举代表一人。
3. 县议会，每居民 200 人得选举代表一人。
4. 边区议会，每居民 1500 人得选举代表一人。

（丙）各级议会长官的选举时期：

1. 乡代表会议及乡长，每六个月改选一次，乡代表会议每月召集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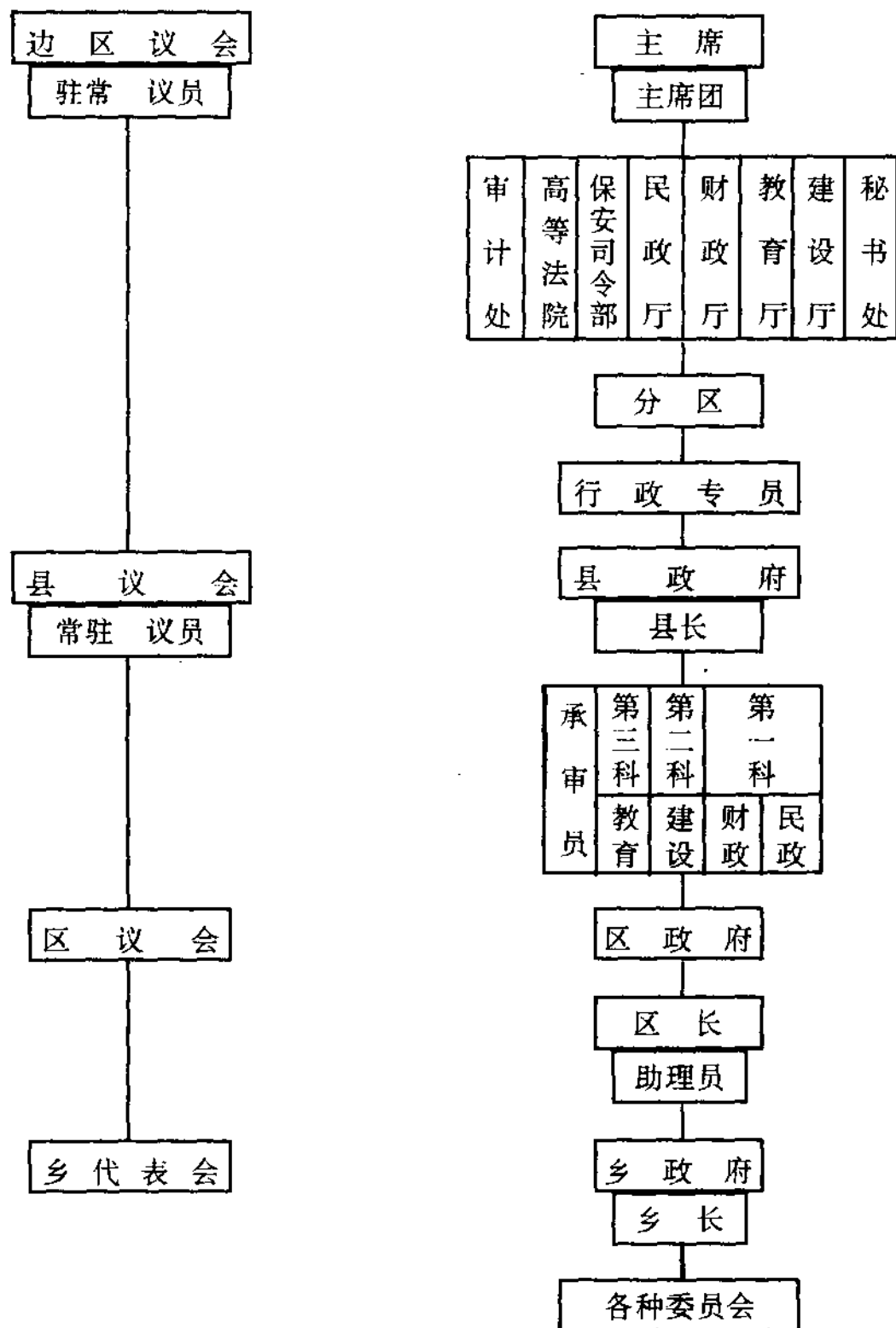
2. 区议会及区长，每九个月改选一次，区议会每两个月召集一次；

3. 县议会及县长，每年改选一次，县议会每六个月召集一次；

4. 边区议会长官、法院院长，每两年改选一次，边区议会每年召集一次。

（丁）议会闭会，特设常驻议员代行职权。县常驻议员五人

陕 甘 宁 边 区 政 制 图



至九人，边区常驻议员十一人至十五人。

(戊) 边区政府的直属县市为：延安市，延安、神府、富县、甘泉、安塞（附安塞市）、安定、志丹、延长、延川、古林各县。

(己) 边区政府所属的行政专员区有三，为：

1. 关中分区辖宁县、新正、赤水、耀淳各县；
2. 三边分区辖盐池、定边、靖边各县；
3. 庆环分区辖固北、华池、环县、曲子各县。

(庚) 边区法院，审判独立，但仍隶属于主席团之下。

关于县政府组织，除县组织系统表内各项以外，另有“保安大队部”和“秘书”两项。在“乡政府”之下设立：

1. 卫生委员会
2. 优待抗属委员会
3. 春耕委员会
4. 救济委员会
5. 除奸委员会

为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边区的政治设施，现在就边区的民政、财政、教育以及群众运动各项，特别在参观访问中所亲见亲闻者，分叙于下：

1. 边区的民政 重要的有下列三项：

甲、土地革命的进行，本在苏维埃时代，国共合作以后业已停止，一切维持现状，即土地未分者不再分，已分者亦不还原。其分配土地亩数，大概每人——无论男女老少——平均分地四垧，即十亩。除每人应得的土地外，尚有公田的分配。如一乡有人口二千，共分地为二万亩，则所配的公田约二百亩。公田之收入，纯为救济抚恤之用。为保证土地所有权，政府特发给土地所有证，故不能因为人的死亡或出生立即变更其所分得之土地。至于变更分配事宜，则由乡政府所常设的土地委员会负责，在一定时期内，进行查田的工作。查田完毕，然后实行死者收田归公，生者重新分配。土地的买卖，在法令上是许可的，但实际上并未

发生。依地质的好坏，使田地亦分成上下等级。但抗日军人一定分得上等田地。子女所得的田地，并不因结婚而变更其所有权。

土地革命的实施，造成了边区政府的最坚实的基础。据延安县的统计，在未实行土地革命以前，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皆没有土地，但当时地主一人之所有竟有多达至数千垧的。现在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现因这种政府的出现而有其够生活之田地，那么，他们对于现政府的真诚拥护，还用说吗？可见边区政府的基础，实树立于此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之上了。

乙、婚姻改革。关于婚姻问题，边区政府确定了两种主张，即：A 保障婚姻的自由；B 提高女权。一般男女居民结婚时，在乡政府登记，即可同居。又凡同居一月以上，即不登记，亦被认为正式夫妇。离婚时，如由女方提出，可向男子索取赡养费；如由男方提出，则男子得给女子以赡养费。子女在五岁以下，归母亲抚养，但男子须负担费用；五岁以上的子女，由子女自决。结婚年龄，女子十八，男子二十。童养媳及童婚，一律禁止。政府工作人员，则在其所在工作之政府机关中举行登记。婚姻登记证，均由民政厅发给，不收登记费用。边区政府现有《婚姻法》颁布。

结婚证的形式如图所示（见下页）。

据说，这种婚姻法颁布的时候，请求离婚的人非常的多，现在却不常见了。又，一个乡间姑娘要她自动地偕着她的未婚夫到乡政府去登记，当初也因为风气不开通而很不容易办到，后来，渐渐由于她所属的团体，如妇女联合会等方面施以教育，便近于自然了。结婚的仪式，并没有规定，聘金当然在禁止之列，但私相接受的，事实上恐难完全避免。

婚姻的自由与平等，是与经济的独立性有密切关系的。现在边区的女子，既取得与男子平等的独立的经济权，她们便可以摆脱一切旧式家庭如丈夫、婆婆及父母的压迫了，所以她们的婚姻

关系，一定可望走到自由平等的道路上去了。

丙、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边区政府在切实地执行。抗属的田地则由其邻居组织义务代耕队，给他耕耘，如代耕队员不够用，则规定以钱代工。

结婚证明的形式如下：

陕甘宁特区 民政厅 结婚证					
中 华 民 国 年 月 日	介 绍 人 婚 姻 登 记 员	结 婚 人		同 志 与 同 志 经 双 方 同 意 ， 遵 照 陕 甘 宁 特 区 婚 姻 法 结 为 夫 妇 ， 于 民 国 年 月 日 向 本 厅 登 记 ， 各 给 此 证 为 凭。	
			性 别		
			姓 名		
			年 龄		
			籍 贯		

关于拾柴、拾粪等事，则发动邻居的儿童去做，所以又有儿童拾粪队等组织。

对于残废军人，一律发给残废证。此证共分四种。第一种每年可向政府领得三十元，一年分两季领取。如断腿者，即可受第一等残废证的优待。残废军人如能工作的，亦可参加工作，或进

学校从事技能的学习。总之，他们的目的，要使一个抗日军人毫无后顾之忧。因此，边区的壮丁，现在不但踊跃从军，而且在前线上亦确能英勇战斗、不畏牺牲了。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优待抗属工作是远不及边区的。我在离开延安前天，肖劲光同志代表边区政府为我和另外几位来延安参观的客人举行饯别宴会上说，他自己家属在国民党区域，照理应该受到抗属的优待，但却没有受到优待。肖同志那愤慨的感情，我是深为同情的！

2. 边区的财政

在江西苏维埃时代，曾收过土地税，到陕北后，除于定边征收盐税以外，未向人民收任何捐税。现在盐税所得，每月约七八千元。这就是边区政府唯一的收入。抗战以来，始有救国公粮之征集。其征集之法，即每人收入三百斤以下者不收，因为三百斤是每人每年必须的食粮。三百斤至四百五十斤者收百分之一，四百五十斤至七百五十斤者收百分之二，一千五百斤者收百分之五。佃农减半；为地主者加倍征收。征收公粮时，先由政府派员指导宣传，并利用民众团体的活动，为时几至一月，而实际征收的时间不过数日。这就是利用民众自动之效果。结果收入三百斤以下的民众，亦多自愿送交，故超过预定额颇多。救国公粮征集之后，边区公务人员的生活问题可算解决了一半。因为政府对每个公务人员平均负担共为七元，其中米粮即占去了四元的原故。

整个一县的开支，每月不过二百余元，即民众团体之经费，亦包括在内。至于县政府之办公费，仅仅二十元，其中尚包括马之费用七元五角。

定边盐税的征收，比过去减少七分之六，每担只收一元，同时，还注意盐民生活的改善。

财政的收入，为绝对的统一，即每一文的收入与支出，均须经过财政厅的。

政费的开支，以人数为标准，故地方武装占第一位，教育占第二位，行政费在三四位之间。

边区通用的是法币及陕西省银行的纸币。

边区银行，归财政厅管理，现未发行纸币。在苏维埃时代，曾有纸币发行，现已全数收回了。

边区的财政收入虽然简单，也无苛捐杂税，但因为他们完全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故现在所行的办法是不能普遍推行的。

当时，边区的银行设在延安城内，我曾去参观过。上述的材料大部分是银行同志提供的。

3. 边区的教育

边区的教育，可分为两个方面来说：一为普通教育；二为干部教育。先说普通教育。

边区一般的文化程度非常落后，乡村中不识字的民众仍占百分之八十。故除文盲工作现在努力推行，对于小学教育亦正努力发展。

边区现有小学校约七百所，学生占学龄儿童百分之四十，但完全小学却在少数。

延安城内设有鲁迅小学一所，学生约五百人，附有幼稚班。鲁迅师范设于保安(?)，学生约二百人，毕业期限为六月至一年。

除文盲工作，则一方面仿照“小先生制”，让在校学生在学校附近成立识字组；一面成立半日学校、夜校或读报组等。在延安城内的识字小组共六百余组，学生约有千人，占全城总人口五分之一。我曾参观过几个识字小组，其办法不如本会传习导生之完善。在延安城内的妇女平民学校，据云，女生对学习功课非常热心，常常自动早来晚退。

每年九至十二月的农闲时期，都有冬学之举办。去年教育厅利用此种办法，曾为大规模之推进，结果入冬学者约达万人。

小学所用课本，归教育厅编印发行，不另收费，亦不收学费。课本共四册，课文偏重政治，即抗日思想之灌输，多用简笔字，且有许多是他们所造的，如卫字即是。另有识字课本二册，这是专为识字小组用的。

当时任边区教育厅长的是周扬同志，我曾访问了他。周同志住在城外的山上窑洞之内。周同志在上海时专搞文艺理论工作。他在延安那窑洞住宅内放着一部鲁迅编印的《海上述林》。我去延安访问时，箱子里也装着《海上述林》一部，其余则任何书都没有带。所以，看了周同志窑洞中的那本书，不禁油然而生出同感。

再谈干部教育。

甲、抗日军政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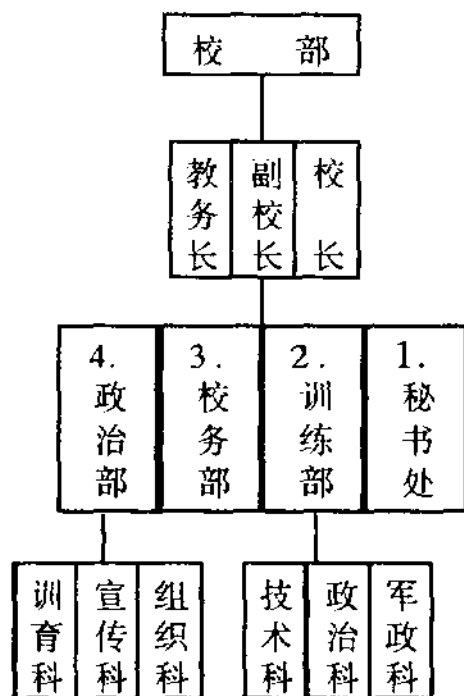
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抗大为八路军所办。抗大于一九三六年创立于陕北保安，第一期学员即在保安毕业。第一期毕业后，始迁于延安，以迄于今。抗大设立的目的，原为训练八路军干部，所以第一、二期学生大部为八路军原有的干部人才。自“西安事变”以后，外地青年来此学习者，日渐增多，便形成了现在的形式。现在学校里约四千人，已毕业者约二千人。修学期原是六个月，现改为三个月。

抗大校部行政组织列表如下（见第162页）。

学生组织以大队为单位，现全校有五个大队。大队以下之组织如下：

大队长——队长——区队长——组长
└——政治协理员

抗大虽为军事学校，但仍设有政治队。在课程方面，军事的是战争、战术、八路军战术、野外演习等；政治队的是中国革命问题（包括三民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工作、社会科学、唯物论、辩证法等。



关于教学方式：

(1) 少而精。

(2) 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使具体问题联系到最高原则，同时，也使具体问题与最高原则切合）。

(3) 注重启发（在总的原则下，提出许多具体问题，以增加学生的思考力）。

(4) 注重一般水准的提高。

关于学习方法是：

(1) 集体的学习 小组讨论，隔天一次。

(2) 自动的学习 竞赛等。

(3) 互助的学习 因为学生入学程度很不一致，有的是中学生，有的甚至是大学教授，故有鼓励互助学习之必要。第一大队毕业时，每人相差的分数不过十分，即利用此种方法的结果。

我到抗大参观那天，正是学员们分组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学员们个个精神饱满，发言极为热烈，而且时有争执，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每个学员手中均有讨论提纲。学员们那种

认真的态度，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那种深刻印象尚未丝毫减退！

延安地处西北边疆，文化程度素称低落。抗大忽然增加了几千学生，所以教员便成了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其办法是：

- (1) 请校外人士（如边区政府方面的负责人兼课）。
- (2) 本校职员兼课。
- (3) 请名人讲演。
- (4) 合班上课。
- (5) 开办教员训练班。
- (6) 采用助教制。

乙、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简称“陕公”。现有学生约二千人。最近有分校设于关中三水。学生课程与抗大的政治队相仿，因为抗大偏重于军事，而陕公是偏重于政治的缘故。学生编队情形与抗大相似，只是学生生活不如抗大的严格军事管理。抗大学生全着军服，陕公学生衣服随便。陕公毕业学生一千余人。

对于学生思想行动的考察，校方颇为注意。其考察方法大致是：

- (1) 主观方面，举行个别说话。
- (2) 客观方面，搜集多数同学对某一学生的批评。

学生毕业后的工作问题，校方完全负责。如学生自己有社会关系，可以回到原来地方工作，校方可以发给路费，如到湖南去，可领三十元，到广东去可领六十元。校方分配的工作，大概是山西前方、新四军或边区政府之内。伴同我去延安的孙氏兄弟到延安后都进了陕公。孙惠畴同志毕业后，便由校方分配到陇东工作。我和孙氏兄弟在延安分别后，便未曾再见，但我最近与孙惠畴取得了联系。惠畴同志现以军级干部离休了，现在居住广州

干休所，他正在撰述工作回忆录，有的已在报纸上发表了。他写的《陇东情思》的回忆录，已经陆续寄来了几篇。惠迪同志亦早已离休，现在大连。孙氏兄弟对革命的贡献，都是陕公打下的基础，而且贡献卓越。

我奉派到延安参观之前，已知有一位在定县实验区工作的白志耕同志已去抗大学习了。因此，我到延安后便约白志耕同志在延安旅舍见了面。白同志身着抗大军服，与定县时的风貌大不相同。因为白同志在定县时是一位女教师，以温雅著称的，而在延安相见，则英姿飒爽的了。白同志首先称赞了平教會的领导人晏先生派我去延安考察，是非常及时的，是政治上的卓见。解放初期白志耕同志已改名白云，曾奉派出席国际民主妇联，孙伏园先生曾在北京与白同志多次见面。我去年到石家庄出席晏阳初先生思想国际讨论会时，曾请定州市政协主席李济东同志约白同志相见，惜因时间仓促，未能一见，但知白同志已从定州市或河北省政协退休了。以上我所知道的孙氏兄弟及白同志三位抗大、陕公的老学员，便可充分证明了抗大、陕公这两所革命学校在训练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了。

现在再谈谈我当时所见到的这两所学校的学习情况吧。

这两校的学习生活，都是紧张、刻苦，而且活泼的。如当时抗大校址，放在延安城内的一个古庙之内，学生可以坐在室内讨论、上课。但陕公的校本部则设在城外，学校的办公室只有几间平房，而教室则太少。我去参观那一次，幸好天晴，学生们都在平地或树荫下席地而坐，每人一块木板，放在膝头上，边听边写。教学黑板就挂在树干上面。设备虽然简陋，但学生的注意力却很集中。这两校学生，除分组讨论外，还自动组织救亡室、出壁报等等。所以学习情绪仍然紧张、热烈。他们日常食品，是小米干饭，外加黄豆芽之类的蔬菜。大米和猪肉，一星期内不过一二次。由于学生都是抱着参加革命的崇高目的而来，所以生活虽

然清苦，并不在意。加以文娱活动非常活跃，演剧、歌咏队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盛。因此，和内地学校的学生生活相比，真有天渊之别了。特别是边区工作人员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和革命领袖，如毛泽东、朱德等等带有传奇性的风貌，更使这批不远万里奔赴延安的青年们受到了鼓舞，也是其他内地所不可能看到的。因此，这两个学校的创立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真是无与伦比！

丙、鲁迅艺术学院

这个学院，是培养艺术人才的，学生百余人，内分绘画、戏剧、音乐三系。校址在城内。从设备上说，是不能和大后方的艺术学院相比的，但这个学院产生了许多多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如《游击队歌》、《白毛女》、《赤叶河》、《兄妹开荒》等革命歌曲和戏曲，这是不可忽视的。平教会在长沙办事处曾经一度进行过抗战剧的演出，如杨村彬先生的《战歌》、熊佛西先生的《后防》，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效果。有一位参加平教会长沙演剧活动的女演员，名叫欧阳红缨，和我差不多同时也到了延安，参加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我在延安见到了这位欧阳女士，并且讨论了关于抗战戏剧问题。

4. 边区的司法

边区的司法制度，其特点是：

- (1) 无期徒刑的废止。
- (2) 有期徒刑最高五年。
- (3) 废止刑讯。
- (4) 废止律师制度，由当事人所属团体担任辩护。
- (5) 诉讼不采用形式主义，亦不收手续费，如当事人为文盲，可以向法院作口头陈述，就是知识分子也不必写状纸。
- (6) 有些重要案件，如汉奸案，则举行公审，其目的在教育群众。

(7) 对于判决的犯人施以教育，以转变其思想。监狱好像是感化院。

边区现有高等法院一所，各县地方法院均未设立，只有承审员审判的等级，名义上是以中央最高法院为终审，但我看到的枪决犯人的布告上都用高等法院的名义发布的。犯人住窑洞，约六十余。

我在延安时曾参观过那种以窑洞为监房的监狱。这个监狱的光线是充足的，也相当干净。犯人中有上镣铐的。我曾参观过湖南衡山实验县的监狱。衡山县的监狱是砖瓦房，虽也干净，但光线没有延安的监狱充足。我还参加一次枪决犯人的判决与执行，那不在法院内，而是在法院外面进行的。据说这被枪决的犯人是贩卖鸦片的。判决后，罪犯没有插标，就由两个执行枪决的法警押走，犯人步行，法警在两旁监押而去刑场。当时高等法院院长是雷经天同志，我和雷同志作过谈话。

5. 边区的建设

由于边区一直处在战争环境之中，所以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事业无从进行。当时，最主要的建设是农业建设。因为气候、地质以及劳动力的缺乏，所以，边区农业并不十分发达。但因地广人稀，反较南方的农民易于谋生。根据去年的统计，每人一年的收入平均为一百元（指银元）。但边区政府的农业政策仍以增加农业生产为主要。其办法是：

(1) 垦荒。陕北农田分山地与川地。山地待开发者甚多。去年开垦成功的农田，计二十四万亩。今年预计增加三分之一。

(2) 畜牧。陕北牛羊很多，原有羊二万余头。山羊每年生产两次，绵羊每年生产一次。靖边和定边的羊毛质量很好。

(3) 动员妇女参加劳动。陕北妇女平常很少参加耕耘，现在因为要壮年男子上前线，所以不能不动员妇女参加耕耘工作。妇女生产组，即是应这种要求而设立的。

在计划中还有：

(1) 开辟华池县为垦殖区。这是陕北的森林地带。

(2) 以富县、甘泉为农业改进区。

(3) 以延长为农业工业区。这里出产棉花和麻。

关于矿业方面现有：

(1) 兴华煤矿，这是新设立的煤矿，估计每日可出煤两万四千斤以上。

(2) 延安东二十里有一煤矿，每天可出煤一万斤。

(3) 白家巷煤矿，每天可出煤一万余斤。

(4) 延长石油矿，新井可出油六千斤，旧井可出油五百斤。本质甚佳，不过提炼方法尚待改进。

(5) 瓦窑堡发现铁矿，有三尺厚，正计划开采。

关于工业方面现有：

(1) 印刷厂一家，承印《解放周刊》、《新中华五日刊》及《列宁选集》等书报。

我曾在宝塔山一个庙宇内看到边区所贮存的白报纸，极为丰富。如每堆白报纸以一人高以准，应以百数计算。可见边区政府对文化出版事业的重视了。《新中华报》、《列宁选集》等书，我到延安城内的新华书店也都看见过。

(2) 造纸厂一家，每日可出纸四五千张。

关于合作社方面：

现有合作社一百五十余所，社金每人五角，社员共七万余人。延安设有边区合作社联合办事处。

关于交通方面：

在兴筑中的有延榆公路一条。

关于造林：

规定每人每年应植树一株，现有四万余株。陕北大部分都是童山，所以植树是必要的。

此外，还有修筑堤坝等工程。

边区政府在这种艰苦环境中，能够注意建设事业，这一点是很能使人敬佩的。当时，和我来延安参观的人士中就有工业方面的专家。在肖劲光同志为我举行的饯别宴会上就有一位水利专家，这是肖同志向我介绍的，但现在已记不起这位专家的姓名了。

6. 边区工作人员生活

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及八路军官兵，都没有正式薪金，只有一元至五元的津贴费。他们收入虽然这样少，但事实上是够用的。因为他们的医药、住房及衣、食都由公家负责。结婚的人，配偶可以参加工作，如果配偶的工作能力不够，可以入学学习，学习的费用也由公家负担。生了孩子，母亲可以有相当时间的休息，津贴仍可照常领取。并且六个月以内，小孩又可以向公家领取三元的津贴。政府又设有托儿所，学龄以下的儿童都可以免费入托。达到学龄的儿童，便归公家抚养了。家庭的组织与形式，在这里是不存在的。但在星期六，夫妇可以过同居生活。“过礼拜六”，在延安算是一句挺有风趣的流行话了。我所住的西北旅舍，就有不少来“过礼拜六”的夫妇同志。这类的办法，不但解决了衣食的需要，而且免去了家庭的麻烦，每一个人都可尽量拿出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来努力于他们所负担的工作。象这种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方式，我叫它“大家庭化”的生活。边区管理财政的人，好象是大家庭的家长，其余的人，等于家庭的子弟。这种“大家庭化”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是再新鲜不过了！

此外，对于精神生活方面，也是很有帮助的，就是自我批评的实行。在一个机关的行政系统上，科员服从科长，勤务听令于上级，这和普通机关没有两样。但是下班以后，大家在俱乐部开会的时候，站在同志的立场，都可以畅所欲言。如果当科长的犯了错误，勤务便能当面直说。因为这种风气已经养成，所以这时

候的科长除了据理答辩外，不能造出任何理由来指斥勤务批评的不当。因此，同事间一发生不同意的事，都尽可宣泄，无须背后说长道短，造成隔膜。这不但在消极方面可以减少人事上的摩擦，而且积极方面促进成自我向上。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革命精神的贯注。我们平常如果遇到一个不常见面的朋友，问问他的生活，所得的答案，总不例外“马马虎虎为衣食而生活”，或者发泄一通生活上的牢骚罢了，真正以事业为怀抱作有计划、有目的的生活，恐怕是凤毛麟角了。但是，边区工作人员的生活态度，却至少十分之九是以革命为前提的，就是勤务，也很少例外，他们都自觉在为革命而工作，自信革命必能成功，所以，目前生活虽然艰苦，将来希望倒是无穷。据说在红军长征途中，那些十几岁的“红小鬼”，当吃草根树皮的时候，不禁叹息道：“等到革命成功，把社会主义的国家建立起来，我们的胡子都怕早已雪白了。到那时候，如果对我们的儿孙说长征时怎样吃草的故事，他们谁肯相信呢？”

爬雪山过草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是多么艰苦的事情，但是他们居然克服它，要是没有那种坚定的革命精神，如何做得到？现在他们所处的环境，虽然比长征时期安定了些，但陕北物质方面的设备，实在比南方任何城镇都差的远。所以革命精神的保持和发展，就可以说是造成他们生活的积极性的唯一动力了。

在生活的调剂上，他们是很注意的。每个机关都有俱乐部的组织。在俱乐部内，一方面可以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一方面也可以进行各种游艺的表演。至于歌咏，更是普遍的流行着，几乎没有一个不会唱一两首救亡歌曲的。当时有一种流行的歌曲本子，叫做《大家唱》，在长沙等大都市也很流行，但是歌唱的只限于学生和青年，而在延安已是家喻户晓了。我当时想到象平教会这种具有相对独立性质的学术团体，又是以同志为结合契机的，经费既有来源而又独立于当时政府之外，事业庞大，目标明

确，无论在中国或世界的教育史上，甚至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都是有伟大革命意义的。如果我们用延安的生活方式，贯注平教的精神，当能在前途放出更加光辉的异彩吧！

（一）边区的民众运动

民众运动的蓬勃发展，这是边区政治上的最大特色。

为什么边区能这样开放民众运动呢？因为：

（1）边区政府的基础是建筑在最大多数民众之上。政府的意志与民众的要求简直是一个东西，所以民众运动的开展，只有帮助政府，绝不会妨碍政府的行动。可见政府开放民众运动得利者还在政府。那么，政府又何乐而不为？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政府的基础只是建筑在少数人利益之上，也来放任广大的民众运动的发展，无疑地广大群众就会联合起来为了自身的利益来和政府作斗争了。那么，政府的开放民众运动岂不是自讨麻烦吗？所以难怪这样的政府必然要用高压手段来镇压群众运动了。

（2）如果政府从积极方面对群众运动加以领导，民众的力量是非常伟大了。政治上得着民众的帮助，则政令容易推行；军事上得着民众的帮助，则作战往往得胜。过去红军在江西苏区，受着精锐中央军一百万大军的包围，仍能不致溃败的原因，就是政府发动了群众并得到民众的助力的效果。这理由很简单，就是由于多数人的结合的原故。所以，一个能积极发动民众，而且取得民众助力的政府，必可立于不败之地。

（3）边区民众团体的经费，由边区政府负担，民众团体的领袖往往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政府的意志和民众的利益，平时既无冲突矛盾现象，可见群众运动的积极分子的思想行动，也就相当代表了政治上的主要动向。因此，可以说政府与群众团体是二而合一的了。

现在民众团体的总称为抗敌后援会。因为要配合行政的机构，故这个会有边区、县、乡区的各级组织。各级抗敌后援会的

中心工作为：A. 武装动员；B. 政治文化水准的提高；C. 建设事业的推进。各个民众都在各自的组织之内，如青年救国会、妇女联合会、少年先锋队、儿童团、工会、商会、农民会、文化界救亡协会等。现时工会会员约四万，占全数百分之九十。妇女联合会会员为十七万三千，少先队队员为二万三千余，青年救国会为十六万。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一个中心工作，就是利用民间流行文学形式，注入抗敌救亡的新内容。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使民众接受宣传的捷径。

我曾以极大的热忱，遍访上述那些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他或她们年纪都很轻，态度也极为开朗平易，毫无浮躁轻率之气。因为当时的定县也有类似的民众组织，所以说的很投机。主持文化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为诗人柯仲平同志，身躯魁梧而态度谦和，又充满乐观的精神，我曾多次拜访他，作了长谈。即以当时定县的高头村为例。平教会在该村组织了家庭会，把全村一百多户而分别组成家主会、主妇会、少年会、闺女会、儿童会等等，对他们进行社会教育或生产技术的教育，虽时间只有一年，效果并未十分显著，但把原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农民组织起来，就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创举了。这是一九三一年的事。到了一九三四年，定县组织了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一九三五年，又组织了青年服务团，特别注意了发动青年自卫组织，增强了青年们共赴国难的积极性。在抗战爆发之后，八路军的陈波儿同志曾跟随抗敌游击队到过沦陷后的定县。这些原来受过平教会训练的定县青年遇见了陈同志，他们知道陈同志将要返回大后方，便纷纷拜托陈同志代他们向晏阳初先生致以问候。一九三九年，陈同志果然从八路军前线回到了重庆。平教会的孙伏园先生曾邀请陈同志来到平教会驻重庆办事处，说到了这种情况，大家都受到极大鼓舞！

由于共产党真正地发动了群众，首先使外地来到延安的青年

们经受一番生活的“洗礼”。他们在这个“新天地”里面，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态度。举一个例吧。原来流经延安城外的延水，水流正常时，在乱石嵯峨之间便形成了天然的浴池，即使在星期天的白天，男同志也有这里洗澡的。因为乱石的掩没，走过延水石板桥的行人，是看不见男同志入浴时的全身。但最初有些女同志过石桥时，看见入浴的男同志，便不走这石桥了，渐渐地她们也敢若无其事地坦然过桥了。有一个星期天，我在延水的支流上走过时，看见一群女同志在水边洗衣服，浅水之上，有若干石头礅子，我穿着布鞋，便以蜻蜓点水方式，从洗衣服的女同志身边踏石而过，可脚未站稳，几乎落水了。那位洗衣服的女同志一见我当时那个尴尬样子，便抬头对我说：“怎不扶着我的背呢？”我听了女同志的话倒显得更不好意思了。其实，扶着这位女同志的背稳稳地踏石而过，有什么不可呢？

群众运动对于本地人民，特别是对于妇女群众的启发教育，更是开天荒的事。原来边区自卫军的训练，男自卫军为十七万，女自卫军有四万。有一次自卫军检阅正遇下雨，只到女自卫军七八十人。这是五月卅日的事。这七、八十位女自卫军都是各自背着长矛，一天翻山越岭地走了一百里泥路赶来延安赶会的。其中，还有不少缠足的中年妇女。那天夜里，她们就住在陕北公学。陕公的学生特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并为她们演出了一场话剧。在欢迎会上，她们都能很大方地出席演说，而演说的内容，以抗敌救亡为主调。她们的政治认识的深刻，给人们留下永远不忘的印象！

有了这样的民众团结在共产党政府的周围，才真正是铜墙铁壁啊！

三

《报告》上说：毛泽东先生在延安可说是一个中心人物，因

为他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是中国共产方面军事上的最高领袖。共产党有军事委员会的组织，毛先生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所以陕北人民都称他毛主席。

在六月十三日，毛先生应了我的请求，接见了我。接见时，我代表本会和毛先生有一次很恳切的谈话。

月夜的延安城，是美的，可爱的，尤其在十点钟以后，紧张地工作了一天的人们都在享受各自应得的休息。它好象一个健康的婴儿，静静地躺在慈母的怀中，那街道两旁忽隐忽现的灯光，仿佛也在舒适的微笑。因为包围在四面山岗里的这座古城，现在正以新生的活跃的姿态献身于抗战的祖国，在月光照临下，它不仅表示了一种肃穆温柔的境界，同时，也象征着它的无限的伟大的前途。

在这样美的可爱的延安月夜里，我会见了毛泽东先生。

毛先生的住宅，是一所普通的民房。我们会谈的那间房子里面，除了一张寻常的单人用铁床和几把木椅以外，还有一张桌面不平的长方桌子。桌面的当中，并放着两盏洋烛灯，书籍和文稿都不整齐的堆在洋烛灯的两旁。我和他的秘书周小舟先生走进这房内时，他是坐在桌子的近旁，烛光很清楚地照着在照像和木刻中早被我熟习了他那温雅的面容。

当时，毛先生站起来和我握手，并请我坐在他的对面。

室内没有旁人，四周十分安静。

“你觉得我们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呢？”寒暄几句之后，毛先生即很谦虚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我便把关于民众文化程度、公共卫生的意见坦率地告诉了他。

他认为这是确实的情形，并且说：“这里的缺点，还不只这些哩。”

接着我们便谈到了平民教育运动。

这天上午我和周秘书有过一次谈话，顺便介绍了本会的工作，大概毛先生从周秘书处已得了相当的了解。于是他直接以平教运动的前途来问我。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略述了本会实验工作的性质和私人学术团体的立场与政治社会环境的困难，并说明平教运动的发展，不但系于本身工作的努力，而且希望某种力量的推进。

在政治斗争上积有艰苦的丰富经验的毛先生，立刻同情而且坚决地说道：“政治是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平教工作的大规模发展，必须有为平民的政治，一切推行方法尚在其次。梁漱溟先生是个很认真的人，他到这里来过，自认他的工作失败了。我看他失败的原因，就是站在政府与人民之间而希望得到一点政府力量，去为人民做事。”

谈到这里，毛先生的兴致陡然增高，好象发现了一件可爱的东西，继续滔滔不绝地发表他对于政治问题的卓见。

“政治的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要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随你要他们的钱，要他们的命，都可以办得到。这是有事实做证明的。从前我们在江西兴国一带，那里不过200万人口，可是我们的军队多到16万，我们平常都吃他们的，穿他们的，他们毫无怨言。那时候还在打仗，兵员补充自然也是靠着他们。后来壮丁都打仗去了，老弱便出来代替耕种。妇女是不会耕种的，她们都自动的学习，结果田地都没有荒废。南方的军队，照常穿着草鞋，于是发动他们去打草鞋，家家都给我们来打草鞋了。同时，我们又发起竞赛的办法，谁打得好的，就给谁奖品。你看，我们何必拿钱去买呢？要不然，就是亲生的儿女，如果不亲近他，他也不同你说话的。”

毛先生天真地笑了，随手取出一根火柴在洋烛上点燃，就放在他不常离口的烟斗中，吸了几口烟。接着说到农民：

“农民的性格，有两方面，一面是黑暗的，如自私自利，愚蠢守旧等。鲁迅的《阿 Q 正传》就是专写黑暗面的作品。一是光明的，如急公好义、勇敢牺牲等。他们见了病倒的行路人，便设法医治；见到邻居失火，一定拼命抢救，那都是光明的表现。他们一身就具有了这两种矛盾的性格。政治的作用，便在发动他们这光明面的积极性，逐渐克服他们的黑暗面，实现民主的政治。现在边区所行的，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这种民主政治。在抗战期间我们发展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钱去抗战！”

于是，毛先生以非常生动的语句，详述过去兴国的农民怎样在他们的政治影响下，象疯狂一般在参加教育上、军事上动员工作的情形。

“事实上农民的愚蠢是有限度的。”毛先生开始运用他的幽默语调：“我看他们比袁世凯还聪明哩。在耕田方面，一个识字的兵也比秀才高明的多，因为秀才翰林光会识字，士兵又能打仗啊。我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虽然耕过两年田，但不如老农的熟练，而且我又不会缝衣，真是缺点多的很。许多人只看到农民的黑暗面，便说他们什么事都不成。这是错误的。”

停一停，他又说：“农民的语言，也是丰富的。我觉得天下顶难听的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因为太简单，又都从书本上来，同实际生活隔绝着。”

“因为他们讲究的要出口成章呀！”

这句话引得他和周秘书都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对于边区工作的优点，我特别指出了民众组织的健全、司法制度和工作人员生活的合理化等。他立刻称许这种观察的正确，认为这些办法都值得普遍推行，并且微笑着说道：

“最高的薪水，我拿过 150 块钱的，那是在汉口的时候，但那时，我总是欠账。现在 5 元一月，都不再向人借钱了。不过 1

元到5元的津贴，还赚少了些，可是也不要太多，如果180元，就会引起争夺饭碗的事来。”

大概因为坐的太久了，毛先生站了起来，在桌子旁边走了几步，然后坐下从容吸烟。这时，他手边的火柴头已积满了一个纸烟听子的盖。

在毛先生休息的时候，我便提到我们定县县政机构中的村建设委员会与青年服务团的实验。他认为这办法很好。他对于我们的组织教育和传习教育的办法，也很感兴趣，因为边区现在实行的识字小组的办法，大体与我们相同。他并且介绍了一些他们曾经实行的识字方法。其中最有趣味的，就是军队在行军时把生字贴在前一个人的背上，去让后面的人一面走路一面读书。有一次举行士兵识字测验，周秘书的一个勤务便能在一个钟头内默写了70多个生字，而且得了奖。

毛先生对抗战军事问题表示了乐观的意见。他认为敌人愈深入愈困难，将来敌人所能占领的，只有几个大城市和大路，所以与其说亡国，不如说是“亡路”。我们要发展各地的游击战，把敌人驱到大城市附近，困死他们，因为他们国小兵少没有法子来应付的。等到国际变化一来，我们再来大举反攻。至于东北的义勇军，当时因为缺乏领导，共产党也无力帮助他们，所以没有很大成功。现在不同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做这种工作。这与“九一八”以后的东北情形完全两样的。

因为他知道我们在衡山方面有县政实验的工作，而这个地方也许有变成战区的可能，所以很郑重地对我说：“平教工作也要注意游击战争哩。”

在争取抗战的胜利，我们和毛先生及他的同志们都一样抱着坚强的信念。我便把本会晏干事长发动农民的主张及农民抗战教育团的工作概况简要地说了一遍。他注意地听着，而且频频点头。

当我们谈到延安县那位“农民县长”，我就介绍了被称为“平民县长”的孙伏园先生。这可算得中国县政史上的佳话。

毛先生虽不认识孙伏园先生，但相当熟悉他的文坛生活和思想态度，说道：“我最近读过他追念鲁迅的文章。他是同情鲁迅的。”

鲁迅是毛先生所崇敬的人物。边区以鲁迅命名的学校就有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师范、鲁迅小学等。他自己并称鲁迅为新中国的圣人。

大家都知道他是有名的夜间工作者，加以他说话又是那样妙绪泉涌，引人入胜，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谈了两个钟头。最后，他却庄严地表示，对晏先生及本会同志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为敬佩，并且热望我们现在必须积极做推广工作，应有几千万的优秀干部去参加。

“共产党愿做你们的朋友！”

这是当我们握别之前，毛先生对我和我会同志们所给予的最可兴奋的鼓励！

那天夜里我回到旅舍便睡了。第二天，以整天时间写成了这篇《会见记》，所以记叙内容较为真切。我奉派去延安时，曾准备了一个大型软封面的记录本，凡参观的经过，都记录在这个记录本上面。可惜这个记录本没有保存下来。根据现在回忆，有下列几点应加以补述：

(1) 会见地点，在延安城内一所一明两暗的平房。毛主席和周秘书各住一间，中间空着。

(2) 我是交际科长金城同志陪去的，但金城同志没有参加谈话。

(3) 我和金城同志走到毛主席住宅前面的院子时，受到毛主席身边安全人员的检查。在夜间没有看到安全人员有多少，但我身上曾被安全人员轻轻摸过，我想大概是怕我身上暗藏什么危险

物品。他们只是轻言轻语和金同志谈了几句，没有问我什么话。时间不过几秒钟，便让我进屋了。进屋后，周秘书就迎接我先到他自己的室内坐着，金同志也同我一道进到周秘书的房里。紧接着，周秘书一人走进毛主席的室内，不过一二分钟，周秘书便陪我走进毛主席的室内。

(4) 毛主席室内的陈设，除了我在《会见记》中所说的以外，就是四壁挂满了军用地图。这地图篇幅既长且宽，从屋顶至壁下，一张联接一张。地图上的字非用烛光细看就看不清楚。当时，我没细看那些军用地图。

(5) 在毛主席和我谈话约一半的时候，突然走进一位身材与毛主席相仿的军人，毛主席立刻向我作了介绍，他是罗瑞卿同志。罗同志站着和我握握手，便悄然退出了。

我在延安参观考察期间，能够晋见毛主席，而且作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是平教会的光荣，自然也是毫不起眼的我这个平教会代表的光荣。从当时毛主席给我最后赠言：“热望我们现在必须积极做推广工作，应有几千万优秀干部去参加。”后来，我反复回忆，是不是这“几千万优秀干部去参加”一句记录有误呢？回忆结果，认定我没有记错，而且很精确的。平教会“除文盲，作新民”的目标，是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基础工程，要把这种基础工程搞好，是非有“几千万优秀干部去参加”不可的。就以“除文盲”来说吧，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来看，把百分之八十文盲的祖国，经过四十多年的艰苦努力，从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证明了我们祖国的文盲只占百分之十五多一点了。这四十多年参加“扫盲”的优秀干部难道不是几千万吗？但是，领导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并未满足于已经达到的目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说：“必须十分重视扫盲工作，争取到2000年全国基本上扫除青壮年文盲。”晏阳初先生于一九八七年由美国回国考察时

曾满怀激情地说：“中国农村建设工作做得实在好，变化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农村面貌，还得有现在这些制度。”晏先生所说的“现在这些制度”，就是我国当前所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毛主席和晏先生虽已作古，但他们所开创的伟大事业仍然在处处发展之中。这是我写这篇回忆录时极为欣慰的事。

现在再回到我的延安考察时代来吧。

我在延安期间，除了上述情况外，还在旅舍中受到了中共中央一位重要人物王若飞同志的拜访。前面说过，我从长沙来延安之前，曾见到了王若飞同志的舅父黄齐生老先生。我离开长沙赴延安之前，黄老先生说若飞同志现在延安，便给我写了介绍信，要我会见若飞同志。黄老先生的介绍信，我到延安后即由交际科的金城同志转交若飞同志了。若飞同志收到黄老先生的介绍信，便亲自到延安旅舍来和我见面了。若飞同志当时四十多岁，身材中等，而气度庄重。王同志和我谈了几分钟后，便对我说：“我现在重任在身，即将离开延安，以后再作长谈吧。”我们便在旅舍匆匆告别了。从此我就没有再见到若飞同志了。大概一九四四年前后，我在重庆工作，王若飞同志已代替周总理继任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团长，但我没有去拜访若飞同志。不幸的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若飞同志、黄老先生和叶挺同志由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因飞机失事，全机人士都殉难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最大的空难！

在我晋见毛主席亲聆教诲之后，我在延安还两次见到了毛主席。第一次是在下午四时前后，我在旅舍前面站着，忽见街道两旁的行人自动站在街道两边，肃然而立，我便向街道一头望去，原来毛主席在十几位随从人员的跟随下缓缓地走来了。毛主席走在前头，随从的人员都在毛主席的后面，随从人员中有几位武装卫士。毛主席神态安祥，不时向街道两旁的群众招手致意。群众

的表情，既严肃而又温和，绝无惊异或骚动情况，好象家中子女对于家中长辈一样。我也曾向毛主席点头致意。这样，经过十多分钟，毛主席和他的随从走过旅舍而到城外去了，因为旅舍离延安城门不过百步左右罢了。第二次，我被通知参加一次晚会。我到会场时，毛主席也到了，他也是参加这次晚会的。因为会场人很多，我没有到毛主席身边去。这次晚会的节目是话剧《赤叶河》。从这两次我所看到的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光辉形象来观察，毛主席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群众都衷心拥戴毛主席，但没有后来我在文字上或电视上所见到的那种响彻云霄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情景。

四

在我那份《陕甘宁边区考察报告》的最后部分，曾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的全局，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我当时认为：这次空前规模的抗战必然取得最后胜利。而国共合作的前途，充满了光明，不但共同抗战，而且共同建国。对于当时已经表现出来的“摩擦”问题，认为无碍抗战大局的，而其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国共两党，和衷共济，建设祖国，使伟大祖国达到繁荣富强的光辉胜境，屹立于世界列强之林。现在，离我那次延安之行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虽然这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使国共两党都经历了磨砺，但国共两党共建祖国的前景，却更加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主张，就是国共两党共建祖国的可靠保证。

我离开延安返回长沙的时候，仍然乘坐往返西安、延安之间那种商用汽车。可在延安登车时，一位在延安认识的湖南籍的抗大学生，名叫彭湃的，随手写了一张纸条，纸条上是在长沙的友人地址，希望我到长沙后找到他的友人。恰好一直陪伴我的金城同志不在身边，我接过纸条就随手放在裤子后面的口袋中了。

不料车行到二十里铺检查站时，站上的同志突然要我下车，并且带上我的简单行李。到了检查站后，站上的同志便客气地对我说：“你在这里休息一下吧。”但那位同志没有告诉我要我带行李下车的事由。我心想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吧？我心里虽然有些疑虑，但不惊慌。到吃午饭时，那位同志让我和站内的同志一桌吃饭。但我的笔记本却由一位女同志翻阅着。我听那位女同志说：“毛主席还接见过他哩。”午饭后，他们又叫我在他们床上午睡。午睡醒来，延安方面来了一位同志，对我客气地说：“听说你带走了一个文件，是吗？”我想了想便随手从口袋中拿出那个抗大学员给我的纸条给他，并说：“是不是这个？”这位同志看了一下，微笑着说：“是了。”又说：“我们知道这个人。现在汽车没有了，我们骑驴子回延安吧。”我们两人分乘两匹驴子，迎着西下的夕阳，走了二十里路回到了延安旅舍。这是我到延安以后最轻松悠闲的一个下午。回到延安旅舍后，金城同志立即赶来向我道歉。我感谢了他，相视一笑而罢。第二天，我仍然乘汽车离开延安。

汽车行到中部县时，有一小时的休息。因为中部县是我中华民族始祖黄帝陵寝所在地，我为了对民族始祖的崇敬与怀念，便独自去到黄陵。哪知一到黄陵，却只看到一片伤心惨目的情景，使我几乎掉下泪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我现在引一段孔尚任著的《桃花扇》里面凭吊南京明孝陵的唱词，以见一斑：

“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儿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横白玉八根柱倒，堕红泥半堵墙高，碎琉璃瓦片多，烂翡翠窗棂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宫门一路蒿，住几个乞儿饿殍。”

黄陵是一座土堆，土堆上尽是荒草。陵前有座大庙，其残破情况，正是那段唱词所说的景象：窗子少了，庙门只有一扇，红漆完全剥落了。所谓黄帝的神主牌上，不知什么人给插上一羽鸡

毛。庙里并没有守庙的人，院子里却有几个打打闹闹的穿得异常破烂的小孩子来回追逐着。陵和庙在一座不算高大的山上。山上有一片象北京中山公园的古柏，树干粗，但衰老颓败之象，简直不象样子。为什么四万万人民（当时大概的统计）的始祖黄陵衰败到这样子？我哽咽无言，我只有废然返回汽车，与衰败的黄陵告别了！据闻，这个中部县，现已改为黄陵县，黄帝的陵墓和庙宇也重建了。我虽然没有再去拜谒黄陵，但相信重修黄陵一定是实事。

我回到长沙后，立即到晏先生在长沙麻园岭的住宅，向晏先生作延安考察的汇报。晏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的汇报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我一面说，晏先生一面在他的手册上记录，态度严肃而认真。晏先生听到我会见毛主席那段，特别注意，听到毛主席向他和本会致意时，面色欣然仍记录不停。我在平教会只是一个普通干事，和晏先生见面时多，而说话时少。通过这次汇报，我和晏先生的关系和情感便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过了两天，晏先生命我向在长沙办事处工作的三十余位同志作了考察延安的报告。同时又命我把毛主席和我谈话的记录，题为《毛泽东先生会见记》，在我会的机关杂志《民间》半月刊发表出来。从我自己来说，在受到晏先生和平教会多年教育之后，又受到毛主席对平教会的评价与鼓励，因而更加坚定了我为平教事业奋斗不息的信念。

1991年10月9日于南京 南湖

1855—1889 年银钱比价、物价等资料

张德昌

编者按：本篇原载张德昌著《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一书（香港中文大学 1970 年出版），作为附录附于该书之后，系作者根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及其他书刊中有关资料，摘录编制成表。对了解清末主要是北京地区的银钱比值变动、物价、佣工工资以及清末经济史，颇有参考价值，特刊出以飨读者。

（甲）有关银钱比价的资料

银钱比值的变动^①

咸丰元年至光绪十五年

年代	日月	地点	银 钱 比 值	番洋与钱比价	备 注
咸丰元年	19/12		1 = 2000(市价)		曾国藩平银价疏
三年		会稽		1 = 1900	咸元十二月十九日 《越缦堂日记·补丁集》页 6
	16/2	北京	1 = 制钱 2100/2200 — 制钱 1600/700 = 制钱 1000 +		御史陈庆镛奏，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页 342—3

① 详见第 184 页①

年代	日月	地点	银 钱 比 值	番洋与钱比价	备 注
四年	15/2	北京	1 = 大钱 2000 + = 大钱 1800 + = 大钱 900(日减)		黄辅辰《藏经堂日记》，上书同册，页 346—349 引
	20/11	北京	1 = 制钱 2000 (官定) = 制钱 2400/2500		左庶子鍾璐奏，同上书同册，页 211—2
	17/9	北京	钞银 1 两 = 官钱店大钱 2000 市价 1 两 = 2500		黄辅辰资料一料上，页 349
	27/8	北京	1 = 30000(票钱)		陕西巡抚王庆云议请用黄金红铜与银并同疏，同上书册，页 182—5
	16/1	北京	1 = 4000 大钱及制钱配合搭用 1 = 2750 制钱		户部尚书张瑞珍奏，同上书，页 218
	15/7	北京	1 = 2750 制钱		通政使李道生奏，同上书，页 268
	4/11	马兰镇	1 = 1000 制钱		马兰镇总兵庆锡奏，同上书，页 272—273

- ①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八章“清代的货币”三，清末币值的变动，页 831，清代制钱市价表(二)，页 843 表三，所列白银一两合制钱数，咸丰三年至十三年，照其注⑨(页 840)解释“除了注明京钱的数字外，都是指大制钱。清末京钱只是一种价格标准，支付时用普通制钱。京钱二文合制钱一文。”颇与事实不符：一，京钱折合制钱，商人照铜价折算，各年各月数字不同。第二，北京所用之钱，大钱、票钱、铁钱甚为紊乱，非全用大制钱。同治元年至光绪年间(表三)系根据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文集二一》)，银钱比价系由海关统计数字折算而得，与北京银钱比价情形不合。

《慧因室杂缀》(不著作者姓名)满清野史五编载：

“咸丰四年，其时盗铸钞钱之案蜂起，严刑不能禁……先后奏请废止(大钱、铁钱、铅钱)，惟留铜钱当十一种，谕令大钱与制钱并行，而京城乃不用制钱。出城数十里又复不用大钱……至光绪十四年，阎敬铭为户部尚书，请废当十，仍用制钱。遂奉旨以三年为期，所有交官之项，以制钱出，以大钱入，期于三年内收尽。然大钱在市虽当十，仅作制钱二文，相沿已久。此令既下，市肆大损。……先是咸丰初年，银一两易钱七千余，同治初易至十千；光绪初至十七千；十四年以后，渐减至十二千；二十年以后，更减至十千零。大钱渐绝，市面稍定。”本篇注释为原书所有一编者。

年代	日月	地点	银 钱 比 值	番洋与钱比价	备 注
六年	10/11	北京	1 = 京钱 6500 + (钱铺私票) = 大钱 7500 + = 现钱 1300/1400	1 = 1735	御史李培祐折, 同上书, 页 278 《越缦堂日记·补丙集》上, 页 86
	12/9	会稽			给事中张修育奏, 资料一辑上, 页 279
七年	12/1	北京	商贾拒用铁钱, 米店罢市		御史保恒奏, 同上书册, 页 579—581
	16/1	北京	票钱 1000 = 制钱 500/600 = 铜大钱 1100/1200 = 铁大钱 1500/1100	1 = 1209	御史徵麟折, 资料第一辑上册, 页 298
八年	16/4	北京	制钱 1000 = 铜大钱 1200/1300		御史忻淳折, 同上书册, 页 298—9
	29/9	北京	1 = 京钱 12000 +		《越缦堂日记·补戊集》上, 页 67
	20/9	会稽			御史鄂堃奏, 资料一辑上册, 页 301
九年	28/3	北京	票钱 1000 = 制钱 200 “物价皆按制钱折算”		署刑部右侍郎袁希祖奏, 同上书册, 页 301
	19/4	北京	1 = 京钱 17000 +		《翁文恭公日记》, 咸丰十年六月十七日
十年	17/6	北京	1 = 票钱 38000		《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 页 67
十一年	8/6	北京	1 = 金钱 28000 + 票钱 1100 = 制钱 62 文 当十大钱 1 = 制钱 2 文 = 铁钱 20 文		同上, 页 70
	12/6	北京	1 = 票钱 30000 票钱 1000 = 制钱 12 文		同上, 页 71
	20/6	北京	1 = 票钱 27000 票钱 1000 = 制钱 58 文		同上, 页 79
	24/6	北京	1 = 票钱 60000 (早) = 票钱 26000 (跌) 票钱 = 1000 制钱 600 文		同上, 页 80

年代	日月	地点	银钱比值	番洋与钱比价	备 注
同治元年	9/7	北京	1 = 私号票钱 13000 私号票钱 1000 = 制钱 100 文 1 = 官号票钱 45000 官号票钱 = 制钱 10/20/30		同上, 页 91
	26/7	北京	1 = 票钱 20000 = 大钱票 9000 “日减 100”		《翁文恭公日记》, 咸丰十一年七月廿六日
	24/8	北京	1 = 现钱 6000/7000		国子监司业马寿金奏, 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资料一辑上, 页 479
	18/7	北京	1 = 20000/30000		湖广总督官文奏, 资料一辑下, 页 511—512
	二年 22/12	北京	1 = 11168		《孟学斋日记·甲集首集》下, 页 92
	三年 26/10	杭州	1 = 13333		《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一, 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福州		1 = 1011 +	同上
	四年	北京	1 = 12000		钟大堪批请改铸轻钱议, 资料一辑下册, 页 559—561
	六年 6/10	会稽		1 = 银 0.715	《孟学斋日记·乙集》, 页 3
	七年 14/闰 4	江宁	1 = 1670 +		《曾文正公奏疏奏稿》卷 26, 同治七年四月十四日
	八年 19/11	直隶	1 = 1800		同上卷 28, 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十年				
	十一年 30/12	北京	1 = 10440		《桃花圣解齋日记·癸集》, 页 9
	十二年				
	十三年 5/4	北京	1 = 12659		同上壬集, 页 64
	13/11	北京	1 = 12500		同上癸集, 页 85
	1/12	北京	“钱铺后开市”		同上甲二集, 页 1

年代	日月	地点	银 钱 比 值	番洋与钱比价	备 注
光绪元年	10/9	北京	1 = 10000		《桃花圣解齋日记·乙集》, 页 67
三年	9/10	北京	1 = 17000 松江银 1 = 16500		同上庚集第二集, 页 54
四年	4/5	北京		1 两 = 洋 1.45	同上集, 页 10
	13/5	北京	1 = 22000 票钱		同上页 16
	15/5	北京	1 = 15000/16000 票钱		同上页
	21/5	北京	1 = 12000 票钱		同上页 19
八年	10/1	北京	“京钱儿 45000 儿三 两” 1 = 15000		
十一年	14/11	北京	1 = 14500 票钱 松江银 1 = 14300 1 = 16500 现钱		《荀学斋日记·庚集》 下, 页 69
十二年	4/1	北京	1 = 12000 票钱 1 = 17000 现钱		同上庚集下, 页 91— 92
	12/3	北京	1 = 13200(最低可换)		同上辛集下, 页 22
	18/3	北京	1 = 13023		同上页 24
十三年	25/3	北京	1 = 10000 票钱		同上辛集下, 页 93
十四年	13/2	北京	1 = 12000		光绪十四年二月十三 日《申报》, 资料一辑 下册, 页 538—9 引
	12/11	北京	1 = 11000 票钱 京钱 17000		《荀学斋日记·癸集》 上, 页 71
十五年	2/10	北京	1 = 制钱 2600		庶子恩景奏, 光绪十 五年十月二日, 资料 一辑下册, 页 540

《越縕堂日记》中有关钱银比值变动的记述

咸丰七年至光绪十三年

咸丰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付光相寺僧洋五元, 每元作钱九百九十七文, 申水钱五十文。(1 元 = 997) 共计得钱五千二百三十五文。又付钱七百六十

五文，为礼忏斋供之费。

番钱自嘉庆时入中国，其初每钱值六七百文。道光间盛行，公私出入非此不济，直亦渐长至千二三百文。至咸丰癸丑岁，以寇警骤长至千九百文。去年冬忽以次减，又多新铸及诸恶色，几壅不行。今遂只得此数。盖此物视银价为消长。自大军驻江南，以浙省为外府，税银尽以给军，而即变价易钱于浙中，内发帑银亦然。又铜钱极少，估舶多有私载铜出海及潜销毁为器物者，故大钱尤不可得。京师及闽中诸省至行铁钱，铜贵而金钱俱贱矣。钱法之乱，莫甚於此，以致商贾束手，细民不聊生。虽台臣屡有言，莫之能止。此亦足以观世变已。今日番钱复减至九百七十三文。

咸丰七年九月五日

收宝泰铺存项：元宝两锭，银五十两，计钱百六十八千四百五十文。

咸丰八年九月二十日

借得番银二十元，每元 1 = 1200 文，合计钱 24—80。

咸丰十一年六月八日

（陈）珊士交来京平银十两一钱，属汇寄其家。近日银价踊贵，一两至换铁钱廿八千有零，而一千文之票，仅换铜制钱六十二文。市物皆长价数倍。钱法极坏，民不聊生矣。自咸丰初以铜钱匱竭铸铁钱，复铸当十铜钱，而钱质恶劣，民间迄不能行。乙卯丙辰间，江浙间有用当十钱者，未几复停。次年吾越以一当五用，旋至当三而罢。今都城则以一当铜制钱二，当铁制二十。朝廷设官鼓铸者有年，思以济铜之乏，而转齟齬於商贾，抑使更贱。立法不严，其弊至是，可叹也。

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日

日来市上交易银价至三十吊以外，票钱一吊，仅得铜制钱五十二文。以户部先揭示尽废钞票不用，近复议废钱票，民间惴

揣，故银价日增，制钱日少。京师久乏铜钱，而铁钱又不能行，惟恃虚票以通有无，倘此议果行，乱必作矣。

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是日银价稍平，一两换票钱二十七千，千换铜制钱五十八文。

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昨日银价已减至二十六千，每千换钱六百。今早忽增银价至六十千。乾益、乾亨、乾元、乾豫四家官号钱票皆屏不用。以户部议钱票太多，度支无银可抵，奏请四乾官号票搭三成用，俟票尽收后，令各钱铺另出新票，不出者斩决。昨已得旨准行。

上谕以四乾钱号浮开空票，私铺奸商串通把持，银价日贵。嗣后着以去年奏定钱价之日起，扣出三成，作为各商罚款。俟票收尽后，将官号撤去，改为民铺，另出新票，其各钱铺皆一体出票。如仍前把持，抑勒平民，官号商人即行正法，私铺从重治罪。其五天字号钱铺着内务府妥为照料云云。自此诏出，民间但肯用五天字号钱票。户部揭示凡四乾字号票准搭三成充捐输职官，其加成捐复请封赎罪仍不准搭用。

咸丰十一年七月五日

今晚四天字号钱票又不行。

咸丰十一年七月九日

数日来私号钱铺皆出新票，银一两换票钱十三千。每千换铜制钱一百。而天元、天亨、天利、天贞四官号钱票，皆渐不行，每银一两换至四五十千，每千换钱不过二三十文。其四乾字号及西天元字号，仅换十馀文。闻户部连日递封奏，不知又何所更置也。县官不知搜利之源，贪狙小利，因循坏法，至于势穷情见，乃不顾本末，别创一议，以为弥缝。其始以利狃商，而轻重之权，度支转夺於狙侏，其既以势竭民，而出入之际，闾阎归恶于君上。徒有纷更之名，无补亏耗之实，示小人以不信，等匹夫之

罔利。掌司农者，半皆黄颌纤儿，白面贾竖，上不益贫，下不可活，是裴延龄、韦渠牟之罪人哉！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日

津门酒保例于正设外，进果羹四碗，食物四盘，杏酪一钟，谓之敬菜。其钱两千，易银一两。计所费共四金，较之都中价值相等。

同治四年十月五日

付余氏英洋钱二十枚八角，作银十四两，此秀才余芹家都中汇款也。英洋钱者，近十年来始出，铢两视旧所行番金益轻。其面文为鸟形，幕文亦与旧异。咸丰之末，惟行上海及广东耳，今遍於江浙矣。

同治四年十月九日

作书致沈蘅夫，以英洋二十枚合银十四两三钱，嘱代还其戚濮姓。作片致张潋俞氏子（举人俞觐光之子），并英洋钱十枚，合银七两一钱五分，此与濮氏钱皆都中汇款。

同治十三年三月六日

皇太后懿旨……将来通行制钱之时，每当十大钱折抵制钱二文。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是日市中钱铺以折负停闭者六家。予前日换银十二两，得票钱百五十千，今日尽成画饼，真无妄之灾矣。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一日

是日，市中所停钱铺复开，予钱票尽取得钱矣，此又非望之喜也。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三日

前月印结局公费银十五两五钱换得票钱二百五十千。

近日都中百物踊贵，米麦尤甚。余所食米，去年春时，每百斤京钱二十八千，今渐至四十七千，昨日且五十千矣。杂货面

(以黑小米、菽米和麦皮为之，都中极贫户所食。)一斤至四百餘钱，旧止百余钱。前日闻李合肥遣官来办平糶，设局于崇文门，又置分局二于内外城，未知何如也。

昨阅邸钞：山西曾中丞（国荃）奏，省城银一两易八三钱一千三四百，而斗米须钱二千四五百。省南（平阳、汾州、蒲州、绛、解、霍等州）纹银一两，易钱一千一百。元丝银则止易钱九百余，斗米须银二两有奇。今日邸钞，李合肥奏：据曾国荃函称“小米市斗每石二百九十斤，银十四两六钱，合官斗每石银七两三钱。高粱市斗每石二百四十斤，银七两三钱，合官斗每石四两一钱零。”是曾疏所称者，乃市斗白米也。合肥又言，据河南委员称“该省时价：小米市斗，每石一百九十斤，制钱六千三四百，合银四两二钱零；按官斗，每石一百四十余斤，约合银三两二钱零。高粱市斗，每石一百八十斤，制钱四千四五百，约合银三两；按官斗每石一百三十斤，约合银二两二钱零。”

光绪三年十月九日

“今都门纹银一两易京钱十七千，松江银一两易十六千五六百，而市斗每石一百五十斤，白米百斤至五十千，已合银三两，一石则合银四两五钱。小米百斤至四十余斤，一石须六十余千，合银三两七钱有奇。高粱都人食之者少。白面每石一百三十斤，须京钱六千。小米面每斤京钱四百六十。然则京城米价贵于河南。满族游民徒食日众，畿辅饥者又纷至沓来。”

光绪四年五月四日

连氏补送家传润笔番银六十元……牧庄来，托其向阜康取连氏所寄得银四十一两三钱。余不知市贾，常以此累友朋，可哂也。

光绪四年五月十五日

前日银价一两至钱二十二千，昨日忽减，今日仅十五六千矣。以人争取钱，且不肯用小钱，钱铺有停闭者。钱法之乱，几

如咸丰末年，恐非佳兆也。

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是日市中钱法大乱，钱铺停闭者十五六家。铺家不肯收银，民间不肯用票，银价减至十二千，不知何故也。

光绪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邸钞，上谕：前因京师钱价长落不定，钱店多闭，于民间生计有关……兹据步军统领衙门奏称：近因私铸复杂，街市挑剔小钱，致钱价无定，钱店关闭者不少。现将借端滋扰抢夺之犯及有意牟利潜逃之奸商拿获数起……至私铸人犯现已拿获数案……日来市肆渐次安帖……

光绪五年三月十日

邸钞，上谕：前据都察院奏：江西试用从九品龚榕敬陈管见十二条，据呈代奏一折……《裕财用》中……并铸银饼一条，或变更成法，或有伤政体，均属窒碍难行……又请增京廉一端，能否办理，著该部议奏。

光绪九年七月十日

邸钞，诏“现在京城一带多有匪徒销毁官钱，改铸溢利，以致私钱充斥。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一体严密查拿……”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李注：“自去年六月下旬，户部尚书阎敬铭私议欲改复铜制钱，於是银价骤贱，钱铺废歇三十余家。”

“召四喜部头时琴香来，付以银一百五十八两，又钱三十四千，为初四日合乐之资。都计此次爨演，共费京钱四千二百五十千。近日银一两易票钱十四千五百，松江银减二百，若易现钱则十六千五百，以钱肆不肯出票也。此皆票钱。”

光绪十二年一月四日

是日市中复禁小钱不行，银价易票钱每两十二千有奇，易现

钱至十七千有奇。自昔年孔宪毅、张佩纶等条陈钱法后，各钱铺遂不肯出票，诸肆之有力者皆效之，惟盐、米、油、烛小肆行票钱。于是市中易银，票钱与现钱遂有二价，钱日益滥恶，交易者以票钱为奇货。盖不知裕铜之源，讲铸钱之法，严私销私铸之禁，平物价银价之程，妄意更张，出入无主，徒为狙佞之利，而市物益贵，钱法易乱，民亦益病矣。盖不学之人无一而可也。

光绪十二年三月十二日

每银一两作钱十三千五百，其价为最廉。

光绪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是日买几二、椅二、杌子四，付银四两三钱，每事票钱七千。

光绪十三年一月十四日

邸钞，懿旨，户部奏：“请于滨海江临各省应解京饷内酌易制钱，解存天津备用……上年六月间谕令醇亲王奕譞会同军机大臣、户部、工部将钱法妥为筹议，以期渐复旧制。旋据奏请以三年为期……先令直隶、江苏各督抚添购机器，制造制钱，并飭例应鼓铸制钱各省，一体赶紧开炉铸造……此系特旨交办之事……及时阅半年，忽称机器制造工本过巨，京局开炉，恐滋市井疑虑，而以飭令湖北等省搭解制钱运津备用为佳……深堪痛恨。总之旧制必宜规复，钱法亟应整顿……限于一年内一体办理就绪……”

光绪十三年一月十六日

是日，市中以昨见谕旨将行制钱，今日小钱屏遏不行，细民觅食不得，号泣满路，饼师菜佣，相率闭门，至有求死者。以昨日市易所得，皆常用钱也。钱法之敝已极，骤欲革之，徒苦小民，益致纷扰耳。

邸钞，吏部奏，遵议户部堂官处分一折：阎敬铭、锜福、翁同龢、嵩申、孙治经、景善、孙家鼐应得革职处分，均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邸钞，熙敬（吏部右侍郎）调户部兼管钱法堂事务。

光绪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兵部左侍郎曾纪泽调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乙）有关物价的资料^①

咸丰六年至光绪十五年

年	日月	物品名称	单位	银(两)	番圆	钱(文)	地点
咸丰六年 (1856)	19/3	芥菜	斤			2	会稽
	1/8	米	石			4,100	会稽
			石			3,400(最下)	
			斗			900	湖州
			斗			500	苏州
	6/9	菜	斤			9	
		酒	斗			200	
		米	石			4,700(最上)	
			石			4,300	
		棉花(连核)	斤			40	
		棉花(去核并弹净)	斤			170	
	20/10	米	石			5,600	会稽
		新米	石			4,900	会稽
		糯米	石			6,000	会稽
咸丰七年 (1857)	17/4	米	斗			550	
	3/7	盐	斤			13	
	28/7	衬材	株			712.5	
	26/9	簪	具			1,500	
	27/9	簪	六斤		\$ 1		
		绣巾	三顶		\$ 4		
	3/11	盐	斤			13	

① 根据《越缦堂日记》各年所记汇辑。

年	日月	物 品 名 称	单位	银(两)	番圆	钱(文)	地点
咸丰八年 (1858)	16/11	漆田	亩			46,500	
	18/12	草	2,112 斤			4,000	
	5/3	米	斗			500	
	16/3	米	斗			550	
	20/3	木磬	具			1,660	
	17/4	米	斗			550	
	7/5	米	升			大钱 56	
	8/5	米	石			6,000(+)	
			斗			70	
	6/9	菱	斤			7	
	13/11	雉	双			550	
	16/11	谷	斤			16.5	
	20/11	鹅	只			530	
	30/11	雁玉嘴烟管	根			440	会稽
		京毛皮马褂	领		8		同上
		锡	斤			181.9	同上
		紫铜手炉	枚			280	同上
	7/12	二毛线绉袄子	领		20	10,000	同上
		金顶	枚		1		同上
咸丰九年 (1859)	17/12	年糕	斤			22	同上
	29/1	床	具			17,000	同上
咸丰十年 (1860)	4/4	单衣	领		6		同上
	17/9	早谷	斤			12	同上
咸丰十一年 (1861)	27/9	米	石			3,500	
	4/10	米	石			4,000(+)	同上
	6/11	米	石			4,800	同上
		靴	双			24,000	同上
同治元年	13/6	菜	斤			10	同上
		萝卜	斤			16	同上
同治元年	11/1	湖绉汗巾	尺			2,200	同上

年	日月	物品名称	单位	银(两)	番圆	钱(文)	地点
(1862)	13/1	水烟筒	具			6,000	同上
	25/9	羊裘	件	6			同上
	25/11	鸡心荷包	个			2,000	同上
同治二年	11/1	翠磁茗碗	枚			1,000	同上
(1863)	9/4	日记簿	册			2,000	同上
	13/4	罗衫	领			28,000	同上
		葛衫	领			12,000	同上
		茶钟	枚			2,000	同上
	23/4	凉帽盒	具			8,000	同上
	24/4	缎鞋	双			7,000	同上
	22/6	莲蓬	枝			32	同上
	20/7	马桶	具			6,000	同上
	1/10	日记簿	册			2,000	同上
	2/10	狐袍	件	6			同上
	7/11	铜面盆	具			12,500	同上
		手巾	方			500	同上
	17/11	鞋	双	2			同上
	12/12	茶碗	枚			1,750	北京
	24/12	新历	本			500	同上
		水笔	管			600	同上
		日记簿	册			2,000	同上
	30/12	鹅黄半绉衬衫	件			38,000	同上
同治三年	13/1	织皮大护书	件			4,000	同上
(1864)	19/2	水笔	管			400	同上
		硃墨	挺			400	同上
	8/3	磨本段棉袍	领	8.5			同上
		皮箱	具			28,000	同上
	13/3	小帽	顶			3,200	同上
	26/3	竹帘	桁			8,000	同上
	4/4	江绸单外褂	领	6			同上

年	日月	物 品 名 称	单位	银(两)	番圆	钱(文)	地点
同治四年 (1865)		江绸夹马褂	领	4.5			同上
		湖绉夹裤	具			16,000	同上
	29/4	窗户玻璃	尺			3,500	同上
	28/5	表	枚	10			同上
	8/6	牙柄蕉扇	桶			18,000	同上
	1/7	日记簿	册			20,000	同上
	7/7	雕翎扇	柄			40,000	同上
	3/8	油绸雨伞	柄			9,000	同上
	1/11	毛马褂	领	5			同上
	11/11	青羊皮睡褥	张	1.1			同上
		白铜暖锅	具			7,000	同上
	15/11	虾青湖绉	尺	2(+)			同上
	19/3	靴	双	2.4			同上
	14/5	细葛小衫	袭			600	会稽
	28/10	龙眼	七斤		1		同上
	7/12	薪	束			22	同上
同治五年 (1866)	28/1	薪	束			18(+)	同上
	27/2	米	斗			480	同上
	9/4	米	石			3,700	同上
	15/4	米	石			3,580	同上
	16/4	薪	束			14(+)	同上
	7/5	草席	领			760	会稽
	29/5	朱漆浴盆	具			2,400	同上
	12/6	洋纱帐子	具			3,350	同上
	27/6	西瓜	枚			66(+)	同上
	27/7	木凳	具			325	同上
同治六年 (1867)	12/8	舒鳧	双			333(+)	同上
	12/4	稻桔	束			4	同上
	28/6	粗葛袍	领			1,890	同上
	26/8	禾杆	斤			1(-)	会稽

年	日月	物品名称	单位	银(两)	番圆	钱(文)	地点
同治七年 (1868)	25/闰4	白团扇	柄			325	同上
	5/8	草	890 斤		2		同上
	26/8	薪	担		1		同上
同治八年 (1869)	12/3	禾稿	斤			7	同上
	14/3	羽织帛围冠	顶		1		同上
	20/11	白菜	760 斤		2		同上
同治九年 (1870)	10/5	新茶	斤			420	同上
	8/6	杭纺绸	寸			432(+)	同上
	2/7	铜帽架	对			700	同上
	5/7	西瓜	枚			51(+)	同上
	11/9	高胫洋镜	盏		1		同上
	23/9	肩舆	辆		13		同上
	29/9	蟒袍	领件		14		同上
		鼯鼠褂子	件		16		同上
		羊皮马褂料	领		9		同上
	20/12	南米	升			46	同上
同治十年 (1871)	17/3	东洋蓂	两			3,000	北京
	7/4	高丽参	两	75			同上
	7/6	丛棘	担			2,500	同上
	5/10	毛儿窝	双担			17,000	同上
	12/11	米(较北京约贱四分之三)	担			2,900(最高)	会稽
同十一年 (1872)			担			1,150(其次)	同上
	25/3	米	石			35,000	北京
	12/5	床席				7,000	同上
		坑				2,000	同上
		竹帘	桁			5,000	北京
		纨扇	桶			4,000	
	3/8	狗	只			8,000	
	18/9	高丽参	两			1,455	
	20/10	茧袍羊裘	件			70,000	

年	日月	物 品 名 称	单 位	银(两)	番 圆	钱(文)	地 点
同治十二 年(1873)		狐皮马褂料	件			50,000	
	23/10	元色绉纱	尺			2,846(+)	
	6/11	方桌	张			14,000	
	25/12	长桌	张			20,000	
		便椅	张			6,000	
		几	张			4,000	
	17/3	波黎窗	扇			16,000	
	4/4	木香花	盆			7,000	
	6/4	梧桐	本			8,000	
	7/4	竹	竿			218(+)	
		缸	具			16,000	
		满蓆	本			2,000	
	3/6	绳床	具			20,000	
	4/6	椅方书案	张			20,000	
		书架	具			10,000	
	20/7	桂花	小盆			1,500	
	20/9	鞋	双			33,000(+)	
		貂冠连纓	顶			96,000	
	8/10	白泥火炉	架			4,000	
	12/10	丛棘	担			5,500	
同治十三 年(1874)	12/1	粗砚	枚			4,000	
	18/2	青鞋	双			8,000	
	6/3	铜墨盒	枚			12,000	
	15/5	罗衫	领	6			
		罗裤	件	1.5			
		缕纱罗衫	领	4.3			
	7/6	团扇	把			7,500	
	23/7	菊花	盆			222(+)	
	8/10	白灰炉连番木架					
		抽底	具			7,500	

年	日月	物品名称	单位	银(两)	番圆	钱(文)	地点
光绪元年 (1875)	3/11	小儿银锁(包金)	把			24,500	北京
	25/12	长桌子	张			13,000	
	15/1	高丽参	斤			38,000	
	13/2	水仙花	本			800	
	5/7	冰	斤			1,000	
	30/7	鞋	双			8,800	
		纳绵带板	对			10,800	
	23/8	锡奁具	具			20,000	
		泽发器	具			4,000	
		茶壶	对			7,000	
光绪二年 (1876)	8/9	重阳花糕	斤			966	北京
	26/12	玻璃风灯	对			20,000	
		锡烛台	对			9,000	
		梅花	对			9,000	
		水仙花	丛			1,100	
	春	米	斤			280	
	19/1	磨本缎马褂	领	11.2			
		湖绉袍	领	10			
	21/1	缎袄	领	5.8			
	17/2	铜鹦哥灯	具			18,000	
光绪三年 (1877)	3/3	米	石			32,000(久不	北京
	18/7	秋帽	顶			4,000 雨,百	
	27/2	菊花	株			212 物昂贵)	
	15/10	白灰火炉	具			3,800	
	17/10	石灰	斤			28	
	7/11	石炭	斤			28	
		米	斤			470	
	26/3	蓝缎袍绵	领	9			
	2/3	缎褂	领			100,000	
	5/4	画桌	张			27,000	

年	日月	物 品 名 称	单 位	银(两)	番 圆	钱(文)	地 点
光绪四年 (1878)	9/4	柳木凳	张			3,500	北京
	28/4	雕翎扇	柄			30,000	
		湘竹丝根金泥折扇	柄			10,000	
	15/5	纨扇	柄			11,333	
		纨扇	柄			6,300	
	27/9	舍利狐褂	领		20		
	29/9	椅垫	对			10,000	
	8/10	米	斤			500	
	9/10	杂货面	斤			400(+)	
		米	斗		83	2,450 京钱	
		米	斗	2(+)			
		小米	(市斗)				
			石	4.2			
			(官斗)				
			石	3.2			
		高粱	(市斗)				
			石	3			
			(官斗)				
			石	3.2			
		白米	(市斗)				
			斤			500	
			石	4.5			
		小米	斤			400(+)	北京
			石			60,000(+)	
		白面	石			60,000	
		小米面	斤			460	
光绪四年 (1878)	15/5	竹帘	桁			9,000	北京
		菊花	丛			222(+)	
	13/12	牛	只	14			北京
光绪五年	12/9	石炭	斤			6.14	

年	日月	物品名称	单位	银(两)	番圆	钱(文)	地点
(1879)	26/12	纱灯	盏			7,250	北京
光绪六年	25/2	食盐	对			8,500	
(1880)	23/3	拾衣	领	3.5			
	30/6	连跨靴	双	3.8			
	5/8	磨菌	斤			40,000	
	8/9	菊花	本			166(+)	北京
	12/11	羊裘	领	13			
光绪七年	14/1	渗金宣炉	具			20,000	
(1881)		渗金小炉	具			8,000	
		桃花草虫瓷钟	对			6,000	
	17/3	白布袍及带	领			12,000	北京
	14/6	大幅草席	张			11,500	
		鹰毛大扇	把			3,500	
	27/8	菊花	盆			262	
光绪八年	25/1	桌	张			17,000	
(1882)	6/4	箱篋(藏书画)	具			10,000	北京
	18/6	靴	双	2.9			
	13/12	甘尖褂	领	15			
		舍利孙马褂	领	17			
		磨本缎面羊皮马褂	领	7			
		狐皮半臂	领	3			
		貂袖	双	2			
		羊裘	领	4.5			
		羔襦	领	5.5			
		藤床	张	5			
		红梅	对			8,000	
		蜡梅	树			6,000	
	17/12	红呢椅垫	张			14,000	
	23/12	羊襦	领	8			
光绪九年	15/1	酒杯	枚			24,000	

年	日月	物 品 名 称	单位	银(两)	番圆	钱(文)	地点
(1883)	18/1	眼镜				15,000	
	21/1	红梅	树			3,200	
	1/2	绯梅	盆			10,000	
	3/2	水仙花	丛			900	
	2/3	毡冠连顶缨	具			26,500	
	8/3	大小床	张			18,000	
	9/3	朱砂栾枝	株			1,750	
	23/4	石榴花	盆			3,750	
	18/5	草花	担			5,000	
	28/5	缎云绉履	双			13,600	
	18/6	花	担			16,000	
		秋海棠	本			1,300	
	22/6	木箱	具			20,000	
	14/7	棉半臂		8			
	1/9	菊花	盆			364	
	5/9	康熙熏翠龙盘	枚			7,000	
	9/9	菊花	盆			419	
	17/9	波黎镜	盏			35,000	北京
		琉璃镜	对			18,000	
	4/11	枇杷叶露	两			5,000	
	19/11	缎褂	领	9.3			
光绪十年	12/2	鼯鼠马褂	领	8.2			北京
(1884)	15/8	瑞玉色江绸大裁单袍	领	8			
	13/11	妇女上车梯登	具			6,000	
	14/11	素心蜡梅花	盆			6,666(+)	
	12/12	米	618斤	11.74			
光绪十一年	15/1	药饼	枚			3,500	北京
(1885)	13/3	朱砂	笏			20,000	
	11/4	踏镜	对			26,000	

年	日月	物品名称	单位	银(两)	番圆	钱(文)	地点
光绪十二年(1886)	8/5	书架	张			20,000	北京
	10/5	藤床	张			50,000	
		革箱	具			22,000	
	17/6	秋海棠	盆			9,000	
	19/7	翠玉朝珠佛头	副	6.2			
	5/9	青云绚茶色缎履	双	1			
	3/3	梨树	株	2			
	6/6	元青芝麻纱种子	领	5.9			
	4/10	菊花	盆			23,000	
		夕砂	盆			6,000	
光绪十三年(1887)	11/11	西洋圆晶镜	对	3.6			北京
		西洋猛火油	箱	1.2			
	24/12	山水纱镜	盏	3			
	14/1	蜜蜡朝珠	串	5			
	16/3	织金蟒袍	领	14			
		绵襦	领	7			
	29/闰4	白地人物套料瓷壶	枚	4			
	5/5	蓝实地纱	领	5			
	17/5	朝珠	挂			4,500	
	19/5	碧螺杯	对	2			
	24/6	黑云绚淡缎履	双	1.2			北京
	25/6	莲蓬	把			800	
	20/7	朝衣朝裳	副	14			
		织金沙蟒袍	领	13			
		罗衫	领	5			
	24/8	吉林蓑	两	20			
	5/9	菊花	盆			4,637	
	7/9	菊花	盆			333(+)	
	8/9	八人方桌	张	1.6			
	13/12	狐白马褂	领	11			

年	日月	物品名称	单位	银(两)	番圆	钱(文)	地点
光绪十四年(1888)	16/1	狐白褂	领	19			北京
		铁树花	盆	2			
	22/2	红杏	株	1			
	3/4	马	匹	53			
	3/7	紫薇	树			10,000	
	25/8	酒	斤			1,200	
	30/9	菊花	盆			266(+)	
	26/11	狐袍	领	12			
光绪十五年(1889)	27/11	红尼坑枕枕垫	副			42,000	北京
	2/7	紫薇花	盆			6,000	

(丙)有关工资的资料^①

咸丰七年至光绪十四年

年 代	日月		两	圆	钱(文)	地方
咸丰七年 (1857)	9/7	工人腾雨工直			200	会稽
	18/7	工人腾雨工直			280	
		工人仰鸢工直			200	
	29/7	匠人制棺一日工直			1,600	
	16/8	腾雨工直			360	
	20/8	单港媪工直			200	
	24/8	僧慧乳媪工直			1,000	
		仰鸢工直			200	
	30/8	缝人工食			3,500	
	8/9	仰鸢工食			480	
	15/9	单港媪工直			200	
	26/9	僧慧乳媪		2		

① 根据《越縵堂日记》，日记原文用“工直”或“工食”、“佣钱”、“佣直”、“工钱”，均指工资。

年 代	日 月		两	圆	钱(文)	地 方
咸丰八年 (1858)	27/9	缝人工直			4,140	会稽
	26/11	僧慧乳媪工直			1,000	
	25/12	腾雨工钱			1,920	
	15/4	阿八工直			660	
	19/4	僧慧乳媪工直			1,000	
	20/4	双林工钱			1,560	
	18/6	广华工直			500	
		祁姬工直			200	
	28/6	祁姬工直			400	
	22/8	僧慧乳媪工直			200	
		腾雨工直			680	
	28/8	仰鸢工直			200	
	8/9	祁姬工直			400	
	20/11	祁姬佣钱			100	
	21/11	阿四佣钱			1,000	
	4/12	僧慧乳媪工直			2,600	
咸丰十一年 (1861)	28/12	付阿四洋				北京
	8/6	王福工食			16,000	
	19/10	王福工直银	1.5			
同治二年 (1863)	7/11	王福工直银	1.5			北京
	6/3	王福二月以前工直			12,000	
		王福四月份工直			8,000	
	18/7	王福工直			8,000	
	15/8	王福工直			8,000	
	14/9	王福工直			8,000	
	28/9	王福工直			8,000	
	2/12	王福工直			8,000	
	6/12	王福工直			8,000	
	3/4	王福二月份三月份工直			16,000	
同治三年 (1864)						

年 代	日 月		两	圆	钱(文)	地 方
同治四年 (1865)	5/7	鹧儿工直			3,000	会稽
	20/11	王福六月至九月份工直			32,000	
		鹧儿十、十一月工直			4,000	
	29/12	王福十月至十二月工直			24,000	
	29/2	鹧儿工直			2,000	
	11/10	金媪十月份佣直			450	
	8/12	王元工直		2		
	17/12	令佣人仰鸢回去付工直		1	200	
	27/12	佣人愿华工直		2		
	29/12	王福工直		4		
同治五年 (1866)		王元工直		2		会稽
	28/1	缝人工直			480	
	4/3	腾雨去冬佣直			500	
	13/6	王元佣直		2		
	9/11	佣媪徐以今日毕工付		6	352	
同治七年 (1868)	13/12	王福工直		2		会稽
	7/2	佣妇阿高工直		2		
	5/5	王福工直		4		
	17/6	王福工直		2		
	10/7	阿驹佣直		1		
	13/8	王福工食		2		
	27/10	王元工食		1		
	10/11	王福工食		1		
		阿驹工食		1		
	28/12	王福工食		2		
同治八年 (1869)	29/12	阿驹工食		1		会稽
	7/2	王福工食		1		
	8/2	阿驹佣直		1		
	11/2	王福工食		1		
	25/3	王福工食		1		

年 代	日 月		两	圆	钱(文)	地 方
同治九年 (1870)	18/12	缝人工直		5		会稽
	24/12	王福工食		2		
	23/2	王福工食		1		
	8/4	王福工食		2		
	29/4	王福工食		3		
	4/5	佣人阿金			1,000	
	19/9	王福工食				
同治十年 (1871)	6/10	付仆入陈升		5		会稽
	15/12	仆入陈升佣直		3		
	4/2	王福工食		1		
		佣人七十工食		2		北京
	25/3	王福工食		4	10,000	
	5/5	王福工食			10,000	
		缉石佣工			8,000	
		陈媪佣工			10,000	
	25/7	王福工食钱			5,000	
	4/8	王福工食			10,000	
	15/8	王福工食			10,000	
		缉石工食			10,000	
		陈媪工食			10,000	
	26/10	王福工食			20,000	
	2/12	王福工食钱			10,000	
		缉石工食钱			5,000	
		王媪工食钱			5,000	
	28/12	王福工食钱			20,000	
		缉石工食钱			15,000	
		王媪工食钱			15,000	
同治十一年 (1872)	22/2	王福工食钱			10,000	北京
		缉石工食钱			5,000	
		陈媪工食钱			5,000	

年 代	日 月		两	圆	钱(文)	地 方
同 汉 十 三 年 (1874)		升儿工食钱			3,000	北 京
	18/3	王福工食钱			10,000	
	5/4	新仆林升工食			6,000	
		陈媪工食			5,000	
		升儿工食			3,000	
	25/6	岑福工食			6,000	
	12/7	圪人工钱			18,500	
		梓人工钱			8,000	
		种树人工钱			5,000	
		阿郭工钱			2,000	
		胡元工钱			4,000	
		孟厨子工钱			4,000	
		车卒阿鲁工钱			6,000	
		英桂工钱			1,000	
		阿周			2,000	
	2/8	岑福工钱			6,000	
	1/9	仆媪佣直			20,000	
	30/9	岑福工食			6,000	
	1/11	岑福工食			6,000	
光 绪 元 年 (1875)		陈媪工食			5,000	北 京
	2/12	岑福工食			6,000	
		更夫工食(月两)			7,000	北 京
	3/12	陈媪工食			5,000	
	3/2	岑福工食钱			10,000	北 京
		陈媪工食			5,000	
	2/3	岑福工食钱			10,000	
	3/4	陈媪佣钱			5,000	
	4/5	岑福工食			10,000	
		陈媪工食			10,000	
	3/6	岑福工食			10,000	

年 代	日 月		两	圆	钱(文)	地 方
光绪二年 (1876)		更夫工食			7,000	北京
		陈媪工食			5,000	
	3/7	岑福工钱			10,000	
		陈媪工钱			5,000	
	1/9	岑福工食			10,000	
		陈媪工食			5,000	
	5/11	岑福工食			10,000	
		陈媪工食			5,000	
	2/12	付仆媪等钱			22,000	
	29/12	岑福正月工钱			10,000	
	1/3	岑福工钱			10,000	
		顺儿工钱			2,000	
		陈媪工钱			5,000	
	3/4	岑福工食			10,000	
		更夫工食			7,000	
		陈媪工食			5,000	
	3/7	岑福工食			10,000	
		更夫两月份工钱			14,000	
		升儿工钱			2,000	
		陈媪工钱			5,000	
	28/8	岑福工食			10,000	
		更夫两月工食油火			14,000	
		杨媪本月半个月及九月			12,000	
		顺儿工食			2,000	
	3/10	更夫工食			7,000	
	1/11	岑福工食			10,000	
		更夫工食			7,000	
		杨媪工食			8,000	
		顺儿工食			2,000	
	2/12	刘升佣钱			7,500	

年 代	日 月		两	圆	钱(文)	地 方
光绪三年 (1877)	4/3	更夫佣钱	2		8,000	北京
		买办佣钱			13,280	
		升儿佣钱			3,100	
		杨媪佣钱			11,900	
		岑福工食			12,000	
		更夫两月工钱			14,000	
		升儿工食等			3,800	
	4/5	刘媪工食			7,500	
		岑福工食			10,000	
		更夫工食			7,000	
		顺儿工食			2,000	
	5/5	岑福工食			10,000	
		更夫工食			7,000	
		升儿工食			3,000	
	2/7	张顺佣钱			10,000	
		顺儿佣钱			3,000	
	2/8	张顺工食			11,800	
		顺儿工食			4,200	
		更夫工食			7,800	
	7/9	更夫工食			7,000	
		顺儿工食			3,000	
	18/9	杨媪工食			23,000	
	4/10	升儿工食			3,000	
		车夫工食			3,000	
	17/10	王升工食			10,000	
	21/11	王升工食			10,000	
	25/11	杨媪工食			5,000	
		王媪工食			5,000	
	21/12	仆史贤工钱			10,000	
	30/12	林更工食			10,000	

年 代	日 月		两	圆	钱(文)	地 方
光绪四年 (1878)	15/1	岑顺儿工食			4,000	北京
		王媪工食			3,000	
	3/2	顺儿工食			4,000	
	3/4	林升两月工食(佣钱至是月 14日讫)			8,000	
		升儿两月工食(讫是月之初)			8,000	
		长儿工食(是月十四日讫)			5,000	
		王媪工食(是月四日讫)			6,000	
	5/5	杨媪佣直银(至是月十七日 讫)	2			北京
	8/5	仆人李升(前日受佣)先给一 月			8,000	
	13/5	更夫工食			7,000	
	9/6	李升工食			8,000	
		顺儿工食			4,000	
	12/7	李升工食			10,000	
		顺儿工食			4,000	
	26/7	圪人工食钱			8,000	
		圪人工食			8,000	
	28/7	圪人工食			9,600	
	29/7	圪人工食钱			7,000	
	1/8	圪人工食钱			4,000	
	2/8	圪人工食钱			4,000	
	15/8	顺儿工食			6,000	
		李升工食			10,000	
		杨媪工食			10,000	
	1/9	王媪工食			26,000	
	6/9	李升工食			10,000	
	3/10	更夫杨工食			7,000	
		顺儿工食			4,000	
		李升工食			10,000	

年 代	日 月		两	圆	钱(文)	地 方
光绪五年 (1879)	1/11	王媪佣直			6,000	北京
		顺儿佣直			60,000	
	10/11	更夫杨工食			7,000	
	2/12	顺儿工食			6,000	
		更夫工食			7,000	
	2/2	顺儿工食			12,000	
		更夫工食			14,000	
	19/2	王媪工食钱			6,000	
	24/2	仆戴龄工钱			8,000	
		顺儿工食			6,000	
	22/3	王媪佣钱			7,000	
		黄媪佣钱			8,000	
		杨媪佣钱			4,000	
		更夫林佣钱			7,000	
	18/闰3	门仆李升佣直			8,000	
		更夫杜林佣直			7,000	
	16/4	李升工食			3,800	
		杜林工食			7,000	
		福儿工食			4,000	
	19/5	李升工食			8,000	
		福儿工食			4,000	
		杜林工食			7,000	
	7/6	龄儿工食(以是日起佣)			4,000	北京
	9/6	王媪工食钱			14,000	
		杨媪工食	2			
	17/6	李升是月工食			8,000	
		杜林工食			7,000	
	10/7	门仆刘顺工食(是日起佣)			8,000	
		更夫孙升(是日起佣)			8,000	
	6/8	刘顺工食			8,000	

年 代	日 月		两	圆	钱(文)	地 方
光绪六年 (1880)		龄儿工食	3		4,000	北京
	10/9	刘顺工食			8,000	
		龄儿工食			4,000	
	11/9	喜儿工食			4,000	
	13/9	杨媪工食				
	16/9	汪升(以是月受佣)			5,000	
	20/9	更夫杨佣			7,000	
	9/10	刘顺工食			8,000	
	16/10	升儿佣直			4,000	
	24/10	李升工食			8,000	
		更夫杨工食			7,000	
	15/11	升儿工食(支至明年正月止)			8,000	
	19/11	更夫杨佣直(至十二月十七日 止)			7,000	
		杨媪佣直(是月末)			8,000	
		王媪(支至明日)			7,000	
	27/11	李升工食			8,000	
	22/1	李升是月工食			10,000	
		升儿工食			4,000	
		更夫叶(十九日起佣)			7,000	
	13/2	李升工食			10,000	
		升儿两月工食			8,000	
	4/3	李升工食			10,000	
	13/6	李升工食			10,000	
	16/7	更夫孙福工食			7,000	
	18/7	李升预支工食两月			20,000	
	17/9	顺儿受佣			4,000	
	22/9	高升预支两月工食			14,000	
	10/10	李升工食			10,000	
	13/11	李升工食			10,000	

年 代	日 月		两	圆	钱(文)	地 方
光绪七年 (1881)	14/11	高升两月工食(至明年正月 讫)	5		14,000	北 京
	3/12	李升工食			10,000	
	22/1	李升工食			10,000	
	9/2	更夫王升(以是日受佣)			7,000	
	19/2	李升工食三月份			10,000	
	23/3	李升工食			10,000	
	22/4	李升五月工食			10,000	
	27/5	李升六月工食			10,000	
	25/6	李升下月工食			10,000	
	21/7	李升工食			10,000	
	23/闰7	李升工食			10,000	
	27/8	王姬工食				
		李升工食			10,000	
光绪八年 (1882)	25/10	李升工食	5		10,000	北 京
	1/2	李升工食			10,000	
	18/3	圪人工食钱			18,000	
	4/5	李升工食			6,000	
		王媪工食			6,000	
		杨媪工食			6,000	
		蒋媪工食			5,000	
		升儿工食			4,000	
		更夫工食			4,000	
光绪九年 (1883)	16/3	圪人佣直	5		40,000	北 京
	20/3	圪人佣直			35,000	
光绪十年 (1884)	6/4	顾升工食	5		2,000	在天津 北 京
		升儿工食			1,500	
	17/4	升儿工食钱			1,000	
	23/4	顾升工食			5,000	
		升儿工食			2,000	
光绪十三年	11/3	王升受佣			8,000	北 京

年 代	日 月		两	圆	钱(文)	地 方
(1887)	21/3	王成工食钱			10,000	北京
光绪十四年	11/4	车夫路四佣直			12,000	
(1888)	26/7	是日门仆曾升受佣工食钱			8,000	
	15/11	王升工食			8,000	
		升儿工食			5,000	

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

大事记（1924—1927）（续一）

司马文韬

1925 年

1 月

1月1日 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主任为阮啸仙。

1月8日 赵自选由省城回到社岗，报告与廖仲恺、蒋介石接洽的情况，及大本营卫士队携炮前来广宁，明午可到潭埗。（周其鉴：《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农民丛刊卷三，1926年9月。以下凡引该书材料不再注明。）

1月9日 上海《民国日报》广州电称：“广宁县劣绅屡次摧残农会，县长有偏袒嫌，由胡省长查悉，将撤换。”（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月11日）

同日 大本营卫士队到达潭埗，当即与铁甲车队围攻江姓炮楼。至10日早，多次发炮轰击，均不见效。

1月11—22日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称：“最近的一年以来，在南方国民党政府领域之下，农民已经被引入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国民党的农民政策的结果”。“广东农民已渐渐地觉悟并组织起来以反抗地主和劣绅，农民协会运动在广东国民党政府之下已成为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

1月11日 卫士队长兼铁甲车队长卢振柳致函第六区保卫团（江屯团局）团总黄鄂棠，提出“和平解决”。翌日黄鄂棠复

函云：“接阅大函，至佩和平诚意，请即停战撤围五日，得召集全县业主会议，再定条件。”

1月12日 周其鉴赴潭埭会见卢振柳，对黄鄂棠复函表示意见：“此种假和平，诈令我军撤围以救江姓敌人，幸勿听信，便是造福广宁农民不少。”周其鉴返回社岗不久，接徐成章由阵地报告，卢氏已下停战令。稍迟，卢氏飭令农军停止攻击炮楼的函件也送达农军本部。乃以农军军长及县农民协会名义分别复函反对。农军军长复函称：“接奉本日贵队长来函，谨悉一是。当即一面下令敝部遵照尊意，暂停攻击；一面亲回社岗报告县农民协会军事委员会，将尊函提出讨论。结果，决定仍依照原定计划包围江匪炮楼，务必摧陷，俾存政府威信而保农会安全。”县农民协会复函谓：“敝会刻接敝农军本部转来贵队部公函，得悉尊意采取和平办法，根据第六区团总黄鄂棠提议，将与潭埭媾和”。“今敌既大举协力谋所以颠覆农会反抗政府，若遽与议和，不特深堕敌人之计，抑且深植反革命之祸根”。“应恳贵队部彻底详察，幸勿为议和之说所诱惑。”并由彭湃单独具函忠告卢振柳。

同日 上午9时，江屯团局嗾使十三乡团匪占据石马山，进攻社岗。卢振柳遂令徐成章带领铁甲车队回援社岗，无庸再来潭埭。农军亦即撤围退守。下午1时，江屯团局乘我军不备，派出团匪30余人冲入潭埭，增援江姓炮楼；另派出团匪百余人，进至罗坑凹，向拆石守卫农军射击，随冲入木古塘乡中大肆抢掠，并掳去会员杨月1名，缚往江屯团局。

1月14日 卢振柳发出召集绅商会议的布告。县农民协会应邀派出周其鉴、罗国杰、陈伯忠、彭湃为全权代表，向卢提出惩办祸首、承认减租、赔偿损失、抚恤伤毙、服从政府、恢复农会等条件。卢说：“我奉命来宁承胡代帅、廖部长吩咐，自必解决减租、惩办祸首、确保农会安全，如果能于绅商会议得之，尤为双方之福。请诸君勿疑我，先由我意做去，更听（候）数日为

要。”周等以须过五日停战期再作应付，亦不表示如何反对，复回社岗。

1月16日 上海《民国日报》报导：“广宁田主劣绅之强横，为粤省冠。此次因破坏农会，压迫农民，惹起绝大风潮。虽经政府分派大军前往弹压，犹复心怀忿恨，时图报复。对于农会所主张减租办法坚不肯行，并鼓动各处乡团，图谋抵抗。该县县长蔡某力欲从中调停，惟被劣绅包围，时多左袒田主劣绅之言动。昨该县长又为此事亲来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见廖仲恺，请设法将农会事调停和解。讲来讲去，殊不明白。廖仲恺以该县长太过糊涂，特大加教训一番，谓田主劣绅鱼肉农民，做官不当包庇。既做革命党的官，当知何为革命，革命是无调和妥协的。田主劣绅不依人道，违背政府保护农民的命令，你亟要从速秉着公理，依省政府命令做去，无庸讲什么调和不调和云云。该县长受教训一顿，只得垂头诺诺而去云。”

1月17日 黄鄂棠等竟于五日停战期间，协同十三乡、蚌溪团匪及李济源残部，无日不向拆石、社岗、荷木咀、锅元各地农会攻击，残杀农民，搜掠农村，掳捉会员，勒赎现金，截抢行人，断绝交通。未尝以停战之故，稍戢其凶。本日县农民协会特致卢振柳函曰：“自贵队长下令停战五日，布告召集绅商会议，敝会为尊重贵队长意见，下令农军退守各区防地。盖自本月十二日起至今日止，已逾停战期限一日矣，未知贵队长五日内对于绅商如何解决？但革命政府派来保护农会惩办匪徒之军队，根据江屯团局黄鄂棠来函，下令停战，召集绅商会议，本欲表示政府宽大，希图事情易于解决。敝会负责人，于十四日应贵队长招请亦表示让步，以期迅速解决农民目前痛苦”。“我革命政府保护农民之军队，本奉有解决减租、惩办祸首、确保农会安全之任务而来。虽欲向反革命派江汉英、江淮英、黄鄂棠、冯思泰等表示如何宽大，而彼逆则竟乘此倡言和平机会，肆意破坏，残杀掳掠，

无所不为”。“农民受害何可胜言。深望贵队迅予先行驱逐拦路掳掠各处匪徒，恢复交通，保护农民，确保农会，不使农民重受和平会议期间之损害，不胜迫切呼吁之至。”

1月18日 卢振柳函飭农军一律收回步哨，不得荷枪巡查道路及市场。县农民协会即日复函云：“查反革命田主正藉贵队长下令停战机会迭向农民进攻，昨函已经详述，未蒙派队保护，正在盼切，詎突来禁止荷枪巡查及勒令收回步哨命令，敝会同入殊深诧异。贵队长既不派队保护农民，又下令禁止农民自卫，确保农会安全之谓何？且敝会系根据孙大元帅发表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颁布农民协会章程组织而成。查宣言第一项明白规定‘农民协会系完全独立不受任何拘束之团体’。敝会谨依政府宣言，对于贵队长下令敝会农军收回步哨及禁止荷枪巡查命令，绝对不能接受。”县农民协会除据理力争外，以该卫士队长同在国民党指挥之下，为避免无谓之争执起见，遵令将各处派出防卫敌人来袭之步哨撤回。

同日 十三乡团匪60余人，乘农军撤回步哨，放枪突进荷木咀第五区农会会所，将会所拆毁，并撕烂党旗农旗，捣毁什物，缴去农军枪支5杆，掳去农会职员5人。县农民协会接获恶耗，当即报告卢振柳，请迅予派队实力保护农会，起回被掳会员，安慰农民。不料卢竟置之不理，致令该匪愈弄愈凶，将该区各乡农会会员家依次抄掠，男女会员流离失所，惨不忍言。县农民协会对卢不能再事容忍，决向政府要求撤办，并派彭湃往省请示办法。

同日 花县田主维持会魁首江耀中等纠率民团及土匪杀害花县农民协会副委员长王福三，焚烧县区乡农民协会。案发后，胡汉民、廖仲恺即向花县县长下达追凶缉匪的命令。（《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30日）

1月19日 广宁县农民协会为十三乡团匪拆毁荷木咀区农

会事通电各团体：“敝会同人，以该匪党如此横暴，卢队长又复坐视不救，悲愤填膺。痛苦无告之农民，以事已至此，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与该匪等作最后之奋斗，决不敢因此而稍却。尚望各团体一致协助，不胜盼切之至。”

同日 彭湃抵省向廖仲恺报告。廖说：“我早知道卢振柳不甚可靠，现在只有把他调回。”并对农民部秘书罗绮园说：“你今晚12点到我家来，把命令交你，明天早好打发彭湃同志回去，我现在去找展堂。”当晚12点交下四道代大元帅命令，内容为：卫士队长卢振柳着即回省报告，所有前方卫士队长职务暂由卫士队第一连连长谢星继代理；着替代卫士队前方队长职务谢星继、卫士队党代表廖乾五、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代表彭湃，共同组织军事委员会，关于广宁绥缉上一切军事动作悉由该委员会决定，指挥卫士队、甲车队行之；着前方卫士队长及甲车队长关于广宁绥缉事宜，悉听广宁军事委员会指挥。（《犁头周报》第13期，1926年8月18日）

1月20日 卢振柳派卫士队第二连前往荷木咀。行前卢对第二连连长廖德流说：“只要到荷木咀镇慑，不要和田主军冲突，致碍我和平进行。”卫士队第二连进驻荷木咀后出示布告称：“本连此次奉令驻扎荷木咀地方，乃为维持秩序便利交通起见。至对于农民田主双方事情，听候和平解决。”

1月21日 广宁县农民协会通电称：“卢振柳到广宁后，对于农会一切措施，过与农民愿望相背”。“卢振柳既身为卫士队队长，又声称为国民党先进党员，应如何信仰我孙大元帅主义，严守党纲，奉为鹄的，拳拳服膺而勿失。乃计不出此，对于党中保障农会宣言，视若无睹，坐令农民之受此一重出乎意料之压迫，惨不忍言。恳请我大元帅、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农民部廖部长当机立断，务将卢振柳卫士队队长一职，立予撤销查办，以平众怒而安农民。并照章开除其党籍，务使党中不良分子一概肃清，

以维本党政策而伸党中纪律。并望各团体一致主张俾救农民。”

同日 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电令卢振柳火速回省报告，卫士队交由第一连长谢星继暂行代理。卢接电后，即着谢星继将潭埗部队及出防荷木咀部队于22日全部拨向县城安置，嘱令听其数日由省回来广宁进行和议，凡事万勿躁动。随带数名卫弁返回省城。

1月22日 广宁县农民协会致电胡汉民、廖仲恺：“卢队长勾结反革命田主压迫农会，坐视毁拆农会，掳杀农民，纵贼不理。请撤办，平众怒，维持党政府威信。”

同日 江屯团匪进攻螺岗区农会，农军誓死坚守，铁甲车队及各区农军又能赶早救援，保住了区农会。计牺牲农军2人，伤4人。被团匪焚毁房屋2间，抢掠20余家，抢走耕牛数十头。

1月23日 彭湃由省城回社岗，带回代大元帅令四道和党军党代表廖仲恺令一道（命廖乾五铁甲车队党代表兼卫士队党代表），并报告东江不日有发动，大炮无法再来，现只炸药来，由地道炸毁炮楼，此次可以得手。

1月24日 广宁县农会执行委员会向廖仲恺报告称：“此次胡代帅及廖党军党代表对于卫士队之处置甚妥”。“围攻潭埗敌人炮楼之举，须俟卫士队开来社岗，军委开会后，乃能开始进行”。“敝会农军迭与反革命田主军接战，耗弹甚多，每农军一名只存弹数颗。而反革命田主空气日涨，数日来螺岗、荷木咀、黄京坑各处被祸可见。此后战事，还不知如何了结。子弹既少，何以应敌。为救急计，应请由部迅赐设法筹给六八、七九弹共二三千颗，俾厚军实而保农民。”

1月30日 广宁县农民协会为反对段祺瑞善后会议通电全国：“敝会早经认定，在今日中国混乱状态中，只有全国一致拥护的国民会议，方有解决中国的希望与可能。分赃式的善后会议，匪特与民众无关，抑且为中国最急切最需要的国民革命前途

之大障碍。敝会在革命政府之下，且当引导农民参加国民革命之时，对于北京执政者段祺瑞一手包办分赃式的善后会议，务竭尽全力誓死反对。”

1月31日 上午12时，卫士队移驻社岗。下午4时，县农会执行委员会设宴欢迎，周其鉴致欢迎词，彭湃演述国民党农民政策，廖乾五、谢星继等演说。7时，召开广宁绥缉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2月1日两路进兵潭埗。

2 月

2月1日 上午8时，铁甲车队和卫士队到达潭埗，包围江姓炮楼并监视黄姓炮楼。由彭湃带领工程队挖掘地道。

同日 粤军第三军（李福林的福军）第十七旅所部陆苏营百余人，偕匪200余人，突然围攻顺德县第五区理教乡，杀死农民职员和会员20余人，焚毁农居数百间，劫去财物、衣服、首饰不下10余万元。（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19日）

2月2日 江姓炮楼团匪发现我军挖地道，立出数十人猛冲工程队，被我军奋勇击退。牺牲卫士队队员马田1名，伤铁甲车队副排长邱炳坤1名。

2月3日 团匪以土炮炸药猛袭地道口。至下午地道挖好。6时许点燃炸药，轰然巨响，敌楼未倒。当晚由绥缉军委会据实呈报帅府，并派赵自选往省报告。

同日 潜伏江屯的李济源残部会同江屯团匪约五六百人，经企山顶（离潭埗10里）来犯，徐成章率铁甲车队20余人和卫士队一个排前去迎击，击毙团匪10人，伤10余人，敌势不支，飞向江屯而遁。与此同时，十三乡及附城东西南三区联团约600余人进窥拆石，铁甲车队卫士队及农军共百余人前往抵御，将敌击退，毙1人，伤10余人，缴获林洞上堡民团大旗1面。

2月4日 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东莞第二区农民协会拥护

国民会议通电云：“缔造民国奔走革命卅年如一日之孙中山先生，此次毅然北上，主张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我们认为此举实为救中国危急之惟一良剂”。“我最大多数之农民，今日为救国危亡计，惟有拥护孙中山先生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

2月5日 扶溪团匪200余人，十三乡团匪200余人，联合攻下螺岗区农会，焚毁会所及小炮楼3座、屋2间。

2月7日 顺德县第五区理教乡农民协会通电全国，声讨福军罪行。内称：“在青天白日之下，而竟有此凶狠恶毒之上匪，而竟有此惨无人道之军队。农民何辜？万望爱国爱民各界诸公，实力援助，代雪大冤。除呈大元帅胡省长、李军长严令所属，吊放追赃缉凶抚恤外，特此电闻，并希鉴察。”（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19日）

同日 上午7时，江屯团匪百余人及大刀会百余人突然进攻井窟，农军败退，潘永清、冯昭、吴郭林3人牺牲。卫士队闻耗驰至，敌烧职员住宅3间，掳走农军黄金梅、李文星、邱流3人而去（到江屯后亦被杀害）。

同日 潭埗黄姓炮楼高竖“服从政府”白旗，派代表来谈判，愿尽缴楼内枪以保全家宅。军委许其请，并嘱令江姓炮楼未解决前，毋得自由出入。

2月9日 赵自选由省城回来，带来了一批子弹。潭埗商人以为炸药复至，此次必较前猛烈，恐波及商场，10日派代表请求军事委员会准其前去劝江姓炮楼服从政府、缴枪、与农会讲和、承认减租。军委同意并提出如下条件：1. 投降政府；2. 在炮楼上插白旗；3. 缴械；4. 接受检查，弄清炮楼内外是否还有武器；5. 接受他们派出一名代表进行谈判。

2月11日 广宁县长转达许总司令、胡省长指示：着派代表到省署解决。

2月12日 代帅胡汉民致电李福林：“刻据中国国民党农民

部长廖仲恺函称：顺德理教乡昨日被福军围攻，经已电达在案。今晨据该乡人来报，昨晚业被攻进入乡，焚劫甚惨，乡民流离，请予拯救等情。并据该乡农会代表霍秀石等面称，军队攻入该乡时伤毙会员数人，请从严惩办各等情。究竟该军何故围攻理教乡，又何故仇视农会人员，仰该军长即电令顺德县驻防军队先停止军事行动，再呈明核办，勿稍姑纵为要。”（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19日）

同日 江姓炮楼派出代表4人，哭求军委会长官免罪，愿尽缴炮楼内枪，并允受检查，但求保护。13日江姓炮楼缴枪。14日黄姓炮楼缴枪。

2月15日 上海《民国日报》广州电：各县劣绅仇视农会案益多，省公署下令，先解散花县、广宁之民团。（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17日）

2月16日 徐成章率铁甲车队两排、卫士队一排及农军100人，收复螺岗，敌退茶坪岗。我军分三路攻打茶坪岗民团，分握该乡两端的敌炮楼乞降，随后又击溃来援之扶溪神打团（即大刀会），共掳获民团和神打50余人。18日徐率队返回社岗。

2月19日 铁甲车队和卫士队拔队回省，农民沿途欢送。彭湃等亦离广宁返省。

同日 粤军第三师莫国华部进驻广宁江屯。莫贴出布告说明来意，第一号布告大意是说他来为保护地方；第二号布告是说他闻得农军在江屯有许多骚扰，此来即系制止农军骚扰，如有何人知道或自身受到农军骚扰，可即到部禀告究办。次日在江家祠召集各乡地主绅董及商家会议，经莫亲自煽动恐吓，全体盖章捏造农军过失禀告于他。会后，地主送银800元，并烧猪2只、生鸡20只给莫，且燃放炮竹庆贺。地主旋又应莫助其伙食的要求，抽够3000元奉给。莫见地主如此优待，遂联合由清远来攻农军之土匪梁金保与地主方面议定宰割农民及压迫农会的条件。地主

们复又气焰万丈，农民不但加倍吃苦，而所有农会活动人物（执行委员）概被驱逐。（《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31日）

2月23日 广州市郊农民开会欢迎铁甲车队和卫士队凯旋归来。廖仲恺致词说，这次凯旋表示了革命的军人开始履行以生命卫护人民的利益了，并希望他们贯彻革命精神，因为革命军人离开农工是不能成功的。接着由阮啸仙报告广宁农民斗争的经过，徐成章报告作战情况。（高熙：《中国农民运动纪事（1921—1927）》，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3 月

3月2日 黄埔军校某君由海丰寄回报告，述农民欢迎东征之学生军及粤军情形。函称：“（二月）二十七日我教导团跟踪追至海丰，已无敌踪。同时粤军张（民达）师亦由三多祝来会。克海丰后，最足以令人欣悦者，惟见一般农人欢跃。本校到时，除沿途烹茶燃烛照耀外，尚饷无数酒米肉，欣欣之意，情不可却，我与军以酬报而受之。三月一日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及前农会会长彭湃来到，遂在海丰城内与市民开联欢大会，到者近三千，颇极一时盛况，为本校行军以来第一次。场中谭平山先生及政治部周（恩来）主任均有精粹之演说，复译为海丰话，聆者尽常领悟，而呈出无限之欣悦。三月二日，我军向公平圩进发，沿途遇见农民数万，多手执农会旗帜向海丰而来，赴海丰农会，并欢迎我军。诟遇我军已出发，遂在沿途摇旗鼓掌，欢呼革命军万岁不已，真诚和悦之态度，殊难以笔墨形容。闻海丰一县，原有无数农会，约有农民三十万，不幸被陈逆武力解散，并杀戮多人，因之数年毫无成绩。今陈逆恶贯满盈，退出海丰，因此海丰农会又得复苏之庆，非但农民自身欣悦，亦本党本校最堪庆幸者也。”（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22日）

同日 参加东征之黄埔军校政治部派吴振民留海丰为该部代

表，办理一切党务及宣传工作，并协助农会训练自卫军。该部并致函校长蒋介石，调宛旦平、卢德铭去海丰，协助农会训练自卫军。（黄埔军校政治部：《东征日记》）

3月3日 海丰全县农民开欢迎党军大会，到会者3万余人。在农旗蔽野欢声雷动之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俄顾问加伦、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皆登台演说。尤以许总司令对农民声明将海丰逆产生全部之半归农会，十分之三归工会，十分之二归学生会，并主张取消苛税杂捐，农民更热烈的欢呼党军万岁。许并答应将所缴陈军枪械提出40杆给农会。海丰县农会亦于是日宣布恢复。（《向导》第112期，1925年4月26日）

同日 黄埔军校政治部加派陈烈去海丰农会训练农民自卫军。（《东征日记》）

3月7日 上海《民国日报》刊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为庆祝广宁农民减租斗争胜利致广东全省农民书。书云：“此次胜利之原因，均赖农民之觉悟，知道协会为自己的营寨，又能够为协会牺牲奋斗，一致团结，共同进行。故虎绅士霸虽财雄势大，械精匪众，而农民以不屈不挠之精神赴之，终获最后胜利。然非政府檄调卫士队、铁甲车队前往肃清匪氛，亦不克至此；然非农民自身觉悟，则政府以军临之，仍不能收完满之效也。政府此次派兵保卫农民，在抑地主凶焰，实为民国史破天荒之创举。从前之军人官吏，无有不勾通当地土劣相缘为利以谋自肥，贫苦无告之农民重受鱼肉，岂敢希冀其保护。而今政府为国民党之政府，一切政策俱以国民党主义为依归。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在谋最大多数人民最大之幸福。我国人口农占十之七八，故尤以谋农民利益为国民党政策之核心。凡党政府下之官吏军人，苟不能实行党之政策者，政府必有以严处。”

3月10日 《大本营公报》第7号发表《政府对于农民运动第二次宣言》，重申政府“对于农民利益，自当竭力拥护”；再

次肯定“农民协会之性质，为完全独立之法定团体，乃根据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一次宣言，及中央党部颁发之章程而设”；指出再有从事仇恨及摧残农民协会者，“政府必从严办，不稍轻贷”；警告所有在党和政府下服务之官吏军人，“如有不遵奉党纲保卫农民利益者，政府即应褫夺官职，永不叙用。”

3月12日 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下午3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为孙中山逝世致书全国农民。内称：“穷苦的农民同胞，饱受劣绅土豪之凌侮，贪官污吏之鱼肉，不法军队之苛扰，内外奸商之侵蚀，生活艰难，未由自拔。惟中山先生之主义足以拯救之。‘中山主义’固不因中山先生之死而有所变更也。吾亲爱之农民同胞，吾侪现在、此后团结应更强，组织应更密，固吾阵垒，整吾步伐，对一切农民之敌，痛予打击，使之惊惶战栗于吾侪之前。”（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24日）

3月15日 由林苏率领之农民运动讲习所武装考察团10余人，由省出发，前往海丰考察农民运动，并带去子弹3000发，送给海丰农民自卫军。（《陆安日刊》1925年3月28日）

3月17日 海丰第七区农民宣言称：“逆党黄少雄，得陈逆派下余荫，充任第七分所长。到任以来，无恶不作，无钱不勒，市民啧有烦言。此次海丰光复，党军网开一面，不忍过事株连；彭县长尤冀该恶从此改过自新，再予第七分所长职。无奈逆党少雄，不独不悔改前愆，更敢任意苛勒，藉派军需，剪灭异己。对于农会，仇视尤深，竟因十余农民请愿细故，妙想天开，托言围攻警局，瞞报县长，率队严拿农会会员蔡举德并何若璠之父，全身捆绑……又按名挨户，向各农会员家中勒派解费。种种骚扰，无所不至……幸彭执行委员长冰鉴高悬，烛破奸宄，派农民自卫军严缉，不图竟被闻风挟款私逃……自应呈请通缉按律惩办，毋使该恶于青天白日之下逍遥法外。”（《陆安日刊》1925年3月21日）

3月18日 鹤山第一区农民协会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惊闻为农工群众解放之导师、为弱小民族独立之伟人孙中山先生遽然长逝，不胜哀悼。惟同人等决定自今日起联络我农界同胞以及被压迫群众，遵守孙先生之遗规，继承先生之精神，加倍努力，向军阀及帝国主义进攻，以完成群众所需要之国民革命。特电驰唁，不胜悲愤。”（《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24日）

同日 番禺县第一区农民协会全体会员暨第二、三、四区代表列队赴广东大学致祭孙中山先生，并以白布上书祭文曰：“生我者父母，救我者先生，而先生死矣。呜呼尚飨。”（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24日）

同日 海丰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为慎重名誉及严肃纪律起见，特发出布告称：“照得本会之设，原为救护贫苦之农民，非为集众恃势，以欺凌小民也。查近有三数不法之人，冒充本会会员或职员，以行诈骗。此种不法举动，殊于本会名誉大有关系。以后如有此等人，一经查出，当即重加责罚，决不宽贷；倘属本会会员有此不合纪律之举动，本会亦应予以相当之惩戒。”该会又因取消杂捐事发出通告云：“孙大元帅去年经下明令取消杂捐，此回许总司令来县，对我们演说，又声明取消杂捐。惟现闻外间歹徒复有欺负我们农民，到处勒收杂捐苛税之举。我们为拥护大元帅法令及总司令主张，自当一致不纳一切杂捐苛勒。”（《陆安日刊》1925年3月19日）

3月22日 宝安第二区楼村乡农民协会开幕，到会者有农民部代表黄学增、东莞一区农会代表蔡日新等，宾主约500余人。是日选举出之农会职员，全属热心之真正农民。（《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日）

3月23日 香山各界团体2万余人在学宫开会追悼孙中山。是日大雨淋漓，凉风悲飒，各农民协会会员冒雨前来参加。各界

送挽联甚多，尤以农民协会“继续奋斗”四字最为醒目。（《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27日）

同日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特别区党部由兴宁致函中央党部称：“本党（部）与校本部铤（16日）抵罗经坝。闻上人云，林（虎）军四出骚扰，人民恨之刺骨，当其退至罗经坝时，农民千余人，与林（虎）军战一时许，闻我军将到，林（虎）军始退。筱（17）日本校出发时，农民千余人在本军先头追击，直至周江墟，俱无敌踪。”（《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31日）

同日 东莞县第七区农民协会开幕，到会者有农民部代表韦启瑞、花县农会代表王镜湖、东莞县第三区农会代表邓一舟、虎门市党部代表叶翹芬，宾主约200余人，并有农民自卫军三四十名。下午2时开会，由王固础主席，各团体代表均有演说。（《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日）

同日 宝安县第一区农民协会在沙莆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约三四百人，有农民部代表黄学增、东莞县农会代表韦启瑞、东莞第一区农会代表蔡日新等。会后举行武装示威大巡行。该区农会系由海员蔡旺运动筹备成立，蔡极热心从事，故有此成绩。（《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日）

同日 《陆安日刊》报导：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为训练之党军，此次会同建国粤军出发，恢复潮汕。现该校以潮汕人民受痛日久，党军亟应设法为之解除，故特派该校政治部指导员鲁易、王逸常往潮汕普揭一带调查人民痛苦状况，并征求人民意见。闻粤军许总司令亦已通令各县妥为保护，俾利进行。

3月24日 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启事：定于4月12日各界在第一公园开追悼大会。番禺、东莞、顺德、香山、花县、广宁、海丰、增城、清远、高要、鹤山、宝安、曲江、惠阳、陆丰、惠来、普宁等县农民协会为发起团体。（《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24日）

同日 上海《民国日报》报导：广东各县农民协会得孙先生逝世消息后，同深哀悼。前经中央农民部通告各员自行就地开会追悼，故各县农会纷纷筹备。近城各县，已次第举行。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高要端源乡农民协会会员廖亚国，于去年十二月初八日夜深被该乡田主賄买无赖邓亚朗杀伤，业由该农会派员来省，呈控于省署及国民党农民部，当经省署飭令拘凶。现经该乡第二区二分署将正凶邓亚朗1名拿获，并刻日将其转解高要县署究办。

3月25日 林苏率领之农民运动讲习所武装考察团抵达海丰，受到海丰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彭湃及农民自卫军的热烈欢迎。（《陆安日刊》1925年3月28日）

4 月

4月1日 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毕业，共114人。

4月2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廖仲恺发出召集各县代表成立省农民协会的通告。内称：“自去年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拥护农民利益政纲之后，我党政府即亟图是项政策之实施，乃先后明令颁布第一第二次宣言，阐明农民运动之义蕴，与表示政府对此之决心。本部更依据吾党决议，起草农民协会章程。一年以来风起云涌，各县协会次第成立。虽其中不乏顽暴贪鄙之官吏武人，以农民一旦团结，将无以遂其饱飏之私，故其措施即不与党纲政令显相刺谬，亦阳奉阴违以图敷衍了事。至一般寄生农间，复专以欺压愚弄剥削农民以为生之乡蠹劣绅土豪，更假借各种名义，结纳反动之地方军吏，竭力从事破坏，希冀消灭此种运动之进行，藉保存彼辈在乡之特殊势力与地位。但一年内农民运动之发展，绝不因此辈之进攻而停滞不前，更有因此而愈促农民之觉悟，而团结更为坚强之势。盖农民创痛已深，要求解放之客观情状至为激切，徒以在数重压迫之下，无可奈何。若一旦寻求

得可以解脱其痛苦之径途，政府复从而加以援助，则农民以生死所关，势必将不惜一切以赴之也。查现在革命政府势力所及之地，已有协会组织者计二十二县，会员人数逾二十万。似此广大之民众，势不能无一指挥机关以为统率。章程上明白规定，有五个县农民协会成立，即可组织省农民协会。今既超越此数，更属事不宜迟。五月一日为世界之劳动节，全国工会代表行将会议于广州，届时农工必当有一融洽密切之提携。故本部决定于今年五月一日（旧历四月初九）召集各县代表成立省农民协会。”通告对各地选举出席代表之办法及进行计划，作了具体规定。（《党声周刊》第59期，1925年4月13日）

同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由农民部通告各地农民协会，酌派代表来省加入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案”。（《党声周刊》第65期，1925年5月25日）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自攻下海丰后，即着手查抄陈逆炯明等家产，昨已将该项逆产处置就绪，系以十分之五补助该县教育费，以十分之三补助农会费，以十分之二补助工会费。闻汕头等地所查得之逆产，亦照此办法。

4月5日 上午9时，黄埔军校开追悼孙中山大会，由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担任主席，出席者共4000余人，长洲农民协会亦派人参加。（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14日）

4月6日 第一次东征的革命军3月间已先后克复潮梅各县。为了推进东江的农民运动，以实力援助东江农民组织协会，是日农民部长廖仲恺特致电汕头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云：“敝部遵奉本党督促农民团结自卫，以解除一切痛苦压迫之政策，业经次第成立各县、区、乡各级农民协会，以为农民运动之进行；并以农民自卫必须农民自身组织之团体始为可靠，非今日把持操纵乡政之局绅所能代表，已函请省长通令各县，极力提倡。现在我党军势力日益发展，亟应普组农民协会，

赶办农民自卫军，以拥护农民之利益，而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特行电达，凡我党军势力所及之地，务祈积极援助，督促进行，俾吾党政策得以实现，无任企祷。”（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14日）

4月12日 广州各界在东较场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赴会团体700余，人数20余万。廖仲恺主席，胡汉民主祭。黄学增代表农界演说谓：“中山先生虽死，但他的主义是永永存在世界，他的主义是为平民利益的，他也因此奋斗而死了。我们农民要一致团结起来，拥护为民族革命而奋斗的国民党。”追悼大会宣传部发表《告农民群众》书，略谓：“中国人民之慈父、弱小民族革命之导师、中国国民党之领袖、我农民解放前途之明灯孙中山先生于去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之后，各县各乡农民均感受无限量之悲痛。我农民在此解放运动开始进行之中，猝丧此前途之明灯，其毋或疑惧惶恐而忧前途之黑暗，或更因而退缩乎？然照耀吾侪前进之途者，非孙中山先生之肉体，而为其精神。其精神不死，则前途之灯永远不能熄灭。‘中山主义’之光，将如太阳之高悬，日益昌明，永远照耀农民解放之路。”（《广州民国日报》增刊，1925年4月14日）

同日 番禺第二区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第二区农会，讨论农会进行事务，举定周少穆为委员长，黄豪为副委员长。（《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1日）

4月14日 海丰农工举行追悼孙中山大会，到者20000余人。农民自卫军武装致祭，悲壮异常。彭湃宣读遗嘱并演说。（《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3日）

4月15日 第一次东征期间，广东各县主持民团操纵乡政之局绅，竟借口筹办各乡联团，强迫农民协会加入，并征收丁捐及田亩附加捐。农民部为此曾致函省长公署，指出：“欲为农民谋自卫，非由农民协会自行组织农民自卫军，不足以收实效。诚

以农民自卫军乃真实之革命拥护者，以此次东征陈逆之役，东莞协会会员之助运输，宝安协会会员之扰乱陈军后方，海丰协会会员之作向导，协助作战，并担任后方警戒，成效彰彰。以视各乡团绅，非亡清遗老，即退职官僚，其思想行为，无一不大悖民主政体者，何可同日而语。远者且勿论，即如上年商团事变，各县乡团，欲图响应，彼辈实为主动，并拟统率乡中叛团会攻省城。其与农会会员相较，一为革命者，一为反革命者，诚判若天渊矣。政府为拥护农民利益计，为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计，只有督促农民自身团结，组织农民自卫军，以谋自卫，实不能容各县举办此种强迫农民协会加入，并苛抽丁亩捐，侵害农民之联团……希即通令各县严行禁止各乡联团强迫农民协会加入，免得农民运动进行。”是日省长胡汉民通令民团统率处及各县县长：“照得农民协会之设，原谋解放农民之压迫，增进农民之利益，与民团作用迥异，故组织办法，各具专章，制度厘然，不容牵混。乃查近日各县局绅筹办民团联团，每有强迫农民加入，并征收丁捐及田亩附加捐之举。以致农民协会之基础益陷纠纷，农民负担更为增重，核与政府设会办团及迭次对于农民宣言之主旨，绝对不符。兹准中央执行委员会函请严禁前来，自应照办。嗣后各属民团联团，务须依照定章，认清范围，毋得强迫农民加入。所征团费，亦毋许妄向农民加抽。倘敢故违，定将该团撤销，并执法惩究。”（《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6日）

同日 广东省长公署训令广州市政厅云：“现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长函开：案照农民协会章程规定，有五个县农民协会成立，即可组织省农民协会。现查已有协会组织者，计二十二县，会员人数逾二十万。有此广大民众，亟应遵章赶造省农会，以资统率而便指挥。兹已通告定于本年五月一日，即劳动节，召集各县代表，正式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于革命政府之首都广州地方。惟人数多众，非有宽大之会址不能容纳。查有本

市东皋大道第一号大屋一间，系属陈恭受逆产，尚堪适用。相应函达贵省长查照，希即准予拨为省农民协会址，并祈印发执照管业，俾会址确定，诸易进行，实纫公谊等由前来，自当照办。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厅即便转饬公安局，迅将前封陈恭受东皋大道第一号屋一间，拨交省农民协会收用具报。”（《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6日）

4月17日 顺德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有区农会3个，乡农会18个，人数4000余人。（《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22日）

4月20日 东莞各地农民运动颇著成绩，农会发展，有一日千里之势，现已成立9个区农民协会。是日召集各区代表在虎门太平开代表大会，选举县执行委员及参加省农会代表。到会者有农民部代表罗绮园、农讲所主任阮啸仙等，宾主约百余人。公推谭桂萼主席，由韦启瑞报告筹备经过情形，次由农民部代表罗绮园致训词，继由阮啸仙等演说，均能发挥尽至，鼓掌如雷。随即讨论决议数项后，选出蔡如平为委员长，谭桂萼为副委员长，蔡日新为秘书，莫萃华、邓一舟、郑鸿光、陈冬为委员。又选出蔡日新、莫萃华、谭桂萼、邓一舟、郑鸿光等为参加省农会代表。（《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5日）

同日 海丰县农民协会出席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之代表林苏、郑志云、杨其珊起程赴省，同行者有黄埔军校之陈烈、宛旦平。该三代表拟向大会提出拥护农民利益、民选县长、取消杂捐、严禁烟赌、撤销驻防军队等议案。（《陆安日刊》1925年4月22日）

4月21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汕头市党部昨接潮安农民协会报告称，县属东莆区一带农村，此次着手从事组织乡农民协会，闻入会者极形踊跃，已成立分会20余处，共有会员数千人。

4月22日 黎明时分，东莞县第三区夏岗乡土霸麦庭阶等，纠集民团土匪百余人，偕同桂军第五师所部谭启秀旅士兵百余人，突将该乡农民协会会所及各会员住宅重重包围，枪杀乡农会副执行委员长麦福肇、委员麦耀棠、会员麦事南及小女孩1口，枪伤10数人，被拘会员18人，焚毁会所与会员住宅10余间，缴去自卫军枪支10余杆，衣服首饰财物损失不下数万金。会员流离失所之惨状，实不堪言。东莞县农民协会为此通电云：“在我们革命政府青天白日旗帜之下，而有此不法军队，甘受土豪贿赂，不惜出此横蛮无理、惨无人道之举动，殊与本党党纲保护农民政策大相径庭。而该乡土豪等前藉莲溪联团局势力，鱼肉乡民，今竟纠集防军土匪民团，极力摧残农会，亦是明目张胆背叛革命政府保护农民运动第一二次宣言主旨。且该乡会员素与该土霸麦庭阶等无若何恶感，显系受反革命派利用，不惜摧残革命主力的农民阶级，暗谋摧覆革命政府。敝会惟有集合本身力量，不屈不挠，誓死反抗。但因此次无辜会员致罹惨毒，万望爱国爱民各界诸君本良心之主张，尽力援助，代雪大冤。除呈胡代帅及桂军第五师长林（树巍）严令所属吊放追赃缉凶抚恤外，特此电闻，并希鉴察。”（《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26日）

4月25日 海丰县第九区农民协会开成立会，到会之各乡农会代表41人，农民自卫军30余人。县农会执行委员长彭湃、农民自卫军队长吴振民出席并演说。（《陆安日刊》1925年5月8日）

4月26日 宝安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计有4个区农民协会、34个乡农民协会，正在筹备者达20乡。（《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日）

同日 上午12时，海丰县第二区举行各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到会者有104乡代表，县农会执行委员长彭湃出席演说。大会选举万清味等7人为执行委员。选举毕，各乡会代表提议各乡

应革应兴之事，皆由代表议决，至4点半钟始散会。（《陆安日刊》1925年4月29日）

4月27日 东莞、宝安两县农民以地理及历史上关系密切，且受帝国主义包围及军阀压迫，不可不有一种大规模的联合，以求解放。是日特在东莞霄边乡开“东宝两县农民联欢大会”。到会者70余乡，代表千余，武装农民自卫军数百，农民部特派员黄学增、龙乃武参加。会场贴满“拥护国民党”、“拥护革命政府”、“继续孙中山先生遗志完成国民革命”等标语。会场正面高悬孙中山先生遗像。上午11时开会，蔡如平演说孙中山先生事略，黄学增演说为农民运动死难先烈同志事略。演说毕全体起立默哀，唱革命歌。（《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日）

同日 《陆安日刊》报导：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以海丰农民协会成绩卓著，特电彭会长选派纯粹农民20名，加入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会长得讯后，因时间匆迫，先选出蔡文礼等10名，其余10名俟各乡农事稍毕，即当再行选送。

同日 正午12时，海丰县第八区农民协会开全区农民联欢大会。会场两边悬农旗与党旗，中挂孙总理遗像，四周贴满标语。到会者有800余人，向孙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由陈佐邦详述农民痛苦，应团结之必要，并说明农民协会之利益；彭小杰详述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剥削农民种种罪恶，及国民革命之急切；吕濯之说明农民在社会上之重要，而地位反居低下，乃是天下最不平之事。听者精神奕奕，顿为醒悟。（《陆安日刊》1925年5月8日）

5 月

5月1日 上午9时，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东大学礼堂开预备会议，公举农民部代表罗绮园为临时主席。先由罗绮园宣布报到代表人数共117人（其中农民部5人），是日依时

到会者 102 人，分别唱名介绍各代表相见毕，开始讨论并通过事项如下：（一）通过会议规则 12 条；（二）推选廖仲恺、杨其珊、罗绮园、阮啸仙、邓贯香、蔡如平、林朝宗、蔡德旺、罗国杰等 9 人为大会主席团；（三）推举邓一舟、黄学增、蔡日新、阮啸仙、罗绮园等 5 人为提案及起草委员会委员；（四）推举谭伯翘、梁次狂、郑志云、阮啸仙、何友述等 5 人为修改农民协会章程委员；（五）推举邓一舟、黄学增、罗国杰、阮啸仙、罗绮园等 5 人为决议审查委员会委员；（六）推举蔡日新、郑志云、冼雄标、何友述、蔡德旺等 5 人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七）修改议事日程，主席提出缩短日程为 5 日，众赞成；（八）通过组织主席团办事处，下设秘书、宣传、事务三股。（《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5 月 5 日）

同日 上午 10 时，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参加在广东大学操场举行的广州庆祝五一节集会。大会由胡汉民主持并致词，继由国民党代表谭平山、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奥士脱洛夫斯基、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代表张特立（即张国焘）、林伟民、邓中夏、邓培、孙燕南（女）、农民大会代表黄学增、杨其珊、青年军人联合会王一飞、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等人演说。会后，全体出发大游行，工农两会代表为头一队，10 万人沿途高呼口号，声震全市，观者途为之塞。（《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5 月 4 日）

同日 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主任为谭植棠。

同日 晚上 7 时，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农民大会全体代表在广东大学举行联欢会，公推廖仲恺、杨其珊、蔡德旺、苏兆征、邓少山、梁子光等 6 人为主席。廖仲恺代表国民党致词，谓“工农利益与革命是不可分的”，号召工农联合，一致奋斗。出席大会的约 1000 余人，至 12 时始散。（《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5 月 4 日）

同日 晚 12 时，东莞县第一区霄边乡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突被桂军第五师谭启秀旅之黄连长率队包围，意图缴械，幸该乡农军知觉，未被缴去，而农军筹备处各种物件，均被抢劫一空，并掳去会员 14 人，勒赎万元，并声言要捉拿县农会委员长蔡如平。（《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5 月 4 日、5 日）

5 月 2 日 上午 12 时，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及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共同在广东大学大礼堂举行开幕式，除两会代表外，来宾到者甚众，合计约 1000 余人。推出廖仲恺、邓贯香、刘少奇、苏兆征、邓少山、王一飞等 6 人为主席。由秘书长邓中夏报告工农死难诸先烈姓名事实，全体起立纪念诸先烈及孙中山先生，静默 5 分钟。接着秘书长报告两会出席代表人数。次由劳动大会代表张特立报告《工农联合会的意义》、劳动大会邓中夏报告《中国劳动运动状况》、农民大会罗绮园报告《广东农民运动状况》。报告毕，中国国民党代表廖仲恺演说，略谓：“国民党与工农利益是分不开的。工农要有他自己的坚固组织，同时亦要国民党成功后才有工农集会结社之自由，接着工农利益乃能达到。本党认定此点，所以无时不帮助工农组织而奋斗。去年商团事变，本党帮助工农不惜以全力对付，及广宁农民减租运动，本党竟用大元帅府的卫士队去助农民打仗，都可见本党与工农利益是分不开的。本党党纲对于工农利益已有很明白的规定，同时亦在事实上表现出来。所以工农与本党要共同努力去实行国民革命，然后开大会乃有意义。”接着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奥士脱洛夫斯基、湘军讲武堂堂长陈嘉祐、青年军人代表吴明等演说。演说毕，由主席致答词，唱国歌，奏乐，高呼口号，摄影而散。（《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5 月 5 日）

同日 晚上 6 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假座亚洲酒店二楼欢宴工农两大会代表，军政界到会者有伍朝枢、朱培德、吴铁城、宋子文等数十人，国民党中央党部职员自秘书以上均出席。

由廖仲恺主持并致词，略谓：“今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至诚至敬之意，欢迎全国工农代表暨各来宾，并望经此次各代表大会之后，即将吾人此后对于革命之战略计划研究清楚，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4日）

5月3日 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全体代表出席。听取罗觉关于中国最近政治经济状况的报告。接着，东莞县代表临时报告5月1日晚桂军谭启秀旅包围该县第一区霄边乡农民协会，拘去会员14人的情况。报告毕，各代表非常愤激。大会以全体代表的名义致谭启秀电云：“代表等正在广州开会，忽得东莞第一区霄边乡农民协会报告东日晚突有贵部黄连长率队到乡无故捕去会员蔡吉等14人，大会闻报，至深骇怪。经全体决议先行电请贵旅长立令释放被拘会员，及惩办该不法连长，以维政府保护农民威信，并盼电复。”（《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4日）

5月4日 广东农民大会联合全省代表往谒代帅胡汉民，请求即电谭启秀立即放人，并惩办不法之军官。（《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5日）

同日 彭湃、吴振民等率海丰农民自卫军及县农讲所学生共百余人，全副武装开赴陆丰县城。县长徐健行积恶心虚，闻风先逃。（《陆安日刊》1925年5月7日、11日）

5月5日 陆丰县农民协会召集各界在附城开全陆公民大会，到会者达3万余人，一致举手表决驱逐徐县长。县农会曾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胡省长等撤办徐县长，并保护农会。（《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30日）

5月6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在广州召开工农两大会通电全国工农同胞谓：两会“决议一致加入革命战线，与本党共同奋斗。本党除向两大会表示谢意外，并希望全国农工加紧组织，扩大革命力量，以促国民革命之成功。本党亦当训令党员，

依据政纲扶助工人农民团体之发展，以副全国工农之望。”（《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7日）

5月8日 广州学生联合会假座广东大学礼堂，欢迎工农两大会代表。1时开会，廖仲恺、陈其瑗、吴铁城、戴季陶等相继演说，农工学代表亦均有演说，大意谓我们农工学须作一大联合，去做革命事业，不可有阶级之别。（《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3日）

5月10日 上午10时，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开会，议事日程为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政治问题提案、经济问题提案、农民教育问题提案、农民自卫军与民团问题提案、农村合作运动提案、农民协会今后进行方针、拥护革命政府宣言、全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依次讨论通过立案。各代表对于政治问题决议案非常满意，鼓掌之声不绝于耳。（《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1日）

同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编的《党声周刊》第63期发表许崇智致中央党部函，提出东江收复后的施政措施：“敝军东来，为民众谋解倒悬，当为地方发扬自治，援助工人农民组织巩固之团体，以护卫本身之利益”。“凡夫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种种，于本军势力所及之地，一切自由，无稍限制。”

5月11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国民党农民部长廖仲恺，现以各属农民多已纷组协会，以谋解放。乃近据东莞农民协会函称：当地劣绅对于农民运动辄为破坏，甚至瞞请驻防军队压迫等情。廖部长当以援助农民系为本党之责，因特函请驻防军队谭启秀出示妥为保护。

同日 番禺县鹿步司所属珠村乡农会开成立大会。主席宣布开会后，由特派员郑千里演说，县农会代表监视选举，即席选出潘文治为执行委员长，潘苑添为副，潘佐荣为秘书。同时开会员大会，议决组织农民自卫军，并派人来省入农民运动讲习所习

业，并严禁乡内烟赌。是日邻近各乡皆有乡人群来观听，热闹非常。（《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5日）

5月12日 陆丰县农民协会致电汕头许总司令、蒋校长，广州廖部长、胡省长及省农民协会，内称：“陆丰县长徐健行，在逆受贿卖官、苛勒种种罪恶，经详前电。詎徐县长恨控，竟电令陆丰县署王总务科长、张队长严办农会，幸县农会诸职员闻觉急逃，方免被拿，虞（7）日已被张队长带队搜劫会所，损失甚巨。各区乡农会亦同时多被派警解散。似此违背党章，顽抗上令，不即撤究，何以儆效尤而维法纪，乞迅赐明令以慰群情。吾党幸甚，地方幸甚。”（《陆安日刊》1925年5月13日）

5月13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代大元帅胡汉民令各军总司令云：“现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长廖仲恺呈称：现据惠阳第三区农民协会会长谢少宗、杨国辉、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钟灵报称：紫金县逆军团长温宗和部下三百余人，盘据县城，被我农民自卫军百余人，协同建国军广东别动队司令兼紫金县长孙统刚、建国潮梅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邹镇强等分路进攻……遂于四月廿六日克复。但因邹部先入，我军随到，竟被邹镇强阻止入城，并且不准驻扎附近地方，组织农会、张贴标语及印刷物，视为不合，要将我军驱逐，只得暂退离城十里乌石约。查逆军现退至蓝塘，即改头换面，高悬革命之旗，派人请求滇军收编，声言返旆报复，谣诼纷传，民心惶惑……现在我军伙食困难，农会组织非常困难。希请迅赐转恳分令各军，如遇逆军温团即行将其缴械，不得收容，以免借革命军名义，残害农民等情前来。理合据情转呈察核，伏乞俯如所请，迅赐分令妥办，以谋发展农民自卫而符本党解放政策，实为公便等情。据此，应予照准。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总司令转飭所属一体知照。”

同日 建国桂军第五师兼宝安太平清乡行营于日前颁布民枪领照条例，对各类枪支分别征收照费8元、4元、2元、1元不

等，限5月15日以前各民枪一律烙印领照，过期加罚；如不烙印领照，即以私藏军火论罪。是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宝安县农民协会致省长胡汉民电，内称：本县农民，历受英国帝国主义、陈炯明各军阀、一般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地主土匪等几层压迫，痛苦达于极点。“其间几经困难，始稍能购置自卫枪支，以苟延残喘。今林（树巍）师长奉令办理清乡，检验自卫民枪，用意在于清剿匪类，以安良善，本会固所佩服。但苟如林师长所定领枪照条例，缴纳照费，则全体农民已购有枪支者，因纳照费而损失巨款；未购有枪支者，慑于纳照费而不敢购，是不啻禁止农民武装。夫国民革命，首先必要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参加，而农民参加革命，首先必要武装。日前本会所属薯田莆、马山头、合水口、周家村各乡农民自卫军，协同林师击败陈军，即证明我农民已能以武装在革命战线上行极热烈的革命工作矣。本会为领导农民群众、贯彻国民革命起见，认为农民之缺乏枪支，政府正宜设法以辅助之，不应稍予以不便。故对于林师长发行此种领枪照条例，特召集全县代表大会议决，提出反对。万请政府即根据国民党党纲，飞令林师所规定枪支领照一项，对于我农民自卫军及农会会员自卫之枪支，一概免领，不胜切祷之至。”

5月15日 《广州民国日报》公布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第一届职员的结果，蔡如平、彭湃、阮啸仙、黄学增、李爱、杨其珊、罗绮园、黄雄标、苏南等9人当选为执行委员，王军、韦启瑞、萧何源、朱观喜等4人为候补委员，并请廖仲恺、谭平山为该会顾问。

5月17日 新学生社社员黄晓元担任海丰县农民协会宣传员，在公平乡宣传，是日上午10时被粤军第27团李营张连不肖士兵击毙。事后海丰新学生社分社协同县农民协会向该团提出严重交涉，经县长彭汉垣调停，商妥办法：将张连全连长官撤差，将肇事士兵枪决，给恤费300元，由该团布告经过情形及处

置方法。当经双方承认，事遂了结。（《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27日）

5月20日 廖仲恺在《革命周刊》第一期发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指出：“那一派反对较多数人民的利益，便是反革命派”。“占我国人口最多的是农工阶级，那一派人替农工阶级打销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与军阀帝国主义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

同日 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十五次会议提出查办惠来、陆丰二县县长案，会议决议由农民部调查事实，缮具报告，提出中央会议，以便转许总司令严行查办。（《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6日）

5月27日 中山县农民协会、县工会联合会暨全体农工发表通电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议收回本邑行政权，由党施行模范政治，实行党纲，训练实际人才，以期建设一模范县，原冀为我八十万邑人谋利益，用副先大元帅改造香山为模范县之遗志，法美意良，至为钦佩，凡有血性，莫不赞同。詎竟有土豪劣绅之流，捏造事实，布散流言，谓‘民党收复政权，实行共产’，摇动人心，藉端破坏。于是有中山县地方自治筹备会之设，笼络乡愚，假造民意，一方面通电拒绝中央派员，要求收回成命；一方面派遣代表请愿中央立予以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诸权。迹其手段，无非欲伪托自治之名，以行其割据之实。此种伪自治机关，其本身既不能见容于政府，其创设又未得各界之同情，居然冒地方之名义，欺压群众，瞒骗官厅。殊不知我邑最大之职业团体如农民、工人、学生等均无参加该会之表示，其何以有代表全邑公意之权能？似此违法乱行，实为革命建设之障碍。我农工两界素以爱国为前提，拥护革命政府为职志，对于此种伪自治机关，绝不承认。特电陈明，尚希垂察。”（《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29日）

5月28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番禺夏园乡自去年成立农会，对国对党均有热烈的努力。日前福军派队赴夏园乡围捕劫匪，但匪党早已遁匿无踪。军队竟将乡农会职员3人捕去。该会大愤，群请县农会转请农民部函粤军总部严加取缔，军人嗣后围捕不得妄拘良民，并布告保护各级农会。现许总司令经函复已飭所属照办。

5月29日 花县农民协会为东莞县第三区夏岗乡惨案致电东莞县农民协会：“该土霸土豪劣绅及桂军谭启秀旅所属，胆敢在革命政府以下青天白日施其生番不及之野蛮举动，较去年双十残杀之商团尤甚。敝会誓为后盾，铲除此种反革命派，希贵会坚持到底，以为农民请命，不胜哀祷之至。敝会除致电东莞县农民协会援助外，仍希各界同胞予以援助，并请革命政府即照东莞县农民协会所请，从速办妥，以安农民而维革命威信。”（《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2日）

同日 广宁县农民协会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胡代帅、各军总司令谓：“我农民工人及一切被压迫者，为要保存粤省和平，必要拥护现在之革命政府，打倒希图危害革命政府之段祺瑞、唐继尧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因此，本会敢领导全县农民誓作革命政府之后盾，尤望各界一齐起来，打倒希图危害革命政府之公敌，以期得到粤省之真正和平。”（《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4日）

5月30日 《广州民国日报》刊登陆丰县农民协会致省农民协会、各县农民协会电称：陆丰县长徐健行，“竟目无党政府保护农民之政策，胆敢在青天白日底下，公然将农会解散，与叛逆陈炯明同一毒手段，其罪实不容诛。此等不肖党员，苟不严肃办，实无以肃党纪而警赃官。我等除一面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省政府严办外，诚恐力量薄弱，还请贵会极力援助，俾早达驱除此獠而利会务进行。”

5月底 顺德县农会委员长郭竹朋因反对民团抽蚕茧捐，被该县第一区东吴局捕拿送县留押，并抢劫农会财物印信。虽经国民党农民部电令该县放人，但仍置之不理，竟至激动农民公愤，遂召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解决此事。县长邓雄闻讯知众怒难犯，农民团结之可怕，卒至放人了事。（《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22日）

6 月

6月1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拥护革命政府宣言。宣言表示：“誓与革命政府通力合作，扫除一切反动势力”。经大会一致议决，“无论现在与将来，其有图危害现革命政府者，吾侪当号召全省农民，执锄耰为政府后盾。”宣言还从赋税、民政、吏治军纪、经济文化四个方面，提出农民目前最迫切之要求，希望得以实现。

同日 番禺县农民协会亦发出宣言，誓以全力拥护革命政府，驱除一切反革命者。（《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3日）

同日 广东省农民协会为“五卅”惨案致电上海全体市民谓：“英日帝国主义者在我国领土之内，既纵容厂主残害工人，复枪杀无武装群众，野蛮暴虐，非复人类行为。在被帝国主义加紧进攻中之中国人民，应一致团结为民族革命作战。我粤农民谨以血诚深致哀唁于被杀害群众之前，并誓以全力为诸君后盾。”并致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各团体、各报馆：“尚乞号召群众集合革命力量，一致声讨英日帝国主义者之暴行，以打倒帝国主义在华之特殊势力。”（《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2日）

6月2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省农协执委会为声讨陆丰县长给各农会的通告。通告称：“查各县农会正在成立伊始，身为国民党党员及服官于革命政府之下者，应如何恪守党纲，尽心维护。乃该县长独丧心病狂，因贪残渎职，为全县公民所不容。

于是老羞成怒，派兵解散该会，并劫掠会中文件器具银物，搜捕该会职员。如此倒行逆施，实属穷凶极恶，若非严惩，则农会之前途势必深受其影响。事关重大，除由本会通电，并予以实力之援助外，特此通告，希即一致通电援助为盼。”

同日 广州各界万余人，在广东大学操场举行援助上海同胞及反抗英日帝国主义大会。省农会代表黄学增担任大会主席团主任，国民党代表谭平山、全国总工会邓中夏等人演说。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3日）

6月5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致国民党函云：“自陈逆败窜，贵党执政及改组以后，确定辅助农工之政纲，一年以来，农民公开组织之发展，遂有一日千里之势。本大会谨以纯挚诚恳之情向贵党表示谢忱及革命的敬礼。惟吾侪尚有怀疑不解者，及一年来吾农民不断的与压迫吾侪之地主劣绅斗争，而地方官吏乡村土豪以及驻防军队等，助纣为虐，以摧残农会为是，往往自称国民党员，或政府所统率之军队。不悉在贵党内是否有此种违反贵党之党纲、背叛贵党主义之党员，但吾侪农民反因此而非常之疑惧。故本大会议决，请求贵党严密查究，对于此等不肖党员，即应实行贵党纪律，尽量肃清。盖必如此，然后始能保证贵党辅助农民之政纲施行无碍，必如此然后农民始不怀疑。”

6月10日 海丰县农民协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及许总司令、蒋校长等称：建国潮梅军第四路司令陈保群仇视农民，先后掳去敝会会员陈成干等4人，备极苛待。竟于支（4）日召集其所部将第六区区会抢劫一空，掳禁职员何亭成，将其毒殴，生死未卜。现陈保群尚住陆丰碣石，解散碣石农会，又掳去职员数人，并集中部队，谋破坏海陆丰两县农民协会。海丰农军人少，势难兼顾，全县农会危在旦夕。“窃政府对于农民运动第二次宣言明白规定，不服党纲、不保卫农民利益之军人，褫夺官职，永

不叙用。乃保群竟在青天白日之下，迫勒良民，掳禁会员、职员，实属违背党纲，且勾结逆党，图谋不轨，非从严撤究，何以消隐患而维党纲。故特电请设法迅将保群之土匪式军队解散撤究，并着其放回被掳会员、职员，不胜盼切之至。”（《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17日）

6月11日 驻防中山县粤军第三警备司令吴泽理所收编之土匪林才等，会同英国浅水炮舰罗便号，劫掠第九区横档乡，英舰发炮160余响，焚烧民居700余家，杀伤掳掠100余人，案情重大。惨案发生后，农民部和省农民协会迭次函请政府严办。（《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8日、8月18日）

6月12日 革命军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收复广州。在杨、刘叛乱期间，各县农团纷呈大本营愿联合讨贼。（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6月14日）

6月15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番禺夏园珠村两乡农民自卫军，在此次反革命作叛期间，竭力起来与革命政府合作，为革命军作向导与后方警戒、护运辎重等工作，殊为热诚致力。日昨由郑千里、潘文治等率两中队沿途向广州市前进，搜索残余叛党。是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宿营，翌晨拔队回乡。

6月16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惠阳县平山区农民协会以党军回师广州，6月3日路经平山，即召集各乡农民协会武装会员700余人，欢迎党军，表示兵农联合。翌晨党军向淡水进发，凡属农会职员及会员均踊跃自愿充当挑夫者，达千余人以上，多数挑至石滩、东莞，当此暑日炎炎跋涉300余里犹不觉其苦。

同日 为促成革命政府最近军民财政统一的主张，黄埔军官学校与各界代表在九曜坊教育会讨论向革命政府建议案。广东农民协会代表提出23条建议，包括：保障农民协会权利，保护农民利益，取消田税外一切苛捐什税，规定最高田租额，发给农民

耕地，取缔劣绅把持农会，禁止一切民团抽收什费强迫入团，解散一切反革命商乡民团，禁止军队拉夫、就乡筹饷、占住民房、擅收枪照费、藉清乡枪杀农民，撤换不照政府命令之官吏等。顺德县农会建议3条，即：取缔高利借债，释放现在所有被押之无辜农协会员，从速解决各县农潮以慰农民。会议听取东莞县农会代表报告谭启秀旅勾结土劣制造夏岗乡惨案后，群情愤激，旋议决请政府将谭撤职严办，以儆将来。（《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18日、22日）

同日 制造1月18日花县惨案之祸首江耀中等，恃其财多势大，勾结前谭、董两县长，常与往来。而该两县长惟金钱是视，置广东省长及农民部廖部长命令作为一纸空文，不为追凶缉匪，反美其名曰和平会议。杨、刘乱作，董前任被建国攻鄂军程潜总司令因其附逆扣留查办。嗣以地方治安必要一相当人员充任，乃请县党部择一承乏。于是县党部决定荐党部常务委员卢季循为花县县长。江耀中等反革命派见卢县长系国民党员以为不利于己，屡次召集田主维持会各人秘密会议，出款7000元收买土匪及乡团，于本日进攻县城，夺去附逆县长，声言不抢商民财物只提卢季循及前农民协会委员长侯凤墀。嗣经程总司令闻报，调队会同卢县长进县城剿匪。各人闻风溃散，卢县长复任。（《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30日）

6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十八次会议就广东农民协会代表117人函告全省农民加入本党，并请严惩压迫农民之军队及党员案，决议交农民部拟复函，并拟训令各党员之服务于军队及行政机关应注意保护农民。（《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5日）

6月20日 《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广东省农民协会宣言称：“本会痛惜此次各地同胞惨遭屠戮，并深恨帝国主义平日种种侵略压迫，誓率领我广东二十万有组织的农民，与各界同胞联合一

致，为上海、青岛、汉口各地同胞之后盾，竭力与蛮横无道之帝国主义者奋斗。”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此次杨、刘勾结段、唐，冀图推倒革命政府，各界人士无不愤激，共起致讨。革命政府之能于最短时间将拥兵数万之杨刘二逆尽数歼灭，一方面固由革命军之能奋勇杀敌，他方面则由农民工人之热烈帮助。兹将各县响义之农民自卫军共起讨逆之概况分述如下：（一）番禺，此次党军进讨杨刘暴军开到番禺珠村时，珠村、夏园、新村、沙涌各乡农民自卫军纷起响义，共讨暴军；12日党军进城时，并有农民自卫军80人随来。（二）南海，6月6日省垣战事爆发后，佛山南浦农民协会即召集农民自卫军200余人，开向深村石湾一带之滇军进攻，拟将之扑灭。时滇军闻耗极为惊恐，后因福军已先于一点来到将之缴械，故南浦农军开到时滇军皆已四处逃散矣。（三）顺德，此次杨刘叛乱，该县农会闻讯，甚为愤激，当省垣剧战时，曾召集农军千余名拟来省助战，惟交通断绝，不能出来，省农民协会曾先后得到该县报告，嗣因省垣亦已抵定，遂即中止来省。（四）东莞，东莞宝安地属毗连，且为东江军事必经之地。当杨刘逆迹已彰、战事尚未爆发之前，即由该两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开联会，筹划应付，即时组织临时军事委员会，编练农民自卫军3000名，请陆军军官学校派学生4人前往教练，预备与东江回来之革命军共起讨逆，而对前方及防军军事消息，时派人四出密探。当党军由虎门出发石龙时，关于带路输送无不努力效命。因为杨刘败溃迅速，尚无在东宝两县地方作战，该农军无不以不获参与战斗为恨。

6月22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广东省农民协会对粤重要宣言称：“此次战事胜利之速，盖出一般人意料之外。此虽由党军用命，为党奋斗，伟烈丰功，昭然道路。然非吾侪农工阶级从中辅助，亦难获此最善之效果，亦为世人所共见闻者也”。“吾

人之目的在打倒一切反革命派之后实行政府最近发表之宣言，谋军政、民政、财政之统一，依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所规定最低限度之政纲以行使政权。而吾侪农民尤冀望政府能实行吾侪之要求，以纾众民之积困也。”

6月23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此次杨刘叛乱，各乡农民协会皆一齐起来帮助革命政府作战，如担任后方警戒，输送粮弹，探报敌情，无不努力效命。革命政府之能以最短时间歼灭杨刘二逆，各县农会农民帮助之力殊属不少，而清远农民之勇往热烈赞助更为难得。当北路滇军朱总司令培德所部讨伐逆军开抵清远时，第二区农民协会有会员122人，甘舍弃耕种，不辞劳苦，自愿充当夫役，代为输送粮弹，日昨并随朱总司令直捣省垣。中有马颈乡正执行委员长赖成就，于11日早抵白云山时因负劳过度殒命，其拥护革命政府之热诚，殊堪令人佩服。当道以此班革命农民，此次讨逆，备著勋劳，特赉赏200金，以资鼓励。

同日 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援助沪案示威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突遭沙面租界英法军警射击，当场死52人，重伤170多人，轻伤无数。省农民协会为沙基惨案发表宣言，强烈谴责这一暴行。（《工人之路特号》第14期，1925年7月7日）

7 月

7月1日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

7月3日 广东省政府改组成立，宣言“保护农民工人利益，扶助其团体组织，以谋其发展”为施政方针之一。（《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4日）

7月6日 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致电国民政府各部长、各委员及广东省政府各厅长：“本会谨以纯挚诚恳之意，代表广东二十二县有组织之二十余万农民，庆祝此决心为民族解放

而奋斗之国民政府成立，同时并望广东省政府能于最短期中，根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内政策之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保护农民利益之宣言，如改良农民生活状况，保护农民团体并扶助发展诸义，切实执行我等农民目前最低限度之下列要求，以苏吾侪农民之积困。”通电并重申了农民在赋税、民政、吏治军纪、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最低要求。（《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7日）

7月7日 平定杨刘叛乱期间，广宁农军进驻江屯，以防范滇桂溃兵入境，并恢复前被拆毁之江屯区农民协会。不法劣绅冯月庭、江耀南等招集土匪驻扎江屯塘角冯楼，屡与农军挑衅。本日上午4时，竟从清远、阳山各处购买股匪600余名，联合驻扶溪塘角土匪共900余名，围攻江屯农会。农军扼守抗拒，然以众寡悬殊，战至4小时之久，卒被敌人冲入江屯墟内，农军一律集中旧团保局南楼坚守。（《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4日）

7月9日 坚守江屯农军接外援讯，接连冲锋出楼数次，敌匪弹如雨下，旋复退入固守。军事部主任欧礼挑选冲锋队30余名，直冲而出，被敌匪机关枪当场轰毙，一时尸陈街巷，血肉横飞。敌匪复用大炮轰击，全楼震动，情势危急。（《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4日）

同日 广宁县农民协会通电称：“望中国国民党中央及省政府体念为拥护革命政府而牺牲之人民，速调党军前来救援而解倒悬。尤望社会人士主持人道，对此不法地主劣绅一致声罪伸讨，俾诛不法，以救农军而保农会。”（《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4日）

7月10日 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四次会议，就省农民协会为广宁江屯农会被土豪勾结土匪纠合千数百人，焚毁农村，占住农家，情形甚惨，请党政府克日派兵剿匪保护农民案，决议先派甲车队前往。（《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

月23日)

7月11日 据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许崇智提议，第四次省务会议议决以省政府名义函请军事委员会及各军总司令飭驻防各军，宜负保护人民之责，勿得骚扰。并议决以省政府名义函请军事委员会对于绥靖地方、肃清匪患各计划，早日议定，以便实施。会议对蠲除苛细杂捐、禁绝全省烟赌、整顿吏治及扶植地方自治、保护农民工人利益等事项，议决由省政府令主管各厅早日提案，以便实施。（《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第1册，广东省档案馆1987年）

同日 广宁江屯农军驻楼为敌匪攻陷，农军伤亡惨重。敌匪又向潭埗农军进攻，农军则以敌势浩大，退回社岗扼守，潭埗复被地主占领。广宁县农民协会再次通电称：“盖自江屯失守，各区农会震于地主声势浩大，风云日趋紧急，反动厉害，为敝会成立以来所未有。现我军虽坚守社岗拆石，然而粮食子弹均无着落，焦灼万分，而地主方面，仍复日日增长，势至危急。请迅设法派队到援，同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接济，并希各界同情援助，否则各区农会恐难保存。”（《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2日）

7月13日 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报告：广宁农民自卫军在江屯被土豪劣绅反动武装围困，已派第三师警备队前往以兵力解围。会议对廖仲恺的处置予以追认。（《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转引自《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下列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七、四十八次会议条目，均转引自该年谱，不再注明）

同日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议就广宁农会电称匪势浩大、农村被毁、请速救援一案，议决交广东省政府迅速办理。当经广东省政府议决转行军事厅、农工厅办理。（《广东省政府公报》第3期，1925年7月25日）

同日 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就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中正、党代表廖仲恺呈称：宝安农友被土匪及谭启秀部队肆行残杀，请查办案，决议请省政府军事厅查办。（《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8日）

7月14日 广东省政府举行第五、六次省务会议，财政厅长廖仲恺提议委任黄居素为中山县县长。议决该项委任月杪发表。廖并提议：由省政府布告准中山县农民自筹自卫，取消一切征收沙田自卫费。议决由省政府令行民政、财政两厅会同布告，飭令中山县长遵照办理。为此，7月16日广东省政府下达第60号训令，令民政财政两厅长会同办理。（《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第1册；《广东省政府公报》第2期，1925年7月18日）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中山县各乡区农民年来被沙田自卫总局、民团联团总部及土匪等重征暴敛，计每亩田捐费有30种之多，负担已极苦楚。最近又变本加厉，更附加剥敛，农民每亩田至7元2毫之多，且高搭棚厂，分遣匪类压迫农民，至一星期内将所有捐费充令缴清，否则杀人焚屋。县农民协会见此情形，日昨特联合各乡区农民协会代表10人来省农民协会报告，协同省农会代表分赴省政府、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请愿，将各捐费取消，将沙田归农民协会自筹自卫，并派兵去剿办土匪。至月前土匪林才等勾结英舰轰杀横档乡一案，各代表以事关国体，并联赴外交部请愿向英国领事交涉。

7月15日 东莞第二区中堂塾乡农民协会致国民政府军事部长许崇智电称：“本会会员陈壮，于本月四日下午五时忽被福字团防军营长陈翼墀、副营长王鹤琴、土恶陈棠阶等无故掳去，困押营部，私刑拷打，肆行勒索，同时并藉故遍搜农会会员住家，骚扰不堪。现值收获时期，各会员在其压迫之下，均不敢回乡收割。当此政府实行整顿军队之际，而竟有此土匪式军队，违

背政府保护农民之宣言，且复霸夺农田苛抽捐亩，藉名检查，实行抢劫，破坏农会，谋害会员，苟任其如此行为，则我辈农民终无死所。敬祈许部长速电该营长吊放，并将该营长查明按律严办，以安农民而儆效尤。”（《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6日）

同日 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致广宁农民书云：“政府对于此次惨案，亦自必有相当办法，断不容敌人过于猖獗。因为现政府是革命的产物。现政府得以成立，得以维持，全靠工农与革命兵士的势力与革命精神。你们进驻江屯之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奉行省协会号召拥护革命政府通告之实行防堵刘杨之窜入。今遭失败，是革命的失败。现政府断不能自外于革命群众，熟视而无所睹的。”（《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7日）

7月16日 奉命赴广宁之农民部特派员到达县城，即分谒县长蔡鹤朋及第三师警备司令莫国华，但此两人皆在江屯变故发生时返广州，不回县署。只有总务科长陈传孝接见，陈云：“此次江屯农军被围，县署得农会报告，极想援救，但于手上无兵，只有请第三师莫部派兵。”第三师则由参谋长何其瀚接见，何说：“此次江屯农军被困，早有所闻，极想去救，但无伙食不能派兵。”两方都说出客气不负责的话。特派员当即将廖仲恺部长所定三个原则条件提出：（一）派兵到江屯击退冯月庭等匪众；（二）拿办祸首冯月庭等及交还被缴农民军枪支；（三）江屯交还农军驻扎。陈传孝以县长不在署无兵力或者可到第三师莫部去商量一下为对，何其瀚则直以此三条件未有师长命令，且莫司令不在部不能办为对。（《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3日）

7月18日 《广州民国日报》公布农民部长廖仲恺为中山县横档乡惨案致国民政府函称：“查此案业经农民协会派员查报属实，分呈军事部解散新编匪军、缉匪惩办暨外交部迅向英国严重抗议，奈迄尚未见答复。此事关系重要，未便缓延。且查该英国浅水炮舰，常湾泊在中山县小榄濠步海面，平日接济匪械，以

致匪氛日炽，已属不法。且外国战舰游弋内河，侵犯我国主权。此次复敢协助匪党，用炮猛攻，酿此惨剧，殊堪发指。为此函达政府查办，希迅速向英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以维国体；一面令行军事部，刻日解散匪军，严缉著匪林才等归案惩办，并祈见复，至纫公谊。”

同日 广东省政府举行第八、九次省务会议，民政厅长古应芬提议请委任李绮庵为广宁县长，议决令委。古并提议请将通缉李济源一案取销。会议议决函民政厅传李济源来省陈明经过情形候核。消息传出，李济源即招兵千百预备出山，广宁地主欢呼雷动。（《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第1册；《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3日）

7月19日 农工厅长陈公博在省政府招待各界会上演说谓：本政府为实现党纲之政府，对于农工利益之保障，势在必行，不独负保护之责，抑亦负指导之责。又谓：现在农会纠纷之事日多，其故缘于被乡绅佃主压迫而来，而亦农人运动初期不可免之实状。并表示农工厅将调查农工会之组织和已入农工会之人数，一俟调查完毕，即从事于整顿农工会之会务。（《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日）

7月20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对英舰炮轰中山县农民一案，决议派省农工厅长陈公博、中山县长黄居素及外交部、军委会代表各一人组成调查委员会，由军委会派得力军队随同前往中山调查；决议赠给海丰农民以军械及服装；广宁江屯事件，由中央农民部及军委会各派代表一人前往调查。

同日 花县农民协会发出声援广宁农友之通电，对广宁农民惨遭地主屠杀，不胜愤激。万请我革命之国民政府火速派军前往广宁，镇压地主之屠杀行为，及严办参加此次残杀广宁农民之地主，勒令交还枪械，并解除地主武装。敝会誓为后盾。稍后宝安、清远等地农会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

人代表会等亦通电声援广宁农民。（《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日、5日、8日、17日）

同日 新会第二区水南乡农会会员潘明、潘运兄弟二人在田间操作，土豪张华炯、张子林纠众数十人，手持凶器，将二人围殴，致头破血流，抢去农具，挟掳潘运而去，潘明幸得逃脱。事后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派员查明属实，即经函请新会县长缉凶严办。（《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28日）

7月21日 广东省政府省务会议致中山县长卢家驹电云：“横档乡案情节重大，该县长自始至终迄无报告到省，荒废已极。速将详情电复察核。”（《广东省政府公报》第3期）

7月2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根据廖仲恺的提议，决议加派省农民协会代表一人参加中山事件调查委员会；广宁事件决议由军委会迅即派兵前往。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为广宁农民受地主屠杀宣言：“农友们、工友们、革命的兵友们及一切被压迫的劳苦群众，你们应当注意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于此次广宁地主屠杀农友、摧残农会的态度。中国国民党政纲是要保护农民的，农民协会是在国民政府之下的合法机关。现在广宁农会已被地主武力摧残了，中国国民党如果要实行他的政纲，国民政府如果是根据政纲而建立的，应即刻镇压广宁地主的反动，帮助广宁农民恢复被摧残的农会……惩办江屯惨杀农军之祸首，解除压迫农民的广宁地主武装，为广宁死难农民伸冤。”

7月23日 广东省政府举行第十一次省务会议，许崇智提议请农工厅会同民政厅根据本党及前政府保护农民一切宣言及命令议具草案，令各县长切实施行此案，由省政府先行令知广宁、中山、海丰、花县四县，责成切实保护农民。会议决议俟陈公博、古应芬两厅长调查完毕再提出会议。关于中山县横档乡被外舰炮伤事，函农工厅长、中山县长黄居素，另函军事委员会、外

交部，各派一员迅速组织横档乡案处分委员会。一面由省务会议电令该现任县长卢家驹，对于此案何以尚无报告。议决照办，并由民政厅电令卢县长。（《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第1册）

同日 花县卢县长复任后，县农会即呈请早日解决王福三一案，以安农民。卢县长查照前案，定期7月21日召集江耀中等继续开和平会议。詎江耀中等不特无人到会，且无只字答复，显系希图翻案，扬言以武力对待，和平会议经已决裂。本日，卢县长派队前往象山墟围捕本案正凶卢永隆，乃该恶等竟预先布置商团土匪数十人于街内外扼要把守，拒绝官兵入墟，作抵抗之状。（《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30日）

同日 广东省政府下达第142号训令，就广宁农会请速救援案和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3日会议议决，令军事厅长、农工厅长即便查照办理。（《广东省政府公报》第3期）

同日 第三师警备司令莫国华派营长黄宗汉带兵百余，偕同前次摧残农会屠杀农民之通缉案犯江汉英进驻潭埗。（《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31日）

7月23日、27日 《广州民国日报》连载农民部特派员关于广宁江屯惨案的调查报告称：“此次农军进江屯，在农军当然为拥护革命政府，截刘杨溃兵，同时恢复江屯农会。但在三师、县长则与地主方面为故设之陷阱，因当时由县协会执行委员会、三师莫国华、县长蔡鹤朋三面开联席会议，决定请农军到江屯扼防。农军出发时，他们答应拿出开拔费百元，旋减至六十元，最后只给卅元，并声明农军到江屯后，如地主反攻他们必派兵援助。今则农军由被困至陷，中间不知请救多少次，总是一屁不响。是则县长、三师莫部通同地主故陷农军于绝境，其又何辞以自解耶！言之实令人痛恨至极。政府保护农民不惜为再三再四之宣言，况当此政府整饬军队力精吏治之时，竟有此不法军队及行

政长官如此违背党纲，反叛政府，摧残农民之恶，则更令人悲痛莫名”。“现目前地主土匪已再进攻潭埗陷社岗，拆石岌岌可危，如再救援不至，势必广宁之农会尽被解散，广宁农民尽被屠戮而后已。特此报告，并代广宁十余万农民向部长请命，恳即派党军来援，并给广宁农民以枪支子弹，藉维危象。”

7月25日 农民部特派员周其鉴与省农民协会赴广宁调查专员同到第三师莫国华司令部，询问办理江屯案及派兵进驻潭埗情形。由参谋陈芳圃接见。陈说：“本部此次派兵江屯固受师长命令而去，同时亦受江屯地主所请而去，以后不见有农军亦不见有土匪，只见有民团与梁金保友军，你们农会根据有土匪不知何所根据。地主多数来本部告诉农军不法，如勒派他们的军饷，开拆他们的谷仓（谷仓本是在前次战争时被农民没收）等等。且江屯此次战争，是农军首先向他们开衅，他们为正当防御起见，不得不攻打农军。你们叫本部拿办祸首，如认为梁金保是祸首，则他是友军断不能办，如认为冯月庭等是祸首，则他们此次攻打农军是正当防御起见，断不能称为祸首。此次江屯事变本部已将一切情形报告本师长，你们如要怎样办请向师长交涉。本部此次派队去潭埗是受地主所请，因为地主报告彼方有土匪（指农民），本部责任在剿匪，不得不派队去维持。”（《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日、3日）

7月26日 花县农民协会发表支持卢县长通电云：“近更闻江耀中等一方面出银二万元下省运动，务必将卢县长推翻，行其运动谭声永上任之故志；一方面复召集联护卫两约之乡团会议，再行第二次进攻县城及驻防本县之攻鄂军。江耀中之反革命行为，业已显著，若不严办，非特于敝会有危险之忧，而革命前途亦发生阻碍。且卢县长系我国民党员，又为扶助农会最力之人，接任以来，办理王福三之案不遗余力，故遭彼方之忌。我农会农民方面正望其长此久任，为农民谋发展。江耀中等竟欲以资本势

力将其推翻。我农民方面无论如何誓不承认，一致反对，一面请政府迅派大队前来将江耀中、刘寿朋、卢永隆等拿获，尽法严办，以伸冤惨而安农民。”（《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30日）

7月27日 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九次会议，对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函达广宁乱事议决由军事委员会、省政府、中央党部农民部及郑师长组织委员会处理，并由中央党部指定主席案，决议指定军事委员会代表为主席。（《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3日）

7月28日 广宁乱事处分委员会成立。（《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9日）

同日 中山县县长黄居素致农工厅长陈公博电称：“窃中山一县，为本党总理故乡，本党总理又为中国国民革命之领袖，其所著三民主义及全国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皆于农民工人之利益再三致意。故县长到任之日，即饬属切实保护农工利益，以符党纲。惟是邑境地方辽广，农田独多，交通较先，工人尤众，年来思想进步，工农各会，春荀怒生，亟须助其发展，解其压迫，使工人农民之组织日益巩固，以立民治基础，以树全国风声。为此电陈钧府厅，伏乞俯念职县农工情形特别重要，迅予委派农工专员常川驻县，办理全属农工事宜，所有一切关于农会、工会各事，统由专员负责处理，由县切实协助。革命前途，庶几有赖。”（《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31日）

7月29日 广宁乱事处分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具体处理办法。廖仲恺、陈公博、黄学增、罗绮园、郑润琦等人出席。会议决定：（一）由第三师将莫国华所部调防，另派军队往广宁，由师长郑润奇训诫所部切实保护农民；（二）江屯农军被缴枪支勒令地主交还；（三）减租照总收获额地主所得不得超过五成；（四）禁止地主以强力压迫农民；（五）广宁民团之存在与否，请军事委员会决定计划解决；（六）广宁农民请求撤换新任县长李

绮庵及查办旧县长蔡鹤朋，交民政厅查办。（《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3日）

7月30日 广东省政府举行第十六次省务会议，陈公博提议：中山县第九区盗贼集中抽收禾捐；又中山县全属盗贼充斥，禾不能割，此二事呈请军事委员会，请于两日内速派兵剿办。决议呈军事委员会，已由军事委员会指派定第一师第一旅前往剿办。（《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第1册）

7月31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再次讨论广宁农民被压问题，决议交军事委员会及省政府办理，将处理不力之广宁县长李绮庵调任。

本月 广东省农民协会为广宁惨案致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请愿书。书云：“查日前广宁县江屯农民自卫军自被万恶地主冯月庭勾结散军土匪攻陷后，敝会即派专员前赴调查。现据报称：广宁地主与粤军第三师警备军勾结得如胶似漆，而反叛政府摧残农会之李济源的化身李绮庵又巧妙神通在省政府方面获委为广宁县长，于是李济源遂指挥其一班党徒、地主劣绅土豪大招兵马，并宣传李师行将得省政府取销通缉班兵入城。（广宁县城）之空气甚嚣尘上，广宁农会在此四面敌人包围之中，惟势非常危险，农民与地主再次武装斗争行再见于旦夕。”请愿书提出如下要求：（一）檄调大兵剿办广宁残杀农民之不法土豪地主；（二）将原驻广宁之第三师部队全数调离广宁；（三）收回新委县长李绮庵成命，查办旧县长蔡鹤朋；（四）由政府严令责成地方官吏军警保护农民协会及自卫军，并以政府名义布告晓谕阖属人民。（《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31日—8月3日）

1895——1899 年王先谦行年事迹考辨

邱 涛

在晚清湖南近代化过程中，有一位复杂而又重要的人物——王先谦。对王先谦在湖南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历来的研究和评价都集中于湖南近代化一个显著飞速发展时期——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湖南维新运动（可以说，湖南的改良活动远远早于光绪皇帝的著名的百日维新）中他所进行的活动上。可是，历来的评价都很简单而且较为一致地说他“反对维新，抵制革命”，国内几乎所有的论著基于传统的研究成果，都把他称为“顽固派”、迂腐不堪的“湖南劣绅”。此类评价值得商榷。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而编修、侍讲、侍读，光绪六年（1880年）升仕国子监祭酒，光绪十一年（1885年）外放任江苏学政，光绪十四年（1888年）因病辞官回湘。光绪二十年（1894年）主讲我国最古老、最著名书院之一、湖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岳麓书院。也正当此时，甲午风云骤变，维新风潮突起，而素以“守旧闭化名天下”的湖南省迅速走到了全国的前列，“新政”蓬勃开展。置身其中的王先谦如何处之？王先谦在其《自定年谱》中从未提及他在新政中有何积极表现，而对自己反对维新派的一些活动则大加渲染。但查阅一下其他有关资料即可看到，他在湖南新政中曾经表现得十分积极，并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1.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五十四岁。主讲岳麓书院”。^①王先谦在自己的年谱中只写此寥寥数语，对1895年这一年度的活动再无多述。然而正是在这一年：

a. 王先谦首先与新到任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商议在长沙创办私营和丰火柴公司（又名洋火局）。《湖南省志》上记载“湖南设厂制造火柴，始于和丰火柴公司。”^②

b. 随后，王先谦由熊希龄、蒋德钧等公推，领衔向陈宝箴呈递开办小内河轮船的禀稿。历经曲折，到1897年夏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批准。^③1898年两湖之间开通轮船，有力地促进了两省商品经济的发展：“湘鄂两省……商务之盛……商利之厚……即以鄂湘轮船公司为嚆矢。”^④

2.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在这一年中，作为全国维新运动重要舆论阵地的《时务报》以梁启超为主笔在上海创办，湖南订者寥寥无几。王先谦在阅读该报后，认为“议论精审，体裁雅饬”，所刊文章大多“忧时君子，发愤之作”，足以使人“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⑤他会同城南书院和求忠书院院长商定用公款购送《时务报》给在院学生，以“俾士子得以浏览通知。”^⑥王先谦还亲自发下《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恳切指出：“窃惟士子读书，期于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守帖括，罕能留意时务，为太平无事时之臣民，犹之可也。今则强邻逼处，列国纷乘，腹我脂膏，环顾几无所凭恃……为士

① 《王先谦自定年谱》卷中，光绪二十一年。

② 《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二次修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6～147页。以下引此书皆同。

③ 《湖南省志》第1卷，第173—174页。

④ 罗棠：《论湘鄂创办小轮公司之盛》，载《湘报类纂》。

⑤ ⑥ 《岳麓院长王益吾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549页。

子者，若不争自振奋，多读有用之书，相与讲明切磋，储为国器，出则疏庸貽笑，无以励相国家；处则迂腐不堪，无以教告子弟，枉生人世，辜负圣明，耻孰甚焉。”他企望士子们“开拓心胸”，从而能“上备国家栋梁之用”。这种思想绝非“顽固、守旧”。当时任湖南学政的维新人士江标特意把王先谦的劝阅手谕寄给《时务报》总理汪康年，刊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时务报》第十八册中广为宣传。以王先谦在湖南学界的崇高地位，这番言论对湖南维新运动的推动作用，对《时务报》在湖南的流传和维新思想在湖南的传播有巨大影响。

1896年，王先谦与黄自元、熊希龄等“集股创设机器制造公司，名宝善成公司。原为官督商办，由王先谦始终经理其中”，^①主要“制造电气灯、东洋车及银元、矿务各局一切应用之件。”^②获得一定成效的有“制辨机和发电装置电灯两项。”^③制辨机“较旧式工具提高工效十余倍”，由王先谦独立经营。当时湖南还没有电灯，该公司于1897年又创设一个小规模的发电厂，“由是长沙一城，自学堂、报馆以及通衢之大商肆，开始有电灯照明。”^④后来的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宝善成的基础上创办而成。

3.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五十六岁。主讲岳麓书院。

对于这一年的活动，王先谦在其《自定年谱》中又是只字未提。但是在这一年，王先谦做出了一个相当激进的维新举动，这就是由他领衔，联络熊希龄、张祖同等六人，建议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湖南巡抚陈宝箴在1897年所作《时务学堂招考示》中说：“上年十二月间，正在筹虑（创办）之际，适据前国子监祭

① ③ ④ 《湖南省志》，第1卷第151—152页。

② 《时务报》，1898年7月19日。

酒王绅先谦等呈请设立时务学堂前来。”^① 仅就这一点而言，王先谦思想和行动中的维新改良倾向就已十分突出了。王先谦不仅是领头提出此建议，在谭嗣同、熊希龄受陈宝箴之命筹备时务学堂之际，王先谦亦出力颇多。主张邀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总教习的建议也是由王先谦、黄遵宪率先提出的。湖南维新人士皮锡瑞在其《师伏堂未刊日记》中有着这样的记载：“至王祭酒处赴饮，笏山（即易佩绅）、壬秋（即王闿运）、采九（即刘凤苞）、拒香（即严家骥）诸君在坐。闻中西学堂拈考已发案，山长（即王先谦）、公度（即黄遵宪）拟请梁卓如，不知肯来否”^② 就是明证。

戊戌政变后，王先谦为洗脱“罪责”，故在其《自定年谱》中说是黄遵宪与陈三立、熊希龄合谋延请梁启超。

梁启超到湘之际，王先谦主张对这位以办《时务报》而在全国已声名鹊起的著名维新人士“学堂公宴……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普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③ 可见梁启超来湘办学堂之欢迎仪式，亦是由王先谦等所筹议的。时务学堂成立后，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总理，王先谦致函熊希龄，表示全力支持他办学堂，并说“先谦断无置身局外之想，有须先谦到场者，随时示知可也。”^④

4.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五十七岁。主讲岳麓书院。

在本年度的《年谱》中，王先谦写的是：学堂教习评语……

① 《戊戌变法》第4册，第494页。

② 《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辑。

③ 熊希龄：《上陈中丞书》，载《湘报》十二号；亦见《熊希龄集》5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④ 《王益吾先谦原函》，《戊戌变法》第2册，第593页。

悖逆语连篇累牍，乃知其志远在谋逆……余遂邀吴彬诸君具呈中丞，附录斋长禀词，请整顿屏斥，以端教术……熊希龄及唐才常、谭嗣同、毕永年诸人，缘此横目成仇，极意图陷……向使康有为邪谋得遂，国事不可问，余与吴彬且先落机阱矣。^① 似乎他与维新派完全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实际上就在这一年，他曾对“南学会”和《湘报》大力支持。

a. 1898年1月，谭嗣同等正式创办南学会。王先谦极表赞成，他说：“天下学术，断不能尽出一途”，“道合志同，各自立会，互相切磨，亦不失敬业乐群之义。”^② 南学会成立开讲，王先谦随同陈宝箴等到会听讲，“学会之初立也，中丞邀余偕往，听讲者亦多。中丞升座，首举‘有耻之志’四字为言，闻者洒然动容。”^③ 他称赞“省城学会，聚讲多贤。”^④ 由于王先谦态度积极，谭嗣同、熊希龄等还屡次邀请他前去讲学。在南学会成立开讲前，正月二十四日上午，熊希龄约齐南学会各主讲和佐办在时务学堂商议开讲事宜，王先谦踊跃与会，一直讨论到下午。^⑤ 由此足见王先谦不仅支持南学会，而且还参与了南学会的组织工作。

b. 1898年3月，谭嗣同、唐才常等“创办《湘报》，作为南学会主要的言论园地，为湖南最早的日报。”《湘报》“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⑥ 王先谦对《湘报》创办评价极高，他盛赞“湘报刊行，见闻广远。开拓民智，用意甚善。”^⑦

5.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五十八岁。主讲岳麓书院。

此时，戊戌变法已告失败，守旧的官僚俞廉三出任湖南巡

①③ 《王先谦自定年谱》卷中，光绪二十四年。

②④⑦ 《虚受堂书札·复毕永年》。

⑤ 《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⑥ 《湖南省志》，第1卷，第169页。

抚。在这种情况下，王先谦一面为开脱“罪责”而极力替自己洗刷，但仍不忘主张在“雄邦环伺之秋，为经久自立之策”。而所谓“经久自立之策”，就是“奇技巧工，以前所应屏除，今日断宜倡导”。不仅如此，王先谦还主张“民开其智”。^①这既涉及到实业，也涉及到政治制度、政策措施以及思想意识的变革，即他所认为的“故今之要务，在朝以明政刑为亟，在野以讲工艺为先。”^②王先谦主张“开民智”，主张转变国民的思想观念，提高国民乃至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实际上就是对历来封建统治阶级“愚民政策”进行抨击。同时他提出了较含糊、笼统的政策制度变革的主张（鉴于当时的政局，他也只能含糊地提出变革或称之为改良新政的主张），也就间接对戊戌政变后“新政”皆废的局面提出不满。其“开民智”主张表现出开明的近代化思想和近代民主精神。

从王先谦的上述表现看，把他斥为“反对维新”的“顽固派”、迂腐不堪的“湖南劣绅”的旧论，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但是，王先谦又确实曾有反对康梁的言论的行动。

（一）对政治风向的敏感，使王先谦在湖南领头发出了反对康梁的言论和行动。

1898年下半年，随着“百日维新”各项举措的铺开，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反维新的政治风暴似乌云压顶，整个政治态势已显出维新必遭中殒的征兆。湖南当然也不例外，可以说整个政治风向陡然变转。

此前，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就对康有为的维新主张和梁启超在他主办的上海《时务报》及长沙时务学堂里头的猛烈宣传“深为不满”。正如梁启超所说，他的宣传“惊动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阔官的张香涛之洞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

^{①②} 《虚受堂书札·致俞中丞》。

辩，学术上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① 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态度也由对维新的支持变为压制。一是调阅时务学堂批阅札记，对梁启超等人宣传维新变法的言论称为“乖谬”。正如唐才常所记述的那样，“外间攻学堂事，三月即有所闻。或谓中丞已厌卓如，或谓日内将使祭酒公代秉三，叶奂彬为总教习。种种讹言，皆云出自中峰……至中丞调阅札记，乃陈、杨二君自内学生收取，收齐后，始汇交受业一阅。受业深恐三教习闻之，致滋不悦，且戒秉三勿与三教习言，亦绝不料中丞已有疑心，果如外人所云也。来谕云‘分教等皇遽无措，及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而临时加批’等语。”^②

作为地方上层人物、湘省名流士绅，王先谦行事必然顾及到自己的身家性命，事事皆留后路，以防事败，则可为自己开脱以图保全。他不会象康梁等新锐人物那样行事带有极大的冒险性和投机性；相反，他会密切观察中央和地方统治集团的举动，随时准备相机而变。从中央到地方政治风向的陡变，使王先谦感到自己前一时期的言论行动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洗刷“罪责”的紧迫感使他起而发难，激烈地抨击康梁，领衔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呈递了保守的《湘绅公呈》，在其中大骂康梁，^③ 并把在湘省进行维新宣传的梁启超等人排挤出湖南。

（二）地方排外性因素，由于湘省士绅对地方政局日渐增大的影响力，这实际上就决定了身为岳麓书院这一湖南地区文化教育中心的一院之长（山长）、前国子监祭酒的王先谦在湖南的地位和影响。

①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页。以下简称《合集》。

② 《唐才常集》卷二，《上欧阳中鹄书（九）》，中华书局1980年6月版。

③ 《虚受堂书札》附《湘绅公呈》。

王先谦执掌的岳麓书院，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湖南的社会舆论和湖南士绅对官权的监督制约机制。所以，湖南维新运动如果没有王先谦的支持和参与，要出现全国维新以“湘省为冠”的局面是很困难的。也正因为如此，王先谦必然极为重视其自身的这种影响力。换言之，王先谦把湖南视为自己影响力所及之势力范围。一方面，他注意吸收和引进“西学”，主张“开民智”，“广设收听，开通声息”，^①积极支持和参与筹划、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等到湖南，支持创办南学会和《湘报》。另一方面，王先谦绝不肯放弃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然而，梁启超入湘后，王先谦积极提倡和参与筹建的时务学堂这一重要阵地逐渐被以梁启超为首的粤人（康梁派）所把持。当时，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都是广东人、康门弟子；更何况，湘籍青年士绅之翹楚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樊锥、易鼎等人“拜服南海五体投地”，^②“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③谭嗣同更是“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④完全归附于康门旗帜之下。这种情况，使黄遵宪发出“粤人治湘”的感慨，王先谦也大感威胁。而梁启超又进而提出一整套计划，欲由他们所掌握的时务学堂和南学会为核心来控制整个湖南的“新政”。对此，王先谦心态上必然产生“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感。梁启超这一套计划在其所撰之《湖南广东情形》一文中有系统的表述。^⑤其主要思想为一方面想通过维新求得湖南在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时得以自保独立；另一方面，他

① 《虚受堂书札·复毕永年》。

② 《唐才常集》，第238页。

③ 《湖南省志》，第1卷第159页。

④ 《合集·专集》三十四，《清代学术概论》第61页。

⑤ 其表述见《合集》专集之一《戊戌政变》，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第131—134页、第137—138页。

也想培植自己的势力，把“民权”、“绅权”以至“官权”皆控制于自己手中，使湖南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不能不激起王先谦的戒惧之心和强烈的排外倾向。岳麓书院历来为湖南教化和社会舆论之中心所在，同时也是湘省绅权对官权的制约和督促机构。岳麓书院山长隐然与湖南学政共掌湘省之教化。现在梁启超欲以王先谦参与筹办的时务学堂和南学会（在心态上，王先谦视之为自己辖下的教育机构而已）而凌驾于岳麓书院及王先谦之上，而左右湘省舆论及绅权，这种权力之争使王先谦等湘省士绅势力与梁启超等康门弟子的矛盾必然激化。对于这种权力之争，以及王先谦由此产生的地方排外性，对照王先谦和梁启超在湖南新政中的活动，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顽固派（或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的斗争。

（三）学术思想，特别是治学方法和态度上的差异和分歧，也使王先谦反对康门学说。

康梁“经世”之学本与王先谦所属的湖湘学派“经世致用”之学有一致之处，因而王先谦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梁启超及受康有为影响的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合作。但康氏学风又为这位朴学大师所深恶痛绝，即身为康门弟子的梁启超，对康有为的“时时武断”的治学态度也颇有微词。

的确，康有为这种学风对其维新事业遗患不浅，使他丧失了许多可以争取的有势力的同盟者。梁启超曾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觐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界焉求之。”^①王先谦也正是从学术推及政治。他说，康梁等人“不思尽心实事，挽救阽危，而相扇以虚名，专意鼓动世俗。”^②王

① 《合集·文集》之七，《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页。

② 《虚受堂书札·复毕永年》。

先谦认为康梁这种做法“即使率土觉悟，太息呼号，而无开济之道，譬犹举家醉卧，遽然梦醒，束手相顾，以须盗之入室，所谓固圉而保种者，果安在乎？”^①

王先谦反对康梁学风及其学说，并不表明王先谦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制度。他在《湘绅公呈》中说：“人才日起，而兼习时务者，不至以误康为西，转生疑阻。”^②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指导下，王先谦一方面主张“今国之急务在海军，民之要图在商务”；^③另一方面，他对湖南新政的标志和重要成就之一的时务学堂和南学会予以肯定，在人们普遍视为反动守旧的《湘绅公呈》中王先谦肯定“上年开设时务学堂，本为当务之急”，并未主张予以废弃。在排挤梁启超等广东籍人士时，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是由于对失去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戒惧所产生的地方排外性，而非出于对湖南新政的敌意。所以王先谦不同意驱逐湖南籍维新人士，他看见叶奂彬等人所拟之公呈约稿中有“‘驱逐熊希龄、唐才常’等语”，认为这样“未免过甚，援笔删去。”^④

综上观之，可以发现王先谦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值得作为典型人物深入剖析。目前，国内为王先谦“正名”的文章，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有五篇论文。^⑤这些论文基本上是把王先谦从“顽固派”的恶名中解放出来，同时却又把他圈入“洋务派”的框架之中。这些文章主张对王先谦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的作用分为前、

① ③ 《虚受堂书札·复毕永年》。

② 《虚受堂书札》卷一，《三致陈中丞》附公呈。

④ 《虚受堂书札·复洪教谕》。

⑤ 这五篇论文是：郑焱：《王先谦在湖南维新运动前期的促进作用》，《湖南师大学报》1986年3期；董剑平：《论王先谦的危机感与洋务观》、《维新运动中的王先谦》、《维新与卫道：王先谦的文化心态》，分别见于《烟台师院学报》1990年4期、1991年4期，《二十一世纪》1995年6月号；吴忠民：《论王先谦的洋务思想》，《东岳论丛》1985年1期。

后两期考察：前期起促进作用，后期起阻碍作用。这种分析有其合理性，王先谦确实有“以中学为报纸，兼采西学之长”^①的主张，这与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主张有相当程度的契合，但王先谦所说的“西学”，正如前文所述，实际上既包括西方的“奇技巧工”，也包括“开民智”、“明政刑”等制度和思想改造方面的主张。何况，“中体西用”也不是洋务派专有的思想主张，维新派同样有此类主张，所以也不能成为王先谦是“洋务派”的铁证。另外，王先谦如果是洋务派，（从人事组织方面来看，）也不可能在湖南新政中与维新派进行如此长期而深入的合作。

由于王先谦又积极参与湖南“新政”，所以《剑桥中国晚清史》为代表性观点的西方近代中国史研究者，把王先谦定性为湖南维新集团中的温和保守派。^②但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发现，王先谦不仅与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有相当大的分歧，而且在人事组织上也不属于维新派，并出于前述诸多原因，把在湖南进行变法宣传活动的梁启超排挤出湖南。所以把王先谦归入维新派也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由于王先谦活动的时期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多变性，使得其人也带有复杂多变的特征。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研究，不能机械地套入“顽固派”或“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固定框架和思维定式中。对王先谦的研究应当打破以“派”来作界定、研究和评价的模式。我认为，可以从多方面，以多角度来考察和分析王先谦：从王先谦作为地方上层人物、名流士绅及其政治特性这个角度；王先谦在湖南近代化历程中，由传统向近代转化而成为具有资产阶级商业化特征的“绅商”这一角度；王先谦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等角度。因此王先

① 《虚受堂书札》附《湘绅公呈》。

②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58—3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谦的思想特征以及人事组织上都不属于“顽固派”，也不属于“洋务派”或“维新派”，而是带有很明显的实用性特征。

97 号要目预告

翁同龢随手记

哈佛大学设立中文教授讲座史料选

陈立夫谈三青团、“CC系”

章太炎在南洋行迹钩沉

公家与会牌

——四十年代云南呈贡县村落基层组织调查

朝鲜策略

《近代史资料》总 85 号—94 号篇目解题

刘建光 编

统一党第一次报告（续） 曾业英 整理 （总 85 号）

见《近代史资料》（总 84 号）篇目解题。

近代中国自开通商口岸史料 张洪祥 周德喜 整理
（总 85 号）

近代中国沿海、沿江重要通商口岸，都是鸦片战争及历次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开辟的。到清朝后期十九世纪末，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也自行宣布开放一些通商口岸，也称“自开口岸”。本史料对“自开口岸”的情况，根据各种文献及报刊加以整理，对研究近代中国中外关系史和中外贸易史有参考价值。

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 孙祥澍 译
由其民 校 （总 85 号）

香月清司曾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等职。这里发表的“手记”，是他对侵华战争期间（1937.7——1938.5）的回忆录，对研究抗日战争史有参考作用。

东条英机、胡文虎会谈要旨（纪录稿） 段梅 译
（总 85 号）

此为日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和香港企业家胡文虎 1943 年在东京的会谈要旨，可供研究日本侵华史和胡文虎之参考。

巴蜀鸿爪录 剑花楼主 （总 85 号）

剑花楼主，本名李鸿球，湖南人，曾任上海信托日业公会理

事、世界书局经理。这是他 1933 年由沪入川的沿江所记，对当时四川的社会情况提供了比较具体的材料，可供参考。

于冲汉日记 辽宁省档案馆供稿 (总 85 号)

于冲汉，辽宁省辽阳县人，清末附生，曾在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任奉天巡按使署外交顾问，为著名的亲日派，伪满洲国时期成为重要汉奸之一。其日记为研究日本在东北的侵略，尤其是对东北矿产资源的掠夺，保存了不少具体材料。

天津盐业纪略 高凌雯 手订 (总 85 号)

此篇“纪略”记述了天津盐业的沿革和有关盐业的事迹，是研究盐业史、经济史和天津地方史的参考资料。

禁火葬录 佚名辑 张仁善 整理 (总 85 号)

记载清同治年间石门县举人反映嘉兴地区居民实行火葬情况，及清廷出示禁止火葬的资料，对研究近代民俗史有参考价值。

新发现的日军强征中国妇女充当军妓史料析 李 秦
(总 85 号)

本文对伪天津市政府警察局档案所载日军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军妓）的史实进行叙述分析，是“慰安妇”问题研究的重要著作。

清代上海房地产卖加绝叹契介绍 冯绍霆 (总 85 号)

这组资料反映上海自清乾隆四十三年至清末民初 130 余年，上海房地产交易及契约手续等情况，可供研究参考。

* * *

翁同龢自订年谱 翁开庆 整理 朱育礼 点校
(总 86 号)

此年谱系根据手稿本整理，起自光绪二十四年三月至光绪三十年五月，是研究清末政局和翁同龢的重要资料。

有关太平天国的西文资料选译 夏春涛 (总 86 号)

这里的几篇资料, 均是根据太平天国时期来华的西方人士的记载译出, 颇有参考价值。

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大事记 司马文韬 (总 86 号)

记述 1924—1927 年国民党对广东农民运动的政策和措施, 对研究中国革命与农民运动, 以及国共关系史均有参考价值。

1935 年日本驻华总领事会议记录 杜春和 耿来金 整理 (总 86 号)

1935 年 4 月 8 日至 10 日, 日本驻华公使召开日本驻中国各地总领事会议, 讨论日本扩大对华侵略诸问题。此记录对研究日本侵华史有参考价值。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选译 (上) 天津编译中心供稿 (总 86 号)

小川平吉, 日本长野人, 早年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 后参加东亚同文会, “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建立伪满洲国的运动, 1938 年至 1941 年与蒋介石私人代表在香港进行“和平谈判”。本文记录了此次谈判的经过和内容, 对研究抗日战争中的中日关系颇有参考价值。

日本对中国的毒品战 [日] 江口圭一 著 杨光尘 译 (总 86 号)

此书是江口圭一根据金井章和沼野英不二在日本侵略东北和内蒙期间, 分别为内蒙傀儡政权的最高顾问和经济部次长时保存的有关种植和贩卖鸦片、毒品的文件材料撰成的《日中鸦片战争》。书中记录不少日本利用鸦片和毒品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 可供研究日本侵华史参考。

翁文灏纪事诗选 杨永庆 整理 (总 86 号)

翁文灏 (1889—1971), 浙江鄞县人, 著名地质学家。1935 年后, 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长兼任资源委员会主

任委员等职，还一度任行政院长，1951 年从法国回国，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自编《蕉园诗稿》从未发表。这里选登的诗多为翁氏纪事感时之作，可备研究参考。

* * *

近代来华百大保险公司 黄光域 (总 87 号)

近代中国保险事业一开始就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对此以往研究很少，资料亦缺。本文将外国在华百大保险公司分别予以介绍，为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保险事业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奕譞致翁同龢函稿 谢俊美 辑校 (总 87 号)

这批信件是中法战争期间奕譞致翁同龢的函稿，对研究当时清朝政府和中法战争均有参考价值。

吉同钧东行日记 杜春和 耿来金 整理 (总 87 号)

吉同钧（1854—1934）陕西韩城人，光绪十六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为清末法学家。《东行日记》记述吉同钧于 1902 年随大学士裕德去奉天查办内蒙古哲理木盟图什业图亲王被逼死案件，对清末政治黑暗腐败情况有所记述，颇有参考价值。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选译（续） 朱宗震 译 陈春华 校 (总 87 号)

见《近代史资料》（总 86 号）篇目解题。

张绍曾来往函札 景 芝 整理 (总 87 号)

张绍曾清末为北洋陆军第二镇统制，民国初年曾任陆军总长、国务院总理。本文收录 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与各方面的来往信札，可供研究民国史参考。

吕公望亲笔稿 吉 迪 整理 (总 87 号)

吕公望（1879—1954），浙江永康人。早年参加光复会，清末任新军标统，辛亥革命时率军攻打南京，民国初年任浙军师长、浙江督军兼省长。1921 年闲居天津，1928 年后在家乡经营

工矿业，解放后任浙江政协委员。这份手稿为吕氏晚年所写，多为生平回忆，有些材料可供研究辛亥革命和民国史参考。

有关善后大借款俄国外交文件选译（上） 朱宗震 译

陈春华 校 （总 87 号）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要求善后借款，俄、日两国也参加了借款谈判。此件根据三十年代苏联出版的《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译出，可供研究参考。

导淮说明书 柏文蔚 著 王鑫义 整理 （总 87 号）

柏文蔚自 1912—1946 年多次提倡疏导淮河，并写出有关说明书、建议书，但多已散佚，《导淮说明书》是现存比较有系统的一篇，可供研究参考。

汤玉麟父子在热河地区种植鸦片档案史料选 辽宁省档案馆供稿 （总 87 号）

1926—1929 年，汤玉麟任热河主席期间，与其子汤佐荣强迫人民种植鸦片，搜括农民，并使鸦片流毒全省。这里发表的是从热河都统公署档案中选出的原始资料，对研究奉系军阀和热河地区史颇有参考价值。

郭嵩焘未刊手札 刘金库 整理 （总 88 号）

郭嵩焘为近代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又是第一任驻英公使。这里刊出的是他于驻英、法公使离任后，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信札，内容涉及中外交涉以及郭氏政见，为研究中外关系史和洋务运动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有关天津教案的四份密件 朱东安 整理 （总 88 号）

1870 年（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是近代中国重大教案之一。这里刊出的四份密件对天津教案的起因和性质均有所记述，是研究天津教案和中外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

天津盐产量及课引 德瑾琳 著 吴弘明 译

(总 88 号)

这是德瑾琳向赫德的报告,内容是天津芦盐的产量和收入情况,以此作为中国向帝国主义赔款的担保。

新发现的孙中山海外电报存稿 邓丽兰 整理

(总 88 号)

这批电报是 1911 年 4 月至 10 月发至加拿大温哥华、香港和旧金山同盟会等处的,为孙中山全集所未收。

翁文灏自订年谱初稿 翁心鹤 翁心钧 整理

(总 88 号)

《年谱》记述谱主一生学术和政治经历,为研究近代人物和民国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平定乌泰叛乱往来电文选 王 琦 整理 (总 88 号)

乌泰是清末内蒙古哲里木盟的一个郡王,因被清廷革职而不满,受沙俄唆使于 1912 年发动叛乱,后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平定。这里刊出的电报,即为赵尔巽与吴俊陞为平叛事往来电报。

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会谈记录(上) 上海市档案馆供稿

(总 88 号)

此为 1926 年 2 月至 5 月北京政府外交部与各国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关于收回上海会审公廨的会谈记录,对研究中外关系史很有参考价值。

《伍廷芳集》补遗 丁贤俊 梁尚贤 整理 (总 88 号)

伍廷芳(1842—1922),近代中国外交家,曾任广州政府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这里刊出的文电涉及当时南北政局、广东省施政方针等,可补《伍廷芳集》之缺。

中国近代指纹学初创史略 钱永贤 季忠平 (总 88 号)

指纹法是 1929 年由英国传入我国的,首先在上海公共租界施行,以后推广于全国各地。本文对指纹法传入中国及实施情况

作了介绍,可供参考。

* * *

梅贻琦日记选(上) 黄廷复 整理 (总89号)

梅贻琦是著名学者,曾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校长。此为梅氏1941年所写日记,对了解和研究梅贻琦生平事迹有重要参考价值。

奉系军阀金融档案选 辽宁省档案馆供稿 (总89号)

这批档案是1917年王永江任奉天财政厅长期间,整顿奉天财政金融的档案,对研究奉系军阀及东北财政史有参考价值。

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会谈记录(下) 上海市档案馆供稿
(总89号)

见《近代史资料》(总88号)篇目解题。

澳门界务交涉资料选编 新智辑 (总89号)

本资料由广东香山县邑绅及旅居海外华侨的五件文书所构成,可供研究澳门史参考。

重校《天兄圣旨》、《天父圣旨》(上) 王庆成 校订
(总89号)

这两部太平天国文献都是太平天国印书原刻本,是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藏于英国国立图书馆东方部。

抗战时期三个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条约 李嘉谷 冯敏
整理 (总89号)

抗战时期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条约过去仅见俄文本,这里刊出的是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文本抄件,为研究中苏关系的重要资料。

抗战胜利前后昆明民主运动史料选编 闻黎明 供稿
(总89号)

昆明在抗战胜利前后是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重要基地,这里选

编的是一组有关昆明民主运动的资料。

越南新闻录 古为明 整理 (总 89 号)

“新闻录”主要记述刘永福抗击法军情况及其在越见闻，颇有参考价值。

少白府君行述 张秀清 整理 (总 89 号)

少白，本名长庚，满洲正黄旗人，曾任伊犁副都统、驻藏办事大臣、成都将军等职。此《行述》为其子培元所撰，可供研究西北边疆史及长庚生平参考。

开滦矿案经过始末 翁文灏 (总 89 号)

翁文灏民国初年任北京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多年，此为作者 1953 年写的回忆录，记述了开滦煤矿的开办和变化过程，可供参考。

李昭庆致李鸿章书 朱赓荪 整理 (总 89 号)

李昭庆为李鸿章之三弟，曾随李鸿章于同治元年至上海，参与淮军进攻太平军。此件可供研究太平天国及淮军史参考。

* * *

日意格 1864 年关于中国内战的日记 夏春涛 译
(总 90 号)

同治元年五月三日(1862 年 5 月 30 日)太平军攻克湖州等地，日意格当时为法国海军军官，曾任宁波海关税务司，后参与“常捷军”与太平军作战。他在日记中记述了太平军攻陷湖州的情况。对研究太平天国史有参考价值。

重校《天兄圣旨》、《天父圣旨》(下) 王庆成 校定
(总 90 号)

见《近代史资料》(总 89 号)篇目解题。

夜半钟声 乔治忠 整理 (总 90 号)

此书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原内阁文库)，内容记述外国

侵略者拐卖华工情况。

梅贻琦日记选（下） 黄廷复 整理 （总 90 号）

见《近代史资料》（总 89 号）篇目解题。

杨守敬与日本森立之笔谈稿 张新民 整理 （总 90 号）

杨守敬（1839—1915）清末著名学者，1880（光绪六年）赴日本，曾与日本学者森立之笔谈中国古籍，可供研究参考。

善后大借款俄国外交文件选译（下） 朱宗震 译
（总 90 号）

见《近代史资料》（总 89 号）篇目解题。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委会记录正本》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记录本》 尚明轩 整理
（总 90 号）

1947 年至 1948 年，国民党召开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记录正本》和《记录本》为研究“民革筹建”提供了第一手历史资料。

* * *

李鸿章手札 刘金库 整理 （总 91 号）

李鸿章手札 26 件，内容涉及中朝关系、天津洋务等历史事实，颇有史料价值。

衙役职事 近代史所图书馆整理 （总 91 号）

本文详细列举了中国旧时地方官府各种下层官吏、职员的业务分工及名称，可供了解和研究清代地方政权和官场情况参考。

《味道轩文钞》中有关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资料选注 钱伯泉
选注 （总 91 号）

《味道轩文钞》作者周先檀，湖南衡阳人，其家与曾国藩、左宗棠有交谊，同治十三年（1874 年）在左宗棠部下金顺营中当幕僚。所录书信系其在新疆军营中所写，对研究左宗棠收复新

疆颇有参考价值。

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 杜春和 编选 (总 91 号)

1911 年秋,清廷为镇压辛亥革命调奉天陆军第二十镇入关,二十军统制张绍曾与革命党人有联系,要求停止武装镇压,实行立宪,并计划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秘密组织“燕赵联军”进攻北京,这是张绍曾在军中与各方往来函电。

国会篇 张国淦 (总 91 号)

张国淦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这是他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回忆录的一部分,可供研究北洋军阀史参考。

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 张书学 李勇慧 (总 91 号)

收录傅斯年致王献唐、张幼山、黄侃、张元济等人的书信,可供研究傅氏学术思想及现代学术史参考。

留美通讯——清华早期留外学生通信选 黄廷复 田彩凤 辑注 (总 91 号)

《留美通讯》是从清华大学早期(1929 年以前)历届留学生的信件中选出的,这些书信涉及许多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可供研究近代留学史、教育史等参考。

华北开发公司概况 王士花 摘译 (总 91 号)

华北开发公司系 1938 年由日本政府批准设立的。本篇资料对研究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的经济掠夺有史料价值。

六枝农村汉族婚丧调查 刘成学 (总 91 号)

本文是对贵州省六枝特区汉族婚丧习俗的调查,可供研究贵州民俗史、社会史参考。

周震鳞自序 周用宜 供稿 (总 91 号)

周震鳞,字道腴,湖南宁乡人。早年曾与黄兴、陈天华创立华兴会,后任职国民政府,晚年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又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1950 年写的《自

序》，记述自己生平和所经历重要历史事件，可供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参考。

吴芝瑛夫妇致徐自华的 12 封信 周永珍 (总 91 号)

吴芝瑛、徐自华均为秋瑾密友，这十二封信对了解和研究秋瑾生平事迹及营葬情况有重要参考价值。

* * *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刘路生 点校 (总 92 号)

本书为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所写，介绍美国政治、历史和地理，刊刻于 1838 年。这是当时介绍美国情况最全面、最具体的一部著作，对中国人了解美国起了重要作用。

洪仁玕亲书自述、诗句 王庆成 辑校 (总 92 号)

《洪仁玕自述》是洪仁玕被俘后所写的供词，为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

洪天贵福亲书自述、诗句 王庆成 辑校 (总 92 号)

这是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后的自述，亦为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

洪仁政、黄文英供词 王庆成 辑校 (总 92 号)

此件为太平天国将领洪仁政、黄文英被俘后在清军席宝田军营的供词，为研究太平天国重要史料。

李世贤部闽南活动文书 王庆成 辑校 (总 92 号)

此为英国档案馆所藏抄件。对天京失守后，侍王李世贤部在闽南地区的活动叙述较详，是研究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参考史料。

驻俄公使胡惟德往来电文录 金 土 整理 (总 92 号)

这里发表的是光绪三十年、三十一年，即 1904、1905 年，清驻俄公使胡惟德与清廷的往来电报，对研究日俄战争史和中俄关系史很有参考价值。

王国维致罗振玉手札 刘金库 整理 (总 92 号)

王国维致罗振玉手札有九通藏辽宁省博物馆。这些手札写于 1917 至 1918 年,是研究王国维与罗振玉的关系和王氏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这里整理的八件手札为《王国维全集》书信卷所未收入,颇珍贵。

关于收回会审公廨的谈判记录 (续) 上海市档案馆供稿
(总 92 号)

本篇资料为 1926 年丁文江和江苏交涉使许沅与帝国主义各国驻上海领事团谈判收回会审公廨问题共十一次谈判的记录,对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上海史均有参考价值。

傅斯年未刊书札 耿来金 整理 (总 92 号)

傅斯年(1896—1950)为著名学者,曾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里发表的是 1931—1940 年傅斯年致胡适、蒋梦麟、赵元任、蒋介石等人的未刊信件,对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和傅斯年的思想具有参考价值。

晚清来华西洋建筑师述录 黄 遐 (总 92 号)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相继侵入中国,并在沿海、沿江各大城市设立租界,开办企业,修建近代建筑,这些近代建筑多为西洋建筑师所设计。本文对西洋建筑师来华的介绍可供对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和建筑史参考。

* * *

英国收藏的有关近代中国的部分文献资料选 王庆成
整理 (总 93 号)

这是收藏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未编号文献资料,内容是太平天国攻陷南京之后,一个反对太平天国的叫“野渡子”的人所记太平军统治南京的情况,如废除家庭、男女分馆等。此件系木板刻印,很有史料价值,可供研究太平天国参考。

嘉善庚申纪事 王庆成 整理 (总 93 号)

此件收藏于桂林第一图书馆, 美国耶鲁大学藏有一册。原题为《赵氏洪杨日记》。过去刊布者均非全文。内容记载 1860 年太平军、清军、官府、土匪对嘉善的统治情况, 是很有价值的史料。

黎元洪未刊信电稿 于铁丘 杨西木 整理 (总 93 号)

这是黎元洪于民国元年(1912 年)至民国六年(1917 年)期间的电文、信札、示谕等文献资料, 对研究民国初年政局很有参考价值。

天津租界市政章程法规选 刘海岩 译 (总 93 号)

选编英、意租界的章程法规共四篇, 均自当时的印本或单页印刷品, 第二件为中英文对照本, 藏天津社科院图书馆。这些“法规”是外国侵略者把西方城市的某些管理制度强加给中国, 使天津成为半殖民地城市。可供研究天津史和中外关系史参考。

二十世纪初几则社会习俗及哥老会调查 岳小玉 辑
(总 93 号)

哥老会是中国近代重要秘密社团之一, 本资料辑录了河北省霸县、赵县, 湖南省平江县, 以及四川哥老会的情况调查。对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史、会党史和民俗史均有参考价值。

罗易、汪精卫“电报事件”档案选 李玉贞 译
(总 93 号)

1927 年“4.12”事变后, 国共分裂, 共产国际派印度人罗易到中国参加中共“五大”。1927 年 5 月, 罗易将联共中央给中国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 由此引起联共对罗易的不满, 并被召回。这里选辑的档案, 对研究中共党史和国共关系史很有参考价值。

严复关于开采矿案的说帖 李桂华 整理 (总 93 号)

开平矿案是中国近代丧权辱国的著名案例, 是中英交涉的重

要问题之一。1901 年严复应张翼之邀，主持开平矿务局事务，并写了这个说帖，对开平矿案的处理提出重要意见。这个说帖，对研究开平矿案和严复生平都有参考价值。

抗战时期张季鸾、胡霖与日本谈判资料三则 卫金桂 整理
(总 93 号)

1938 年《大公报》总编兼副总经理张季鸾与香港《大公报》记者胡霖受蒋介石、张群之托，与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局顾问神尾茂进行会谈，并与日本学者山崎接触。会谈虽无结果，但留下了三则资料，对研究日方和谈条件及蒋的态度颇有参考价值。

明道会要旨 伍廷芳 著 丁贤俊 喻作凤 整理
(总 93 号)

《明道会要旨》1921 年伍廷芳所作，是一本涉及道德、宗教、哲学、科学的小册子，未编入《伍廷芳集》，后在英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发现。此书流传极少，可供晚年研究伍廷芳思想参考。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96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史资料 总 96 号/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

ISBN 7-5004-2425-6

I. 近… II. 近… III. 近代史-史料 IV. 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1315 号

202/5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29 千字 印数 1—1600 册

定价:15.00 元